

回顾与反思
苏联东欧问题译丛



一杯苦酒

——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
和改革运动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 著

徐葵 张达楠 王器 徐志文 译

1990
А.Н.ЯКОВЛЕВ

新华出版社

一杯苦酒

——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

[俄] 亚·尼·雅科夫列夫著

徐葵 张达楠 译
王器 徐志文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 / (俄) 雅科夫列夫著; 徐葵等译.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9.8
(回顾与反思·苏联东欧问题译丛)

内部发行

ISBN 7 - 5011 - 4530 - X

I. 一…… II. ①雅…②徐… III. 布尔什维克 - 研究 - 俄罗斯
IV. D3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4142 号

Горькая чаша:

Большевизм и Реформация России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版专有权由作者授予新华出版社

一杯苦酒

——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
(俄) 亚·尼·雅科夫列夫 著
徐 葵 张达楠 等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75 印张 插页 2 张 300 千字
1999 年 8 月第一版 1999 年 8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 - 5011 - 4530 - X/D·719 定价: 24.00 元 (内部发行)
(提请读者注意: 本书正版封底均贴有防伪标志)



亚·尼·雅科夫列夫（1997年）



雅科夫列夫和他的双亲



作者与戈尔巴乔夫等访问中国(1989年)



作者与戈尔巴乔夫等游览长城(1989年)



作者在苏共19次党代会上（1988年）



作者会见里根（1988年）



作者与科尔会见（1989年）

译者的话

我参加了本书部分翻译和全书最后的译文校对。在译校过程中接触到书中讲到的许多苏联历史上的事件和作者提出的看法，有时不免引起我对我们的苏联研究工作和对本书的一些思考和想法。我想简要写出来，供读者参考。

本书俄文版于1994年出版。1998年作者对原书又作了不少修改，特别是在第四编中增加了很多新的内容。这本中文版就是根据修改稿翻译而成的。作者说他这本书是他“多年来思考、怀疑、踌躇和苦恼的结果”。看来，他把书名叫做《一杯苦酒》，意在表明他回顾苏联的历史犹如在品味一杯苦酒。

我是几年前知道这本书的。大约1997年年中，50年代初我就认识的一位俄罗斯老朋友来北京开会。他当年是苏联《共青团真理报》驻北京记者，后来又长期任《真理报》驻北京记者，回国后在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工作，中苏关系恶化时他因主张苏联应同中国友好而吃过一些苦头。在交谈中我问他，现在俄罗斯出了很多回忆录，你认为哪几本材料和内容较丰富，值得一读。他推荐了几本，其中就包括雅科夫列夫的这本书。

雅科夫列夫的这本书在一定意义上是一部回忆录，但在更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部学术性著作。作者从历史、哲学、政治、经

济、文明等方面回顾了苏联的历史和苏联的改革，探讨了欧洲文明的发展过程和世界当前面临的许多世界性问题。雅科夫列夫其人我们中国人大概并不陌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他是苏共主要领导人之一，曾是戈尔巴乔夫的左右手，也是利加乔夫的对立面。他在这本书中明确表明他反对苏联的布尔什维主义，主张社会民主主义。也许有人会提出一个问题：这样一个人写的书，是否有价值予以译介，是否值得一读？我译校完后的感觉是，不但需要读，而且需要对书中涉及的很多问题和提出的许多观点进行深入的研究。

首先，我觉得为了进一步弄清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详细过程和研究苏联剧变的深层次原因，就需要读这本书。这几年俄罗斯出版了不少当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其他一些高级领导人的回忆录。我认为我们在研究苏联改革和剧变问题时，这些书都需要看。我国已翻译出版了利加乔夫的《戈尔巴乔夫之谜》、雷日科夫的《大动荡的十年》、博尔金的《戈尔巴乔夫沉浮录》等书，这些书对我们了解和研究苏联当时的情况都很有用。可是苏联这场改革的主角戈尔巴乔夫本人的回忆录《生活和改革》一书尚无中文译本。雅科夫列夫也是这场改革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他在书中披露了别人的书中没有涉及的一些事，例如1987年年中苏共中央全会上发生的叶利钦提出辞职事件之前，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一次会议上叶利钦同其他政治局委员间就已经产生意见分歧和争论的事实。当时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中存在着两派。雅科夫列夫等人的立场观点是同利加乔夫等人不同的。如果只知道其中一部分人提供的事实和观点，而不知道另一部分人提供的事实和观点，是很难弄清楚苏联这场复杂改革过程的，因而也就很难对之作出

有充分根据的分析和判断。这是我认为我们需要阅读这本书的第一个原因。当然，正如有的俄罗斯回忆录作者所说的，回忆录作者往往“面临着两个诱惑：一是算老账；二是在事后把自己写得比当时更聪明、诚实和勇敢”。本书作者是否受到这两个诱惑，这需要读者在阅读时加以鉴别。

其次，作者在书中就有关法国大革命、马克思主义、欧洲文明的历史发展、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苏联走过的道路、斯大林主义、布尔什维主义、苏联改革的教训、俄罗斯该走什么道路、当今世界面临的种种挑战等问题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的议论和看法。不管你是反对，还是同意，或部分反对部分同意作者的观点，我觉得这些问题和观点还是需要我们认真加以探讨和研究的，而且要对这些问题作出符合历史实际和时代精神的、科学的、有说服力的回答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且不论本书作者的思想理论本身如何，仅就作者按他的思想理论体系就这些问题展开的论述来看，可以说本书有它相当的广度和深度。

再其次，我想，对作者这个人和他所代表的思潮在苏联的出现这个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也是很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的一个问题。雅科夫列夫出身在农村的劳动家庭，参加过卫国战争，战后在大学历史系毕业。他在苏共各级的职务阶梯上从基层党组织书记逐级上升到苏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后来当了10年驻外大使，戈尔巴乔夫改革期间上升到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会同布尔什维主义、斯大林主义决裂，而转向社会民主主义。而且在苏联像他这样发生演变的人不能说是个别的，他不过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代表人物。为什么在苏共执政下，雅科夫列夫等人会对苏联社会和党内生活在开始时感到困惑和怀疑，后来

又感到失望，最后成为苏联这个制度的反对者？对这些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难道不值得我们很好研究吗？我是完全相信毛泽东在苏共 20 大后对当年斯大林严重破坏法制的错误的评论的。他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①。最近我还看到一篇文章提到胡乔木讲述毛主席当年的心情说：“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就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② 究竟斯大林的这种统治在那个年代的苏联老百姓，尤其是在思想比较敏感的青年的心中产生过什么影响？从雅科夫列夫对自己战后经历的叙述中，似乎也可对这个问题找到一点回答。

应该承认，我们对苏联不少历史问题和事件还不是很清楚的。有些事我们似乎已清楚了，但这几年随着一些历史档案的发表和历史真相的澄清，我们认为已经清楚的问题，又得重新去研究。比如，苏联何时开始揭露斯大林个人迷信这个问题，我们过去一直认为是赫鲁晓夫开的头。可是现在有确凿的材料说明，斯大林逝世后第一个提出要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是马林科夫，

① 见《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333 页。

② 转引自李慎之著《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见《作家文摘》1999 年 1 月 12 日第 312 期。

而不是赫鲁晓夫。^① 所以，只有多方收集材料和广泛阅读各家的著作，包括雅科夫列夫这样的著作，我们才能进一步增加我们对苏联历史的了解，使自己的研究更加深入下去。

以上是这本书的译校工作所引起的我的一些感想。至于对这本书本身，我还想说这是一本就俄文来说也是较难读，因而也是较难译的一本书。作者喜欢使用文学的笔调、生僻的字眼和独特的表达方式，并引用诗文和典故。从本书的目录看，有不少章也不易一眼就望文生义知道它要讲什么，只有看了正文才能知道题目的涵义。所以我想在这里先把本书各编的主要内容作一简介，也许可为读者提供一些方便：

第一编《从源头谈起》先叙述了作者本人的经历，苏共 20 大对他的影响，对赫鲁晓夫的分析评价，一直讲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然后在第一编第二章《先驱者》中，转而论述法国大革命

^① 见 1997 年 5 月 27 日俄《独立报》刊登的俄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Ю·Н·朱可夫的文章：《悄悄的非斯大林化——反个人迷信的斗争是在 1953 年 3 月开始的》。文中引用档案材料说明，从斯大林 1953 年 3 月 5 日去世后到同年 9 月 7 日赫鲁晓夫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之前这段时间中，马林科夫主持苏共中央主席团工作。他从 3 月 19 日就开始反个人迷信。他提议 4 月召开苏共中央非例行全会，专门讨论个人迷信问题，并起草了反个人迷信的讲话稿和决议草案。但因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多数主席团委员（其中包括赫鲁晓夫）的反对，这次全会未开成。6 月发生了贝利亚事件。7 月 2 日——7 日召开了讨论贝利亚问题的中央全会，马林科夫在总结发言中除讲贝利亚问题外最后又着重讲了反个人迷信问题。全会的决议中也提到个人迷信问题。但由于许多中央委员的坚持，会后发表的全会公报对个人迷信只字未提，马林科夫的讲话和全会决议成了秘密档案，直到 1992 年才公开。文章说 9 月赫鲁晓夫担任第一书记和苏斯洛夫主管宣传工作后，苏联报刊上又开始宣传斯大林。

及其领袖人物，以及法国大革命的先驱者们对马克思、恩格斯等的影响。其后三章议论的是哲学问题。作者对矛盾论、物质和精神、本质和现象、基础和上层建筑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提出了他的质疑和看法。

第二编《布尔什维主义》是对苏联历史的评论。从1917年二月革命讲起，论述二月革命的教训未被记取，直到今天俄罗斯还要完成二月革命提出的许多任务。接着论述十月革命，分析了布尔什维主义产生的历史原因、它同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专政的关系、其思想特征教条主义在俄国土壤上产生的历史根源。第八章《墓地十字架的种植者》，题目十分怪僻，讲的是斯大林执政时进行的大清洗、大镇压，列举了大量材料，叙述了莫洛托夫等（包括赫鲁晓夫在内）在大镇压中所起的坏作用，也叙述了朱可夫对几百万回国后被当作劳改犯对待的被德军俘虏的苏军战俘的平反所起的作用。第九章论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第十章论述了斯大林对冷战的产生应负的责任，其中提到1949年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态度。

第三编论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来龙去脉。收录了作者本人在改革初期提交戈尔巴乔夫的进行全面改革的政策建议。分析了苏共提出加速战略的历史原因。叙述了苏共领导层内部分歧的出现和发展。论述了苏联的政权和权力的体现形式——党机关、经济机关和暴力机关的三头执政结构在苏联历史上的作用及其与1991年8月19日事变的关系。作者还对列宁、斯大林到契尔年科六位苏联领导人作出了他的评价。作者在第十二章中还分析了苏联改革的困难、它的失败原因和教训，以及戈尔巴乔夫的失误。最后在第十三章中论述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改革，承认对

民主和市场经济有过浪漫主义的幻想；在这一章里讲的《七个“非”》中，还提出了他认为俄罗斯改革和俄罗斯的社会改造应实现的七个目标。

第四编对 20 世纪世界曾出现的两种制度的对抗和冷战进行了反思，认为俄罗斯要走的是不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二分法划分的“第三条道路”，并论述了当前世界向人类提出的挑战，从分析几个世纪以来欧洲文明的发展过程出发，提出了冷战后的世界应向何处去的问题。

在这里我还要强调一下我个人认为需要译介《一杯苦酒》这本书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在当今信息化和全球化趋势日益发展的世界上，我们需要了解和研究世界各国各种学派和思潮，而不能对之不闻不问，我们应该对各种学派和思潮提出的问题作出我们自己的判断，对当今世界在各方面向我们提出的挑战作出我们自己的回答。我们有邓小平理论和 15 大的精神作为指导思想，我们又有 20 年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这是我们的优势所在。对雅科夫列夫在他的书中提出的一系列观点，读者无疑会作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

最后，我要说明一下我们四个译者所做的工作。徐葵（中国社科院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翻译了本书的第一编，王器（同上单位研究员）翻译了第二编，张达楠（同上单位译审）翻译了第三编、作者写的序言和附录中的作者生平，徐志文（同上单位副研究员）翻译了第四编。张达楠对全部译文作了第一遍通校，徐葵作了第二遍通校。还要说明的是，作者在原稿中没有任何注释，为了读者阅读的方便，我们尽可能给书中讲到的一些人和事作了一些译注。但是不论在译文中还是在译注中错误在所难免，

尚祈读者给予指正。

徐 葵
1999年1月

致中国读者

首先我衷心感谢在贵国出版我的这本书。贵国人民是值得深深敬重和钦佩的人民，她建立了世界上一种最古老的文明，她在自己几千年的历史中经受了一切可以想象的和难以想象的、来自内部的和来自外部的艰难困苦和欺凌侮辱。

我将这本名为《一杯苦酒》的书奉献给中国读者。本书原先在俄罗斯出版，但奉献给你们的这一本已做了很多修改，增加了新的文献和新的评价，还添写了几十页新的内容——这是因为时间在流逝，对往事的回忆在不断涌现。改革（原文为 перестройка）^①时期的事件参与者所写的众多的回忆录为我提示了已经尘封在我脑海深处的一些事实，还提到了我以前根本不知道的一些事实。

本书是对近几年来受到生活无情检验的那些想法——正确的和谬误的——做一总结的尝试。

但同时我想（至少我有这个意图）分析一下我国改良主义的

^① 作者在书中不同的场合使用了 перестройка 和 реформа 两个词，前者在我国译为改革，是指 80 年代中戈尔巴乔夫开始的改革。后者既可译为改革，又可译为改良，我们在翻译时视原文含义使用了不同的译法。——译注

经验，尽管它前后不一贯、举步维艰，而且受革命主义的牵累，但它坚持不懈地寻找自己的道路。

思考中的俄罗斯越来越清楚，国家面临了严峻、实质上的悲剧性的挑战：要么是慢慢地死亡，要么是新的流血的爆炸（仅仅这个世纪，俄罗斯由于战争、饥饿和镇压就死亡了6000多万人，进行了三次革命，人民经历了轮番不断的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战争、芬兰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阿富汗战争、车臣战争）。

如果说本世纪我国的所有政治体制都已遭到了破产，那么今后将怎样生活？

合理的出路只有一个：放弃革命，走改良（原文 *реформа*）之路，痛苦的、缓慢的、在过去曾不止一次地遭到否定和扼杀的改良之路。

今天，甚至明天仍会众说纷纭，说什么改革（*перестройка*）没有事先作出计划，常常进行得不坚决，耽误了时间，而改革的领导人没有看准或没有考虑到某些东西，等等。

我不想争论，可能是这样。直言不讳和准确评价的时间还没有到来。将来当激情平息，全俄名利场告终，理智清醒，各种民族主义浊流消退之时，将黑白分明，希望之虹的七彩颜色会自然呈现。

目前对我来说，有一点是清楚的，这就是我国人民对历史的挑战给予了正确的回答。

其他的一切就只取决于我们了。

最近十年，这是我对俄罗斯在新的道路上探索自己命运深感满意的十年，但这十年也有不少意外，如俄罗斯的生活现实就曾

残暴地对待某些关于自由和民主的浪漫主义幻想。

但是，这里既没有任何新东西，也没有任何不寻常的东西。现实永远不会是意识的翻版。生活是沿着自己的不可预知的道路前进的。

人们常常问我，我对目前所发生的一切是否满意，改良的进程是否符合最初意图。关于这个问题，我准备在本书中详细阐述。而现在只能这样回答：既满意又不满意，既符合又不符合。

今天，俄罗斯社会正在极其艰难地走上坚定、正确的道路。自由的意识正在逐渐溶入实际生活，而这一点是改革事业将生存下去，任何严寒也扼杀不了正在俄罗斯破土而出的道德和人性的萌芽的重要保证。关于这一点，本书有详细论述。

但是也有令人失望的地方。主要的失望在以下各方面。还在改革开始以前很久的时候，我在幻想我国未来时，在自己的脑子里勾画了各种图画，而且一幅比一幅美丽。当时我深信，只要还俄罗斯人民以自由，人民就会觉醒，就会提高自己的地位，找回尊严，就会开始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要求来安排自己的生活。现在我要非常难过地说，所有这一切原来都是带点傻气的浪漫主义幻想，这种幻想很可能是由于对畸形的苏联现实极端反感而产生的。

现实生活中的情况不完全是这样。看来只有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而且也不是全体，正确地评价了自由生活。而大部分人好像还没有察觉他们已获得了自由。很可能这是乞丐心理和千百年来所处的奴隶状态造成的。换句话说，自由没有成为我们生活方式的主轴和我们的民族意识。

其次是，偷窃、匪祸、撒谎、团伙犯罪、恐怖活动、吸毒、

卖淫以及许多其它丑行都暴露出来了。偷窃已成了职业。很遗憾，新贵们由于自身的专业素质极差，责任感极低，他们制订的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使任何一个想要挣钱的精明人必定会加入偷盗、敲榨勒索和贪污受贿的行列。

我曾相信，民主制将会给官僚主义以重大的、甚至致命的打击。唉，民主制不仅未能胜任这项任务，而且本身蜕变成官僚主义民主制。官僚主义——看来这是我们的不治之症。同苏联时期相比，现在克里姆林宫的臣民数量几乎减少了一半，可是当官的人数仅最近几年就增加了120万，占到有劳动能力的人口的20%。我国的官员不受监督，高傲自大，贪婪成性，他们（包括地区的和部门的）又在企图把国家加速推向官僚封建主义并胡作非为。正在产生一个新的畸形制度来替代社会主义的封建主义。国家的恐怖暴行已为普遍的行贿受贿、偷窃和抢劫所代替。贪污受贿成了官员任职的实际目的。

我坦率地说，我没有料到议会制会给民主制带来危险，不管这是多么不合情理。我原来认为，自由的差额选举能够将正直、有头脑、有教养和有专业知识的人选进立法权力机构。可是，现实生活的情况是，不少对事业和社会漠不关心的无耻地蛊惑人心的人却钻进了中央和地方杜马。这种变化的最早征候在人民代表大会时期就已显露出来，只是很少有人去注意罢了。大家曾把这些情况作为笑料，却没有想到，社会蛊惑会成为争取权力的基本手段。

但是，大众媒体及其周围形成的情况，使我感到特别气愤。在改革较为顺利的年月，民主派的报刊已开始呼吸充满生机的自由空气。这是一段美好时光，勇敢而正直的人不断涌现，取得了

不可估量的成绩。可是当野蛮的市场一来到，一切都被摧毁了。出卖灵魂、践踏良知、1937年式的告密、按指使写文章和作广播、极度的恬不知耻以及蔑视真理蔑视人等等现象统统出现了。善与恶、真理与谎言、自由与无权已像在列宁和斯大林执政时那样，开始变得毫无标准，互相转换起来既容易又简单，丝毫不受良心的谴责。

过去，报纸和杂志、广播和电视，在扫清通往社会的民主健康化道路的障碍方面，曾经做了难以估计的大量工作。可是今天，许多新闻工作者都想发财致富。这当然是好的，但只是在不违背挑起教育别人重担的人的荣誉与尊严的情况下。

我在写这一切的时候真正感到心疼。我有某些理由认为，公开性也是我一手扶植的产物。因此，当看到和感到新闻界的某些精英人物如此健忘，我简直无法容忍。当然，我也远不是对新闻圈子里的所有人都表示愤慨的。我同很多编辑和严肃的记者仍旧友好相处，他们非常清楚地记得公开性是从哪里来的，产生的结果是什么，知道当时大家是怎样由于有了言论自由而沸腾起来的。

不管现代大众传媒的状况如何，要是没有这些传媒，俄罗斯的民主就存在不了。只要大众传媒销声匿迹哪怕一二月，政府当局就又会胡作非为，搞起专政来。在俄罗斯用棍棒来管理要比用法律来管理容易得多。

这些问题要一一列举是举不完的，但有一个问题还是必须讲一讲。改革伊始，宗教政策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奉为国策的无神论，由于它道德败坏，已悄悄地寿终正寝。政治局在这个问题上曾经是意见完全一致。我曾直接负责过宗教问题。我认为，

复兴宗教将会使民族在道德上得到健康发展，而崇高的精神境界将能遏制和治疗缠得人晕头转向的物质追求、贪婪和嫉妒。

遗憾的是，很多宗教界人士不知为什么开始投靠政府当局，依靠它的施舍过活，而且非常忙碌地去履行作为国家附庸品的下贱的职责。社会期待宗教的是进行治病救人、使人精神高尚、富于怜悯心和诚实的布道，而这种布道在没有宗教信仰、不信神的无限痛苦的几十年之后的今天是特别需要的。

今天的俄罗斯，有很多事情使我们所有的人感到忧心忡忡……但俄罗斯终究有过 1956 年、1985 年和 1991 年，这些年份是消除不了的。时间消逝得既快又慢。只要我们走入歧途，这对我国人民将是悲剧，对高度相互依存，可是还没有完全认清自身的统一性和还没有对世界生活的全球化作好准备的整个世界也将是悲剧。

我们需要一个伟大的俄罗斯，但这种伟大不是靠帝国的野心和军事实力，而要靠人民的美德和生活的质量。俄罗斯只能在自由的条件下，在法律至上和人的权利高于国家利益时能达到这种伟大。

我对出现一个自由繁荣的俄罗斯是有信心的。

如果本书在中国找到自己的读者，我将由衷地感到高兴。

亚·尼·雅科夫列夫

目 录

译者的话	(1)
致中国读者	(9)
第一编 从源头谈起	(1)
第一章 代自白	(4)
第二章 先驱者	(38)
第三章 既定的救世主说	(50)
第四章 关于矛盾	(66)
第五章 本质和现象	(80)
第二编 布尔什维主义	(88)
第六章 教训未被记取	(93)
第七章 啊，盲人们，盲人的引路者们	(104)
第八章 墓地十字架的种植者	(120)
第九章 威武不能屈	(146)
第十章 哺育冷战的人们	(156)
第三编 是希望还是灾难?	(171)
第十一章 改革的来龙去脉	(174)
第十二章 是失败吗？不，是胜利	(220)

第十三章	七个“非”	(248)
第四编	变革, 变革	(258)
第十四章	世纪的挑战	(263)
第十五章	意识形态时代是否过去?	(282)
第十六章	沙文主义及其后果	(295)
第十七章	斯大林主义之“死”尚需时日	(311)
第十八章	新俄罗斯与西方	(325)
第十九章	一切有待体验	(332)
附 录:	雅科夫列夫生平	(352)

第一编

从源头谈起

只要我们仍是奴才，只要我们还没有挺起腰板昂起头，布尔什维主义就不会死亡。

布尔什维主义来自何方？

这个问题还将长时期地伴随我们。

……学者会犯错误，而且一定会在某个方面犯错误，而他的错误往往成为促进知识进一步发展的肥沃土壤。

学者比起他们其他同时代人来说，更加是自己时代的教条和谬误的俘虏。

学者乃是理性的、方法论的和实践的认识工具的人质。由于这些工具的不完善，就有可能提出错误的假设和不正确的建议。

真正的学者必定会沉缅于某些思想，并赋予其中某种东西夸大或缩小的意义，把某种东西理想化或绝对化。

这就是全部实情，因此对那些真诚地寻找真理、不断地怀疑并一再检验自己得出的结论的人进行指责，未必是合理的。

如果一个学者开始把自己的发现认为是圣人的启示，而把自己看作是救世主，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马克思主义正是发生了这种情况。

可是，说实在的，我所感兴趣的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而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国恰恰走上了马克思的社会救世主思想的道路，而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在政治垄断和意识形态神话的基础上形成了军事官僚专政，剥夺了人的一切财产和权力。而这种专政在生活的所有领域里都显示出了它的无能和缺乏适应力。

这样一来，俄罗斯在很多方面错过了20世纪，大大地落后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第一章 代自白

从20世纪的社会实验所引起的希望和幻想，到懂得人民命运曾面临的是多么深不可测的深渊，人们所经历的这条路是条痛苦之路和充满矛盾之路。这条路对那些曾经真诚地相信过、真诚地希望过、真诚地犯过错误和实诚地劳动过的人来说，更是痛苦和充满矛盾。

本书写得非常不轻松，不论是在剖析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什么在实际生活中站不住脚以及剖析浸透鲜血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时候，还是在剖析充满矛盾的改良经验和我国遍体鳞伤的精神生活的时候。

对我来说，本书是我多年来思考、怀疑、踌躇和苦恼的结果。



我是卫国战争年代入党的，时至今日仍然深信，当时我根本无权站在一旁袖手旁观。这是严峻地考验良心的时刻。同时我也相信共产主义思想，认为它是生活的真谛。

可是，从前线回来之后开始产生的失望情绪越来越沉重地压在心头。在我家乡雅罗斯拉夫尔地区到处可见快要饿死的儿童，农村被继续掠夺到颗粒不剩，城里把旷工和上班迟到的人关进大牢，而在农村则把拾麦穗或扔在地里的已冻坏的土豆的妇女关押起来。

我没有立即想到，对我来说将开始另一种生活。青年的富于浪漫色彩的热情已经消失，战争已经过去，可是我头脑里却是一锅粥，时而烫得叫你受不了，时而冰凉得叫你寒心。

我生平初次认识到什么叫谎话连篇，什么叫恬不知耻。我本不愿意相信，可是事实越来越明显：所有的人都在说谎——不管是在台上发言的，还是在台下恭敬地专心听人发言的。对我这个天真的农村小伙子和由中学直接上战场的前线战士来说，这一切都是无法忍受的。

在前线，我感到自己是完全自由的，因为死亡之神对所有的人都平等看待，而共产党员也确实可以成为人们的表率。

可是在后方，而且还是在城市里，却是另一种生活，一种厚颜无耻、蛮不讲礼的生活，你要是正视它，随时可能被置于死地。

我是拄着拐仗从前线回来的。我妈妈见到我一瘸一拐地走向我们家的时候，惊吓得把手里拎的水桶都掉在了地上，她哭着说：“今后我将怎样照料你呢？”她坚持要我到纺织厂或酒厂去做办公室工作，因为需要扶养卡佳、柳霞和塔玛拉三个妹妹。

我想学习，想掌握一门专业。我父亲（他和我在同一个方面军作战）受伤后继续留在军队服役，他支持我的想法。

我想进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或高尔基市造船学院，但没有被录取，原因是我的健康状况不合格。

我被雅罗斯拉夫尔医学院录取，可是当我前往了解我该在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去上学的时候，我见到了几个没有被医学院录取的姑娘在伤心地哭泣。姑娘们因不能上医学院而痛哭，而我对到哪一所学校上学都满不在乎。我开始可怜这些姑娘，我要回了有关证件，将它们送到了雅罗斯拉夫尔师范学院。我原想进语文系，结果把我分配到了历史系。

我是第一次过集体宿舍生活，我们五个残废军人住一个房

间。我们经常争论，提出各种疑问，但是我们内心还是对未来的生活将会是诚实有序和美好公正充满了信心。

也有遇到过我幻想中的“公正”取得了“胜利”的情况。一次，在党的会议上产生了要追究也是前线战士的阿纳托利·博佳科夫大学生的党员责任的问题（他在个人档案里没有写明曾当过科夫罗夫市兵役局长的父亲被镇压的事）。我只是后来才知道，这个“案子”是根据克格勃的秘密报告进行审理的。尽管阿纳托利再三说明他父亲已平反昭雪，也都无济于事。

会上分成了两派，曾是前线战士的大学生纷纷起来为自己的同学辩护，而教师们则主张把阿纳托利开除出党，结果也真把他开除出党。我们不服，上学院党委去申诉理由。尽管院党委再三劝我们不要再采取什么行动，我们还是去找了区委。可是区委坚持党员大会的决定有效。我们不愿就此罢休，去了市党委。在那里发生了难于置信的事，第一书记接见了我们并支持我们的意见。我们真是欣喜若狂。不过，这对我们来说也只是一个一俊遮百丑的实际经历而已。

再来看看苏联战俘的遭遇，他们被从德国集中营赶到了自己祖国的集中营。一次我去弗斯波利耶火车站，见到不少眼泪汪汪的妇女，他们希望能接到自己的丈夫、兄弟、父亲，可是我见到的只是从闷罐车厢仍下来的无数纸团，里面写着扔纸团者的姓名及其亲人的地址。

这是对人们尚还脆弱的心灵极其沉重的打击，是残酷无情的打击。而随后这种打击连续不断地发生。

人们说，经历会使傻瓜变得聪明起来。我看事情并非完全是这样。

这里我讲一下我同当时被称为“党的良心”的马特维·费奥

多罗维奇·什基里亚托夫^①见面的情况。从中我得到了关于“党的生活”的印象非常深刻的教训。这些教训构成了我一生中使我逐步摆脱幻想的那部分经历。

什基里亚托夫当时是党的镇压机构——党监察委员会主席。

当时我较年轻，还不到30岁，在雅罗斯拉夫尔州党委当中学和大学部部长，同时兼机关党组织书记。

召开了一次例行的党员大会，因我休假没有出席这次会议。据讲，会议原来开得很平静，可是突然间有一个行政处的工作人员（可能是克格勃的、内务部的或军队的）指责州委第一书记格奥尔吉·谢苗诺维奇·西特尼科夫“在畜牧业部门搞托洛茨基主义”。西特尼科夫大为光火，说了他对此想说的一切，如说，他不记得托洛茨基曾管过畜牧业。

这也就成了西特尼科夫的“错误”。批评西特尼科夫的卡申就此给党中央写了信，之后西特尼科夫、农业书记戈诺博布列夫、身为机关党组织书记的我以及写控告信的人，都被召去见什基里亚托夫。在那里开展了一番思想教育。我对荒谬的指责和抱有成见的讨论感到震惊。

我本想说点什么，可是什基里亚托夫打断我说：“闭嘴，你还年轻，你弄不清某人是何许人也。”

我只是在后来才知道，这件事完全是人为造成的，因为马林科夫不喜欢西特尼科夫。而什基里亚托夫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将来撤西特尼科夫的职。

不过，倒是控告者本人使这种结局得以避免。当什基里亚托

^① M·Φ·什基里亚托夫（1883—1954），苏联国务活动家和党的活动家。1906年入党。在图拉参加十月革命。1923—1934年为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39年起为党中央委员，联共（布）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1952年为主席。——译注

夫宣布说，必须就此事作出最严肃的结论时，卡申就用气忿的口吻说：“作什么结论？应该立刻把他们所有的人都撤职，都开除出党。”

什基里亚托夫不能容忍他这种态度，他说：“噢，原来你是这种人！你教训党中央来了！”接着他转向西特尼科夫，补充说道：“您怎么能让这种在苏共中央都不知分寸的、没有纪律的人在党的机关里工作呢？”

关于托洛茨基主义和压制批评的事也就到此结束。西特尼科夫马上打电话到雅罗斯拉夫尔，口授了州委常委关于解除卡申工作的决定。

同什基里亚托夫第二次见面的情况同样令人相当焦躁不安。

当时，反对世界主义的斗争正方兴未艾。中央委员会收到一封匿名信，说我身为中学和大学部部长没有表现出必要的警惕性，没有同高校中、特别是医学院中“世界主义者”的学阀行为作斗争。

什基里亚托夫开始责备我不懂得党的路线，结果是助长了世界主义，因此应该受警告处分。顺便说一句，什基里亚托夫在讲话中没有提到“犹太人”^①这个词，因此我不太理解他说的是什么，我就嘟嘟囔囔说了些含糊不清的话，如说世界主义在雅罗斯拉夫尔市没有什么表现。

“你走吧。”——他含糊不清地说。

可是当我走到房门时，他又问道：

“为什么走路有点瘸？”

“前线留下的毛病。”我回答说。

^① 据苏联后来披露的材料，当年苏联的反世界主义，其矛头在很大程度上指向苏联的犹太族人。作者此处讲到“犹太人”的意思即在此。——译注

“在什么地方打的仗？”

“在沃尔霍夫方面军。”

“在哪个部队？”

“在海军陆战队。”

他叫我回到办公桌旁坐下，然后用比较温和的口气给我讲警惕性、讲帝国主义的阴险奸诈、讲其他等等，最后就客客气气地让我走了。看来他们后来选上了别的什么人来当“替罪羊”。

同什基里亚托夫的第三次见面，最后搞得很尴尬。他们先是把我叫到原先去过的那间办公室去见指导员^①，然后带我去见什基里亚托夫。

他这一次也没有认出我来。他面前放着一封信，他低着头开始说我不懂得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说我在同世界主义的斗争中有过火行为。接着他读了他面前那封信上的几个人的姓名，除了亨金教授外，其他人我根本不认识。我说，亨金已经到沃罗涅什大学去当教研室主任了，他是通过应征招聘去的。

接着，我对什基里亚托夫说：

“马特维·费奥多罗维奇，您一年前曾和我谈过话，可是当时您批评我的内容和现在完全相反。”

他瞧了我一眼，看来已经想起来了，随即就问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叫人拿来了去年的卷宗。突然，他高声地说道：

“瞧，就是那个人的笔迹。这个坏蛋！”

当着我的面，什基里亚托夫给雅罗斯拉夫尔州委第一书记打电话，命令他一定要找到这个写匿名信的人。

不久就找到了这个写匿名信的人，原来他是某个区委的前书记，曾因酗酒被撤职。我曾参加了撤他职的这项工作。

^① 苏共中央的干部职称，指党中央各部分管各地区或部门的、经常下去巡视和指导工作的干部。——译注

回到雅罗斯拉夫尔后，我问州委第一书记，为什么我会有什么基里亚托夫本人过问我个人问题的这种“殊荣”。

“一切都很简单，”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卢基扬诺夫回答道。“他们在找一个具有全联盟影响的惩治对象，正好这时候碰上了这封匿名信。”

就是这种毛病，不过我还是要感谢这几次见面，因为它使我在刚从事党务工作时就明显地减少了我的天真想法。

这类事情真是讲也讲不完，可是有谁对它感兴趣呢？我国健忘的人实在太多了。

常常有人问我，我是什么时候和为什么开始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首先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实际体现，即所谓“社会主义”的。

在本书后面的篇章中，我将不止一次地再来谈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尤其对我这个几乎一生献给意识形态、社会科学和外交工作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但是，正是因为我曾仔细研究过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这个教义的“永恒真理”在我眼里一年比一年暗淡无光，越来越经常出现疑点和空白点，往日的那种使人浮想联翩的色调已明显地失去光泽。

这里没有什么悖理之处，这里有自己的逻辑。

当然，赫鲁晓夫 1956 年在苏共第 20 次代表大会上做的报告，对拨正看法和形成新的评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出席了这次大会，我当时是苏共中央学校部的指导员。

顺便说一句，就在那一年秋天，我打报告要求派我去学习。离开中央机关，在当时来说可不是件寻常的事，可是我决定再一次仔细研究一下经典作家的著作，而且现在已经洗过 20 大的“凉水淋浴”，这样做很有好处。

二

既然谈到苏共 20 大和 20 大对 20 世纪俄罗斯历史的转折意义，也正好来详细谈谈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历史至今还没有对他勇敢走出的一步作出全面的和应有的评价。

我对他的议论与其说是分析性的，不如说是我自己的看法，而且带有感情色彩。此外，我想把这个历史人物放到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去考察，而不是把他作为今天玩弄政治游戏的玩具。

如果谈到近百年来的政治家，那么我不记得有比赫鲁晓夫更充满矛盾、更复杂、具有如此可悲的双重意识、思想和行动反复无常的人物。

那么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国的雕塑家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雕塑了一尊放在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台座上的赫鲁晓夫的青铜头像。赫鲁晓夫的雕像就立在他的墓地上，在那里**思想**。

雕像的容貌给人**强烈印象**，**它**颇有哲学意味。

赫鲁晓夫首先是一座充满活力的**火山**，它的喷发有时给社会带来好处，有时也为害不浅。他既是**互托邦**主义者，又是现实主义者；他既是一个具有鲜明的马尼洛夫^①式自我表现的人，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实用主义者；他**机智狡猾**，**像**小孩子那样天真。

他施巧计制服了老奸巨滑的贝利亚，赶走了朱可夫，而使勃列日涅夫靠拢自己。他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短兵相接，打得精疲力竭，可是对苏斯洛夫和波德戈尔内等人却不战而降。

他不仅酷爱戏剧和俄罗斯古典作品，而且还是“艺术中布尔

① 马尼洛夫是果戈理《死灵魂》中的人物，爱痴心妄想。——译注

什维克烈火的保护者”，捍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哨兵。

人们称他是“玉米狂”和“空话专家”，他成了民间笑话的主人翁。但是，人们也称他为敢于推翻斯大林关于新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论点的大政治家。

赫鲁晓夫是一个要通过苏联社会主义创造幸福的不屈不挠的献身者。他毫不犹豫地向共产主义，而且只是向共产主义迈步前进。他总想尽快地达到目的地，可是他越走离目的地越远。

他看到了我国的落后，可是他是一个不屈不挠的乌托邦主义者，他总是在寻找能使国家摆脱困境的“灵丹妙药”，如种玉米、开荒、搞农业化学等等。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有一次在讲到鲍里斯·叶利钦时说这个人俄罗斯气质太多了。

那么，关于赫鲁晓夫该怎么说呢？

这里真用得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说法，俄罗斯人膀大腰粗，好大喜功，让他收敛一些，决无坏处。

这可真是那种把帽子往地上一摔，用皮鞋敲桌子的胆大妄为的小伙子作风！

这里也真用得上的果戈理的说法，不爱骑快马的人能算是俄罗斯人吗？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一生，曾经是春风得意、飞黄腾达。他是一个大老粗，爱幻想和心地善良的人，但有时过于严厉和专制。他是个试验家，常常是雷厉风行和变化莫测，态度粗暴和蛮不讲理，善于领悟和机智过人……总之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但是，促使我念念不忘尼基塔（老百姓曾这样称呼他），而且对他怀有感激之情的，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首先是20大。

还在20大前的1954年，我去滨海边疆区出差，在那里听了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对包括渔船船长在内的当地积极分子的一

次讲话。他对斯大林时代讲了一段很尖锐的话，使我感到十分惊讶。当时他说，党现在面临着一项任务，这就是“要把在斯大林年代被糟蹋掉的、被轻率地消耗掉的人民信任的善意一点一滴地收集起来。”

我回到莫斯科后，都不敢对一般认识的人讲这个“反话”，只是对知己朋友说了说，而且要求他们绝对保密。

当时已处于混乱不安的过渡时期，斯大林去世引起的张惶失措的局面还没有完全过去，恐惧心理依然存在，谁入主克林姆林宫掌权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现在，当我们谈到赫鲁晓夫的历史功绩时，可以有充分根据地将以下业绩归功于他个人：

——把千百万人从劳改营拯救出来，揭露了斯大林的真面目，使整个民族或部族从流放地回到了原地；

——使农民摆脱农奴地位，不再服劳役，取消了农村“定居区”制度，给农民发了身份证；

——把和平共处思想提到了优先地位，探索了相互理解和合作的可能性，构筑了穿过“铁幕”的通道。

曾经有一段时间在街道上、火车站和火车车厢里出现了沉默不语的人群，这些人由于在劳改营养成的习惯，正如索尔仁尼琴笔下的伊万·杰尼索夫那样，个个都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他们珍惜每一个呼吸空气的机会，拖着沉重的脚步沙沙作响地走着，贪婪地吸着香烟……这些都是获得释放的囚徒。

曾被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泰斗斥之为“叛徒”的整个民族或部族，如卡尔梅克族、车臣族、印古什族、巴尔卡尔族、鞑靼族、卡巴达族、朝鲜族、波兰族和日耳曼族人，都回到了故乡。

古拉格群岛的劳改营陆续关闭，撤掉了铁丝网，拆毁了瞭望塔，毒死了专门用来咬人的警犬。

赫鲁晓夫式的布尔什维主义摆脱了自己的斯大林“嫁妆”。

但是，根本没有想到要对反人类和反人性的罪行进行苏联式的纽伦堡审判。

我给斯大林时代的独裁者之一以应有的评价似乎有点奇怪。其实不然，如果真心诚意地探索真理的话，那这里也就没有什么矛盾。

在生活中要确定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问题上的恶压倒善或善压倒恶，总是很难的，因为善恶总是相伴而行的。

在这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

有一种习惯在我们这里早已成了时髦的东西：回顾过去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照例基本上都是一些废墟。那些未实现的希望的废墟，种种希望总是很早就夭折了。

但是，无论过去和将来始终存在着永远生机勃勃的生活。即使在斯大林主义的冻土上它也开过花，也曾花色娇艳，可怕的镇压、官方一律的思想和对无神论的单一领袖的绝对信任的坚冰都没有能使它窒息。

赫鲁晓夫曾强烈地感到有问题，可是他不明白他是在暗室里东闯西突，在绝路上蛮干。

尽管如此，赫鲁晓夫的突破乃是从野蛮向文明的突破，是从动物的本能向恢复理智的突破，是从非理性向责任感的突破。它惊动了社会的精神世界，而这是自由的唯一土壤。

但是，赫鲁晓夫在克服斯大林主义方面跨出重大一步之后，对防止事态的危机性和灾难性发展既显得缺乏能力，也没有这个愿望。

他是时代的产儿，体制的产儿。

他作为政治家、作为人，曾遭到人们的极度唾骂，他被人遗忘了20多年。万幸的是，人们还是像对常人那样给他送葬，把他的遗骸安葬在普通人的墓地。

历史喜欢不近常情的事。赫鲁晓夫先是从肉体上埋葬斯大

林，他是治丧委员会主席，后来在 20 大上又从历史上埋葬了斯大林。

在斯大林的葬礼上，赫鲁晓夫先后让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讲话，而这三个人后来都被他除掉了。

赫鲁晓夫继承了一份可怕的遗产。1953 年初，专制制度的狂妄行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千百万人还关在劳改营和监狱里。

农村过着赤贫生活，战后完全荒芜。每天晚上集体农庄的作业队长总是沿着村里的街道一户一户地给成年人派明天的任务。他这种派工也是吃力不讨好，因为那些由于繁忙的家务变得凶狠的婆娘们都给他做嘲弄的手势，而留在农庄的男子汉则一边骂娘一边诅咒为“工分”、为工作日去干活。

儿童们拎着粗麻布袋在收割过麦子的布满麦茬的地里捡掉下来的麦穗。

每个农户在整个春天和夏天向收货站交牛奶，而秋天交牲畜和家禽，这是在交实物税。

斯大林爱好历史，熟知农奴制的一套规章制度，他原封不动地通过强硬手段把它们运用于我国农村。

20 世纪中叶，俄罗斯的农村成了国家农奴制农村，而且国家从农民那里夺去了除空气以外的所有东西。

就废除俄罗斯农奴制一事来说，应该向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深深鞠躬致谢。农民不再服徭役交租赋，取得了身份证和有保证的货币劳动报酬。我们好像把赫鲁晓夫做的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可是它像从监狱和劳改营释放“政治犯”一样，具有非常伟大的不可磨灭的意义。

赫鲁晓夫的第一脚踢得好，踢得非常好。也许对知识分子来说，这段时间只是“解冻”，可是对普通老百姓、特别是对农民来说，这已经是春天，尽管阴雨连绵，但毕竟是春天。

我重复一句，赫鲁晓夫终究是相信空想的共产主义，亲自在探索通向这种共产主义的道路。要是他没有“直面美国”^①就好了。他在美国参观家庭农场后，更坚定了要把集体化进行到底的思想。他相信集体农庄能够达到家庭农场的效率。而每一次他想出的花样失败后，他就狂热地贯彻新的空想，寻找新的救命稻草。

砍掉家庭副业，这是赫鲁晓夫对农民，也是对全体人民犯下的滔天大罪。

停止采用草田轮作制也带来很大损失。威廉斯院士是位天才的科学家，他发现地球上的生物圈是按封闭曲线发展和自我恢复的，而草能够恢复和增加土壤的营养供求能力。

当赫鲁晓夫认定种玉米是解决饲料问题的关键后，他就下令不再种原先的饲草而种玉米。于是拖拉机犁开进了草地大肆开荒。结果是尘暴四起，大小河道变浅淤塞。

尘暴——这也是赫鲁晓夫的一大罪状，因为自然界既是人民的栖身之所，又是人民的母亲。

合并集体农庄，而且常常是胡来的令人不快的合并，这也是集体化的继续，确切地说是集体化的大功告成。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贯彻关于克服城乡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信条。看来，这两个差别都没有被克服。

直到今天，政府关于马的决定仍让我感到心疼。我们过份匆忙地告别了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拉着农村文明大车的马。马给人们耕地、运货、打仗，肉和奶还可供人们食用。但是，看来是马的无所事事的嘶叫声和大车的吱嘎声使社会主义“丢了脸”。

我国在世界上堪称落后的农业已不再使用马匹，可是根本不

^① 作者在此借用了当年赫鲁晓夫访美后苏联出版的记述赫鲁晓夫访美的一本书的书名。——译注

缺车辆的美国人至今仍养着一千多万匹马，用以完成零星的日常工作。而我们几十年来，不管一抱干草、一捆柴禾，还是一袋粮食、一桶牛奶，已经都是由带拖车的拖拉机沿着坑坑洼洼的道路去运送的。

赫鲁晓夫感到农村问题严重，甚至试图成立作为苏共一个部分的农业党。可是在农业生产本身以及如何组织农业生产的问题上，他却未能从传统观念的圈子中摆脱出来。

在罗斯，土地问题仍然具有致命的性质，但这个问题一旦解决，它本身就会是一个起决定性作用的健康因素。

赫鲁晓夫是由斯大林亲手提拔起来的。斯大林通过自己的妻子知道赫鲁晓夫（他是阿利卢耶娃就读的学院的党委书记）后，就把他放到区党委去培养，后来又让他跟卡冈诺维奇“学习”，17大以后把他调到了自己身边。斯大林用亲信拼凑了一个班子去建设兵营式的社会主义并彻底粉碎反对派。

赫鲁晓夫对社会选择的正确性深信不疑，因此他天真地相信，只要把不好的领导人换上好的领导人，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他不懂得，只有在市场上通过价值法则并在竞争的条件下才能够根据经验确定玉米、肉类和任何产品的社会必要生产耗费。

作为真正的俄国“熊”，赫鲁晓夫迈着笨拙的步子急急忙忙地去追赶美国，结果以出丑告终。

可是，他把斯大林的这艘国家大船开到了狂风暴雨急浪朝天的海面上。这艘船开始倾覆，船上由党内权势分子组成的、分成农业和工业两部分的水手班开始大声哭叫起来，已听到了呼救信号。

由党、军工集团和强力机构联合组成的三头执政机关决定把这艘船开进名为“停滞”的风平浪静的港口，并给它挑选了一位相应的船长勃列日涅夫。

赫鲁晓夫是个乐天派，他属于那种少有的人，对这种人，一

般说，人们是不会怀恨在心的。

只要我们一想起练马场画展、种玉米、赶超什么等等，脑子里马上就会出现有关他的各种笑话、民谣和街谈巷议的话题。

他是天资极其聪颖的人，但是他没有经受得住对他的阿谀奉承和歌功颂德。10年间他获得了4枚苏联英雄金星奖章，这可以说是充实自己的圣像壁的最高速度，要比勃列日涅夫快得多。

影片《我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这是为“伟大的10年”摄制的一部宣传得震耳欲聋的丑角表现片，它给赫鲁晓夫的威望带来莫大的损失。鼓声隆隆，把夜宿枝头的小鸟都吓跑了。

人是脆弱的：绝对权力使人绝对腐败。

赫鲁晓夫是在极度缺乏人性的时候走上我国历史舞台的。斯大林是活上帝，他的亲信们也都是天上的神仙。难怪乎传播着这样的传闻，说什么莫洛托夫掌握40种语言，而米高扬不知因为什么掌握了72种语言，说什么贝利亚能够根据照片确定“人民的敌人”，而马林科夫知道所有党员的姓名，等等。

赫鲁晓夫使这帮天上神仙下凡到了人间，跌落在肮脏的历史大道上。无论是谁都已经不可能成为人民意识中的第二个斯大林了。

值得称道的是，对赫鲁晓夫来说，任何劳动都是神圣的，他没有把劳动分高尚的和卑贱的。作为劳动者，他既蔑视过寄生生活的达官显贵，也看不起游手好闲的平民百姓。

可叹的是，赫鲁晓夫也遭到了所有俄罗斯改革家所遭到的命运。如果不是我们，那我们的后代必将为赫鲁晓夫树块纪念碑，他是理应得到这份殊荣的。

他是那个时代的领导人中唯一一个为自己做过的错事进行忏悔的人。

三

苏共 20 大引起了骚动和各种矛盾的反应，我个人对过去和现在的评价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

在苏共中央社会科学学院结业后，我回到了苏共中央机关。这是 1960 年。我对 20 大的感受仍很强烈，可是机关里总的气氛仍一如既往，没有丝毫变化。代表大会是开过了，可是好像就根本没有开过似的。

任何旨在发展 20 大决议的建议，在使人窒息的官僚主义环境中都往往夭折。

我曾多次见到为勃列日涅夫起草各种文件的我的朋友和同事（尼古拉·伊诺泽姆采夫、格奥尔吉·阿尔巴托夫、安德烈·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亚历山大·鲍文、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尼古拉·希什林、瓦季姆·扎格拉金）是如何千方百计挖空心思地把某种新的东西、某些新鲜的概念写进那种用词千篇一律、充满刻板套话的标准文件里去。当时有一种天真幼稚的想法，认为所有这些“机巧做法”会有助于开导“领袖们”。唉！这类企图照例都是失败的，仅仅成为在扎维多沃晚间喝茶时悲叹的理由。

我本人也在这些讲话稿里加进过“公开性”一词，但是这个词后来也都神秘地消失了。不过这是另外的话题了。

1972 年 11 月，《文学报》刊登了我的题为《反对反历史主义》的文章。这是一篇在很多方面较正统的文章，别样的文章在当时是不可能被刊登出来的。

但是，在这比较正统的言辞后面，有着一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目的，这就是引起社会各界关注的大国沙文主义、地方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人主义日益增长的危险性。

党内外仇视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至今伪善地称自己为爱国者，他们在某些共和国（乌兹别克、乌克兰）领导人的支持下宣

布我是侮辱“老大哥”的人。

破坏性很大的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在唱着自己尖嗓门的歌，而确切地讲在唱着送葬歌。

我确信，今天那些披着“民族爱国者”外衣而实际上是彻头彻尾的沙文主义者的人们和集团，对确立各种形式和各个层次的挑衅性的民族主义起了相当的作用。

那时候我虽然明白民族主义观点会起非常危险的作用，但我连想都没有想到，民族主义观点会成为使我国瓦解的思想纲领和形成俄罗斯法西斯主义的一个根源。如果俄罗斯各族人民今天还不清楚俄罗斯法西斯主义的卑鄙透顶的实质和严重的危险性，那么看来他们将要为此付出极昂贵的代价。

顺便说一句，在那些恨透了我的，但在为我写“传记”的作者的文章和传单里，除了很多其他论点外，常常固执地提出这样一个论点，说什么所有这些“有害于俄罗斯的”改造都是由雅科夫列夫从海外带回来的，因为他曾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过，在加拿大当过大使。

这种指责仿佛有其正式的内幕背景，因为这个论点的作者是根据他本人的奴隶心理和反爱国主义心理来这样写的。

当然，在国外工作生活 11 年，使我增加了一定数量的理论知识和实际知识。

我亲眼见到竞争也就是市场是如何有效地推动经济向前发展的。我有机会因亲眼所见而确信，只有紧张而组织良好的劳动才能创造财富。我不只一次地参观过家庭农场，去那里看到的不仅是农民的繁重工作，而且看到了这种工作的效率。司法系统有条不紊的工作也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

至于说到信念，那么有关信念的情况，要比我的论敌们所设想的情况复杂得多了。

我是 20 大之后去美国的，当时我比较年轻，具有非常矛盾

的思想，在我头脑里已经扎下了关于人的自由的思想。

我回国了，尽管在思想问题上已向右转了。

为什么？

这里有两个情况起了作用。

一个是国外的反苏宣传的简单卑劣。例如，我记得有一部电影，其中讲在莫斯科只许当官的走进高尔基文化休息公园的大门，而工人农民只能从旁边的涅钦基斯花园那边的小门进去，而那个花园是人们遛狗的地方。

造谣带来的总是相反的效果。

另一个是美国电台和报刊老是广播报道有关我国的那一点真实情况，也就是我国生活中存在的，我自己也都知道的那些缺点。可是从别人那里听到或读到这些报道，总是让我感到无法忍受地不舒服。

因自己国家而感到的自豪和认为不用任何人的帮助我们自己必定能摆脱困境的坚定信念，在心理上使我不是将愤怒指向灾难的根源，而是指向坏消息的传递者。

我根据自己的经验深知，造谣也是苏联宣传不可分离的特点。这是这个制度赖以生存的条件。

但是，当造谣来自海外新闻机构时，我不可避免地对外国自我标榜民主的公正性产生了怀疑。换句话说，否定与肯定、醒悟与迷惑、怀疑与希望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远不是沿着笔直的大道发展的。

在加拿大时，那还是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我曾写过一篇题为《保守主义和革新主义及其信徒》的文章，这是针对毒化科学和实践的教条主义的有害作用而写的。不过我这篇文章只是到了改革时期才得以发表。后来我写了一本论述佛教哲学某些特点的书，该书取名为《感悟》。令我感到满意的是，我发现佛教哲学强烈反对教条主义。

我在写关于马克思主义中的布尔什维主义的书籍的同时，我起草了一个关于1789年法国革命的报告。我想以两百年前的历史事实为背景来说明，依靠暴力进行的革命最终必将阻碍进步，使人的心理充满敌意和不容异见。

因此，从我个人方面来说，我的世界观改革早在社会改革之前很久就开始了，尽管还不是彻底的改革，但我已做好了进行彻底改的准备。

但是，所有这一切只是我个人的思想及其演变情况的一个所谓断面，实质性的因素则在于另一方面，在于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日益糜烂，政治体制处于濒死状态。

看得越来越清楚的是，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不能不带有因时间的推移而易消逝的性质。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概念从最初开始所反映的就是他那个时代的而不是未来时代的思想道德标准、知识水平和固定看法。

社会主义梦想自我了结的时刻，社会主义思想的动员能力自我消耗殆尽的时刻迟早将要到来。

暴力不可避免和暴力有用的思想，对立双方势不两立、肉体冲突以至互相残杀的思想，建立崭新社会形态的人间天堂的思想已逐渐过时。跃进的思想原来是与生活实践格格不入的。

信息匮乏使苏联人了解不到由现实生活产生的新知识。为了迎合教条，忽略了例如没有多样性就不可能有运动和发展、反对分化实际上就是反对进步的前提这样明显的道理。

打开信息渠道的要求已趋成熟，而且日益加强，迫在眉睫，它使人感到恐惧，但同时也带来希望。

人们开始醒悟，尽管是缓慢地、左顾右盼地，但总是开始醒悟了。

如果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强迫你指鹿为马、颠倒黑白，要你思想上没有别的想法，对各色各样的教条主义戒律不产生怀疑，实

际上是很困难的。任何一个思维健全的大学生，只要他去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他就一定能发现，他们文章中讲的很多东西与 20 世纪人类发展的实际经验是矛盾的。

生活本身已起来反对许诺用非常简单的解决办法（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暴力）来创造人间奇迹的救世主论，反对诡称自己有权决定各民族、各阶级命运以及文明命运的马克思主义的专横与傲慢。

我经常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我国乌托邦思想能掌握群众？为什么历史不愿意寻找别的能代替暴力的手段？

为什么自由和社会公正的思想遭到如此粗暴和如此野蛮的践踏？

为什么社会会同意消灭农民、对本国人民进行血腥镇压、对生态采取野蛮态度、毁掉历史的物质和精神象征？

为什么会形成一帮专门靠永远希望将来能过上好日子的人民来过寄生生活的党和国家的官僚？

为什么人如此软弱无助？所发生的一切是否能够避免？

就在不久以前，我们中的很多人还在为暴力鼓掌叫好，还相信只有消灭“人民之敌”及其子孙后代才能获得幸福。

但是，不是我们头脑里的所有东西都能消灭掉的。正因为这样，伟大的改革运动才能在 80 年代中期得以开始。

说到这里，我想顺便回答那些批评改革运动的人，他们喋喋不休地说，1985 年的改革开始时没有任何计划，甚至没有任何主张或思想。

至于说到计划，那是不可能有的。

那个时候谁能够接受内容包括取消单一权力、单一意识形态和单一所有制的根本改革社会制度的“计划”？谁能接受？党和国家的机关权势分子？克格勃？还是将军们？

在我看来，所有这些预先“计划”的要求都是由习惯的传统

思维产生的。

怎么能够对千百万人的生活事先作出计划呢?!这不又是神话、幻想，又是骗局吗?要知道，这里讲的是生活方式的更替，而不是政治体制的修补。

至于说到主张或思想，那么多的，而且不只是出自于那些自觉地作出自己的选择、无私地走上改良之路的人。这些革新的主张或思想也确实实实在在地在社会上、在人们中间酝酿着，学者和作家们也反复讨论过。

例如，我曾在那里当过所长的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在改革开始以前就定期（在我之前和我当所长的時候）向苏共中央和政府报道有关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以及国际关系现状的报告。

这里举两个例子。1984年初曾向苏共中央报道了关于成立同外国公司的合资企业的必要性的报告。中央书记尼古拉·雷日科夫曾为此请我去谈话，他非常感兴趣地详细讯问了这个建议的细节，并对建议的总方向表示支持。

我还记得有一份由苏联科学院好几个研究所共同起草并报送政府的篇幅较大的文件，其中谈到如果苏联的经济今后仍按原先那些原则发展，那么在本世纪最后10年里不知在哪个方面我们将会大大倒退，我们将避免不掉一场深刻的危机。

不久前我在自己保存的文件中找到了这些不同专题——既有国际问题也有国内问题的报告。下面仅引两份以飨读者。

先引一份谈国际事务的报告，即关于里根的报告。这份报告是1985年春根据戈尔巴乔夫的请求准备的。他非常关心对外政策，他请我就可能进行的苏美高层会晤谈谈我的意见。

关于同里根会晤的意见

1、现在所有的情况都说明，里根千方百计地想在国际事务中掌握主动权，造成美国坚定地主张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和改善国际政治气候的印象。

里根梦想成为“伟大的缔造和平的总统”，想使美国成为“伟大的国家”，为此里根想要解决一系列任务，不过当前的心理环境对他不利。

2、里根本人意味着美国的军国主义化，他也完成了这方面的一部分计划，实际上他把他所允诺的一切全都给了军火商，所以他能够脱开身来去搞“高层”外交，而这种外交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件事关威信的事，能提高参与者的政治身价，这正是里根目前所需要的。

3、里根正在受到预算赤字的压力，因为预算赤字有造成经济混乱的危险。因此要么用外来威胁来证明为什么会有预算赤字，要么缩减预算赤字。

4、别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表面上还比较团结，可是在其他盟国中间就没有团结可言，或这种团结已不怎么牢固。所以美国力图保持住向心倾向的高潮，而千方百计地阻止离心倾向的发展。

因此，显然必须判断一下这次邀请会晤的意图。这里可以看出很多问题，如：力图把我们同西方的关系纳入苏美轨道（美国对自己的盟国是非常警惕的）；查清楚国会内外反对军国主义化的情绪；希望重新摸清楚苏联在关键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

毫无疑问，这个举措除了它的政治意义外，还带有重要的宣传任务。无论是放弃会晤还是会晤失败，对里根来说不会有丝毫损失（对前者他会说：“原来我是要会晤的，可是……”，对后者他又会说：“俄国人总是固执己见。”）

换句话说，在里根看来，他的建议是经过周密考虑和精确计算的，不会有政治风险。

结论：同里根会晤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应该同意会晤，但不要太匆忙。不应该造成只是里根在主宰着世界性事件的印象。

会晤的目的：(1) 亲自获得关于美国领导人的印象；(2) 发出明确信号，即苏联真的准备达成协议，但必须根据严格对等原则；(3) 以明确无误的方式告知里根，苏联不允许别人来操纵自己，不会牺牲自己的民族利益；(4) 必须继续含蓄地指出，天底下并不只你美国一家，但同时也不要错过同美国改善关系的现实机会，因为在当前的四分之一世纪里美国仍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大国。

美国的基本政策很难会有某种出人意料的变化。这倒并不是仅仅因为里根持有僵化的反共思想，而是美国处于由独霸资本主义世界转到以伙伴关系为主和进而转到相对的平等关系的过渡时期而不得不采取强硬方针。

即使不提美国固有的地缘政治传统，这个过程对美国来说，很明显将是痛苦的，因此它还将长时期地影响到美国的对外政策。

正是这个过渡时期要求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将我们对外政策的目标转向逐步有计划地发展同西欧、日本、中国的关系。

但是，这不应该减少对重要的苏美关系的注意，相反应该重视两国间的关系。

会晤时间：可能的话，可安排在代表大会之后。最好是在我国进行某种经济改革之后，或者在采取其他能展示我国活力的具体措施并取得成就之后。具体行动最能使美国人信服，使他们愿意走上谈判桌。

会晤地点：不要在美国，而在欧洲的某个地方。

对策：正如已经讲过的那样，我们必须利用一切对美国有政治压力的可能因素，首先是欧洲人对缓和紧张局势的关注（这一点在不久前的莫斯科会谈期间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来确立我国

作为倡议国的立场。

为此要求采取强有力的对策。

例如，趁赫尔辛基会议 10 周年之际（今年 8 月 1 日），我方可提出在芬兰首都召开《最后文件》签字国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的建议。通过提出这个想法，我们可以引起人们对在国际关系中增加信任的必要性的特别关注，恢复政治和军事领域的缓和进程。

关于这个想法，可以先在中央总书记给美国总统的私人信函中提一下，并指出在赫尔辛基可以建立个人接触，就进行苏美高层会晤的可能时间和总的框架问题直接交换意见。

不管美国的反应如何，我们可以将这个措施向我们的盟国进行通报，并就如何做西欧国家的相应工作同它们达成协议。在这方面的政治努力将会使即将召开的华约参加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工作得到充实，而主要的是，我们不仅有力地证明我们对恢复缓和进程的态度是积极的，而且可以为苏美高层会晤奠定基础。

亚·雅科夫列夫

1985 年 3 月 12 日

可以看出，报告就改变我国国际方针提出了一些谨慎的建议。

另外一个文件是 1985 年 12 月的口述记录稿。这个文件的内容有不少相互矛盾之处，它前后是不连贯的。它在一些地方断然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而在另一些地方则是建议对这一制度加以改进；它有时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否定的态度，有时则只是批评它的教条主义阐释；等等。

这些思想有许多在晚些时候的发言和文件中得到了反映。而在改革之初，要想发表它们是不可能的。当然，这些尚待整理的

提纲中的某些内容，戈尔巴乔夫已经跟一些关系密切的朋友交换过看法，进行过讨论并得到了共识。

请读者原谅我引用这个冗长的口述记录稿。但舍此别无他法。文件终究是文件。这个文件当今很有意义是因为创作的年代，也许还因为它能帮助人们弄清楚一切是怎样开始的。

那么请看：

1985年12月3日。

1、关于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主义阐释，其危害已足以使任何创造思维甚至经典思维都毁灭殆尽。

魔王，他就是魔王。它的魔蹄至今践踏新思想的幼芽。斯大林教条这一恶魔恐吓着人们，然而看来还得长期与其共居在一起。

社会思想本应从空想发展到科学，而在马克思主义阶段，社会思想在许多方面仍然是空想。例如，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滞后、关于快步向共产主义跃进以及资本主义注定灭亡等等的机械概念仍然充斥其间。老一辈所耕耘的信息园地过于贫瘠了。

我国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而是一种新的宗教，它屈从于专制政权的利益和它任性的要求。专制政权曾把自己的上帝、预言家和信徒捧上了天，而后又把他们打翻在地。

既然话题涉及的首先是我们自己，那么就有必要弄个明白，哪怕是尝试也好。一心想要在物质方面过上好日子而精神上达到完美境界的我们，怎么落在后面了呢。羞辱和痛苦使我们不得安宁。

探寻化解、缓和根本冲突以及生活中各种矛盾之路的文明正在形成之中。然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结论却与其格格不入。

我们已经没有权利不来清算顽固不化的教条主义以及无穷尽地对天发誓要忠于马克思理论遗产所造成的后果。同样，我们也不能忘却为祭祀马克思主义而牺牲了的一切。

必须在理论上作出这样的突破，才能制止极权主义和对自由、创造的蔑视，才能结束意识形态的单一化。

2、关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性。从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降调到了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但是说轻一点，我们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并不因此而使人更信服些。

为何如此？据我所见，这是因为，整个社会主义概念是建立在否定的原则之上的。资产阶级性被扣上恶魔的头衔。用比宗教裁判者还要凶狠的心理不断从每个活着的魂灵中捉鬼抓妖。社会生活被虚假谎言毒害了。

对人的有罪推定，被当作是行动的指南。带有法律性质的20万条指令可以认定某某人就是潜在的预谋犯。发出了应该唱什么歌、读什么书、说什么话的指示。只有鉴定和材料才能说明你举止行为是端正的，而随大流的思维方式则是你为人可靠的证明。

反常的阶级性碾压了经验（斯大林甚至在贫瘠的农村也“找到了”不断产生的资本家们），社会主义也由此为自己断送了通向未来之路。通往真空的道路是不存在的。于是我们就往后退，退到了封建主义。而在马加丹以及某些“并不太遥远的地方”，则坠入到奴隶制度中去了。

我们的经典作家们，看样子是曾寄希望于我们，以为我们比他们聪明，相信我们会用他们的方法去搞清楚所有一切。但是我们并没有搞清楚。我们在一座用坚硬的教条主义石块构筑起来的貌似科学的迷宫中走失了方向。

单一的所有制和单一的权力不是社会主义。它们还在古埃及就已有过。我认为，走向真正的社会主义还必须从市场经济及其按劳付酬（劳动价值由消费者决定）出发，同时要使信息交流畅通无阻，不受检查，要有正常的反馈机制。

千年以来曾经统治并正在统治我们的是人，而不是法律。应

该打破这一老的格局，转向新的、法治的格局。

这样，问题就不仅仅是拆除斯大林主义，而是替换掉千年沿袭下来的那个国家模式。

3、关于经济。我们竟然有本事好几十年来在世界上潜力最大的国家中一直过着困苦拮据的日子，其生活水平在全世界竟排名大约第50位之后。

对自然和人的空前掠夺是斯大林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由于这一法则的作用，而且仅仅是由于这一作用的结果，国家才取得了“巨大的、奇迹般的、不可置信的”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成就。

1928年，消费品（第二部类）占工业产量中的60.5%，1940年占30%，今年大约占25%。一个荒谬论点被奉为规律：如果不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要保证国民经济的不断增长是不可能的。

结果是建立了一种“为经济而存在的经济，”它的发展已不受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制约。一连好几个五年计划，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都通过了决议要加速发展第二部类生产，但发生的事情正好相反。经济内耗的破坏力竟是如此之大，以至即使每年挖掘出150亿吨地下资源，即平均每人一节车皮的话，我们实际上也还是在一个离富裕还十分遥远的地方踏步不前。

应该更大胆地运用以下一些概念：经济的生态含量、商品的巨量合成、时间含量、质是不可认知的数、商品的信息含量（近似的说法是产品的科学含量）。人们仍然一头雾水，为何信息成了世界贸易的主要产品，而信息手段产业则是经济的火车头。

当前，改革的搞挑派在我国俯拾皆是。他们把一些明白的推理当作是先验真理。而许多学者，甚至是著术甚丰的学者，仍然处于一本含有毒素的书——《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间接的但终究是沉重的压力之下。

政治经济学不去剖析卢布，不触及它的遗传基因，不诠释卢布不可思议的病理，那么这只能是希奇古怪的妄言妄语。

民主社会只有在其所有领导人和人民对以下诸项茅塞顿开之际才能建立起来：

1、只有市场才能实现劳动等价物的正常交换。除了市场之外，人们还未发明出其他途径。没有市场的社会主义只能是空想，而且是血腥的空想。

2、正常的经济需要私有者，舍此不可能有自由的社会。恐怖即将消逝，旧社会即将崩溃，因为那是个不讲经济利益的社会。

人是利益驱动的社会性生物。有了利益，他就能推倒大山；没有利益，他就会对将其年薪浪费在钢铁和水泥上的事无动于衷。在最好的情况下，也许会给报纸写信反映一下。

人对所有制和权力的疏远（异化）是我国恶行的基因。消除这一疏远就是改革的至高无上的命令。

在当今条件下通过土地、固定资产、运输和通讯手段的租赁，完全有可能实现国家所有制的人民化，经济的非官僚化。

如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国家的观点对人与所有制和权力的异化问题作一番科学剖析，那么就会大大有助于社会的租赁—合作事业的开展——这是革新的正确矢量^①。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是共产主义形态尚未成熟的产物。而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就曾生活在老牌国家英国，而列宁则曾生活在所谓“兽性”的帝国，那时，每月发给流放人员6个卢布（在当时是不少的钱），他还能在那里自由地写书。人们只要到警察分局局长那里“办个手续”，花上3个卢布——一张出国护照的钱——就可以出国了。

^① 矢量，物理学名词，亦称向量，即既有大小，又有方向的量。如加速度、电场强度等物理量都是矢量。——译注

3、社会需要信息的正常交流，如同空气一样。这种交流只有在民主与公开的条件下才成为可能。任何形式的信息封闭、信息阻断必然导致社会的自体中毒。对信息匮乏现象不作研究，也是我国社会研究学科的灾难。

正常的反馈系统是社会的前庭器官……

因此，改革所追求的基本内容是：

- (1) 市场经济及其按劳支付；
- (2) 作为自由主体的私有者；
- (3) 民主化、公开性和大众共享的信息；
- (4) 反馈系统。

只有这样，改革志士才能实现自己的构思并更换沿袭千年的国家制度格局。有人断言哲学是抽象概念；不，哲学是超具体的，如同它所追求的任何真理一样。

但是普希金说过，“无数个平凡的真理要比抬举我们的谎言更值得珍惜”。

4、管理。它已经陈腐，但却极其巧妙地捆住了人们的手脚。

未来——管理将在独立的公司和跨行业的联合企业中进行。

企业——公司——联合企业应该只跟银行挂钩，金融信贷制度将成为管理金字塔的顶峰。而国家计委应该制订国家和社会纲要，按竞争机制分配资源和投资。为此就要有正常的各种各样的市场，而首要的是资本市场。

各专业部——这是斯大林主义的怪胎，经济改革制动机械的台架；它们是超级垄断者，就如“黑洞”一样，把科技进步窒息在里面了。

这样的部只会长出脓包。我们实际上没有国家经济，有的是部门经济……

将损耗转嫁给消费者和自然界，实施通货膨胀和商品短缺的经营方法——这就是专业衙门的无上命令。赫鲁晓夫解散部是绝

对正确的。然而很遗憾，他干这件事就如同干别的许多事情一样，采取的是骑兵的风格。

完善专业部根本无从谈起。应该用经济核算来取缔它们。应该一个接着一个地把它们逐出国家财政预算。

5、关于党。和平时期党领导一切的做法是极其脆弱的。经济中开展竞争，实行个人自由和真正的而不是口头的选举自由，这些必然和单一的权力发生矛盾。

但权力就是权力，自愿放弃权力是罕见的。苏共也是如此。特别是因为苏共有一种“佩戴勋章”的脾性。

应该赶在事件发生的前头。也许，将党分成两个部分是明智之举。那样就可以给现有的分歧以组织上的出路。但这是一个特别的课题，需要仔细斟酌研究。

最后，现在有许多不明朗之处令人焦虑。生活不断暴露出矛盾，其中一部分矛盾看来将转化为对抗性质。越来越使人感到保守主义、不容异见、不懂专业、虚无的理论说教等等正在冒头。生活在迅速地赶超理论、赶超构思。

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好多时光了。好像四周一切都还是昨天的样子。但是实质上，一切都已经发生了变化。

20世纪不仅使现实本身，也使人们的意识、人们对世界和自我生活的认识机制发生了质的变化。关于进步、社会福利，关于过去和当前发生的事，关于现代人为什么而苦恼等等的观念都有了实质性的变化。

即将过去的百年波谲云诡，人们已经精疲力尽了。人们很想锁住时间不让流逝，害怕在新的时刻又会撞上什么不明之物。

在这一历史漩涡中，正是苏联、俄罗斯、莫斯科承担着民主改革运动的可以想象和无法想像的重担。这场具有决定意义的运动终止了带来死亡的世界分裂状态。

历史在等待瓜熟蒂落。虽然在新的条件下并未出现什么完整的世界观——它根本就不存在。但是人类获得解放的可能性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呈现出现实的轮廓。

但在俄罗斯还有许多不确定的东西，许多问题甚至还未提上日程。改造工作进行得相当痛苦。昔日遗留的泥淖深不可测、险象环生。时间好像是在揭露那个已经成型的生活方式的寡廉鲜耻，时间仿佛是在嘲笑人，它特别显示出人的不堪造就、低首下心和自惭形秽的那个被压迫的魂灵，显示出布尔什维主义留给人的一切。

新法西斯主义情绪在加强。反动势力再次动员起来。重新出现充斥布尔什维主义培育起来的龙争虎斗、不容异见、黩武的民族主义等等的局面。无休止的仇恨、事件逻辑的偷换、物质领域和精神领域理性和非理性的混杂——所有这一切重新降临俄罗斯，目前这里的任何程序都充满无政府主义气息。1993年10月事件再次证明对时局的这种评估是正确的。

事实上国内政治生活和斗争直到今天仍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下”进行的。极权主义不仅侵独了国家、社会和政治机构，它也深深地埋在几乎我们每个人的心坎之中。

以“第二次浪潮”的某些民主人士为例。他们曾如此顽强地以他们所拥有的一切手段与苏共机关的垄断进行了斗争。我指的是那批在1991年以后进入政权机关的人们。

大墙倒塌了。开辟了相对来说比较干净的权力园地。命运本来要求在这里播下真正民主原则的种子，播下经济、政治和精神自由的种子。

结果如何呢？

没有结果！权力，那迷惑人和腐蚀人的力量又想把道德重新压在下面。

一个早已明白的道理又被置于脑后——迷恋权力的结果，将

使民主变成盲目的举动。

太多的人们仍然轻信“简单决策”带来的机会和好处，好像它们能够一劳永逸地清除我们生活中的痛苦的矛盾。

这就是我们灾难、问题、贫困、相互攻讦、兜历史怪圈的根源——政权的形式虽然改变了，但人的地位仍然几乎没有变化。

我们刚刚获得了自由发挥智能的机会，但却又自愿套上新教条主义的框框。我们又开始装出司空见惯的虔诚和煞有介事的笃信，发誓要忠于改头换面的时兴口号，而不愿真正弄明白我们到底发生过什么。

当然，几十年来灌输到人们脑海里的一切，是不会立即消逝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幻觉仍然活在人们心里。事实上今天没有哪个政治力量是已经完全摆脱了它的影响的。

新的正统分子正在企图把圣徒的罗斯的思想与信奉阶级斗争学说的见识这两种无法联合的东西凑合在一起。某些知识界人士和社会学家则仍然相信有“纯粹的”、“原汁的”马克思。按照他们的见解，这一马克思与列宁、十月、布尔什维主义等等毫不相干。他们认为，马克思时代并未过去，而是将要来临。

这些幻觉的根子——寻找权威以求庇护的不可遏止的愿望和根深蒂固的旧习。好像权威通晓一切、理解一切，什么都能对付得了。

换句话说，一种新的救世宗教及其神化了的领袖崇拜无论在教义方面还是礼仪方面都显得是颇有生命力的。

但是，1985年和1991年还是来到了。这些年份是抹不掉的，是它们摧毁了奴隶恐怖的密幕和锁链。

今天冒出了几千名“聪明的”和“有远见的”，按照他们的说法甚至是“大无畏的民主人士”。

可悲的还在于，某些民主的“精神圣徒”在高攀并跻身于“官员名录”之后，竟是如此凶悍地争夺他个人的经济利益，真

是可怕得很。呜呼，很遗憾，我 1991 年 8 月在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上发言时警告过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当时说道，“新的民主派”应该做的首要一件事就是不要让政治骗子掌权。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新的民主人士”在 1985 年前曾经颂扬过谁、揭发过谁；但他们在用石块投掷所谓“不坚定”推行改革的人方面却是好身手。

我说这些完全不是想兴师问罪。这样做没有意思。而且，历史从来就不缺转来转去瞎忙的人。这些人有了权就会射击别人的后脑壳，而一旦权力更迭，他们就奴才似地哭哭啼啼，看别人眼色行事。

请看某些政治家和记者。有这么多的人晃荡到表面来了。他们劲头十足、毫不客气地在报道过或者拍摄过的随便哪个人的身上“蹭净自己的双腿”。他们只关心一件事——画出自己的肖像并将其放到镀金的镜框中去。看来，此类俗夫从“民主俄罗斯派”走向“日里诺夫斯基派”的路途是很短的。

我们无权迷路。迷路将是我国人民的悲剧，全世界的悲剧。这个世界是如此相互制约着的，但它仍然没有完全认清世界团结所达到的程度，还未感觉到，一个相互负责的时代已经来到。

我要强调一下，是相互负责的时代。

在俄罗斯，大概许多事情将取决于在在职的各级政治家能否迅速换代。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

倒不是不相信这些或那些根据自己能力背着十字架的政治家们，而是因为他们全体都是在对峙冲突的氛围中，在与旧政权的斗争中，在与向改革宣战的党和国家机关的斗争中成长培育起来的。

当前的一批民主人士至今怒火中烧，仍旧热衷于大小集会，未能摆脱掉在与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中染上的新布尔什维主义。

我已经说过，在改革成为民主进程的固有内涵，成为思维和行动的方法之前，复仇的危险是始终存在的。

如果仍然出现暴力、冲突、无度的政治野心、不惜手段争夺政权以及别的象征革命的种种做法，那么自我调节的民主根本就不可能到来。

我乐观地看待未来的民主的俄国，但总是放不下心来：新的希望到头来会不会只是新的幻想，新旧乌托邦会不会把我们重新带到没有前途的死路上去。

第二章 先驱者

在数千年的文明史中，任何人、任何地方、任何时刻都未能依靠暴力建成一个人们赞许的社会，因为暴力只能产生暴力。

无论鞭子还是棍棒、囚禁还是恐吓，都培训不出道德和自由。

暴力革命——乃是洒在悲剧性幻想的玫瑰花瓣上的鲜血。

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主义的许多内容是建立在与资本主义早期积累以及欧洲革命有关的，特别是与法国革命有关的社会经济经验之上的。

至于马克思对“野蛮资本主义”时期的分析，这是他为19世纪社会思想所作的重大贡献。于是，从欧洲革命经验得出的思想结论是立足于破的。

马克思主义中最邪恶的教条是关于暴力的教条，以及构筑于其上的阶级斗争观点，但这并不是马克思的发明。法国的几次革命以及随后在欧洲所发生的事件都为那个看来颇有说服力的论断奠定了基础：即暴力是社会生活的规律性现象。

暴力被封为“历史的接生婆”。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不单是一场胜利了的政变，这样的政变曾经有过不少。而且甚至也不单是向新社会的戏剧性的突破，

这样的突破在某些国家还来得早些，虽然没有这么红红火火的场面。

法国大革命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成功地在自己的精神宝库中，在自己的实践中集中了欧洲社会经验的、科学的和社会意识的最重大的成果，它怎么说也在自己身上折射出了它们。这场革命将揭示智力、道德和社会的深刻变革的历史必然性的改革运动和启蒙运动的果实一体化了。

这曾是伏尔泰的世纪。他抨击了专制政体，毒辣地讥讽了教权主义的偏执，热情地讴歌了富有斗争活力的个性。

这曾是卢梭的世纪。他比起所有同时代人来更尖锐地提出了平等的思想。

这曾是孟德斯鸠的世纪。他捍卫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的民主原则。

这曾是重农学派经济学家魁奈和杜尔哥的世纪。他们创立的原则提出了创业自由和国家不干预经济生活的思想。遗憾的只是，他们在自己的思想中忽视了先驱者的伟大遗言——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柏拉图、托马斯·阿奎那、亚当·斯密等等许多人关于经济应遵循道德规范的遗言。

这曾是爱尔维修的世纪。他认为“利益”是新的伦理准则和一切立法的基础。

一代杰出的思想家给现行制度作出了道德判决。虽然他们千差万别，但客观上完成了一项共同的事业——为革命耕耘并播种了理智的园地，冲垮了对传统权威、传统道德、传统政治价值的信仰。

他们以其固有的才华和机智向世人表明：旧的秩序不讲道德、奸佞虚伪，充斥僵死的教条主义和繁琐哲学，是与理性势不两立的；这个旧的秩序总是与人的自然本性处于冲突状态，它不许人去追求一个摆脱不平等的等级制度和专横的君主制的和谐的

社会，在那里个人的利益与全人类的利益将结合在一起。

世纪末的严酷年代来到了。在制宪会议和国民公会的讲台上发表的激昂演说中，我们听到了他们的思想；在革命宣言的文本中，我们读到了他们的观点。

革命一开始就是在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下开展起来的。

人民闯入到政治实践中来了。不管这种闯入是爆炸性的还是创造性的，总之是以其独特的内容充实了启蒙运动的进步思想，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新的社会制度的方案。人民群众不仅切盼政治平等，而且企求社会平等。

在当时的条件下，争取社会公正的奔涌激情最终未能取得成功。但是这一奔涌激情成了革命进程的强劲的推动力量，后来更刺激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

革命是社会的特殊状态。

革命，按其构思是正义的，但采用的手段却具有邪恶的性质。革命来势凶猛，具有摧毁力量，它同时也为社会的发展埋下了阻碍的因素；它将社会分裂成了相互敌对的部分。

以往的教训通常都被教条化了。历史常常从一名教员变成了政策的仆人。

但是真实而不是杜撰的历史总是可以告示人们许多东西。历史可以提供丰富的精神粮食，帮助人们不光是理解过去，也更能理解现在。

我们也不得不重新考察许多历史现象和事件。

1789年7月“攻占巴士底监狱”也好，1917年10月（11月7日）“攻打冬宫”也好，都是艰苦卓绝、矛盾重重的过程的象征，它们的名字是：革命、反革命、进化。

这些过程的具体情节是无与伦比的。它们相互交织在一起，独特地解决了人作为社会性的生物的一些古老的问题，例如关于以下一些对比关系的问题：

- 目标和手段；
- 强迫和信念；
- 破坏和创造；
- 理想和现实；
- 革命与进化的“代价”比；
- 人民与政权的相互关系；
- 阶级等级制度和全人类的联合。

道德变革和生活民主化带来的唯一后果是智力的解放。

刚刚不久以前还是经济上受压迫政治上受鄙视的一名普通法国人，不但感到自己是享有与大家同等权利的社会成员，而且感到自己对这个社会的命运负有责任。现在许多人在临死前不再喊那句熟记的口号“国王万岁”，而是喊明白易懂的“民族万岁！”

二

法国大革命为现代法治意识和政治文化奠定了基础。法治意识和政治文化是文明世界得以联合的关键，与此同时，世界的民族、社会和文化多样性仍将保留下来。

法国大革命在人类面前提出的问题中有许多看来是永恒的。例如，有关人权，或者说有关人在其同类的交往中究竟处于什么状态的问题就是如此。法国大革命消灭了等级特权和隔阂，它宣布：“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这就是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的实质。

这个宣言的作者们曾经体验过凌驾于人之上的封建国家的压迫，他们于是彻底推翻了价值体系，确认“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

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宣布了分权原则、公职人员职责和报告其工作的制度。它确立了个人权利的保障和法制原则，包括无罪推定原则。

宣言确认：“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每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应对滥用此项自由承担责任。”

年轻资产阶级向世人推出的文件，其威力和内容已远远超越一个阶级的利益，它表达了全人类的道德和法的绝对要求。

然而这样一些基本原则，当涉及——而它们事实上涉及了——不同人群、阶层、阶级的利益的时候，要在现实生活中体现它们是颇费周折的。

法国人民革命的理想也逃不出这一命运。弄虚作假依然如故：口头上一套，实际上又是一套。唉，这对我们来说又是多么熟悉啊！

过去了好几十年，妇女在法律面前的不平等地位才宣告结束，但也并非彻底、普遍地结束。

至少在一个世纪之内，贫穷的人们为了权利和自由的获得不以财产上的资格为依据进行了斗争。

铺设了一条漫长而并不笔直的道路——从等级的和财产上的特权通向平等。但时至今日对平等的诠释却依然是各取所需。

法国革命距离国家不仅保护群众的政治权利，而且保护他们的经济权利的思想已经十分贴近了。然而这一思想终究未能在当时兑现而成了遗训之类的东西。在雅各宾派拟就的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以及 1793 年的宪法（都未能付诸实施）中，都曾许诺一切公民享有平等、信仰宗教自由、普及教育、结成人民团体的自由等等；也还曾许诺为贫困的公民提供劳动权，为丧失劳动能力者提供生活资料等等。

这一清单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年代国际社会普遍赞同的维护人权的国际宪章的雏形。

三

就这样，理想是崇高的，意图是明智的。

但是革命的意义首先是为人类提供了什么教训。至于后人目光短浅、固步自封或者精神上以自我为中心，以至无法记取教训来校正其社会实践，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主要教训之一——宣言与行为、意图与现实之间的对比关系。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没有一场革命如同法国大革命那样，提高到道德口号的高度，没有一场革命宣布过如此高水平的民主理想。

但是也许，任何一场革命都未曾暴露出如此明显的脱节现象——被唤醒的期望值和生活实际之间的差距。

自由受到了限制，理智王国成了理想主义的产物，而期望是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公正和平等冷落为仅仅是法律文件的某些条款，崇高情操和良知都染上了虚伪狡诈的毛病，对理想的神圣信念成了表面虔诚的伪善行为。

18世纪革命家们的悲剧在于：他们曾真诚地争取全人类理想的胜利，想要建立一个高尚品德普及的王国，但是希望的逻辑与生活的逻辑发生了残酷的碰撞。

难道不是在1791年2月废除了行会这一中世纪的设制之后，很快就通过了禁止举行罢工和建立工人组织的法律？

难道不是在制宪会议的会场内于1789年10月制订出了关于武力镇压人民起义的法律？

难道不是1791年宪法规定的有资格的选举权与两年前宣布的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相抵触？

难道不是大资产阶级利用了热月政变来取缔体现人民主权的各种民主设制？

利己主义占了上风，把理想狠狠地抛在了一边。

法国革命的领袖们，至少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曾深信无疑，他们是在进行一场解放全人类、争取自由和公正在普天之下取得胜利的斗争。“法兰西的自由一旦消灭”，罗伯斯庇尔高呼道，“大自然将被裹尸布覆盖，人类智慧将要退回到不开化的野蛮年代，专制制度就会像无际的海洋淹没全球。”

救世主的精神几乎表现在一切大革命之中。上升的阶级总要争取充当人类的解放者，而事实上只解放了自己。然而即使是自身的解放也只是相对的、部分的。

实际上法国大革命并未解放人类，甚至也并未解放法国本国的劳动阶层，它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封建等级的隔阂被摧毁了，但代之而起的是新的隔阂，也许不再那么深，但同样是感觉得出来的。社会进步的成果被少数人僭窃了。

与此有关，法国革命可以说还有另一条教训。这场革命在多维的世界中好像迷失了方向。它在国际关系方面的实践明显与其旗帜上写明的那些原则相违背。

事实上，1796—1797年波拿巴向意大利的进军难道不是解放战争蜕变为侵略战争的令人不安的征兆吗？拿破仑在19世纪初进行的战争对这一问题同样给了肯定的答案。反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演变成对其他民族的讨伐。提出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国家变成了殖民强国。自我解放的思想蜕变成了帝国波拿巴主义。

但是尽管有这么许多毛病和缺陷，革命进程的逻辑还是依稀可辨，它还是向四面八方衍生出社会改造的主体和有力量掌权的主体，衍生出一批捣毁旧秩序、真正掌握起权力的人。

四

走向文明的新阶段不可能没有痛苦。那些即将消逝的社会结

构的惯性，人们对新生事物难以接受的心理，左倾激进分子的急躁情绪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促使充满激烈冲突的一幕幕悲剧不断上演。

对作用和反作用机制的理解远非那么简单，时至今日还在争论不休。但是不管怎样，对新问题麻木不仁，而其载体又不肯承认自己愚昧无知的那种科学或政策是要不得的。

苏格拉底认为这是好做长篇议论的蠢材们所固有的特性。

彻底革命的需求源出于时代，但总是想超越时代。思想解放、充满激情的人们常常想出一些高难度的点子，但在千差万别的各类事件乱成一锅粥的时候多半无法实现。

革命的历史还提供了一条教训：激进、快速更替旧制度的尝试必然伴随一种危险——革命的目的将不由自主地被手段所偷换。急躁情绪有变成排除异己的危险，阶级斗争则有可能变成仇恨心理，而这种仇恨心理如大家熟知的那样是容纳不得理智的推断的。对教条和抽象公式的屈从不可避免地社会上衍生出许多“不自由”，这种屈从不仅把革命理想，甚至连革命倡导者本人也排挤到一边去了。

革命令人信服地表明，在社会改造进程中，领袖、政论家的作用是何等重要。可以作为范例的如：马拉、米拉波、丹东、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和其他许多“创造了”历史的人。

但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当群体、政党、阶级的斗争演变为领袖之争，在个人因素的周围超乎寻常地集中起林林总总的各种事件的时候，斗争的矛头所向就会稀奇古怪地、突如其来地发生变化。昨日的战友和志同道合者变成了相互反目、怒不可遏、毫无忍让和仁慈之心的敌人。今天掉脑袋的是左翼雅各宾派的阿贝尔和肖梅特，明天是“调和的”丹东，后天则是罗伯斯庇尔自己。

悲剧性的危险还由于渴望报复昨日的敌人。他们虽然还活着，但已经在政治上和社会上身败名裂，是注定要垮台的人。

法国大革命清楚地显示出自己否定自己的逻辑。

它显眼地为世人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几乎所有后来的革命都碰撞到了，而且看来时至今日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我说的是革命行动的界限问题。这是一条好像具有魔法的界限，一旦越过了它，明智的、有道德地组织生活的愿望实际上已开始被为达到目的而采取的不道德的方法所否定。

马拉曾经诉诸“人民惩罚之斧”，想用它来不经法庭砍掉数十万名“坏蛋”的脑袋。“恐怖”，罗伯斯庇尔说道，“不是什么别的，而是快速、严格和不屈不挠的公正，因而它是美德的表现”。

瞧，这也是俄国布尔什维主义所喜爱的遁词。

恐怖成了家常便饭，不仅惩办了革命的敌人，也惩办了不沾边的人。谁不跟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当权者打破法律的条条框框，肆无忌惮地使用了暴力之剑。断头台砍掉了伟大的法国化学家拉瓦锡和诗人谢尼耶的脑袋。争取自由和人权的战士的漂亮外衣披挂在贪权者的身上，他们的邪恶念头得逞了。革命吞噬了自己的亲生儿女。

恐怖和暴力政权不可避免地把丧失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的人推向前台。他们把许多过去的战友逐出了共和国政府。革命被暴力和强制迷了心窍，阻挡了自身的道路，为篡权复辟创造了条件。

其结果是，雅各宾派建立的制度陷于社会的真空之中，这就预先注定了它的垮台。

几乎是百年之后，恩格斯对革命的波折作了思考，他在1870年9月4日致马克思的信中写道：“……我们通常把恐怖统治理解为造成恐怖的那些人的统治，实际上恰恰相反，这是本身感到恐惧的那些人的统治。恐怖多半都是无济于事的残暴行为，都是那些心怀恐惧的人为了安慰自己而干出来的”。（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3 卷第 56 页)^①马克思的说法是，“全部法兰西的恐怖主义，无非是用来消灭资产阶级的敌人，即消灭专制制度、封建制度以及市侩主义的一种平民方式而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6 卷第 125 页）

但这些并不妨碍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宣布暴力是历史的动力，而恐怖是罗伯斯庇尔的美德。

恩格斯认为俄国的革命动乱注定要发生，而且这些动乱在许多方面会重复法国革命的经验。

在他致维·查苏利奇的信中写道：“我所知道的或者我自以为知道的俄国情况，使我产生如下的想法：这个国家正在接近它的 1789 年……这是一种例外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很少几个人就能制造出一场革命来，换句话说，只要轻轻一撞就能使处于极不稳定的平衡状态……的整个制度倒塌，只要采取一个本身是无足轻重的行动，就能迸发出一种后来无法控制的爆炸力……”

“那些自夸制造出革命的人，在革命的第二天总是看到，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制造出的革命根本不像他们原来打算的那个样子……”

“据我看来，最重要的是：在俄国能有一种推动力，能爆发革命……在这个国家里，形势这样紧张，革命的因素积累到这样的程度，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状况日益变得无法忍受，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从原始公社到现代大工业和金融寡头——都有其代表人物，所有这一切矛盾都被无与伦比的专制制度用强力压制着，这种专制制度日益使那些体现了民族智慧和民族尊严的青年们忍无可忍了——在这样的国家里，如果 1789 年一开始，1793 年很快就会跟着到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6

^① 作者在文中引用马列主义著作的引文时都没有指明出处，我们翻译时尽可能查明了出处，凡没有注明出处均为自译。——译注

卷第 301—305 页)

应该承认，预言应验了，革命发生了。

这些警告布尔什维克们是否知道？当然是知道的。但是他们也同样知道，恩格斯在同一封信中指出了俄国革命的不可避免，而重要的是他不管怎样认为是件好事。

十月革命是一场超恐怖的革命。

在各种不同的革命者中，首先是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有不少人笃信暴力和它的净化能力；也有不少人想直接学习雅各宾党人的经验，认为重复 1793 年的做法将会是救国救民的好事。他们以恐怖的手段取缔了不同政见，残酷无情地砍光了旧制度的载体——地主、商人、资本家、神职人员、军官和一切可疑分子。

为了这些罪行，为了失控的革命蛮干的无道德行为，不得不付出难以置信的沉重代价。

但也有另外一面。许多道德情操高尚的纯洁的人们曾经真诚地相信确实非常有必要摧毁旧制度，相信眼下这场革命是符合道德的。他们相信革命的建设性本质，而且相信很快就将建成一个公正的社会。因而不加太多的思索就将当前发生的一切理想主义化了。

但是这种理想主义有损于对许多事件的反人类性质作出合乎实际的评价。这种盲目的信仰助长了狂热、暴力和流血。

一个道理被忽视了。任何一场社会风暴产生的客观的能量不但可以加强社会的健康力量，同时也能激活社会堕落的底层，它在历史变革和动乱的年代尤其危险，因为原有的社会联系已被削弱，而新的尚未建立起来，法律和护法机制不可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世上有多少次社会转折都蒙受了这样一种灾难：卑鄙混充高尚，无知和无耻打着革新力量的标语口号，并以此作为幌子从事与解放运动最初提出的理想和目标毫不相干的勾当。

多少次革命后来蜕变了。除了丧失信仰、不容异己和废墟之外，什么也没有留下。

凡是急不可耐或利己主义占了上风的地方，就有可能出现最怪诞的现象：今天的罪行是为了美好的明天；不讲道德是为了未来的道德；世界观的专制主义是为了颠扑不破的永恒真理；残酷的不公正现象是为了虚幻中的幸福。

革命，首先是法国革命，为马克思主义论述暴力充当社会发展动力的历史条件提供了某种根本性质的依据。但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后果。

这些后果让我们细细道来。

第三章 既定的救世主说

“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没有注意到社会一体化机制的全部总和，没有看到人的行为动机是矛盾的、多样的，除了经济利益以外，良心、团结感、善意也都起着作用。

当代人对精神健康、道德环境问题和对探索个人存在与个人生活的秘密的兴趣越增长，他越会更快地摆脱把人的道德复兴与生产手段的社会化与单一政权和单一所有制联系在一起的幻想。

迫切需要关于个人生存的哲学，以便能够维护和说明精神生活的独特性和主体性。

我的论敌常常不看我写的东西，就批判我攻击“思想巨人”、“不自量力”，而且是用布尔什维克所喜欢采用的那种不提出任何论据就给人扣帽子和进行指责的方式。对习惯于写那种风格的文章的作者来说，他们对提出论据完全不感兴趣，他们是凌驾于事实之上的。

我知道，这里问题不在于马克思，而在于你采取什么政治立场。

然而，我仍然想再一次说，马克思使我感到兴趣的只是他涉及政治的那些论断，例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暴力问题，否认公民社会、家庭、私有制、法权的问题，以及作为布尔什维克实践基础的其他一些问题。

对我们所遭遇的一切，我们将在后面对之作社会心理动因的分析。历史预测往往是不可靠的。其实，普列汉诺夫、卢森堡、柯罗连科^①和高尔基当年就清楚，布尔什维克政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对社会生活有机体的强暴。但这是预感，不管它们如何尖锐，还不是分析。

无论如何，在目前这个历史转折关头，弄清楚把建设体现社会公正的社会的最初蓝图转变成兵营式官僚主义专政的原因和后果，这是十分重要的。

还在马克思之前很久，社会思想早就在思考人如何生存，如何最好地安排生活，如何实现人的幸福等古老问题，提出了为数不少的美好的乌托邦思想。但是这些思想并未找到实物的基础，没有超越纯意识的范围，没有摆脱使人热烈向往的幻想和没精打彩的希望的空框。

这是有很多原因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过去许多世纪留下的智力遗产中在对社会结构的理解上有着惯于作直线性理解的沉重包袱。例如，在19世纪，人们把进步同克服生活的分化和多样性联系在一起，常常把它们同社会生活的无法控制的自发性和无政府状态等同起来。

实质上，马克思主义认为进步就是通向社会生活的“明晰化”的前进运动，就是社会结构的不断的简单化的论断，从一开始就是与生活相矛盾的，生活的逻辑得出的是相反的结论，它促使人们懂得，历史的本质在于从最简单的关系向更复杂的关系发展。

^① 柯罗连科（1853—1921），俄国作家、评论家。作品富有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译注

H·K·米哈伊洛夫斯基^①认为，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必然来的信念与其说是建立在历史进程的物质基础之上，不如说是建立在确认黑格尔辩证法学说的理性的基础之上。他这一看法毕竟还是对的。

马克思在他的早期创作中对黑格尔辩证法和黑格尔关于矛盾、关于否定之否定的学说最初是有怀疑的，后来在写作《共产党宣言》和《哲学的贫困》时这些怀疑都消失了。此时黑格尔的正统学说占了上风。

对19世纪，特别是它的上半期来说，把对日常意识的信仰同在自然科学中对因果关系的研究结合在一起，这是当时的特征。根据直接类比的原则，这种因果关系也常常被移用于研究人、社会和历史。

原因——结果。作用——反作用。应力——运动方向。劳动——成果。从A点——到B点。由小到大，由简到繁，从单一到普遍。

在自然界和宇宙中存在的奇妙的等级排列和秩序，似乎意味着社会中可能同样存在着那样的秩序性。

自然科学中一些引人入胜的发明使人们形成了一个信念：科学一定会提供使人的恒古宿愿得以实现的特效手段。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尖锐性使这些宿愿更加强化。

而与此同时，个人和社会意识的结构本身又具有宗教信仰式的特性，因此很容易形成偶像，形成新的崇拜对象，很容易把无神论当成反宗教的宗教。

从这种精神环境中马克思主义几乎挑选了它的全部极端主义。

^① 米哈伊洛夫斯基（1842—1904），俄国社会学家、政论家、文艺评论家、民粹派。——译注

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个社会假设，它的主要内容是这个社会有能力改造，而且是加速改造人的生活条件，有能力不仅对政权机构和私有制的生活方式进行改造，而且对精神领域和道德进行改造。

号召建立没有贫富差别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将由受歧视和被压迫的人领导世界，因为只有他们才有智慧、纯洁的良心和正义感。这个号召，以及普遍重分私有财产和克服私有制思想的传布，在大部分人中引起了十分热烈的反应。

这个思想落到了由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不公正、各种畸形现象和社会发生的急剧物质分化所培育的土壤上。

产生了通过革命实现向新社会的过渡的炽烈诱惑。相应地也产生了对历史哲学的新的解释。处于它的中心的是这样一些问题，如历史进程的间断性问题、社会发展中的极端时期、从一种社会状况向另一种社会状况过渡时对自然形成的社会机体的破坏等。

法国大革命的理想和象征在新的条件下似乎苏醒过来了，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次生命。

出现工厂无产阶级、传统生活方式发生崩溃和爆发最初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孕育了强调同过去决裂、把未来浪漫化和强调革命救世说的灾难性意识。

把资本主义说成是商品生产发展中的最后阶段的夸张说法也是与此相联系的。

染上了感情色彩和智力上自命不凡色彩的这种世界观的既定性，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把主要的东西置于分析之外，也就是不去分析实现历史和文化继承性、维护与保持生命和保障社会活力的社会机制。

仅仅对无疑是重要的，然而人为地从历史的前后联系中抽出来的那些社会现象和过程作了分析，就据此作出了许多结论。

这些结论涉及到社会、国家和个人发展的一切方面，涉及过去全部的、甚至将来的历史发展。也就是作出了意义极其广泛的和后果极其严重的许多结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早期资本主义的批判是社会思想发展中的卓越现象。

但是，把科学理论变为意识形态，变成用暴力改造世界的某种教义问答，使这种理论变了形，而已经开始的政治斗争使这种社会思想趋势大大地教条化了，逐渐使它堕落到为暴力作论证和辩护的可悲角色。

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他们的社会发展公式就受到了尖锐的批评，不仅是由于它的矛盾性，而且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概念在构建未来纲领时忽视了当前正在发生的变化。

这是带有根本性质的批评。但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如果同意这一批评，就意味着他们的基本思想——世界暴力革命思想的破产，按照他们的看法，暴力革命将结束人类的史前时期，并打开了通向人类真正历史的道路。

对暴力革命思想的“伟大”的着迷，使马克思主义巨匠们不能清醒地正视周围的世界。还在那时候，他们就给自己的意识形态敌人扣上“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叛徒”等帽子，他们宣称马克思主义是永远正确的、无可指责的，马克思主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当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可以找到不少谈到教条主义的危险性，谈到理论家作出自己结论时必须以生活为依据的言论和有关自由和民主的谈论。但是他们对这类健康思维所作的实际解释，使这一学说具有公开的伪善性质。

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走进了死胡同。他们确定了最终目标——建成共产主义。确信必将达到共产主义。伟大发现已经完成。所剩的只是找到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并在理论上为之进行

论证。

在真正的科学中这样是不行的，顺便说，马克思也是承认这一点的。

科学就是运动、怀疑、对无知的克服，对科学来说存在永远是具有许多未知数的课题。任何发现都是研究的结果。从研究中也得出与预想不同的结论。

马克思主义围绕同样一些命题已经转了一个半世纪。翻来覆去都是同样的东西：剥削、阶级斗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上层建筑、领导权、公有化、无产阶级专政、旧世界必然灭亡、新世界必然胜利，等等。

过去的实践也许还可以证实这个东西，但是生活已经向前大大发展了。为马克思学说的命运承担起责任的西方马克思追随者们，没有能够或者并不愿意把马克思的理论假设拿到生活中去加以检验。

马克思的理论假设在俄国长期找不到自己的地位，它很难被接受，因为它是同俄国的精神世界和人民的生活方式相矛盾的。而当它开始在实践中受到检验的时候，则什么也没有产生，而只产生了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

还在俄国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初时期，它就受到了很有说服力的批判。它在半封建落后国家条件下的可行性尤其令人怀疑。根据马克思自己的命题，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工业发达的国家中，当生产关系在生产力的冲击下发生爆炸的时候才会实现。俄国完全不具备这些条件。它仅仅开始了自己的工业化道路。

但是列宁在马克思主义中看到了这样一些论断，这些论断如果付诸实践，可把国家引向革命。

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被认为是对无产阶级的背叛而加以抛弃。于是就产生了布尔什维主义。

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这方面起了致命的作用，在这

次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裂。列宁得以组织自己的党，这个党扫除了自己道路上的一切，取得了政权。

当布尔什维克得出了在俄国存在着夺取政权的现实可能性的结论时，他们用已经在1905年12月开始的国内战争的鲜血巩固了自己的信念，这种国内战争通过这种或那种形式直到现在还在进行着。

对历史的自然进化进程的破坏，变成了俄国的灾难。

列宁激烈地同任何无法同革命和夺取政权的概念相容的思想进行斗争。事情的这一方面是需要特别研究的课题，但是现在需要对两点情况给予注意：一是改良主义被列宁彻底抛弃；二是涅恰耶夫^①精神在列宁的实践中牢固地得到了确立。

列宁还精确地估算到，专制政权会对改良主义进行迫害。这里布尔什维克的利益和沙皇的利益走到一起了。到这时候已经昏庸不堪、不能把改良作为社会发展手段加以接受的专制政权走下了历史舞台，而对改良同样予以蔑视的布尔什维克则崇拜革命，轻而易举地夺取了倒坍在地的政权。

但是生活终究是生活。它对待那些开始对生活施加强暴的人是不那么仁慈的。因此一切也就偏离了正道。

或许是马克思主义的药方同十月革命后俄国的现实生活一开始接触就使列宁产生了 he 过去不曾有过的疑惑。

从各方面情况来看，他开始懂得了“战时共产主义”的破坏性，敏锐地抓住了1921年初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原因，并由此在

^① 涅恰耶夫（1847—1882），俄国革命运动参加者，秘密团体“人民惩治会”的组织者。著有《革命者和基本信念》。1869年在莫斯科杀死了有叛变嫌疑的大学生И·И·伊万诺夫，后逃到国外。1872年瑞士当局把他引渡给俄国政府。1873年被判处20年苦役。死于彼得保罗要塞的阿列克谢耶夫堡。——译注

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结合起来这个概念上闪现了修正主义思想。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写道，合作社问题是一切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绊脚石，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与之斗争过的旧日合作社工作者傅立叶、孔西得朗^①和圣西门信徒的学说中去寻找。

应该指出，在列宁的最后几篇文章中可以看到对于与现实生活发生特别尖锐矛盾的某些正统观点进行重新审视的企图。但是这些疑惑本身也充满着矛盾。他时而认为新经济政策是暂时的退却，时而说国家资本主义必须存在到共产主义的胜利。如此等等。

现在来猜测这是对教条进行重新审视的开始，或者是一种策略手段（列宁一直是个策略大师），这是没有意义的。

我个人并不相信这是列宁临死之前的理论上的再生，虽然究竟如何又有谁知道呢。

在那个时期，当世界上，首先是在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中间已经开始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初教训进行积极的思考时，在我们这里用真话和谎话播种了关于马克思主义无所不能和是绝对真理的神话，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对布尔什维主义有利的那些方面。许多最不可思议的意识形态诡谲手段被施加于社会，依靠这些手段在几十年时间中甚至谈论马克思主义中真理和空想成分的关系的可能性都被堵死了。

我们就来看一下“残余”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提供了把政治上的任何失误都算到尚未摆脱资产阶级旧影响的人的思想行为中的资本主义“胎记”的危害性的账上去，算到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和无纪律性等等的账上去。

^① 孔西得朗（1808—1893），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信徒。提出通过成立生产者协会的办法实现“阶级和解”的主张。——译注

也把各种困难、失败、失误同外部反革命，同垂死的资本主义对新生社会的消极影响联系在一起。臭名昭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压制了健康思维。

要对社会现实矛盾作分析是根本不可能的。把一切都归结为研究新旧事物之间的对抗和用新的生活组织形式取代“腐朽的”经济关系与行为动机的过程。至于那些已用新的形式反映出来的矛盾，则都被认为是非对抗性的，只从这一点上去进行研究。

在60年代初期，采用了另一个计谋，这个计谋把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正确性的探讨又推迟了四分之一世纪。提出曾存在两个马克思的说法就是这个计谋的基础。

第一个马克思是“早期”马克思，他是现实人道主义的真正创造者，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作者。

第二个马克思是“非真正的”马克思，即《共产党宣言》、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资本论》——非人道主义的经济理论的作者。

有些哲学家在60年代初期，跟随着亚当·沙夫^①指出，我们的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悲哀在于它们并不符合真正马克思的思想。但是由于哪儿也没有实现过真正人道主义的马克思思想及其克服异化的学说，因而也就否定了想把“真正”的社会主义理论同它在实践中的实现加以对比的可能性。

我们有些社会科学家坚持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实际在原则上不可能同马克思的集体联合体社会的理论纲领相符合，因为马克思设想的那种实际所需要的时间要比苏联走过的时间长得多。按照这些观点，只有当社会主义在所有国家中，在全世界获得胜

^① 亚当·沙夫(1913—)，波兰哲学家。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导论》、《共产主义运动处于十字路口》等。——译注

利的时候，才能谈得到马克思主义的详尽的自我检验和实证论证。

这些巧妙手段还在 1985 年开始改革之前就受到了批判。健康思维和按照全盘公有化的模式建立起来的经济结构所面临的日益加深的危机促成了那场批判。人们注意到，我们缺乏对 20 世纪历史的现实进程和按照马克思和列宁思想去建设社会的现实实践的比较分析。

把“真理性”一开始就当作既定的东西，这是极其有害的。布尔什维克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这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了宗教裁判所的功能，变成为了斗争和统治的目的而进行集体心理动员的工具。

二

任何预测都会有不准确之处。社会生活的本质和人的本质普遍具有本身独特的可变性，因此在它们的运动中经常有非常重要的不确定因素。问题仅仅在于这种不可避免的不正确性的规模有多大，实质是什么，以及它的实际后果是什么。

在对发展趋势进行预测的尝试中不存在任何先验的不合法的东西。归根结底，一切社会科学的意义和使命就在于学会作出可靠的社会预测。

在马克思的学说中没有这种“可靠性”。不但如此，它还以资本主义已走到历史尽头和接近消亡的立论作为出发点。其他一切都由此而来。

当然，任何事物，既有始，也有终。但是走向消亡之路有多长？可不可能发生某些新的因素，足以大大影响到发展的性质和前景？如果是的话，那么是哪些因素，何时会发生？最后，与此有关的是，在创造历史的社会力量的行为中出现了哪些新因素？

根据来自巴黎工人 1848 年 6 月起义的印象，就得出工人

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从一开始就具有不可调和性和对抗性，他们之间的矛盾不可能在现存的经济关系框架中得到解决的结论。

这个论断的绝对化，不论对革命理论、对历史哲学、最后是对作为出发点的研究方针都有影响。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是与《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段连在一起的，那一段说，“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504页）

与此同时，不必害怕任何牺牲。必须用一切代价保持无产阶级群众的革命精神。例如，马克思认为，公社成员没有不经战斗而放弃阵地，这是他们的功勋。他写道，“工人阶级士气的涣散比起不管多少领导人的死亡最终将会是更大的不幸。”

在上个世纪的40年代末和50年代，对马克思来说，没有比反对暴力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更可怕的敌人了，提一下这一点不是多余的。他付出了许多论战才能来揭露改良主义和进化主义的“幻想”。列宁也重复了同一条道路。

顺便说一下，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的进化倒是很有意思的。

他在年轻时候写道，“因此，英国工人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愈多，他们现在的愤怒就愈快地成为多余的（如果这种愤怒今后仍表现在以前的那种暴力行动中，那它无论怎样也不会有什么后果），在他们反对资产阶级的发动中粗暴行为和野蛮行为也就愈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586页）

后来他完全改变了看法：“财产共有性的要求……就这样排除了对资产阶级的任何仁慈、温和和尊重。”

马克思认为自己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转折阶段的见证人，这时资产阶级文明已开始走下坡路，已没有什么东西能使它得到挽

救。这一信念贯穿于《共产党宣言》。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末尾，马克思坚持认为，已经开始的资本、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831页）

马克思根据这一点把事物绝对化，把实质上是特殊的東西变成了普遍的东西。他把克服封建的多层结构和使社会与经济结构简单化的进程，奉为普遍历史规律。

这种观点允许把大量社会问题归结到一个矛盾中去，即事实上的生产社会化和占有的私有形式之间的矛盾。原有的一切社会差别都被溶解到一个大矛盾——资本家和雇佣劳动之间的矛盾中去了，这个矛盾只有靠政治革命才能得到解决。

采用类比方法在这里是得不出什么的，因为从内容的观点来看，由后期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同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新社会，例如向这一种或那一种社会主义形式的可能过渡，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资本主义确实是在后期封建主义的母胎中成熟起来的，它一开始就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形成一个发育成熟的自我发展和自我调节机制的体系、经济关系和刺激因素的体系。

这里革命（如果革命发生的话）的任务仅在于保证已成熟的经济关系得到发展的余地。这里革命家不会冒什么风险，因为他们所捍卫的是已在封建社会内部证明了自己的生命力的东西。

这里所讲的是同一种私有制性质框架中的历史运动。

但是社会主义不可能作为质的整体在原先的社会内部形成。资本主义既没有造就新的集体生产方式的动因，也没有造就这种生产方式的主体，也就是准备去建立新的经济关系体系的人。

关于资本主义没有准备好最主要的东西，即集体生产的人的因素这一点，十月革命后当彼得堡的印刷工人举行罢工时，布尔什维克就立即看到了。

当时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几乎同时得出了一个奇怪的结论：不用暴力强制劳动，要建立新社会是不可能的。布哈林写道，工人阶级的广泛阶层带有商品——资本世界的烙印。因此实行强制纪律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在工人阶级本身范围内施行的主要新型强制形式之一就是消灭所谓“劳动自由”。

这种逻辑是毫不新奇的。如果生活本身并不产生这种形式，就必须把它从外面塞到生活中去。这就是用暴力把破坏自然的历史进程形式的东西强加给社会，而且把这一切说成是为社会谋幸福。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智力和知识的极限，这一点对社会和个人，对天才和普通人来说都是确实的。但是这里的问题不仅仅是思想家在精神上的闭塞。

这是人们热衷于改造世界的时代（这里讲的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马克思和罗思柴尔德^①、恩格斯和杜邦^②在要改造世界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尽管他们是按不同的方式行事的。

也许，婴儿就是这样开始走路的，他突然感觉到了自己不是爬或是躺，而是走的能力。他想走，高兴地向前冲，他脸上流露出快乐和惊奇，他走出一步，两步，随后跑了起来，为自己状况的突然变化而屏住了呼吸。他向前跑，但不可避免地会摔倒，摔倒，他经过摔痛，摔得发紫，起泡，学会了困难的运动的学问，但那是可感知的、可控制的运动。

欧洲文明在19世纪中也是这样一个婴儿，而想让人类最快

① 罗思柴尔德（1744—1812），法国银行老板，是西欧著名的罗思柴尔德财团的创始人。——译注

② 杜邦（1739—1817），法国经济学家，曾鼓吹自由贸易。后移居美国，1802年在美国开始发迹，其后裔在美国形成经营化工和纺织业的杜邦家族。——译注

地向美好未来前进的马克思主义药方是这个婴儿摔下的最沉痛的一跤，这一点已为俄国的社会试验所表明。

看来，应该同意这一点，即《资本论》的作者对滋生唯利是图习气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个人厌恶，培育了献身于证明私有制文明必然灭亡的革命家马克思和学者马克思。只要读一下马克思的《论欧洲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在这两篇文章中形成了马克思的政治和世界观信条），就可确信这一点。

他对未来的预测，在很多方面都是从一个信念出发的，即社会生活、家庭、传统价值观的无序程度的增加和解体过程，一定会扩展到社会的所有其他领域，而这最终将为一个原则上不同的形态——共产主义形态清除出位子。

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的论断从一开始就是同公民社会必将自我销毁的信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断定，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建立新的生活方式，建立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最高形式和实现少年教育的社会化等梦想，都是有可能实现的。

总的应该说，经典作家们对传统家庭的态度（不仅是对它的经济结构，而且是对它的心理结构），是消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直到逝世之前在再版《共产党宣言》的时候，一直原封不动地对所谓资产阶级关于家庭和教育的说教，对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温情脉脉，进行尖锐的批评，这是很典型的。

由恩格斯撰写并在出版前由马克思看过的《反杜林论》中，仍保留着原先的信念，认为必须克服“资产阶级家庭”及其特有的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亲密关系，取消遗产制和家庭教育。

马克思视之为异化的结果和源泉的许多社会设制（国家、民族、语言、宗教、道德、家庭、劳动分工、市场、私有制），实际上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生活的基本条件和人的社会生活组织的普遍原则。

历史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也没有对马克思表示赞同。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革命将在几个发达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中同时发生。这一点并未实现。革命在俄国发生了，但这是由于各种不同的情况奇异地交织起来的结果，其中许多情况同“社会思想”并无直接关系。再说，即使按照马克思的公式，俄国的生产力也远未成熟到需要炸破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外壳的地步。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是腐朽的社会，它同科技进步和社会进步是抵触的。这个说法看来是不正确的。

马克思提出了没有商品的空想。但是至今通过价值规律不仅决定着这一件或那一件东西的使用价值，而且决定着劳动生产率。因为只有依靠这一规律才能在竞争的条件下经验地确定生产这一种或那一种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

关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框架内不可能保证生活的社会条件这一思想并没有得到证实。资本主义学会了避免阶级矛盾的急剧尖锐化。剩余价值中很大一部分用到工资上去了。在可接受的最低生活标准中包括了有报酬的休假、汽车、住房、休息和一系列社会保障。

还在 19 世纪末伯恩斯坦就注意到了这一情况。

本世纪显示了各种妥协性的、中间性的发展方案的有效性，这些发展方案把连接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各种直接形式和间接形式结合在一起。

关于实现生产集中化和扩大化的可能程度的预测也未得到证实。曾经断定说，小生产和中生产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而这将导致绝大多数居民的无产阶级化。马克思在评论普鲁东时写道，“作为真正的法国人，他把联合体限于工厂……在他看来，法国农民、法国鞋匠、裁缝、铁匠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必须接受他们的存在。但是我越是研究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越是相信，农业的改革，从而也是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个体养猪的改革应该是未来改革的根本。”

在19世纪下半期，人们曾认为，技术进步最终将改造现有的一切生产形式，在所有部门中都将出现需要集体劳动和集体所有制的生产工具。

然而，技术进步并没有把单个的、个体的劳动工具都排挤掉。相反，在许多情况下，科技进步大大地促进了这些工具的完善化。从而也为保护个体的、分散的、首先是家庭农场的劳动，也为大生产、中生产和小生产的相互协作建立了新的技术基础。所以，关于小生产，首先是手工劳动，作为旧的生产方式注定要消失的预测并未得到证实。

关于可有效地把大工业生产中形成的劳动组织方法移到农业部门中去的设想也未得到证实。实际表明，农业生产的“生物力学”对农业劳动组织，对它的分配和劳动关系具有重要影响。

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对采用新机器已丝毫不感兴趣”。可是，他写道，这样资本家也就改变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也就是要以几何级数来衡量进步速度的不可抑制地发展人类劳动生产率的使命，而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利益同人类文明的利益发生了矛盾。资本就这样再一次证明，它已变得衰老了，而且变得越来越衰竭。

但是这一法则在实践中并未得到证明。在再生产周期的下降弧线上利润份额确实是在减少。但是总的说，在生产中采用科学成就和利润份额的增长之间的依附关系，同马克思的预测往往是直接相反的。在马克思逝世后的一百年中，资本主义在技术工艺的发展方面已完成了几次飞跃。

顺便说一下，这种情况也同工业生产最初阶段的情况相似，与劳动价值论所说的相反，投入机器装备最多的纺织工业的资本带来了最高的利润。

实质上，马克思据以建立其“科学社会主义”世界观大厦的全部具体经济结论中没有一个是实践中得到证实的。

第四章 关于矛盾

矛盾的实质就是解决矛盾。没有这一点，矛盾就毫无意义，事物、人和社会就将处于不断的、无穷无尽的对立之中。

所有事物、所有社会、任何系统，直至宇宙——这首先是和谐地连系在一起的对立物的系统。人的伦理、全部古代的和基督教的和谐、和平和爱的伦理都是以这个原则为依据的。

不能把生活的矛盾归结为经济的矛盾，不然生活本身、它的完整性就消失了，家庭、权力、爱情、功勋、神话、宗教都消失了。所有悲剧、戏剧、喜剧，命运、大老粗和智者、预言家和战略家、还有构成生活真正内容的一切崇高的东西、使人震惊和惊讶的东西、时代和人民的精神都将消失了。

马克思把一切矛盾都理解为对抗。特别是，他提出了“对抗性矛盾”这个词，所指的就是那种高度发展的、只有靠外科手术办法才能解决的冲突。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矛盾也具有矛盾的一方朝另一方转化和双方相互渗透的特征。他指出，异化贯穿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两个基本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所有活动和行为。

马克思要大家注意，在分析无产阶级和私有制之间的矛盾

时，只宣告它们是统一整体的两个方面是不够的。

私有制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它本身也就必须保持其对立面，即无产阶级的存在。这是对抗的正面。

相反，无产阶级必须消灭自己的地位，从而也必须消灭以它为前提的它的对立面——私有制。这是对抗的负面。

这样，在对抗范围内，私有者代表保守一方，而无产阶级则代表破坏一方。第一方极力保持对抗，而第二方则极力消除对抗。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对抗性矛盾除了通过某种爆炸外无法得到解决。

好，就算是这样。爆炸在消除矛盾双方中的一方时，就消灭了原来的对抗。

但另一方又如何呢？

它是否将包含到某个新的矛盾中去呢？可是，这样一来不就是爆炸、震动、革命的无穷无尽的发生吗，因为谁能保证新的矛盾不会是对抗的呢？或者它遇到了某种非对抗性的存在，然而这又将如何去保证发展呢？因为非对抗的和甚至是非矛盾的存在就是垄断，而垄断就是停滞、腐败、衰变，这一点已为苏联经验所证明。

马克思最感兴趣的是矛盾的对抗和它们的启示录式的解决。他好像并未注意到，对立并不必然是冲突或矛盾。存在着对立的和谐。一切组织都是和谐的合作体，一切分工都是不同的和对立的功能的相互补充。只是由于这一点，社会才得以生存和发展。

但是这决不意味着静止的和谐。我们看到的是，对立面的和谐的不断破坏和恢复，和谐与混乱的不断斗争。被分成部分的整体和谐并不总是完美的，其中有分歧，有矛盾。但是和谐可以得到恢复，可以建立新的、更完美的结合。这就是生活的过程，生产和创造的过程，历史的过程。

赫拉克利特^①（马克思主义者很喜欢引用他的话）说，不和是万物之父。这个思想被马克思主义拿来作武器，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想去发现，赫拉克利特还有另一个与此相对的原则：和谐、协调、和平是万物之母。没有这个原则，一切就都不可能诞生，都不可能在世界上永存。这个原则原来无人给予注意，因为它是同斗争和革命理论相矛盾的。

黑格尔——马克思的精神之父——尽管非常喜欢古希腊罗马人爱用的讽喻和象征手法，对赫拉克利特也有好感，但未注意到弓和琴的象征。

弓是一个两极对立的系统。弓张得越满越好。

但是弓弦可以变成琴弦。琴的构造原理同弓是一样的。同所有弦乐器一样，琴是多弦的弓。

弓的原理应用于一切建设中，首先是在建筑中。这里一切都是以力的对应，以拱垛和拱为基础的。“拱”这个词就意味着弓。一切技术，实际上从原子到太阳系、到宇宙的我们全部存在都建立在这一个和谐和对立的原理之上。

普卢塔克^②早就写道，根据赫拉克利特，宇宙的和谐，正如琴和弓的和谐一样，是多音的和多样的。弓和琴在原则上既是相同的，又是对立的，正如生和死一样，因为弓会带来死亡，而琴会带来生命的喜悦。

马克思选择了弓。他把阶级斗争的全部政治概念都建立在不可

① 赫拉克利特（公元前6世纪末——公元前5世纪初），古希腊哲学家，辩证论者。他提出了不断生成，不断变化的思想（一切皆流，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对立面处在永恒的斗争中（不和是万物之父），同时宇宙中又存在着（隐蔽的和谐）。——译注

② 普卢塔克（约45—约127），古希腊作家、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是《古希腊罗马名人传》。其他流传至今的作品汇集在一起，题名为《道德论》。——译注

可调和性和对抗性矛盾的基础之上。阶级只是为了同另一个阶级对抗而存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对立的阶级进行着斗争，“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2页）

马克思不怕暴力、国内战争，颂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肉体冲突。在阶级和阶级对抗没有消灭之前，社会科学的结论就是胜利或者死亡，流血斗争或者灭亡。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也就是不可调和的对立面斗争的历史，它客观上就把不受限制的非道德性带进了生活，特别是带进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

用暴力来加以解决的对抗使人的存在变了形，阻碍人的道德的发展。实质上，整个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首先是它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剥夺剥削者的学说，是反对作为公民社会基础的全人类道德的。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历史的心灵和智慧。这里根本容不得用超阶级的态度去衡量无产阶级的行动，一切服务于革命思想的东西事先就被认为都是正确的。这种无视普遍公认的道德规范的特殊的“阶级”道德性成了一个免罪符，它把任何行动，其中包括犯罪行为都说成是正确的。

马克思不是从个别人、具体的个人的自我感受、幸福、苦难的立场，而是完全从社会结构如何不断地走向既定目标的角度去观察现实历史过程的。

这种思维方式使马克思的许多追随者都表示景仰。例如，考茨基曾钦佩地说，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在历史上存在的与其说是个人，不如说是社会，它会把所有阻挡社会发展规律的人全都“无情地扫除掉”。

确实，马克思并不是从个人出发，而是从社会整体的历史自

我运动的冷酷逻辑出发的。

马克思主义的非道德性在俄罗斯达到了自己历史的顶峰，因为正是在这里这一学说实际闯入了活生生的进化运动的现实。

布尔什维克们从宣布自己是为无产阶级利益而斗争的战士开始，就走上第一次俄国革命的街垒，他们一直是在战斗。开始是同沙皇，以后是同自由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再后是同俄罗斯人民。结果是不堪回首。

人既成了暴力的工具，也成了暴力的牺牲品。

试问，在广泛意义上说，什么是矛盾的解决呢？

在哲学上，它的实质就是二律背反的解决。从正题，到反题，到合题。

矛盾在综合中的复杂统一（按照黑格尔的说法，综合意味着新的质的出现，新的质并不把矛盾的双方吞并了，而是使之得到协调），被马克思主义的说法降低为简单同一，其中矛盾的一方被称为主要和基本矛盾，而第二方则失去自己的存在，而溶入第一方。

可是问题恰恰在于，正题和反题不可能回到起始的同一，否则运动本身就停止了。

存在决定意识这条二律背反成了很难捉摸的东西。它既是口号，又是引子，又是对任何行动、任何道德和行为的解释。既然意识落后于存在，那么一切也就不言而喻，毫无办法。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之后断言，我们所属的物质的、被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的实在，而我们的意识，尽管好像是超感觉的，不过是物质的肉体——脑子的产物。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思想不过是移植到人脑中去的物质的东西。当马克思认为脑子产生思想，正如胰腺产生胰岛素一样时，他当然脱离了低级的唯物主义。他也拒绝庸俗的唯物主义，他指出所谓物质就是全部的存在。

但是问题的实质在于，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庸俗的和非庸俗的，有教养的和没有教养的——的争论是从一个问题出发的：存在的原始基础是物质还是精神？

解决的办法在哪里呢？在一方没有另一方就不存在这一点上。当人得到了如何取得和保存火的信息时，他也开始了自己有意识的存在，在此之前他只是采集自然给予他的东西。

文化和生产本身的发展过程，不过是取得信息，培养才能，学会把才能用于实际的过程。至今人还在努力获取信息，正如我们穴居的祖先获取火一样。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由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此精神生活就是第二性的、派生的。由此得出结论，社会的物质生活独立于人的意志之外。

这正是奇谈怪论。我们在自己历史中所看到的恰好与此相反。曾有过蓬勃发展的俄国，它却变成了废墟，变成了坟地。或者拿古罗马来说，它是被野蛮人摧毁的，它的物质生产也倒退了。

不，人的意志并不是无足轻重的东西。

正因如此，所以我认为，争论物质第一性和意识第二性纯粹是书生气的争论。按照我的观点，信息是一切的基础。

物质作为凝固的能源是信息的能源保证，而精神则是人脑取得的，改写的，加以系统化的信息，是人脑产生的信息。

基本粒子、原子、分子、民族、社会、人、国家、世界、宇宙——它们首先是信息系统。物质只不过使信息系统充实，使信息系统得到发展、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从一种形态转向另一种形态。

信息系统包括了人迄今所知道的全部精神和全部物质。这一切就叫做自然和社会，也就是不断发展着的或衰减着的信息系统。

正是信息，它的表现是无穷无尽的。伟大人物在其生后只留下信息，不管它是达·芬奇的绘画，或者是莫扎特的交响乐，或者是普希金的《叶甫根尼·奥涅金》，或者是果戈理的《死魂灵》。

古罗马的灭亡，这是经过了自已的顶峰和开始衰降的信息系统的灭亡。物质生产方式在这里不起什么作用。成吉思汗灭亡了40个国家，其中每一个在经济上都超过蒙古人。

最高的信息形式是作为衡量人的道德性和肯定人自身存在有理的准绳的良心。

再拿马克思主义关于量到质的转变的论述来看。其中没有科学内容。一堆砖，不管堆上了多少砖，还不是大厦。不管把多少原子集合于一个分子，仍然不能得到活的细胞。

量到质的转变，这是从一种信息形态转向另一种形态的某种信息跳板，而且用马克思主义的用语来说，是在同一物质基础上的转变，这里指的是同一种量的物质，同一种量的原子、分子、电子、中子——总之是人在微观世界中发现的一切的量。

信息系统经常在变化，量到质的转变始终是一种诞生行动、自我诞生行动、生成行动、建立新阶段信息系统的行动。

归根到底，所有信息系统用完了自己的信息源就转向新的质。当然，由于缺乏能源的保证，信息系统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中断。这也是确实的。但无论如何信息是第一性的，物质和精神是第二性的。因为精神——也就是更有组织的信息——是有效能的，所以只有它才能投射到这一种或那一种物质中去。

例如，如果没有人脑这个理想的信息综合器，就不可能有原子弹或氢弹的爆炸。虽不可能有那种爆炸，可是人触及了宇宙结构的巨大能量之源，其结果是人类变成了可被消灭的，是在人脑的设想中可被消灭的，因为人触动了信息的始因。

康德把“自在之物”的不可知性定义为无穷无尽的认识任务。

我们的祖先学会了取火和保存火，但他没有关于热的定理、燃烧的实质和氧气的概念。所有孩子都看到皮球往地上掉，但他们不知道地球引力的规律。我们都使用电，但不知道电是什么。什么是球状闪电，我们也不知道。据认为，存在着宇宙的无限性，在别的什么地方生活着别的生物。这正好是“自在之物”不可知的一个例子。这不是因为物质是不可知的，而是因为任何信息系统的发展都是永恒的，即使是时间在其中流逝得极慢。

“自在之物”只有通过它的表现才可认知。而这就是相对真理。至于绝对真理，它是没有穷尽的。

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决定存在这个二律背反是无法解决的。它是永恒的。二者是相互渗透的。但是意识越来越多地决定存在。一个接着一个的发明（不管在电子、生物工程领域，还是其他领域），都是作为高级信息系统的人脑的产物，它能吸收信息，对之进行加工，寻找新的、容量更大的信息。

众所周知，文化、文明包含着人的劳动和创造的全部系统，各种活动形式的全部系统。技术活动、劳动活动、科学活动、政治活动、艺术活动、宗教道德活动都属于此。它们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系统。

但是历史经济主义断定，经济因素是决定一切活动形式的，从而也是决定社会命运的原动力。正如上面已经说过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政治和精神过程。

但是生产方式能否在决定意义上确定这一个或那一个社会的人们的观点、思想和信念，确定他们的生活呢？古代在希腊、罗马、埃及、巴比伦、犹太王国都有过奴隶制。在北美洲，奴隶制一直存在到林肯总统之前。

奴隶制经济在各地都同样从事农业和畜牧业，使用相同的劳动工具。

难道能从奴隶制经济的这种单一性中引伸出并了解到各种古

代文化以其思想、信仰、设施呈现出来的无穷的多样性吗？

如果经济决定文化的性质，那么全部历史都将归结为物质生产的历史。可是宗教史、罗马法、古希腊哲学、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古典哲学、建筑和文学的特性，我们又将如何对待它们呢？

人民的特性中容积了多种多样的、具有差别的人的活动的全部系统。能否从人取得自己谋生手段这一点就引伸出人的本质来呢？如耶稣是木匠，使徒保罗是缝帐篷的，柏拉图是奴隶主，普希金是诗人，萨哈罗夫是学者。

文化具有永恒性，并随时都在丰富自己。其中有它的岛屿、它的大陆，它的哲学、文学、建筑、音乐、绘画和科学的半岛。不能把体现于一切完成的形式和未完成的追求中的人民的劳动和创造归结为物质生产的功能，尽管物质生产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发展成分。

当然，如果不知道人是如何穿着的，人吃些什么，他们有哪些习惯和劳动技能等，那么历史远不是完整的。

但是普希金的个性要通过他的信仰，他对生活意义的理解，他珍视什么，他爱谁和恨谁来了解，主要是通过他的创作来了解。他的惊人的全部精神世界就反映在他的创作之中。

人民的特性也要用同样的方法来了解。包括人民所信仰、崇拜的东西，他们对美的理解，他们的习俗，他们的权力和隶属组织，当然也包括他们的经济。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民族的面貌。

“存在决定意识”这个二律背反，也产生了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个命题。它有助于直观地描绘经济决定精神生活、文化和其他一切的方法。

可是用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来理解文化是完全不合适的。

社会生产所包含的，首先是生产工具、技术和劳动的社会组织（马克思主义称之为生产关系）。

而上层建筑所包含的什么呢？它意味着法和政治，意味着国家，意味着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的过程。当然，科学、哲学、宗教属于精神过程。但是技术完全是建立在科学和全部科学系统之上的。

另一方面，劳动的社会组织是靠法和国家来构筑的。然而，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科学、法、政治属于上层建筑，而社会生产、技术和组织则属于基础。结果是上层建筑在构筑基础。

有人说，这种解释太简单化，太直线化了。他们还补充说，作为论据，艺术文化的发展有它本身的特点。据认为，它的发展并不经常同物质生产水平相符，而常常超过物质生产水平。

这样就完全有理由提出以下问题：究竟意识的哪一部分落后于存在，哪一部分又超过存在？如果追随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说法，则落后的存在不可能决定向前超越的文化。

不，这无论如何都无法自圆其说。

也许既无基础，也无上层建筑，而只有完整地进入统一的、无所不包的文化中去的各种劳动和创造功能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附？

例如，没有一个经济概念客观上不在自身中包含着法律范畴。资本要以所有权为前提，商品要以销售，工资以劳动合同，剩余价值以合同和所有制为前提。最后，法律和经济关系的全部结构要求以统治权力和服从义务为前提。

脱离了现实经济过程的法只能为保持政权服务，只能完成操纵经济结构和人的任务。另一方面，超越了法律规范界限的经济生活势必是混乱的、破坏性的、注定要毁灭的。

一切发展，一切创造都是分析和整合的过程，相互渗透和相互矛盾的过程，从分解和对立的部分中建立整体的过程，建立统一的分解整体的过程。

马克思是反对社会分解和整合的原则的，因为他从来不从整

体性出发。对他来说整体已解体为敌对的部分。

如果讲到历史唯物主义，那么它的主要不正确性在于它被人为地扩展到所有历史时代和所有文化中去了，尽管它所根据的只是对一个时代和一个欧洲民族家庭的分析。一个历史时期的特征被变成了全部历史的法则。

在地球上生活着没有文字的澳大利亚土著人，至今还用毒箭互相射击的亚马逊地区的野蛮人。在印度有半野蛮的部族。世界上还有人吃人的现象。

但同时有日本、美国、西欧、俄罗斯，有宇宙空间站、电子设施、人工智能。

工业化时代已经过去。信息时代已经到来。

对马克思来说，一切都以经济为终结。他认为工业化是绝对价值。他的经济主义的全部热忱不是从已经有过的和将会有的东西中吸取来的，而来自于一切应永远如此的认识。

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就是工业化的永恒运动，也就是作为实现最大劳动生产率要求的生产工具的发展。

这里又出现了矛盾。马克思有两个关于必须的基本论断：一方面是必须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的绝对要求，另一方面是必须对剥削的绝对禁止。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就处于这两个绝对命令之间：最大限度的生产是好的，剥削是坏的。

但是社会事实上从不处于，也不可能处于这样的选择面前：或者是最大限度的劳动生产率，或者是使生产经营服从于精神。

在现实生活中经常不断地解决着（有意识地或在实际上）两者之间的相互结合和协调，使许多经济、社会领域、政治和其他参数达到某种最佳状态的任务，尽管要达到社会理想和经济理想的同一是不可能的。

再说，从“纯粹”经济观点来看，不管是对利润的“资本主义追求”，还是“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建设，谋求最大限

度的劳动生产率可能不是好事，而是对社会生活和进步的阻碍。

马克思主义不懂得，或者不愿懂得工业主义的悲剧就在于用工业文明压制精神文化。为此得付出严酷的代价。对伦理功能的压制导致对善恶之间的界限的冲蚀，导致像对待生产工具一样对人完全采取技术主义的态度。由此就出现了集体农庄、劳改营和出卖苦役劳动。总之，只要经济上有利，就什么都可以做。

对马克思来说，解决工业主义的矛盾很简单，那就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但是这里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那里继承了带有其全部矛盾的工业精神。

而至今所有世界体系，不管它们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继续在进行工业化的过程，使自己同自然、文化和人的关系变得更加严酷。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自由和必然这个二律背反。按照康德的说法，它是一个逻辑矛盾，其背后隐藏着对立面的现实协调系统。正题和反题，虽然看起来互不相容，但都是确实的，虽然是在不同的意义上。它们帮助我们发现，现实的存在系统就是不同意义和对立意义的和谐，因为具体的现实不是单义性的，而是多意性和多义性的。

“人是会死的”和“人是不朽的”论断是众所周知的。这两个论断都是正确的，但意义不同，因为人乃是相互并不吞食，而是相互滋养的临时因素和永恒因素的和谐统一。

根据同一原则，自由和必然这一二律背反也得到了解决。自由和必然的对立，“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句箴言取自德国唯心主义，首先是康德、黑格尔、谢林、费希特。

在黑格尔那里自由首先意味着精神的自主性和理智的自主性。理智的自主性不是随心所欲，而是追求自身自由的必然。对这种精神的，而不是自然的必然的认识就是真正的自由。

但是马克思主义是不接受这种解决办法的。马克思主义者所

讲的必然性决非精神的自主性。这样，关于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句箴言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因为认识不是行动。但是自由是要讲行动的，它要问的是，是否存在自由行动的可能？

自由的概念和追求自由的欲望当然只有在不自由的条件下才能产生，即在由于一系列原因而感知到不自由的事实的前提下才能产生。

社会在许多世纪中可能生活在奴隶制下，而且把这种秩序看作是自然的，唯一可能的，能保证安定和稳定的。

社会不是立即觉醒过来的，特别是生活在不自由中，但又不知道这一点的社会。觉醒是从个别人开始的，后来觉醒的人越来越多，觉醒具有了不可逆转的性质，此时生活和形势开始造就并大量产生新思想的代表人物。

这些过程是同个人的形成联系在一起的，是从经济自由的社会心理的增长中，从劳动成果的增长中衍生出来的。这一点不仅为资本主义历史所证明，也为流传给我们的古代民主史所证明，不管是希腊的埃拉多斯也好，或者是俄国的诺夫哥罗德也好。

在马克思的分析中重点是放在“必然”的范畴上，而不是放在“自由”的范畴上。

在马克思主义（后来也在列宁主义）的理解中，必然本身是同“不可避免性”等同起来的。它是主观的，来自其他的人、阶级、集团。

概念被明显地掉换了。必然开始被解释成某种不可避免的东西。例如命运、使命，而不是一定情况下的一定结果的可能性。为论证人类的共产主义未来而提出的论据，不是它对人类有好处，因而是必然的，而是根据这种结果是不可避免的推测。

甚至也不提出这样的问题：某些人为因素能否影响到必然的程度、尖锐性、紧迫性？譬如说，它是否取决于知识的增长，人和社会的视野的扩大，新的物质力量和可能性的取得。如果必然

性是不可改变的命运注定的，那么人的欲望和企求又能有什么意义呢？而如果人的自由和意志可有所作为，那就不会只有一种逃避命运打击的办法吧？！

人的自由不是仅仅在于摆脱不自由。也在于用智慧和道德把握越来越宽广的世界视野的能力。必然不在于服从人所无法控制的力量和法则，而在于为了自己的幸福而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才能去获得进行选择的自由。这也就推动了文明。

必须补充，对自然界的必然的认识还并没有提供自由和控制这些必然法则的能力。例如，行星运动的法则，一切生物的衰老和死亡的法则，等等。此外，对这些法则的认识还有待于物质化。达·芬奇得出了机翼的公式，但是飞机的升空要迟得多，尽管现在人们都乘着达·芬奇想象出的机翼在飞行。人造卫星按照牛顿的定律在飞行，但是在卫星上天之前已经过了许许多多年。

人为了控制自然界的必然性，光了解这些必然性是不够的，人还需要具备自由行动的能力。仅仅从被认知的必然中是得不到任何自由的。换言之，必须转向带有其全部范畴的自由。而正是这一转移构成了自由和必然的二律背反，这个二律背反是不能用被认知的必然这句箴言来解决的。

人的幸福在于自由。

自由不仅是生命的基础，它也是自我意识的顶峰，精神的最高要求，不管是个人的，还是人民的。自由是创造和文化的推动力，是一种神圣的东西。

第五章 本质和现象

可以，而且需要砍树，挖掉树根，以造就未来的耕地。然而，砍树不是因为树不好，而是因为需要腾出地方以作他用。也不是砍掉全部树林，而是砍掉需要用作耕地的那部分。即使是在清除出来的地方也不是毁掉由树木造成的一切，即那块肥沃的土壤，因为只有在这块土壤上才能长出东西。如果把这层土壤也挖掉，那么既不会有原来的树林，也不会有新的庄稼。也不会有勤劳的农夫的经验，这种经验使农夫的后代得以种植粮食，重建树林，并得到使人类生生不息的一切。

许多哲学—社会学定义，特别是关于本质和现象的定义，看起来好像离开日常生活中具体人的利益非常遥远。实际却并不如此。好多世纪以来，本质和现象的范畴一直处于思想家注意的中心。

至于马克思主义，它也把这个二律背反从哲学范围移到了政治范围，其结果是把具有全部感情的、同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具有复杂关系的、具有他的过去和现在、具有他的悲剧和对未来的憧憬的人视而不见了。

左派共产党人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作为指针的生活革新纲领，是同马克思关于完全克服异化的、分裂的人的幻想相一致的。从马克思的结束“自私自利的人”、“偶然的人”，结束“私

有制肮脏货”、“唯利是图生活”的思想，到布哈林和普列奥布勃拉任斯基的完全克服“旧社会”的思想只有一步之遥。

马克思对公民社会的机构和结构的敌视态度来自于他对可能建成一种新制度的信心，在这种制度下个别人有可能在自己的具体存在中体现出人类的理想本质，克服本质和存在之间的矛盾。

这种论断中不仅含有使人迷惑的空想，而且含有革命急躁性，其本身就在鼓动对现实的人及其自然生活实施强制。

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人道主义”是建立在对强调全人类价值和“简单”道德规范的抽象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虚弱无力”进行批判的基础之上的，它反映了新时代世界观和它的进步学说的根本矛盾。

今天很难说，在那种社会思想水平下，在那个具体时代的精神经验的基础上，事情能否不是那样的。

平静的历史分析那时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个时代充满了造反气氛，造反的直接对象就是资产阶级和教权。在“自由、平等、博爱”这些还是新鲜的口号中，包含着恢复这些口号的原始纯洁性的伟大诱惑。乍看起来，它是合乎逻辑地在召唤新的人道主义，并要求抛弃资产阶级道德。

伦理观念和道德理想不是人为地发明的。它们包含了不少迷信和偏见的东西，但也吸收了许多宝贵的和曾由过去多少代人，甚至史前时代的人的长期经验检验过的东西。所有这一切，给予人以精神能力，形成了他的生活意识和社会生活规范。

如果把任何文明的这些原始基础都抛弃掉，那还能保存文明本身吗？难道能在把过去的一切完全清除掉的地方建立精神基础吗？

马克思，如 19 世纪许多受文艺复兴思想影响的思想家一样，并未感觉到，他们所主张的进步范式（即把没有学问的人同有学

问的人、把落后同发达、把宗法制同城市化对立起来)，本身就会引向不平等和人对人采用暴力的新形式。把本质同现象，把自然人同经验的人对立起来，这就是马克思的社会思想的特征，正是在这种对立中存在着出现政治操纵和革命狂热的潜在可能性的根子。

是的，在生活中必须把无知的人同有学问的人等等区别开来。但这是否提供了把社会划分为反动阶级和革命阶级，并认为前者注定要灭亡，要退出历史舞台，而后者“代表社会理智和社会良心”的权利呢？谁能保证，在历史事件的现实进程未搞清楚之前，给整个阶级宣判社会和政治死刑会不犯错误呢？革命阶级从哪里取得了决定另一个被称为反动的阶级的命运的权利呢？能用为了进步的利益这一点来证明这一切都是正确的吗？而且这是不是就是进步呢？

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认为，为进步而作出的牺牲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合理的。恩格斯写道，“历史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她不仅在战争时期，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拉着自己的胜利之车越过成堆的尸体。”

年轻时的列宁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中一点也谈不上道德”。

想让一个人在他短暂一生中体现出作为人类的人的全部特征，想让个别人体现为国家的抽象公民和在他的经验生活、个人劳动、个人关系中成为作为人类的人，这种想法本身实质上不过是空想而已。

而想让由受到生活经验特点和心理素质制约的具体生活服从于某种理想模式，这种图谋将会引起新的痛苦。如果剥夺了“偶然的人”的选择权利，剥夺了他继续作为他那样的人的权利，就更是如此。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社会道学气息，它对单个的人所采取的

漠视态度，是由这样一个信念引起的，就是它认为人的本性是可以很容易改变的，人的普遍解放以及普遍摆脱自私自利和孤独的人的烦恼与欲望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说基础的马克思的社会和政治极端主义，他认为可以完全克服人的存在的矛盾、个人利益与全人类利益之间的矛盾、个人生活与政治生活之间的矛盾的思想，也是不符合生活现实的。

马克思称之为异化世界的一切东西，如国家、民族、单独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宗教感情等，难道不是人现实地生存和表现他的多样性利益和品质的各种形式吗？

马克思主义把进步同克服自然形成的人类文化设制联系在一起，可是除了指出难以捉摸的未来以外，没有想出用什么来取代这些东西，马克思主义的自相矛盾之处就在这里。

认为未来将作出最后的判断，这种观点在最好的情况下会导致对当今价值的贬低，在最坏的情况下则会导致对当今价值的全部否定。同假设的经验相比，我们已知的经验具有无可怀疑的优越性，因为它是已有的，已存在的东西，而未来的东西，那只是一种抽象的可能性。

因此，认为知道了未来的抽象“模式”（这里所指的是理论模式）就足以了解未来经验的最本质特征，这个论断是站不住脚的。

这种预言包含着某种神秘性，它不可避免地会把对抽象理论和具体历史之间存在差别的理论阐述变得简单化。

把分析的这两个层面混淆起来，会导致这样一种企图，即想在非批判的形式中去实现理论方案，想把过去认知的模式强加给永恒地运动着的生活。这样做势必要采用强制的办法把反自然的、同社会存在格格不入的形式和结构灌输到社会存在的肌体组织中。

这里是把黑格尔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作为变革的工具加以重视，其实质就是企图让现实的实际发展逻辑去适应它的思辨方式的形成逻辑。

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中，正如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一样，并未预见到各种所有制形式和各种劳动社会组织方式的同时共存和相互作用。

现实社会生活根本不可能服从于一元论逻辑，不可能摆脱多元主义，服从于臆想的社会法则。如果完全扬弃，真的达到了纯粹单一化，那么社会生活也就死亡了。

马克思声称他同空想社会主义完全决裂，后者在自己的预测中是从被经验地观察的人的心理和感情出发的。马克思坚持认为，人的本质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但是其结果是他给自己关闭了通往认识个别的、会死亡的、偶然的人的经验存在的道路，以及这个人如何现实地体会自己的世界和自己的存在的道路。

与其说马克思在方法论上，不如说他在信念上，在社会思维模型上，是反心理学的。他对人的心理经验是不感兴趣的，他认为随着社会关系性质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人的本性的变化，因此人很快会变成不同的人。

马克思的概念在他对那个时代的社会制度的评价上吸收了许多合理的东西，对正在诞生中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荒诞畸形进行了批判。但是这一切都过多地从属于作者的个性，受到他的个性的制约，贯穿着公式化的思维定式和掌握了固定真理的自负感。

也许，相同的情况也发生在物理学中，那里产生的是“牛顿主义”或“爱因斯坦主义”。

马克思主义关于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拯救人类文明的基本命题，是经受不住理性的、经验的和其他的论证的。试问为什么是这样呢？这是从何说起的呢？

就是马克思本人通过他自己的分析也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

论。在他的著作中，首先是在《共产党宣言》中，他写道，工人阶级是传统社会崩溃的产物，是失去了传统社会形式、财产和对未来的希望的阶层。

这就产生一个疑问，究竟这个“崩溃的产物”，而且是由于贫困而变得怀恨在心的阶层，如何能在自己身上找到精神力量和智慧去建设一个更完善的社会。

至于说到俄罗斯，那么革命所允诺的劳动的解放不但没有实现，而且变得具有更多的奴役性，工人同所有制和生产的异化变得更彻底。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劳动者流氓化的急剧进程，它所增加的决不是社会的建设潜力，而是社会的破坏潜力。

正是由于这种流氓性的顽强抵制、它的寄生性和毫不负责的心理，使 1985—1998 年的经济改革及其进步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变了形。

从经验和心理上，马克思只有当他写到工人阶级是“什么也不会失去”的阶级时才是正确的。

但是从这个论断中只能得出同他的关于工人阶级的“社会理智和社会良心”的主体的基本假设完全相反的结论。历史表明，什么也不会失去的人很容易采取非理智的行动，他们很容易被操纵，为暴力和破坏思想所吸引。什么也不会失去的、饥饿的、冤愤的、受屈辱的人，是谈不到良心的责备，谈不上发慈悲之心的。

当马克思分析人的、特别是无产阶级的社会本质问题时，他最坚决地反对阻挡通向未来社会殿堂之路的私有制。

顺便说，马克思在这里是违背他的老师黑格尔的意见的。黑格尔认为民主和私有制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没有对“外部事物”和对所有制的自由态度，人的自由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把自己的希望首先同工人在资本主义下形成的劳动习惯联系起来，他希望“由于几代人先后都得经历的资本的严格纪

律而形成的普遍勤劳将发展为新一代的普遍财富”。恩格斯认为，工程师将因为自己的剩余劳动多要一盆汤而感到羞耻。

似乎到此时尚未有过欧文的公社的可悲经验，即在那里大家都乐于写诗，可是却找不到愿意到田野里去工作的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共产党宣言》中对这样一些人进行了嘲讽，这些人在同社会主义者的论战中提到有一个对劳动的刺激问题，他们反驳说，“私有制一消灭，一切活动就会停止，懒惰之风就会兴起”。《宣言》中写道，“这样说来，资产阶级社会早就应该因懒惰而灭亡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劳者不获，获者不劳。”（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78页）

《宣言》的作者觉得，他们用这种轻佻的论述就驳倒了财产社会化的反对者的最重要的论据。

但是问题在于资本主义制造了一整套刺激紧张劳动的客观生活条件。资本主义之所以不会因为懒惰而灭亡，是由于它发明了像饥饿威胁和失业恐惧这样一些同游手好闲作斗争的手段。此外，私有资本所有者，不管是工业、银行、商业还是其他资本家，从来都没有安宁的生活。

马克思主义经常都把共产主义说成是地上天堂、人间天堂。这也是自相矛盾的。事实上他们认为，只是在阶级斗争的街垒里才有人的位子。斯大林的“螺丝钉”说，直接来自马克思的对人的忽视。例如，在他们的视野中，反馈联系问题及其在历史、经济、政治、人与社会的全部活动中的作用完全消失了，尤其是在人和社会的活动中的作用。

一切活动都会带来一定的结果。这个结果对存在的下一步进化是否会有什么意义，或者会与之毫不相干？把必然解释成为具有铁的无可阻挡性的不可避免性，这样势必会漠视结果的意义。这个结果是如何取得的，它对以后的事件会有什么影响，它对本身有无影响，它是否会使他学会什么，这些都成为无足轻重的了。

只注意到社会生活中的直接因果联系，这也是同社会历史过程的决定论概念相符的。如果引入反向联系就会使事情变得大大复杂起来。

这里需要在实践中研究一下这样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在 20 世纪已被叫做多义性的依附原则：按照这个原则，相同的起始因素可以导致不同的结果；相反，相同的结果也可在不同起始条件的结合中获得。

使社会关系变得文明和高尚的一切，可以缓解矛盾和使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矛盾不致走向极端化的一切，同反向联系一起，实际上都消失了。例如，市场竞争机制、民主设制、传统、道德等社会发展因素和其他许多东西。今天俄罗斯还在非常困难地克服严重的心理和思想混乱，走向这些东西。

换句话说，当时并不懂得，反向联系，这是通过自我控制和自我调节的运动。

而社会发展的程度越高，社会变得越复杂，它就越需要自我调节社会关系和使社会关系完善的机制。

对这些机制的承认和这些机制所起的作用都会表明在公民社会的框架内走向统一的、相互依附的人类的运动所遵循的法则，要比黑格尔辩证法的二分法所规定的法则复杂得多，都会勾销认为通向未来之路是在使社会关系单一化和原始化、直线化的认识。按照这种认识社会结构将变得如此简单化，那时，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作者的话来说，社会上将“既无手推车运货工人，也无建筑师”。

这种对待问题的方法将会压制人的本性、人的使命、人在这个世界上短暂的一生中作出个人选择的权利。

第二编

布尔什维主义

任何一个思维健全的人不可能不明白，凡是布尔什维主义一经确立的地方，就必然出现诛除异己、血腥镇压、精神扼杀和政治迫害等现象；而超乎寻常和冷酷无情的党和国家的垄断压力更使人们透不过气来。所有这些耽误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拉大了与世界文明进程的差距，败坏了道德风尚，丧失了固有的传统。

这一社会沉痾是如何折磨俄罗斯的？要对此作出分析并非易事。布尔什维主义的根源，其实践与后果还有待历史学家、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进行长时期的思考。

改革运动揭露了苏联制度没有生产力，但它本身也是一个极其艰苦的过程。

问题不仅仅在于来自党、军队和惩罚机关三头执政的统治势力的抵抗，以及国家—封建经济领导人，特别是军工集团领导人的抵抗。

千百万人是在这样的制度下渡过一生的，他们在此学习、工作、养育后代；他们受尽苦难也得到过欢乐；他们心理上无法接受这样的论断：他们这一生似乎是枉然徒劳地虚度了年华。

可以也应该理解他们。对于国家及其各族人民来说，所发生的一切是一场不可思议的大悲剧。

但是极权制度还远非是国家及其人们生活的全部内容。布尔什维主义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但却是卑劣的一部分，它在人民的身上留下了血痕。

我相信有朝一日我国人民将会知晓：数以亿万计的资金被罪恶地滥用于军备竞赛、对外冒险、为别国提供军援；滥用于无任何意义和效益可言的土壤改良计划和谁也不需要的民防建设项目；滥用于搜捕和迫害“人民敌人”。我国人民也将知悉无视发

展农业和轻工业的行径以及其他使国家落后、人民受屈遭殃的许多事实。

时间要求老老实实在地回答以下一些问题：社会的崩溃在何种程度上是过去罪迹昭彰的党和国家黑手党肆虐的结果；在何种程度上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偏执狂热的结果；而在何种程度上又是我们全体殷勤地参与了恶行的结果。

不要逃避现实——正是我们自己泯灭人格和良知，冷酷无情地中伤戕害并将子弹射向了与自己相仿的人们；是我们告发了邻居和同事；在党的会议或别的集会上，或通过报刊、电影和戏剧舞台，揭发了那些“思想不纯分子”。

难道不是我们曾被迫宣誓尽忠，作出被称之为自我批评的种种悔过。

有人会：“这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也许不是你。但是大家都有份。

应该议论一番破坏经济并对个性实行精神压迫的畸形的国家体制和官僚专制制度之所以形成的政治决策方面以及社会道德方面的诸多因素。

但是同样应该不忘自己，不忘那泯灭个人良知的种种罪孽。

布尔什维主义既存在于制度之中，也存在于我们中间。

难道是外星人在我们土地上散播仇恨？

难道不是又有人在叫喊要镇压、审判并处死那些公开纵谈新法西斯主义日益逼近的人们吗？

难道不是有数十种法西斯报刊已在我国出版吗？它们千方百计地挑起内战，刊登“某种势力奸细分子”的名单，即未来政治审判中的被告人的名单。

难道遭受打击后苏醒过来的，曾经为布尔什维克无法纪行为忠实服务的审判和检察机关，不是又在我们的国家开始积极帮助悄悄而来的复辟活动？

难道……？等等。

这一篇从分析1917年二月革命开始。因为我认为将这一时期与今日改革运动中的事件对照，有许多相似之处。

第六章 教训未被记取

困惑不解的同时代人当时搞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是“自由”这一响亮迷人的字眼曾经压倒了一切：对于所发生事件一头雾水、惊心动魄的时代断裂、面对未来的恐惧心理。

俄罗斯已经多少次面临不确定的命运，呈现眼前的只有隐约可见的朦胧前景。

任何一种历史真理总会遇到许多反对者、歪曲者、不怀好意者，甚至还有妒嫉者。它使许多人感到不舒服，许多人对它不欢迎；也有人进行投机，仅仅把它当作确立自我的工具。1917年二月革命遇到的情况同样如此。而最近几年发生的变化也有某些相似之处。

二月民主革命还将长时期地检验我们的学习能力和分辨能力，即检验我们能否分清前瞻才略和冒险盲动；国家职责和虚假的自命不凡；确凿的成绩和晕头晕脑的自我陶醉；务实的揆情度理和闪烁其词、夸夸其谈的臆造瞎编。

无情折磨我们的是不容异见和侈谈空论，正是这些在1917年葬送了民主。不容异见的做法今日也会同样葬送我们，如果我们不及时醒悟，不在民主的土壤上明智地达成和谐的话。

在1917年2月之前，俄罗斯除了专制以外，不懂得有别的统治形式。君主逐代易人。莫斯科大公被全罗斯沙皇取代；而取代后者的是全俄皇帝——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统治从太平洋到中欧、从北冰洋到兴都库什山麓的幅员广袤的国家的专制君主。

根据历史本身脉络，二月革命是一个极其伟大的事件。在俄国现代史上大概没有别的事件像它那样急剧地改变过千百万人的生活。

一切革命都有不少相似之外，然而每次革命都不是重复，因为它总归有其自身的遭遇，自身的后果和教训，自身的高潮和低谷，自身的光荣和自身的耻辱。

正式的历史研究著述认为二月革命很快就被十月政变所取代，是十月政变推翻了二月革命。是布尔什维主义专制践踏了通向民主的运动。

如今，如果有人以为人民为此付出了超乎寻常的昂贵代价的这一历史教训已经丧失其现实意义，则是极其幼稚的想法。

应该承认，1985—1998年间的改革运动未能经受住以二月革命作为标尺的检验，未能及时借鉴它的思想和价值，未能从它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很明白，二月革命并非无缘无故贸然发生，而是事出有因的。旧制度痛苦地分崩离析。新的资本主义关系在一个半封建的国家中逐渐成长。贵族丧失了前进动力，开始走向衰落。新兴的工业家们的贪婪和残酷无情漫无节制。斯托雷平曾经企图改变运动的矢量，但却又未能进行到底。斯托雷平本人也似乎逾越了时代的轨迹。左派把他当成反动分子，沙皇宫廷则认为他是左派。如同此前另一位改革家亚历山大二世被害一样，斯托雷平也被杀害了。

国家因日俄战争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失利而蒙受耻辱。最高当局贪污受贿。君主专制制度害怕一切，辗转不安。有关暴风

雨前夕的这一窒闷场面，索尔仁尼琴在其《红色车轮》中作出了高超的描绘。

人们等待着暴风雨的来临。暴风雨终于来到了。

没有必要赘述事件的经过。这里只着重指出，无能的政府在第一个震荡中就倒台了。君主制度的拥护者 B·B·舒利金^①回忆二月的日子时曾痛心写道：“事情在于，在整座偌大的城市中，却找不到几百名同情当局的人。”^②

于是，人民的巨浪在全国翻腾，冲刷着旧的政权。

但是正是在这里开始了大悲剧的第一幕。

事情在于，自以为有资格领导群众前进的领袖人物——常有这样的情况——对于实行像样的领导还没有做好准备，还不能理解并评价所发生事情的全部深刻意义。尤为糟糕的是，他们并不相信会有胜利的结局。在国家杜马中响彻尖锐的批评，但却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更有甚者，取代专制的新政权竟公然中止了斯托雷平的改革。

当然每个革命的进程都难以预料，预测革命将如何转变谈何容易。人们的认识有时畏首畏尾，有时刻板教条，人们总赶不上汹涌的时代浪潮，虽然还不时自诩在前进道路上是遥遥领先者。

当时俄国的政治领袖们也并不理解事件的真正性质及其意义。对于知识分子和温和的民主力量来说，革命完全是突如其来的意外。他们原先所希望的只是动摇沙皇制度基础，建立君主立宪制，即期待以限制沙皇权力的办法来争取民主自由，他们并不想完全摧毁君主专制制度。“打倒君主专制制度”这一口号本身，对于大多数政党来说只是一个口号而已，而不是当前的实际任

① B·B·舒利金（1879—1976），俄国政治活动家，君主主义者。俄国第2—4届国家杜马右翼领袖之一。——译注

② B·舒利金：《时代》，莫斯科1989年版，第173页。——原注

务。

流亡国外的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更未曾预料革命会有这样的局面。甚至对极端激进分子来说革命也是突如其来的。

例如，1917年2月15日A·施略普尼柯夫^①曾以布尔什维克中央俄罗斯局的名义向列宁发送了如下的汇报：“政治斗争日趋激烈，全国范围内正在掀起不满的浪潮，革命风暴指日可待。”

列宁对这一信息淡然处之。他在瑞士对青年发表演说时说道，他们和另外一些“老人们”看来是活不到革命的来临了。当列宁在报上读到革命胜利的消息时，他对这一条新闻也曾经表示怀疑。

而对于那些身处彼得格勒市内，亲眼目睹了汹涌浪潮的政治活动家们来说，所有一切好像是一场偶尔爆发的骚乱，是总归要失败的。

在首都以及全国，左翼政党和派别的代表人物不只一次地开会讨论瞬息万变的局势。在集会上议论了革命，有的估计革命的到来大约还要等30年，有的则说要等50年。

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认识是：俄国还在酣睡，风潮还未触及人民生活的深处。

自由主义派别的活动家们不敢利用所发生的事件以推进激进的政治改革，他们更不想去夺取政权。

这种等待策略一直维持到人们清晰目睹以下事态之时：沙皇制度已经支撑不住，它既无法使人们信服其生存能力，也无力动用驻扎首都的部队以镇压起义。

当然，要求民主政党手头握有现成的革命纲领是不公允的，因为革命不期而至。但是这些政党在革命过程之中以及革命以

^① A·施略普尼柯夫，苏联政治活动家。十月革命后任劳动人民委员、全俄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联共（布）中央委员等职。——译注

后，直面形成的局势竟无力制订出行动的纲领和策略，对此应该受到谴责。

也许，正是他们的浑浑噩噩、无所作为，为培植专制的土壤施加了肥料，为将官们或者某个极端势力政治派别夺取政权创造了条件。当时一种观点不胫而走：除非实行专制，否则无政府现象必不可避免。

在暴风雨般的各种事件相继发生的情况下，民主倾向的各种派别的沸沸扬扬、杂乱无章的活动——主要是举行集会——很快就取代了不相信革命会成功的心态。

至于极左派和极右派，他们正好利用人民群众不满情绪不断高涨以及民主力量尚未组织起来的时机，致力于最短期间夺取政权。

我们应该记得问题的实质何在。二月革命旗帜上写明的要求是：推翻专制制度，退出战争，解决土地问题，保障政治自由和社会的民主建设，改善人民群众的经济状况。

当然，任何历史类比都相对而言，但有时它们却是难以置信地相似。

从某种意义上说，俄罗斯当今改革运动所肩负的任务，也就是二月革命来不及解决的那些任务。直到今天土地改革仍然明显落后，民主制度和自由尚处在十字路口，群众的经济状况仍然十分困难，社会问题仍然被人忽视。这就是历史的自然进程被人为阻挡所付出的代价。

诚然，改革运动在其最盛年代（1985—1991）基本上已经推翻了布尔什维主义的专制制度，已经从对本国人民不断进行的战争中退了出来，从反对阿富汗人民的战争中退了出来，从与全世界核对抗中退了出来。

回头再看看二月革命，当时着手解决的问题同今日一样，是经济方面的：供应粮食，组织工业和运输工作，解决土地问题和

农业关系等。

沙皇政府不可能明白经济困难的根源何在，因而也拿不出克服困难的办法。

取得政权的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和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人物曾经如此锋芒逼人、振振有词地批评过沙皇政府，斥责在其统治下经济崩溃、物价飞涨；但他们自己不仅未能比旧制度干得好些，相反，却把国家推向全面混乱的境地：货币贬值达到了空前的规模，许多工厂由于缺乏原料和燃料被迫停工，交通运输遭到严重破坏，全国经济生活面临瘫痪的危险。当权者巧取豪夺成风，犯罪现象比比皆是。

形势愈益恶化。政府在稳定局势方面表现出令人无法容忍的、莫名其妙的动摇不定、趑趄不前和碌碌无能。

当然，经济困难并非始于1917年2月。它的根子很深。但是公众舆论认为是执政当局指挥不力使然。原先欣慰欢乐的情绪被失望和厌恶新政权的情感替代了。

于是**第一**，对经济一窍不通的当权的上层和领袖人物继续将革命引向覆灭。

第二，革命群众的基本要求之一是缔结民主和约。

但是将官们和工业头子们却不愿放弃战胜国有希望获得的好处。他们以为战争的胜利结束将使许多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迎刃而解。这些社会集团如同临时政府一样，不愿顾及这样一个明显事实：俄国的军事政治紧张程度已经超越了极限。

这是革命的又一个失误。

第三，俄国农民期望革命能迅速解决农村问题。但是农民得到的并不是土地，而是有关土地改革的朦胧的允诺。

农民已经等待得不耐烦了。1917年秋季到来之前，即早在十月政变以前，自发的农民暴动已经席卷俄国。夺取地主土地及其庄园具有群众性规模。这是国内战争的最初的火光。

革命的领袖们终究未能明白俄国农民问题的全部深刻意义。时至今日，也并未对其有足够的认识，这对民主进程构成了真正威胁。

第四，居住在俄罗斯境内为数众多的各族人民也未能从革命中得到满足。

当然，革命有力地推动了民族运动。但是历史总有许多悖逆现象。二月革命也不例外。争取民族自决的最火爆的运动是布尔什维克们发动的，他们因而在民族地区赢得了巨大的支持。但是后来的事情表明，他们把自决原则只当作应时口号，而不是真正的权利规范。

二月革命在这里同样犯了错误，表现出眼光短浅的教条主义态度。

第五，革命为自由民主的发展开辟了异乎寻常的前景。

临时政府为确立、巩固俄国的民主秩序和国家的民主化作了不少工作。它实施了政治大赦，迈出了8小时工作日制步伐，宣告政治自由和信仰不同宗教的充分自由。言论集会自由变成了现实。1917年2月以后的日子曾是工会组织空前增长的时期。

然而正是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只经历了如此短暂的时间，即到了1917年的秋季，二月革命所诞生的民主即被扫荡殆尽？扫荡一蹴而就，不曾费大力气。这大概是我们祖国当代历史上一个最不是滋味的问题。

我不知道确切的答案是什么，但我想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二月革命后俄国民主主义主要表现为经常不断的大大小小的群众集会和辩论。大家以各种各样的理由举行集会。苏维埃不时通宵达旦地举行没有预定日程的会议，讨论人们关心的一切问题。美国记者阿伯特·里斯·威廉斯写道：“俄罗斯变成了一个有成千上万个演说家的国家。”

集会将人们都吸引到重大政治问题的讨论中来了，而人们对

深刻分析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并没有作好准备。但是，集会通过的决议既对各政党的立场，也对政府的工作施加了影响。在这种形势下，平民主义的政治主张及其肤浅粗俗的评论和要求就受到了普遍的欢迎。

大小集会成了狭隘党派利益裹挟群众心态的重要工具，成了对临时政府机关施加压力的有效手段。

理所当然地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些集会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广大群众的真实情绪？历史昭示（二月革命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革命也罢，其对立面的反革命也罢，最终基本上都是少数政治色彩浓厚的人们实现的，而基本居民与群众总是消极被动，或全然处于冷漠状态。受少数政治色彩浓厚人物伤害最大的就是“沉默的大多数”。

集会民主的扩大与非理性权力的增长携手并进。不断举行集会、提出简单而易被群众接受的口号的技巧本身，如同高尔基所描写的那样，导致了本来就粗俗不堪的心态的进一步庸俗化。

没有哪种政治力量热心于唤醒人们采取深思熟虑的负责的态度来面对国家所发生的一切。谁也不想发扬民主原则、掌握妥协艺术，即人们并不企盼提高能力与对手进行对话，培植本领去听取不同意见并考虑对方的利益。

谁也不劝诲人们去思考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相反，大家都在薰染仇恨心理。

把对手描绘成魔鬼，刻意利用敌人般的形象是当时各政党共有的特性。集会民主为民主的自我瓦解带来了杆菌，加强了不容异见的思想。

革命逐步变成为骚乱。无政权的局面也产生了影响。未能制订出保卫新的俄国的立法原则；警察、宪兵瓦解之后并未出现新的护法机构。国家逐渐陷入混乱。

二月革命不仅未能加强政治中心，反而冲垮了这样的中心，

从而摧毁了稳定的基础。俄国最终也没有出现能够抵制专制复辟和庸俗的破坏政策的第三种力量。

所有这一切为民主走向其反面创造了有利条件：民主蜕变成无政府主义，而无政府主义又终于演变成布尔什维主义的专制。

民主政党领袖们和俄罗斯知识分子都曾经深信不疑：解放了的人民将会在历史上起到其伟大的作用。兴奋不已的情绪产生了一种幻觉，以为传统的极权制度会迅速、无痛、几乎是自动地过渡到民主制度。他们忘却了1861年改革后，以及1905—1907年骚乱后俄国社会的现代化曾遭到多么巨大的困难险阻。

整个社会对于如何运用突然降临的自由并未表现出应有的责任感。

很遗憾，自由常常被用来追求狭隘的党派利益而不是去寻求众志成城的合力。与此同时，对待别的政党，甚至是同一政治信仰的不同派别都采取了不共戴天的态度。公众的意识是隔断的、分散的、割裂的；它最终蒙受了左倾激进主义的欺骗。

为这一进程推波助澜的是一大批政治组织之间的相互斗争。

民主力量并没有成为能使社会上一切有生命力的、健康的和明智的势力都联起手来的那么一种中心和骨干。通过民主建立一个较前自由、幸福的俄罗斯的信念逐渐烟消云散了。

在这样的形势下，任何一个激进的阴谋家组织，比起任何一个民主立场的政党来都会占据优势。

发生了又一个离奇的现象：民主竟然违背自己的意愿，为专制创造了条件。

领导临时政府的是一批作为反对派上台的人们。这是一批不同职业的人们——有学者、律师、工商界人士等等。他们中的许多人赞同社会主义的观点，也有的与民粹主义的政见一致。

然而当他们为国家掌舵的时候，他们立即成了职业政客，日益脱离供应其营养的根子，脱离把他们推向政治浪峰的力量。

他们不去认真开展工作，而是代之以凭空臆想方案，提出脱离生活的纲领，施展形形色色的政治手腕；他们一心跟着某种情绪转，而不愿为人民和国家的真正利益服务。民主方针最终无法贯彻，执政当局本身陷到了蛊惑人心的革命空谈中而不能自拔，这就导致一部分居民冷漠以待，另一部分居民愤愤不平，有些人则对政权产生反感。

二月革命的最伟大的意义在于国家政权的更迭形式，即避免了国内战争及其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这场革命的不流血性是俄罗斯向新的品质过渡的绝无仅有的典范。曾经出现一切社会力量和平协商地开展行动的诱人前景。

但是通过社会和解以解决共同的民主任务未能实现。个别政治领袖人物的自负傲慢占了上风。狭隘的党派目的置于社会利益之上。极右派和极左派相互仇视以及中派内部政见分歧使继续培养民主制度和建设公民社会的希望破灭了。

改革的中坚力量的涣散导致极端两翼势力的加强和社会进一步两极化。这里特别明显地表现出当时政治精英们极其不负责任的态度。

事情发展到科尔尼洛夫 1917 年 6 月叛乱时各派力量的直接交锋。在布尔什维克的参与下科尔尼洛夫叛乱被平定，这就为布尔什维克开辟了直接通往政权的道路。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召开民主力量会议的尝试未能产生真正的结果，反而表现出民主中心的涣散无力和张慌失措。

革命的破坏倾向压倒建设倾向，其激烈程度已无以复加。民主越来越被人们斥之为混乱，而专制却向人们承诺会带来秩序和安定。

临时政府软弱无力、碌碌无为，其结果是经济形势急剧恶化，政治斗争日趋尖锐，所有这些导致萎靡不振、玩世不恭、万念俱灰的社会心态，而这些心态又反过来为蓄谋政变和集结反革

命力量助纣为虐。

这里又有了另外一个颇伤脑筋的问题：是否真的有过走另一条发展道路的可能？当然有过。但是革命领袖们优柔寡断，结果是俄国的民主在其最初萌芽时就凋谢夭折了。这些领袖们旁征博引以使人们确信民主是无能管理好国家的。社会更愿意听取粗俗和极端政策鼓吹家们的意见。

乌里扬诺夫—列宁的党狂热地准备政变，他本人一直主张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以军事专制恐吓社会。这里指出一件事实不无意义：某些资产阶级政治家同意了他的观点，认为俄国摆脱危机的出路只有一条，即通过专政。

这样，民主政府不仅为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土壤施加了肥料，而且实际上是未经斗争就拱手将这一政权交给了他们。

布尔什维克们也滔滔不绝地侈谈民主，但是他们毫不犹豫地粉碎了本应制定俄国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立宪会议。

民主游戏结束了，开始了专政的严酷现实。不到一年功夫俄国兜完了灾难之圈：从专制经过民主又转向专政。

教训、教训、教训。我国历史上有过多少次教训啊！人们充满过信念和希望，流淌过鲜血和眼泪；千百万条生命为此而牺牲。

我们不只一次着手伟大事业，但是从未将其进行到底。我们缺乏毅力和本领，也缺乏责任心。

我们打倒过近千年来我国所有的政权，现在只剩下打倒我们自己，打倒我们的糊涂昏昧，我们对别人不共戴天的仇恨以及对自已的恻隐和宽容。唉，由于自己的懈怠、肤浅和愚妄，我们是多么不懂得去爱别人啊！

我相信，只要战胜我们自己，我们就会战胜一切不幸。而在1917年2月之后的日子里，我们未能做到这一点。俄国选择了病态的发展方式。

第七章 啊，盲人们，盲人的引路者们

从历史的观点看，布尔什维主义是从肉体上消灭农民、贵族、商界、整个企业家阶层、僧侣、脑力劳动者和知识分子的社会癫狂系统；是从利沃夫到马丹、从诺里尔斯克到库什卡的挖尽兄弟坟墓的“历史的鼯鼠”；是基于一切压迫形式的对人的剥削和对生态的疯狂破坏；是掩盖思维空虚的反人类的训条。

从哲学的观点看，是社会自恋范畴的思维方式和对任何论敌的攘除和排斥；它集教条主义之大成，是以狭隘需求对待真理的权宜的和最终的结果。

从经济观点看，是由于否定经济自由和面向社会的市场所造成的极大浪费的起码的最终结果；是生产力的无政府状态和生产关系的绝对官僚化；是长时期的科技落后。

写作一部材料翔实的布尔什维主义史看来为时尚早。但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社会方略的基本点是有必要的。

历史的实际进程已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的单维性、普遍性和质的同一性等等谬误学说抛到了生活的一边了。

在这样的条件下，克服教条和教条主义，使科学回到人类生

活的原本真理，就具有根本的性质。

这里指的是毫不妥协地推翻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教条。

指的是坚决否定号称历史火车头的暴力革命；坚决否定“剥夺剥削者”的罪恶主张——要斩草除根地否定它们。

指的是导致世界分裂和对立的革命救世主义所具有的危险性。

指的是否定公民社会的思想所造成的危害。

指的是消灭私有制观点的投机实质。

指的是关于商品文明根本功能及其价值已经寿终正寝的假设的荒诞不经。

指的是摒弃唯意志论的农业纲领。

一句话，指的是肃清布尔什维主义。



共产主义思想早在马克思以前就诞生了，它直至今日仍然存在，这里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只要它仍然是在科学探索、预测和争鸣的范围内存在，那么大概如同其他思想一样，是会起到正面的作用的。

但是有人为马克思主义安排了另外一种命运。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成长了布尔什维主义，后者囊括了一切鼓吹暴力改造世界的论点。

还在世纪之初，俄国社会民主党已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翼，分裂成正统革命派和正统改良派。

列宁需要有自己的政党——政权党。他抛弃了社会改良主义，开始构建以暴力改造生活为实践的布尔什维主义。

分裂党的缘由不过尔尔，然而分裂这件事本身，如上所述，却给俄国后来的命运造成了恶劣和致命的影响。

然而，认为列宁及其激进派别之所以在生活中占了上风并吸引了人们，只是由于其虚荣心和权力欲，那是糊涂的想法。

那么马克思主义借助了什么样的特性和特点得以在俄国城乡风靡一时？今天，社会已进入深刻革新的时期，还有没有必要对其在我们土地上之所以流行的根源和缘由作出分析？

应该而且必要。仅仅以暴力凌驾于社会之上这一点解释所有一切，就把问题简单化了。似乎有人强迫我们相信，我们也就相信了。

是的，曾经有过暴力，有过强迫；所有人都曾被党的洗脑系统所裹胁，所有人都接受了思想控制，精神上几乎全然与世隔绝，对不同政见者进行迫害……等等。

所有这一切都曾经有过。

但是，好几十年来，为数众多的俄罗斯知识界信仰马克思主义却完全出自自愿。也不能说俄罗斯思想界就看不到或不明白马克思主义在逻辑上有明显的纰漏。然而更重要的是，人们之所以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仅仅是把它当作新的学术流派，而是作为一种指出摆脱绝望和困境的途径的学说。

为什么会如此？看来，答案不仅应该在马克思主义中寻找，在其诱人的乌托邦观点中寻找，也还要从俄罗斯现实的特点中去寻找。

譬如说，从未有过法治、从未有过土地私有制的国家能够知道什么？在这个国家里，从未有过个性的自由。这样的国家对社会类型可以有另一种选择一无所知。

许多人现在奋起“斗争”的只是针对最近的 70 年，好像此前未曾有过另外的数千年，这数千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布尔什维主义在 1917 年取得了胜利。

直到今日，人们还未尝试把历史作为不间断的统一的进程来加以认真的研究，还未把历史放在 20 世纪以及更早时期的世界

的（不仅是欧洲的）发展的总体背景中加以仔细的观察。

中央极权国家产生了相应类型的个性。当然另外一种说法也是符合逻辑的：即这一类型的个性本身乃是极权制度的支柱，它不断在各个层面繁衍极权，不仅在政治机构和国家机关的层面，而且在一切层面——家庭、作坊及其以上的各个层面上繁衍极权。

这两种说法都是有道理的，但我们还是先来讨论第一种说法。

极权社会制度总是压制个性的，哪怕有时采取了最为缓和的方式。它摧残个人独立自主的能力，扼杀个人在这方面的需求。它培植人们的趋附心理，要求他们长期充当从属角色。

极权主义生活方式不仅限于宏观结构方面。它还存在于父权制的家庭关系之中。在那里，家庭的独裁恣肆会把国家的暴政远远抛在后面。它也表现在生产关系上，主人的绝对权力同样也十分强大；它还表现在地方生活上，一个地方长官有时要比任何上级都显得有权有势。

所有这些，如同人们熟知的那样，在俄国生活中不仅有过，而且具有极端的表现形式。

俄国专制制度引起欧洲方面尖锐的道义上的非难，正是由于它的专横跋扈。

但是专制制度本身完全不仅仅是沙皇、宫廷或统治阶级某些脾性的结果。极权主义是社会赖以生存的严酷条件——贫困、知识匮乏、人口稀少以及频繁的外来威胁、冲突、战争等等的必然结果。

产生俄国极权主义的附加因素还有：国家广袤千里，只有中央集权才能加以控制，因为交换关系的水平明显低下，无法在如此地广人稀的地方实现经济一体化。

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是绝大部分居民是文盲，他们分散

在辽阔的幅员之上，除了极权等级制度以外，要实行别的组织形式是极其困难的。

是的，如果说严酷的生存条件孕育了极权主义，那么当极权主义一旦问世，它本身立即热衷于保存这些条件，以便维持自己的统治。

在社会上逐渐形成了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极权主义的社会意识和个人意识。

这都是些什么？首先是对简单处理问题的偏爱，企求将责任推给别人，特别是依赖当局，渴望得来全不费功夫的信念而不去追求知识，甘心处于从属地位等等。教条总要比论据来得简单易懂。所有这一切加上其他许多东西就形成了奴隶心理。

布尔什维主义充分利用了这一遗产，在社会上引发了累累的血腥事件，而且都是在“热烈鼓掌转为欢呼”的情况下发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曾说过，造反者从来不会有其自己的自由，他们总是寻找跪拜的对象。他们有了这样的偶像崇拜之后就再不成其为人，而变成了爬行动物。

极权主义意识是一种传染病。但是应该指出，谁也不像知识分子那样心甘情愿地沉湎于极权主义思想。

俄国知识分子不仅对于幅员如此广大的国家来说数量极其稀少，它的相当一部分还只属于边缘阶层——19世纪末构成其核心的是非贵族出身的人们。这些平民知识分子并不富有，好不容易受到了教育，实际上在沙皇等级制度下按照他们智力水平和教育程度、他们的见识和社会需求来说本应享受的公民权利和个人权利都被剥夺了。他们命运多舛，通常依附于随便哪个官吏的门下。

这些平民知识分子饱受凌辱，对普通百姓的遭遇了如指掌。他们在思想深处根本不愿去体谅维护国家秩序的那个政权，更谈不上与这一政权进行妥协和合作。

让我们回忆一下俄国的一些著名的历史现象——民粹派和无政府主义。这些派别的领袖们都曾号召人们采取暴力和恐怖行动，要不惜任何手段去与政权进行斗争。一种极端的仇恨情绪在滋长。它是由政权当局，然而呜呼，也是由知识分子培养滋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降临时，就落在这一土壤之上。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充塞烦琐哲学、解决问题的简单处方、迷惑人的乌托邦观点；它还大量灌输一种心理内容，使马克思主义比起所有现代西方理论来更贴近在俄国占主导地位的人们的思想感情。

二

是什么样的意识机制和社会实践机制使布尔什维主义得以确立呢？

这首先是一种寄生机制，即寄生于未来理想生活的纲领之中。如果一种幻想经常与卑微的生活实际相结合，那么就会形成特殊的心态，其基础是贪恋乌托邦的游民阶层心理。一贫如洗的人们总是很容易坠入粉红色的梦幻之中。

事实上那些贫穷无知、无依无靠、束手待毙的人们又能怎样生活？他们眼前除了为活命而斗争别无他途。等待他们孩子们的命运也同样如此。希望渺茫，荆棘载途。

天堂的帷幕如同升天堂之前的炼狱一样，并没有时间和空间的座标。共产主义的理想同样从未有过时间和质量的确切参数，以便哪怕是作些预测，在何时，在何种条件下可以建成这样的社会。

正是时间上的遥远以及对晴朗未来的虚构，使崇高目标不仅是诱人的，而且是伟大的。

从根本上说，任何盲点不仅仅是文明、文化最终可以突破的错误，也不仅仅是认识方法。看来盲点是与文明及其精神领域的

发展伴随而来的产物，就其表现的内容和机制来说，是意识进步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

伟大目标轻而易举地给人们和社会设下了道义上的陷阱。它使人们产生幻觉，似乎为了达到既定目标就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即使不是任何手段，也是众多手段。毫无疑问，对于不同意这一目标的人，尤其是对于否定这一目标的人就可以采取任何手段。这就为政治投机开辟了广阔天地。所有被乌托邦意识胁裹的人们——各种思潮的追随者们——都掉到这一陷阱中去了。

历史详尽无误地记录下了同一类型的怪诞现象：一方面是通过革命实现正义的思想所具有的吸引力，而另一方面是没有一场革命不违反自然的道德准则。

我想，如果把这种违反道德的现象仅仅从主观范畴诸如虚伪、堕落、背叛、背弃信念、蜕化变质等行为加以解释，将是一种缺乏根据、简单从事的做法。所有上述行为都存在过，但它们解释不了各种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的实质。

还有一种现象也未能解释清楚：为何在俄罗斯，甚至在斯大林恶行的一切骇人听闻的事实公诸于世之后，仍然有不少人继续举着斯大林像在诸多城市的大街上游行。这里不仅仅是对少年时代的悬念和怀旧，或者是由于这些人们及其父辈直接参与了迫害。这里还有没有搞清楚的东西。

事实上直到 50 年代中期还有人在为既定目标着魔，还远未意识到它的乌托邦实质。人们还在吃力地攀登石阶以获取新的知识，双手都为之磨出了鲜血。人们仍然被颐指气使的狂热所俘虏。任何怀疑都仍然被看作是犯罪。伟大目标早已为一切罪孽作了辩白和宽恕。

布尔什维主义也成了教条主义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

自古以来在俄国现实生活中教条主义是作为思维规范，同时也是作为理想而培育起来的。培植教条主义的不仅仅是政权和教

会——这是明摆着的——也还有世俗人士、教权主义的反对派、各种邪说，最后阶段在很大程度上也还有知识分子。

这里不妨指出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若干区别，虽然区别并不太大。

这种区别我看在典型的德意志教条主义中是表露得十分明显的。使宇宙和人类全面有序化、合理化和组织化的思想，正是德意志意识的特征，不管这种有序化是作为一种目标，抑或是作为某种已经达到的、虽然未被我们所认知的状态。这种思想很长时期以来产生了哲学、社会学、法学和政治学方面的为数众多的有规范意义的成果。但同时它终究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在诸多别的思想和学说中，自己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

类似的自我剖析，马克思主义也曾尝试过。例如在马克思、特别在恩格斯的书信中都曾有所反映。这种自我反省本应更加深刻些，自我批判的内容也应更多一些。但是这类反省的事实终究是否定不了的。

但是列宁主义却没有过这种尝试，假如不算列宁的最后几篇文章的话。而列宁的最后几篇著作并没有对国家后来的发展产生什么影响。

斯大林推行的是单一的意识形态，他把对话从科学实践中废除了。他号召创造性工作，但却不准人们进行真正的科学争论。理论原理与实践的脱节也发挥了侵蚀和瓦解的功能。布尔什维主义无论在公众意识还是在组织整个生活方面强化极权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原理已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把个人的教条式的思维同教条主义加以区分是合理的。后者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种倾向，它存在于意识领域，存在于科学、文化、信息、政治，存在于各种实际任务的解决方法之中。

教条式的思维——这首先是指缺乏能力去把握现实世界瞬息万变的所有现象；它否认出现某些完全崭新的、人们未知的新事

物的可能性，对此类新事物产生抵触情绪，以及相反，对已知的、充分熟娴的事物的绝对化。

教条主义者不懂得，任何一种知识都是对无知的征服，任何理解也无非是对不理解的胜利，即从一个未尽状态走向另一个未尽状态的运动。教条在这里是没有任何位置可言的。就算是天才思想，一经宗教手段解释为永恒，就不再成为科学，而成了某种拜物教。

实质上，教条式的思维害怕任何可能的发现、前瞻和推论。于是就抓住成规老套、过时和陈腐的事物不放。

俄罗斯改革运动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社会中过于饱和的教条主义和被压抑的心理状态。后者阻碍人们相信自己并开始独立自主地采取行动。

乌托邦已成为过去，恐惧心理也在慢慢消失，但是个人实现自我价值的渴望却姗姗来迟。

三

谈及教条主义就必定要提到社会乌托邦。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在它之上构筑自己的巢穴的。

看来，世界不会马上从社会乌托邦中解脱出来，虽然这种解脱迟早会来到。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个别的人们，某些社会群体，也许还有许多国家，他们的生活总是会充满各种问题、困难、冲突和贫穷。这就是说，无论在实践方面还是精神方面，乌托邦赖以滋生的土壤都还会继续存在。

看来，认识方面的土壤也依然存在：乌托邦起着社会宏观假设的作用，从而也为认识的过程提供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其实可怕的并不是乌托邦本身，而是那种企图把乌托邦纳入社会制度的实践。

人们有权作出自己的选择，包括显而易见、毫无意义可言的选择。同样，社会也有权进入误区，但只能是社会本身作出的选择，而不该是外部以武力或通过愚弄群众的办法强加于社会的事物。

乌托邦意识直至今日还有很大影响。这不仅是旧的概念和兴趣的惯性现象。千百万人的内心世界根本还没有准备好去正视现实并开始过另外一种生活。现在再次出现了乌托邦意识反抗理性的问题。我完全不排除在现阶段出现某种影响力很强的新的乌托邦的可能。

道德要求，确切些说是对道德的一种投机，也是乌托邦意识的永恒支柱之一。

道德要求本身当然不会引起什么非议。但这种要求在极权社会的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得到满足。相反，几十年来在日常生活中反道德的现象层出不穷。为其推波助澜的不仅仅是以阶级关系代替了家庭关系以及宗教的被禁，也还有随时随地无所不在的各种手腕和招数。

我不想多谈整个政治的不道德行为。在那里，人被当作是社会建设的工具，而不是目的本身。

布尔什维主义作为政治心理现象，如果不说及它的若干源于乌托邦观点的固有特征，则是不可思议的。属于这些特征的有：

对事件的真正含义，其真实起因和发生机制一片茫然；

在社会知识特别是实际建设手段极端匮乏的条件下热衷于急剧的外科手术干预；

在对于看不见的、隐蔽的、内在而内涵丰富的一切（或几乎一切）一无所知（或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与看得见的以及似是而非的现象进行斗争。

这里谈及的许多特征并非我国独有。左倾激进思潮不仅仅存在于、作用于布尔什维主义的特殊形式之中。落后带来贫困、无

知、无法纪和暴力等现象，而这些现象又反过来再生产落后；在这一循环圈被打破之前，这种激进主义将长期存在下去。

四

上面已经说过，布尔什维克们完成政变之后，事实上并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革命激情十分高涨，但却没有明确的行动纲领，因而这种激情是没有意义的。

在空中建造楼阁的企图，其结果是落空了。这一点现在已经十分清楚。只要不想以宗教狂热迷惑自己，不想亵渎历史，那么就不会见到一种结局，即建设一个新的（袭用以往的形容词）社会并未使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得到提高，并未出现社会和谐；相反，却暴露出体力、脑力、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源的极大耗费，而且常常是徒劳的。经济越是受缚于教条，它的无效益也就越明显。制度的迫害本性导致了生活的非人道化。

效益和人道主义本是永恒的对立伙伴，现在却有了他们的倒影——无效益和反人道主义。

几十年来，生铁、煤炭、钢、石油总是优先于饮食、住房、医院、学校和服务行业。类似“这是必要的”说教，实际是谎言。工业化加上类封建的管理所付出的代价之昂贵是灾难性的。人力物力损失极其惨重，对人的漠不关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国家从出售石油中得到了几千亿美元。这笔钱被用来进口商品和食品，从而也购得了精英们可以马虎工作的权利，而且遵循一条“只要我们安全，哪怕洪水滔天”的原则，接二连三从国外买回了从办公室用的回纹针直到工厂设备。这些设备有很大一部分在垃圾场上烂掉了。

腐朽的制度也腐蚀着人们，它唆使人们偷窃怠工，百般阻挠人们以诚实劳动谋生。

现在，大概已无法计算半个世纪来为了国家军国主义花费了

多少资金。

武器的研制和生产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层权威人士的全力支持。遵循的规矩是：一旦“必须”，付出什么代价就并不重要。此外，原子、宇航、采矿以及其他直接或间接与军备竞赛有关的部门，有很大一部分是利用囚犯劳动建立起来的。

甚至现在，当世界形势已经根本改变之际，军国主义的以及旧的国家机构还在拼命抵抗，不愿放弃自己的“战果”。

为了土壤改良花费了几百亿，但并未见到农业生产有什么长进。伏尔加河流域有多少万公顷的土地被报废，非黑土带又有多少被白白干涸了的沼泽。沼泽干涸了，但是被遗弃了的、原先早就耕种过的土地却被荒废得越来越多。多少劳力被白白浪费掉，为的只是保住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制度具有效益的臆造不致戳穿。

为了从国外进口谷物投入了几十亿资金。我个人深信不疑，这里形成了相互勾结的、严密组织起来的、与国家联手的黑社会结构。

事实上，近年来真正用来建设农业基础设施的开支甚至不到计划的一半。这种破坏行为是暗中进行的，它为一些人在国外采购农产品时发财致富，而在分配粮食时又进行政治蒙骗创造了条件。

只要动用十分之一购买粮食的黄金，就足够用来建设有效的农业基础设施，从而大大减少收割、运输、储存和农产品加工时的浪费。

但是呜呼，农业综合体直至今日没有有效的基础设施——没有道路、没有现代加工企业、没有优质粮仓、没有专用的运输设备等等。

再拿基本建设来说，出现了一大批“未完工程”——膨胀的通货被砌入坚固的钢筋混凝土中去了，人民的福利事业尽被糟蹋

完了。

难道不是人民的血汗钱用来进行军事冒险、给国外那些自称为“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统治者们以军援。到现在为止谁也说不清楚，为了武装干涉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的内政以及对几十个亚非拉国家提供武器，所付出的代价如用物质计算究竟是多少。

不少资金花费在与不同政见者的斗争上，花费在这一斗争所需的技术的购置和研制上，花费在供养和收买情报人员上。换言之，花费在一场对付本国人民，特别是对付知识分子的秘密战争上。

这是一些无底的黑洞，它们吞没了几十万公里的道路、数以千座计的住房、幼教机构、剧院、图书馆和别的设施。

人的劳动和才智、自然资源和物质财富被浪费掉了——其目的性、规模和效益都无人监督。经营混乱直接源于不属于任何人的所有制，源于没有专人负责、没有价格的劳动。

可以理解，甚至最好的老板也会失算，也不能完全没有人的先天缺陷。但这位老板总会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否则他就不再成为老板。

但是经营混乱却是周而复始，其范围越来越大，它开始涉足新的领域、新的方面和形式，它接连不断地制伏了对它的任何挑战——那么这就不是失算，也不是错误。

这是对寄生于社会、人类和自然的制度的宣判，虽然这样一种制度对某些社会群体和统治精英们有利并因而得到了精心的保护。

是的，经营混乱确是游民们的天堂。当财产不属于任何人的时候，财产的管理者实际上是不受监督的，于是就产生出唯我独尊的罪恶结构，在那里黑社会与国家勾结在一起了。

确切些说，国家本身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变成黑社会了。

无论就其活动方法、对待个人和全体人民的态度，甚至就其心态来说都是如此。

在国家所有制的条件下，任何经济上的恣意妄为和目无法纪现象都是国家的暴政和违法行为。商店、食堂发生的克扣和欺骗，都是国家在欺骗自己的公民。作物遭受雪灾、在基地上霉烂、收割和运输环节中的浪费也都是国家的过错。

也可以举短缺问题为例。这早就不是什么组织不善引起的周折，而是经济制度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也是这一制度赖以存在的必要条件。有组织的短缺是有利的，它养活了为数众多的从事分配、管理、外贸以及其他工作的国家机构。

俄国发展的经验表明，走有计划公有经济之路是无法改变在生产率、劳动技能和工艺技术方面落后于先进国家的状况的。这不是个别的局部的滞后，而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落后现象。

集体化和土地国有化与预测相反，已成为我国土壤退化及其被滥用的主要原因。列宁曾积极坚持的土地国有化，等于把俄国农民一切有生命力的东西统统付之一炬，它不仅耗尽了土地肥力，也使俄国农民多产的耕作技术丧失殆尽。不只是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使农村解体的恶行，而且在生活方式本身、在人民的内心世界和道德概念中，也出现了某些难以逆转的东西。

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未能如同马克思主义所预言的那样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相反，在丧失生态思维、经济思维以及智力竞争的条件下，社会根本不可能有健康的精神生活。

布尔什维主义企图确立它独特的道德即阶级道德，发动了一场反对一切宗教的战争，而所有宗教都内含全人类的价值，当然其形式是各具特色的。为此，布尔什维主义也必须有自己的宗教，那就是带有侵犯性的无神论，它成了否定个人自由选择权的现代宗教裁判所。

咄咄逼人的无神论宗教确立了自己的教义解释者和自己的神

意代言人、自己的圣像和圣陵、自己的圣尸和圣书、自己的异教邪道和教义信条、自己的正统观念和取缔异教徒的制度、自己的忏悔和放弃异教仪式。当然还必须建立宗教裁判所，其残暴程度被斯大林推向到了极限。

思维和灵魂与物体处于同等地位。持不同意见的人们被消灭或被隔离开来。自由劳动、自由思想、自由言论统统被取缔。科学艺术被布尔什维克化了。农艺、医学、电子学——所有的一切都被归到意识形态领域中去了。

因为只有为共产主义建设服务才是道德的，于是以劳动和智力择优的过程被根据政治思想实行升迁的制度所替代了。

剥夺生产资料和重分他人的财产不仅未能使劳动者富裕起来，相反，由于经济发展的无情逻辑和道德报应规律作用的结果，产生了卑微的游民阶层。

这种剥夺搞乱了人的心理和意识，破坏了劳动的刺激因素，冲刷了人对自身丰衣足食所应有的责任心。

取消市场和市场关系的纲领，到头来是一个消灭经济文明根本基础的纲领。

马克思主义曾经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克服民族利己主义、种族主义、沙文主义、反犹主义相提并论；但其结果却完全相反。

如后来弄明白的那样，布尔什维主义解除了人对自己经济地位的责任感，搞乱了人的社会思维，从而也就使人慑服于极端民族主义思想。极端民族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一种形式，它如同一股龙卷风，能席卷一切，留下的将是一片废墟。

劳动者在国内战争中不仅未能清洗掉身上的“旧泥巴”，相反，战争使他们性格乖戾狠毒、精神道德颓丧不振。不共戴天成了普遍流行的精神病症状。革命不再是伸张正义的节日，而成了复仇、妒忌、镇压的酒神节。

布尔什维主义使尽浑身解数，将不容异见和仇恨心理奉为国家意识形态，为的是把人们统统变成斯大林暴政的参与者。

但并不是一切都已得逞。人民终于积聚了力量，从身上驱散掉了这一悲剧性的邪魔妖术。

第八章 墓地十字架的种植者

从人性的角度看，根本就不可能有本章标题那样的称谓。很难将社会上的残忍、背叛和欺世盗名之举以及从背叛老师到背叛父亲的彻头彻尾的邪念恶意等等揉合成一个概念。这在圣书中也不可能找到。

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上绝顶骇人听闻的一页，就是它矛头指向本国人民的恐怖行为。

一切对革命有利的事都被认为是合乎道德的，而其他都是不道德的。

正是在这样一种道德概念的指引下，国内战争中的人质被枪杀，农民被消灭，集中营纷纷出现，有好几个民族全体被迫迁徙他乡。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虚幻未来要比人的生命更为重要。于是，当涉及政权问题时，就可以放开手脚，不择手段、不闻善恶地行事。

真正的价值——自由、善良、爱情、协作、团结、法律至上等等都被认为是多余的，因为它们冲淡了阶级意识。



有一些伤口是长久不能愈合的。

怎么能够发生这样的事：只是因为几个罪人的古怪念头，千百万清白无辜的人被消灭，还有千百万人则注定要受无尽头的折

磨，他们被遗弃于社会之外，成了无人性可言的国家机器的牺牲品。

使人感到恐怖万分还由于，所有这一切是在另外千百万人或沉默或叫喊的赞许中进行的，他们也未必明白，他们同样属于枪杀别人或被人枪杀之辈。

死者的悲剧同样也是活着的人们的悲剧，是极其惨重的悲剧。

千百万人诚实地劳动、享受快乐、养育子女、憧憬美好的未来。他们相信这样的未来，抛弃了那些据说是妨碍他们快速达到所渴望的幸福时刻的人们。

这是为虚幻信仰走火入魔的人们所曾经渡过的可诅咒的时刻，是他们怀着双重心态、他们的良知遭受碾压的时刻。

一切似乎都是盘石般的牢不可破。但是 1956 年 2 月 25 日，即苏共 20 大的最后一天，在日程以外的一次秘密会议上，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报告。

报告人的字句道出了斯大林及其亲信的反人民的罪孽和暴行。

苏共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代表被邀参加了这次会议。我当时年轻，坚信马列主义学说的正确，信仰斯大林；我曾怀着这样的信仰经历了卫国战争。

我，以及别的许多人，在脑海里已经出现某些模糊的疑问和不便提出的问题。但这些疑惑很快就让位给对所从事事业“伟大意义”的信念，让位给对克里姆林宫英明领袖的敬仰之情，这些领袖们要比别人更懂得该做什么和怎么做。

我所听到的一切使我陷于苦境。我听到了赫鲁晓夫的话，但却不愿去理解它。一切似乎都不是真的，甚至连我在这里，在克里姆林宫也不是真的。

整个大厅窒息般的沉寂。听不见座椅吱吱作响，也听不见有

人咳嗽。大厅寂静无声。人们不敢互相直视，也许是因为一切来得太突然，也许是因为感到恐怖。

人们散会后耷拉着脑袋出场。蒙受的打击十分巨大——特别是由于承认制度犯下了罪行，而斯大林本人就是罪魁祸首。

我们，这次党的会议的参加者们，当时无法想像在赫鲁晓夫作了历史性的坦白之后，将要起步的变革会是多么宏伟和彻底。

赫鲁晓夫的报告是仓促起草成的。第一稿的起草人是苏共中央书记波斯佩洛夫。在第一稿中曾企图为罪行辩护，指出实行迫害政策是由于某种“历史需要”，重提关于阶级斗争尖锐化、资本主义包围、存在地下反对派组织、斯大林的反对者们处心积虑要复辟资本主义等等的套话。

在赫鲁晓夫本人作的报告中只剩下原稿的总框架和具体事例。而对违法行为增添了许多疾言厉色的批判。

20 大后成立了平反委员会，由什维尔尼克挂帅。基洛夫被害案件则由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调查。

50 年代后半期，数以万计的 30—40 年代和 50 年代被无辜判刑的人们从劳改营、监狱和流放地回来了。

很遗憾，为被镇压的受害者平反的工作很快就开始降温，到了 60 年代中期就完全停止下来了。随之而来的是这样一个时期，那时呈现的趋向是不仅对违法行为和暴政不再作声，甚至着手为斯大林及其周围人物进行洗刷。

为什么赫鲁晓夫要对平反进程降温？那是因为他道出了具体罪行的真相之后，却规避对暴行的源头——制度本身及其确认暴力的学说作出评定。他没有能力，也不愿意，他也感到害怕——一切都交织在一起了。

在改革（指 80 年代中的改革）之初，也并非马上形成得以继续对政治迫害的蒙难者们进行平反的良好氛围。

仅仅到了 1987 年底才成立了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一个委员会

来审理这类问题。在一段时期我领导了这一委员会，任主席。在叶利钦治下，我也继续了这一工作。在此期间，为 250 万人恢复了名誉。

说真的，这是一桩无论体力上还是道义上都极为艰苦的工作。我调阅了几十万宗案卷，每个案卷涉及的人生前都热爱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国家，但后来都根据命令或者告密材料不经法庭审理就被枪毙并被抛进地窖和沼泽。老实说直到调阅案卷之前，我要重复一遍，即在此之前，我总认为政治基本上是诚实和庄严的、必要和有用的事业。

当我阅读这些充满污泥和血迹、痛苦和背叛的文件并加以研究之后，我开始确信，布尔什维克的政治是集道德沦丧、尔虞我诈之大成，是贪婪自私的渊藪。充当这一政治的动力燃料的是不可遏制的权力欲。

长期以来我总摆脱不掉一种感觉，似乎暴行的组织者是一批神经失常的人。但是我明白，这样的解释有把问题简单化的危险。

后来这个委员会（现今仍归我领导）在叶利钦总统治下重新启动了自己的工作。这是 80 年代后期整个社会发生的历史性变化所要求的。重要的意义不仅在于恢复法律正义，还在于对过去的悲惨事件从政治上和道义上作出评价。

二

委员会工作伊始，就全面研究了 30 年代后半期进行公审时的局势。

这里列出一些案件的名称：“右派和托洛茨基分子反苏联联盟”、“托洛茨基军事反苏组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盟”、“莫斯科中心”、“克里姆林宫案件”、“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平行的托洛茨基反苏中心”、“莫斯科反革命组织——

‘工人反对派’小组”、“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萨法罗夫、扎卢茨基等列宁格勒季诺维也夫反革命小组”、“布哈林学派”、“苏丹-加利耶夫中心”、“李可夫学派”、“为复兴自由俄罗斯而斗争的全苏同盟”(“科学院案件”)、“И·Н·斯米尔诺夫、捷尔-瓦加尼扬、尤戈夫等人托洛茨基小组的参与者”。

全国各种各样的“联盟”、“中心”、“同盟”、“学派”和“小组”共有 70 多个。对这些案件的审讯大部分是不公开进行的。

这些名单上的成千上万人已被枪决。总的来说是特权阶层消灭特权阶层，官吏们消灭官吏们及其下属。跟他们一起入土的还有学者、医师、工程师、教师——我们民族的智慧精华。这些事，人们已经报道很多了。

这里我仅举两个例子——一个战前的和一个战后的。

1940 年，斯摩棱斯克州“火花”集体农庄庄员 B·叶梅利亚诺夫被判处 6 年徒刑。把他关入大牢的根据是告密材料。告密者写道，叶梅利亚诺夫以批评的口气评价了国家的农民政策，他还曾向同村人谈及：据他所见，德国人要入侵苏联。

莫斯科“爪哇”卷烟厂工人 B·尼科利斯基 1949 年曾给一家报社写了一封信，其中对国家经济形势、工会作用被贬低以及民主未能发扬等坦率地陈述了不满。他同时请求原谅：假若写的不正确，那么请指点他走出迷津，他尤其不愿冒犯或得罪任何人，而只是想“吐露些许痛苦的心声”罢了。他被苏联国家安全部特别会议判处劳改营监禁 8 年。

委员会证据确凿地查明，所有“联盟”、“中心”以及其他种种案件纯系捏造，是根据拷打、胁迫、逮捕子女等罪恶方法取得的口供编撰的。

30 年代初最大规模的镇压是集体化时期的“剥夺富农”。相当大的一部分“被剥夺的富农”被全家迁徙到国家最边缘的地区，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和极北地带的工地——总共大约有 120

万农民。农户主的家庭成员——他的妻子、孩子、老人也同样遭到惨无人道的惩罚。千百万人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他们丧失权利，任人宰割，成批地被折磨致死。

除此之外，在剥夺富农的过程中，50多万农民被判处不同期限的监禁。后来他们中的许多人被枪决，或在遣送流放地和专门移民点的途中死去。在伐木场和矿山，这种死亡率尤其来得高。

也有这样一种说法：严刑拷打等都是护法机关工作人员自发所为。

当然有过这种情形。但是总的镇压政策并非由强力机关制定，而是由国家最高政治领导授意的。

1938年大规模镇压浪潮稍有减缓，一些党组织的领导人开始向克里姆林宫反映：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使用了未经许可的方法。这时，正是斯大林本人于1939年1月10日通电地方当局称：“联共（布）中央说明：内务人民委员部使用体罚是从1937年起经联共（布）中央允许的……”

斯大林所谓的“使用体罚”，是对那些确实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的装模作样的表述。发生过毒打、酷刑、不让睡觉、夜间“轮番战术”（侦查员轮番休息）以折磨人的审讯、长时间的“罚站”、以残害亲戚朋友相威胁……等等。

斯大林亲自参与策划了许多案件。大家知道，基洛夫被害后斯大林于1934年12月2日抵达列宁格勒。他推翻了侦查后得出的若干判断，指示要证明谋害基洛夫是季诺维也夫分子所为。

斯大林写给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主席缅任斯基一封关于“工业党”的信被保存下来了。他在信中写道，受侦讯者应该招供其与西欧国家政府有联系，旨在为武装入侵苏联作准备。在信的结尾给缅任斯基提了一个问题“明白吗？”

缅任斯基及其同僚“明白了”。取得了所需的口供。为数众

多的文件昭示这些口供都是怎么取得的。

曾任列福尔托沃监狱长的济明的供词中有一段话是：“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或是贝利亚都常常前来参与审讯。他们两人都都曾殴打被捕的人。我亲眼见过叶若夫殴打被捕者……也见过贝利亚拷打布柳赫尔^①，他不只是用他的双手拷打，他还带来几名配有橡皮警棍的人，他们在贝利亚的唆使下毒打布柳赫尔。布柳赫尔喊道：‘斯大林，你听见了吗？他们是怎样毒打我的？’贝利亚反过来也喊道：‘快说你是怎样出卖东方的？’”

布柳赫尔只好违心地说他与右派托洛茨基组织有联系。他不久在审讯室中死去。

许多法庭审判程序都是按预拟的脚本进行的。判决书也早已拟就。当时盛行的做法是，当最高法院军事庭或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审理案件时，内务人民委员部早已制定好名单，“惩罚方案”可迅速抛出。这些名单要送交斯大林亲自审批。

列入名单的有三类惩罚方案。第一类——枪决，第二类——8至25年监禁，第三类——8年以下监禁及流放。

三

对镇压应负个人责任的除斯大林外，还有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贝利亚、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米高扬、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安德烈耶夫、科肖尔、苏斯洛夫。特别卖力参与镇压的有亚戈达、叶若夫、阿巴库莫夫、维辛斯基、乌尔里希。

^① 布柳赫尔（1890—1938），苏联元帅（1935）。联共党员（1916起）。国内战争中曾参加平定杜托夫反革命暴动，因1918年夏领导乌拉尔军远征而获第1号红旗勋章。1921—1922年任远东共和国陆军部长兼人民革命军总司令。1929—1938年曾指挥远东特遣军。1934—1938年是联共（布）候补中央委员。——译注

В·М·莫洛托夫，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1930—1941年）。首先应对众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丧命负有责任。许多干部在莫洛托夫亲自策划下遭逮捕、杀害。

1935年进入苏联人民委员会的人民委员（相当于政府部长）中有20人在镇压年代丧生。活下来的只有米高扬、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安德烈耶夫、李维诺夫和莫洛托夫自己。1938年初进入人民委员会的28名成员中，有20人遭到镇压。

仅1936年10月至1937年3月的半年中，苏联各人民委员部有近2000名工作人员被捕（不包括国防、内务、外交人民委员部）。

莫洛托夫曾在伟大卫国战争以及战后期间核准许多逮捕令。某些人原本核准的是监禁，莫洛托夫却在其姓名旁边加批“处极刑”字样。

1949年莫洛托夫核准逮捕许多苏联和外国公民，他们被指控从事间谍和反苏活动。

瓦伦堡^①也丧命于卢比扬卡。我本人确信，他死亡的真相至今讳莫如深，但我弄不清楚原因何在。有一次，当谈兴正浓之时，克留奇科夫告诉我说瓦伦堡是在卢比扬卡被枪决的。但我未能找到可以印证的材料。也许这些材料早已被毁了。

Л·М·卡冈诺维奇作为一名政治活动家，他一生走过的道路是与背信弃义和镇压活动紧密相连的。集体化年代他在乌克兰、沃罗涅日州、北高加索和西西伯利亚等地工作留下的后果是广为人知的。

^① 瓦伦堡（1912—1947），瑞典商人和外交官，二战期间曾营救大量匈牙利的犹太人，可是1945年被苏军以间谍嫌疑逮捕，囚禁在苏联时失踪，是位传奇人物。据瑞典当局讲，苏联曾透露说，瓦伦堡于1947年因心脏病死于莫斯科监狱。——译注

卡冈诺维奇在 1935—1939 年大规模镇压年代充当了特别暴戾的角色。在卡冈诺维奇的核准下，铁路运输和重工业部门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遭镇压，他们后来被处以极刑和长期监禁。1937—1939 年由卡冈诺维奇亲自核准逮捕的铁路运输工作人员中的“人民敌人”的名册和档案达 5 大卷之多。

为了推动大规模的镇压，卡冈诺维奇视察了车里雅宾斯克、雅罗斯拉夫尔、依万诺沃等州和顿巴斯地区。

A·A·日丹诺夫。长时间实际担任联共（布）中央第二书记之职，对大规模镇压负有直接责任。1936 年 9 月他同斯大林一起从南方休养地发来电报，要求加强镇压。根据他们的建议，内务人民委员部由叶若夫挂帅。列宁格勒在日丹诺夫领导下还在战前就有 68 万余人遭镇压。

为了加强大规模的镇压活动，日丹诺夫视察了巴什基尔、鞑靼和奥伦堡等地的党组织。

在 1937 年 4 月至 9 月的 5 个月期间奥伦堡州有 3655 人遭镇压。其中半数被处以极刑。然而日丹诺夫 1937 年 9 月初抵达奥伦堡时，却认为镇压措施不力，又迫害了 598 人。在日丹诺夫实行“清洗”之后，鞑靼党组织又有 232 人、巴什基尔又有 342 人遭逮捕，他们几乎全被枪决。

日丹诺夫在 1938 年镇压共青团中央领导中起了积极作用。他代表政治局行事，将共青团中央书记们定性为“祖国叛徒、恐怖分子、间谍、法西斯分子、在共青团内部推行敌对路线的政治上腐烂透顶的人民敌人”，是“一群反革命匪帮”。

日丹诺夫是 1948 年全苏列宁农科院 8 月会议的组织者之一。是他在 1948 年 7 月 10 日写给斯大林的书面报告中提出了为陷害大批生物学家定调子的建议。日丹诺夫是迫害数以千计的文化人的策划者。

K·E·伏罗希洛夫。经其核准，对红军高层军事领导人和政

工人员实施了谋害。30年代，5名元帅中有3名被害，16名集团军司令员中有15名被害，67名军长中有60名被害，199名师长中有136名被害，4名舰队级海军指挥员全都被害，6名一级分舰队级海军指挥员全都被害，15名二级分舰队级海军指挥员中有9名被害，17名一、二级集团军政委级政工干部全都被害，29名军政委级政工干部中有25名被害。

1936—1940年在他领导国防人民委员部期间，3万6千多名红军中、高级指挥员遭到镇压。在克格勃档案中发现300余份由伏罗希洛夫签发的核准逮捕著名军事将领的文件。

事实上，二战之前我国武装力量已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

Н·С·赫鲁晓夫。有文献资料表明，赫鲁晓夫战前曾在莫斯科市、莫斯科州以及乌克兰等地策划大规模的镇压活动。他曾亲自上书要求逮捕莫斯科市苏维埃和莫斯科州委的领导人。仅在1936—1937年期间，莫斯科共有55741人遭到镇压。

赫鲁晓夫自1938年1月起领导乌克兰党组织。同年乌克兰被捕人数达106119名，次年为12000名，1940年近50000名。

А·И·米高扬。在他的核准下，食品工业委员部和外贸人民委员部的几百名工作人员被捕。米高扬不仅核准逮捕令，而且亲自参与策划。例如，1937年7月15日他曾致信叶若夫，建议对苏联食品工业人民委员部所属全苏渔业和海洋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实行镇压。他还就镇压外贸工作人员问题提交了类似的报告。1937年秋米高扬视察亚美尼亚，指示共和国的党和国家系统清理“人民敌人”。结果是几千人死于非命。

在联共（布）中央二一三月全会（1937年）上，米高扬和叶若夫联名就布哈林案件作了报告。

Г·М·马林科夫曾直接参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对中央和地方领导人所采取的大部分行动。他不止一次巡视地方党组织，指导开展大规模的镇压活动。

1937年，马林科夫曾与叶若夫一起视察白俄罗斯，对干部进行了一场货真价实的杀戮。带着同样的目的，他巡视了土拉、雅罗斯拉夫尔、萨拉托夫、鄂木斯克、坦波夫等州和鞑靼。

马林科夫曾好几次亲自参与审讯并拷问被捕者。马林科夫伙同贝利亚正是用这样的方法泡制了亚美尼亚的“反革命组织”案。

业已查实，马林科夫在泡制所谓“列宁格勒案件”中曾起了罪恶的作用。

A·A·安德烈耶夫作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亲自参与了对许多中亚共和国党组织的镇压活动，包括迫害乌兹别克和塔吉克的党组织，他也曾在伏尔加河流域和北高加索从事这一工作。正是在他巡视之后，经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人核准，萨拉托夫州的430名、乌兹别克的440名、塔吉克的344名领导人遭枪决。

M·A·苏斯洛夫。在罗斯托夫州委书记任期内曾参与大规模镇压活动。担任奥尔忠尼启则边疆区委第一书记后，不仅竭力反对释放被无辜判罪的人，而且坚持实行新的逮捕。1939年7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个委员会向贝利亚提呈报告称：苏斯洛夫对内务人民委员部派驻边疆区的局的工作颇为不满，认为这个局过于宽容。苏斯洛夫指名要逮捕一些人。后来都照办了。

作为驻立陶宛的联共（布）中央局主席，他对波罗的海沿岸发生的驱逐出境事件负有直接责任。

苏斯洛夫是迫害、摧残苏联艺术界和科学界许多著名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的组织者，也是镇压“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的组织者。1946年11月26日，他给斯大林呈递了诬陷这一委员会的书面报告，这一报告就成了国家全部机关进行侦查的依据。在“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一案中，数百人被判罪，其中许多人被处以枪决。

应当单独谈谈 M·M·加里宁，他作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曾于 1934 年 12 月 1 日签署了由斯大林和叶努基泽提交的《关于修订现行加盟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

根据这一决议，审理案件就无须有关方面参与，也可无视赦免权的请求。曾据此规定作出了极刑判决。

1931 年至 1946 年间，加里宁领导了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属的一个审理和批准诉讼案件的委员会，他对目无法纪和大规模恐怖行为放任姑息，对赦免请求置之不理。

如同莫洛托夫一样，他的妻子也遭政治诬陷而被捕入狱，他也同样采取了忍让俯就的态度。

四

社会上有一些人的脑袋中仍然窝藏着一种神话，似乎大规模的镇压行为只是出于斯大林及其属下之手。至于在列宁生前，有的说没有这种事，有的说即便有也是个别现象。可悲的是这种说法与现实相距甚远。

镇压根本就不可避免。问题不仅在于列宁或斯大林。当然，对千百万无辜蒙难者的生命他们负个人责任，这一点是明确的。问题的实质在于他们所建立的布尔什维主义制度，在于构筑在暴力意识形态之上的制度。

众所周知，国内战争后曾经宣告向公民和睦和协商过渡。但是事实上国家恐怖行为成了国家领导政策中的基本内容。开始有计划地从肉体上消灭贵族、军官、商人、地主、僧侣。

发出公民和睦的号召恰逢血腥镇压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之际。水兵们无非是要求一切社会主义政党在苏维埃中均应有相应的代表，反对共产党垄断政权。起义遭到镇压后留在要塞的 1 万名喀琅施塔得水兵中，6500 人被判处不同期限的徒刑，2000 人被枪决。牺牲者的数目本来还要大些，但起义的最积极参与者预

感面临残酷镇压，逃亡到芬兰去了。

在侦查每个被捕者时，首先要求供出“同谋者”，接着进行搜捕，然后又向新被捕者重复这一套。于是镇压飞轮的转速与日俱增。

镇压不仅针对起义的参加者，而且也针对与喀琅施塔得事件毫不相干的普通百姓，他们只是居住在喀琅施塔得罢了。甚至儿童也作为人质遭到逮捕。

1922年春开始大规模强制迁徙喀琅施塔得居民。首批迁徙的是其亲属被枪决、判刑或失踪的居民，也有的是亲属被开除出党或自动脱党的居民。仅1922年2月至1923年2月，共有1963人作为喀琅施塔得叛乱分子及其家属被强制迁徙。在以后的几年中，居民仍不断遭到搜捕和流放。

当局想以大规模的恐怖行动来结束声势浩大、席卷俄罗斯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运动。

为数众多的农民运动的参加者也遭到了同样残酷的迫害，农民运动遍及伏尔加河流域、顿河沿岸以及西西伯利亚等地。

1922年夏，莫斯科组织了对右派社会革命党领袖的公审。俄共（布）中央组成一个专门委员会领导了这次审事。

在彼得格勒，120名原沙皇军队军官因所谓塔甘采夫^①案被枪决，其中有诗人H·吉米廖夫。教会人士遭到了迫害。1922年秋，大批从事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被逐出俄国。他们中有历史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世界闻名的杰出科学家。

20年代后半期对旧工程技术知识分子进行了一次袭击。1928年，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在著名的“沙赫特”案件中被判刑。稍晚，进行了对“工业党”案件的诉讼，接着，指控“破坏分子”

^① H·C·塔甘采夫（1843—1923），俄国法学家，俄罗斯科学院名誉院士。——译注

的讼案几乎遍及国民经济的一切领域——从重工业、国防工业直到轻工业，包括烟草工业和化妆品工业。

出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中央联盟局”和“劳动农民党”的案件。

在那些年代，一大批科学家受所谓“科学院案”的牵连而遭到迫害。这一案件于1929年底即开始立案审理，伴随而来的是——一场矛头指向科学院、指向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城市一大批科学家的声势浩大的运动。

有115人被审讯。其中有С·Ф·普拉托诺夫、Е·В·塔尔列、Н·П·利哈乔夫、А·Е·普列斯尼亚科夫、С·В·罗日杰斯特文斯基、М·К·柳巴夫斯基、Ю·В·戈季耶等科学家。给他们罗织的罪状在当时已经公式化：涉嫌与国外侨民和外国社会活动家有联系。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集中营和流放地悲惨丧生。

至今尚在争论：遭镇压的牺牲者的总人数是多少。

目前尚无根据可靠文件得出的、能准确反映全国性大悲剧规模的确切数字。

现在有相距甚远的不同数字。眼光敏锐的韦尔纳茨基院士^①1939年1月写的日记评述了30年代后半期的事件，他写道，“被流放和监禁的总人数为1400—1700万。我想这不会有什么夸大之处”。瞧，这一事件的同时代人是数以百万数估算镇压牺牲者的数字的。

1954年，内务部长С·克鲁格洛夫（他本人曾是镇压的积极参与者、强制迁徙北高加索民族的组织者）报呈赫鲁晓夫：1930至1953年间遭镇压的人数约为370万，其中76.5万人被枪决。

^① 韦尔纳茨基（1863—1945），苏联科学家，地球化学、生物地球化学和放射地质学奠基人，苏联科学院院士（1912年起为彼得堡科学院院士），乌克兰科学院第一任院长（1919）。——译注

经过初步认真核实可以肯定，这一数目被大大压低了。其中没有列入监禁于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监狱的人数，而这些监狱在那些年代都是人满为患的；没有分析政治犯集中营中的死亡人数。遭镇压的农民以及被放逐的少数民族的人数都被忽略了。

那么，官方数字之外还应当追加受害于集体化时期的 340 万人以及遭镇压的 330 万少数民族，这样就超过了 1000 万人。

遗憾的是，所有这些数字依据的是分散的统计资料或者是历史学家们的估算。

应该对这一课题开展认真的调查研究，请所有掌握材料者和有关单位共同参加。

由于政治原因进行镇压是国家恐怖政策的一个方面。它的另一面是范围广泛的整个惩罚政策。

已公布的文件可以提供有关这一政策在规模上的概念。自 1923 年至 1953 年间，仅俄罗斯联邦根据不完全统计被判刑的人数超过 4100 万人。

当然，其中有的人确实犯下了刑事罪。但被判刑者中也有数百万人是因为上班迟到，在集体农庄未完成规定的劳动日指标等原因而丧失自由的。1940 年 6 月 26 日和 1942 年 4 月 15 日签发的命令中曾提及，由于这些过错被判刑的人数 1940 年为 200 余万，1946 年为 120 万，1947 年超过 100 万，1948 年为 93.8 万。甚至到了 1953 年，根据这类法律条款判刑的仍超过 30.8 万。

仅在战后年代，由于上班迟到或在集体农庄未完成劳动日指标而被判刑的人就超过 600 万，其中许多人服刑于“古拉格”劳改营，成了奴役性质的劳动力的主要来源。

五

斯大林主义—布尔什维主义的最丑恶的罪行之一是大规模镇压原被俘军人及战争年代被强迫遣送国外并遭受法西斯凌辱的公

民。

部队领导层对战争缺乏准备、专业水平低下，这一切使德国法西斯占领军仅在几天之内长驱直入苏联腹地。前线迅速向东方推移。数十万名红军官兵被围并很快被俘。

战俘的确切数字付之阙如。德军当局发表的数字为 527 万。根据俄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的统计，被俘官兵达 459 万。

至于普通百姓，大约有 400 万人被驱赶到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

大约 200 万苏联官兵（整个战争时期战俘总数的 49%）是在 1941 年夏季被俘的。

除被俘者外，数十万官兵沦于被占领地区。

部分被围人员在当地居民掩护下躲藏起来，一部分人参加了游击队。

他们中的某些人参加了乌克兰起义军和波兰国家军的武装小队，被占领当局作为保卫队——“维持秩序警察”——使用。

为数众多的证明材料——从德军部队和兵团战况日志到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局和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反谍机关“除奸部”于不同时期审讯苏联军人时获得的供词——都显示：绝大多数红军指战员尽管战斗环境极端复杂、甚至濒于绝境，仍表现出反抗德军的真正的英勇气概；许多人是在受伤、患病、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被俘的。

仅在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地盘设立的一共 38 所战俘押送营中，只有两所用来收容投敌分子（不到 400 名），其他 36 所押送营通常每所拘押达 1500 名。

这足以说明，投敌分子数目在战争第一年不足被俘人员总数的 1.5%。后来这一数目呈不断下降趋势。

在法西斯俘虏营中死亡的战俘达 200 万，被驱逐出国在俘虏营中丧生的普通百姓超过 123 万。

苏联领导对被俘红军军人所采取的态度，早在 1940 年就已经确定。

苏芬战争一结束，芬兰方面将 5.5 万名战俘转交苏联当局。他们被悉数解送到依万诺沃州尤扎镇的特种集中营。特种集中营的四周围上了铁丝网，并由内务人民委员部押送队负责守卫。被监禁的人被剥夺通信和会见亲朋的权利。监禁地点是绝对保密的。审查工作搞了将近 1 年。大部分人被判处期限不等的监禁。剩下的人于 1941 年春被押送到极北地带。他们后来的命运就无人知晓了。

卫国战争一开始，苏联当局甚至把那些在前线另一面仅仅只逗留很短时间的人也当作祖国叛徒。事实上他们全部都经审讯或不经审讯遭到了严厉的镇压。军队的特别处不经审判和侦查就枪决所有形迹可疑的突围出来的和掉队的官兵。常常根据告密和检举就判以枪决。

当然，据我个人的前线经历，应该说，在前线的连、营一级，这些问题的处理方法并非都是如此。1942 年夏不时有被围的弗拉索夫将军第 2 突击集团军中没有被俘的指战员从前线那一边逃到我们海军陆战队第 6 旅的地段来。但是，当他们大批来到我们这里时，旅的特别处就将他们送到后方进行甄别。如果来的是小群官兵，他们通常就在我们部队里留下了。总之，前线上正常的人们对待他们的态度与当局完全不同。

苏联国防委员会还在战时就通过决议成立特种集中营以审查和甄别从俘虏营释放的以及在解放地区被发现的“原红军军人”。特种集中营是一种管理严密的军事监狱。监禁于营内的人被强迫到煤矿、矿山、伐木场从事劳动。完不成劳动指标或有微小过失，就要像“古拉格”劳改营的囚犯一样受到惩罚。

随着红军向西推进，越来越多的战俘和百姓从德军魔爪下解放出来。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内务人民委员部、军事反谍机构

“除奸部”的相关部门立即把他们隔离开来，先送到集中转押站，然后解送到固定的、按古拉格制度建立起来的甄审营。

那些重新被铁丝网隔绝的人们是如何熬尽苦难的，有许多文件为证。“……好像战时从来也没有像现在那么难熬……我们的双腿已经不能动弹了。我们的伙食糟透，像对待狗一样对待我们。人们对自己生命已无所谓，许多人已经自尽。”（H·M·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此类信件和别的证明材料不计其数。

当1946年12月1日遣送回国的工作实际结束之时，一共登记在册的有183.3567万名战俘和358.2000万名普通公民。

拒绝返回苏联的达45万名苏联公民，其中17.2万人是原军人。

人们在甄审营中受审查的时间从几个月到几年不等。列宁纳巴德市化工联合厂原址改建的最后一个甄审营在1953年才关闭。到50年代初，坐落在沃尔库塔和乌赫塔地区的所有甄审营都尚在工作。

文件表明，经初步审查之后，甄审营中受审查的总数中有10%以上的人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除奸部”三人小组的决定或根据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的决定被判处不同期限的监禁。更多的被审查者则是在后来的审查（有的在其居住地、有的在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特种后备部队进行）中被判处期限不等的徒刑。

1945年8月1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关于派送从德国俘虏营中释放的红军军人以及兵役适龄的被遣送返国者到工业部门工作》的决议。根据这一决议，他们悉数被编入“国防人民委员部工人营”并派送到国家东部地区和极北地区的工矿企业。

在这些“工人营”中服役，其性质与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劳改营中没有什么区别。总共有66万名战俘和90万名兵役适龄的被遣送返国者在“工人营”中服完役。

最后，所有被遣送返国者审查完毕后都要在国家安全部门登记入册。根据这一专门名册，他们多年来受到许多限制——从事本行专业、选择居住地点、参加学习和社会活动等的权利皆被剥夺。所有被遣送返国的人无一例外都遭到了此类形式的迫害。

这里特别指出一点我看是合适的：在整个国家领导层中，只有朱可夫元帅意识到战俘问题的尖锐性质。他无疑较别人来得明白，人民为了战胜法西斯曾付出了何等深重的代价。这一代价中也包括那些身陷法西斯囹圄、回到祖国后又投入苏联劳改营和监狱的人们的悲惨命运。

他是第一个提出有必要在对待战俘和被遣返回国的公民方面恢复正义问题的人。在他的坚决要求下，苏共中央主席团一个专门委员会从1956年4月19日起开始审理这一问题。

1956年6月4日朱可夫提出报告，第一次引证了在对待战俘方面发生过专横行为的确凿材料。

朱可夫在报告中得出的结论是，这些不守法纪的现象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斯大林个人迷信处于统治地位，而重大的国家问题和军事问题都是斯大林个人专断的……”报告同时指出，“战时发布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议以及最高统帅的命令中，关于如何对待从战俘营或突围归来的人的问题所持的观点是片面的，其出发点是用一切方法对他们及其子女进行迫害。由此，不经法庭审判迫害被俘军人的非法行径，以及法庭审理战俘案件的过程中破坏法制的现象就风靡全国。”

朱可夫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为了消除粗暴违反法制的后果，朱可夫的委员会建议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给予原战俘以物质帮助，根据其专业提供一个月的试用期，取消入学等方面的一切限制。对于那些负伤或从俘虏营逃跑的原被俘军人，凡未获政府奖励者，建议给予政府奖励。

委员会的这些建议在中央主席团引起了尖锐的争论。

当局的全部“慈悲”最终只限于：对原战俘同已于1955年获赦免的曾参加德国组织的部队和宪兵纠察队的人员同等对待。并未通过任何有关物质帮助和金钱补贴等项的具体法律。

形式上取消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限制战俘公民权利的规定，但他们的权利并未由此得到真正的恢复。

顺便指出，这样的立场朱可夫不仅在对待原战俘的态度上坚持，而且在整个政治迫害问题上也同样坚持。

1957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进行大会讨论时，朱可夫第一个起来发言，提出高级领导人应对斯大林主义时期的罪行、枪杀、滥用权力等担负责任的问题。他认为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他问道，“那些在大规模镇压中有过错的人不认为自己有责任说清楚自己的罪责……”

“当然，”朱可夫说道，“当时是沉重的岁月，但是只要你们终究不是自私鬼，那么你们就应该向自己的中央说明，破坏法制的事是如何发生的，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那么中央就会作出决定，谁应该而谁不应该留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上。”

朱可夫宣读了他所掌握的文件，其中有关于几万人未经法庭审理而只是根据政治局委员的直接指示或他们的核准即遭枪决的骇人听闻的材料和数字。

“他们卷起袖子刀斧霍霍砍向别人的脑袋。”朱可夫说道。“人们像牲口一样按单子被赶往屠宰场：公牛几条、母牛几条、绵羊多少只等等。”

当卡冈诺维奇发言的时候，朱可夫插话打断了他：

“说一说对罪行、对枪决应该负什么责任，这是最重要的问题。”

卡冈诺维奇：假如中央全会的成员要求我把其他问题搁起不谈的话……

朱可夫：说说你为什么让300名铁路员工命归西天？

卡冈诺维奇：提出的问题是政治问题。

朱可夫：也是刑事问题。

卡冈诺维奇：审视这个问题不应该以 1957 年的视角，而应该以 1937—1938 年的视角，正如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要求的那样。我要提醒大家，当时我国正在进行一场政治斗争……

朱可夫：你直接回答，枪毙了中央委员，怎么，难道他们是我们的敌人吗？

卡冈诺维奇：曾经有过敌人，也有过尖锐的阶级斗争。在与敌人斗争的同时，是否出现过反常现象、胡作非为和罪行？出现过。

我同意并拥护赫鲁晓夫 20 大报告，虽然我承认我内心很痛苦。但我认为中央委员们对于斯大林名誉扫地并不感到轻松，对于揭露自己身上的脓包和疮口也并不好受。我经历了反复的思想斗争，但我赞成这一报告。我认为我们将事实捅开并公诸于众是正确的。但是当然，我并不以此推卸自己的职责。我负有政治责任。

朱可夫：也负有刑事责任……犯法者应以刑法论处。

卡冈诺维奇：我说的是政治责任。当时形势很尖锐，我们采取行动又很迅速。刚才朱可夫同志仅仅举出 2—3 个人的名字，说他们签发过文件，而其余人一字不提——这是一种宗派主义的手法，这就是宗派。打倒一批人，只要对自己有利，而对另一些人则噤若寒蝉。整个政治局都有份。还有州的三人小组——每个州都成立了以州委书记挂帅的三人小组。

喊声：是根据谁的指示？是谁建立三人小组的？

赫鲁晓夫：成立这些三人小组的罪恶行径是经谁核准的？参加三人小组的所有人都已被枪决。

喊声：是啊！

卡冈诺维奇：并不是所有人。

赫鲁晓夫：绝大部分已被枪毙。

卡冈诺维奇：您难道没有在乌克兰签发过枪毙人的文件？我1935年3月离开莫斯科，1934年离开中监委，我是在经济领域供职的。

喊声：那个领域许多人被枪毙了。

朱可夫：300名铁路员工被枪毙了。

赫鲁晓夫：难道审判机关和肃反机构会听从党的机关吗？从未有过此事。我曾被怀疑是波兰间谍。

卡冈诺维奇：好多人都被怀疑过，其中或许也有我呢。我现来讲这个情况。当时的形势十分紧张。

喊声：那是你们自己造成的。

卡冈诺维奇：大家问我铁路员工的事。当时内务人民委员部不断送来材料。诸位可以问一问铁路员工，我当时如何倍受指责，说我把问题耽搁了。我保护了几十万名铁路员工，但一些根据材料所述是敌人的人，我们逮捕了。而怎么您，朱可夫同志，作为师长，就不曾签发过这类文件？

朱可夫：我从未下达枪决任何人的命令。

卡冈诺维奇：这就很难核实的。

朱可夫：去核实好了。

卡冈诺维奇：而您，当时不拥护中央政策，不拥护对敌斗争政策吗？

朱可夫：拥护对敌斗争，而不是枪杀。

卡冈诺维奇：我们当时对许多细节并不了解……

朱可夫在结束发言时说道：“一旦人民知道他们手指上滴着无辜者的鲜血，就不会用鼓掌，而是用石块去迎接他们。”

但是对那个朱可夫认为是最重要的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不了了之。决议中指控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对大规模镇压负有个人责任的段落是按秘密方式通过的，不在报刊上发表。全

会参加者关于以内部通报形式印发朱可夫提及的文件的建议遭到否决。

按当时惯例，中央全会的速记稿应分发到共和国和州的党组织，可是六月全会的速记稿只送到苏共中央档案局秘密封存。4个月之后，朱可夫本人再次成了“总书记”专权的牺牲品。

六

平反的进程是复杂的，充满着矛盾。这里遇到的不仅是政治和法律问题，而且还有道德问题。

大家知道，30年代后半期镇压了一大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达4万名以上。恐怖之斧对谁也不放过。

那么这一次蒙难者又是些什么人呢？

在斯大林之后的时期里常遇到这样的事：在审查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的具体案件时拒绝为他们平反，因为他们本人应对其无法纪行为负责。

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个问题：此前曾是刽子手的蒙难者是否应予宽恕？从纯法律角度说，应该宽恕。那么从道德的角度看呢？

亚戈达被捕后，新的人民委员叶若夫对整个内务人民委员部系统发动了一场清洗。而叶若夫倒台之后，贝利亚又在中央和地方开展了更为广泛的清洗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运动。

当叶若夫领导内务人民委员部之际，曾处决一批面目可憎的人物如阿格拉诺夫、普罗科菲耶夫、莫尔恰诺夫、加伊、斯卢茨基、克德罗夫、乌沙科夫等。叶若夫下台后，像弗里诺夫斯基那号刽子手也掉了脑袋。

然而自己掉入捏造和迫害机器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并非由于自己的罪恶行径受到惩处，而是被扣上当时很平常的一套罪名：背叛祖国、充当间谍、从事破坏、图谋杀害斯大林。

当然，这些指控是没有根据的。但是机器在正常运转，被捕者供认了侦查员编造的全部罪行。

这样一来，拒绝为这些人作出平反，似乎意味着他们因之而遭到枪决的那些凭空捏造的罪状应该成立。伪造的罪状都是那些“剧本作者”凭空杜撰的，而他们自己在被捕之前也充当过这样的角色。

怎么办？根据某些条款加以平反，同时又按另外一些条款予以起诉？

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叶若夫的命运。在叶若夫领导大规模迫害活动的血腥的1937、1938年之后，他被捕了。在起诉之前对他进行“侦讯”时，同样使用了他曾如此卖力地倡导过的肉刑和精神胁迫。

叶若夫在侦查员提出的所有指控上签了字。但是在庭审时他推翻了他的供词，声明受到了拷打和折磨。他说，现在，在经受长达数月的侦讯之后，即走过了那条他曾强迫数千名清白无罪者所走的道路之后，他开始明白自己犯下了罪行，但不是指控他的那些罪状。

叶若夫并不请求保全性命，他懂得对他的判决早已作出了。但是他作了一个声明（他的话留在庭审记录上）：在前一天，贝利亚曾看望了他，劝他认罪，并答允他认罪了就可以保全性命。叶若夫答道，他本人也曾多次这样劝说过被捕者，但谁也未能见于同意这样做而保全性命。因此，叶若夫说，我没有接纳贝利亚的建议。

另外一个例子。亚戈达是作为右派托洛茨基分子阴谋的参与者被枪决的。他并未参与这一阴谋，因为不存在这样的阴谋。这意味着应该像其他人一样予以平反。

亚戈达不该得到宽恕是正确的，但是他所承认并由此丧生的那些指控是不正确的。

也还有一批受迫害而未能平反的人。他们曾经利用职权把人们送上刑场，肆意展开政治迫害来百般讨好斯大林。常常是为了保全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开展镇压活动。在这方面地方上的“积极分子”表现尤为卖力。

但是也有斯大林对他们实施惩罚的时候。而且上帝！其罪状竟是进行非法迫害，因而以从事破坏论处。这就是斯大林。被惩罚的不但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而且还有党的领导人（如波斯特舍夫^①）。

这些人现在被当作是牺牲者。不是这样吗？

研究人员已被准许查阅档案。我想再次强调，对于那些与人们死亡有关的文件应该采取特别审慎的态度。这些材料的背后不仅是被枪决者和死难者，也还有活着的人。既有熬过难关活下来的人，也有参与过迫害的人，也有所有这些人的儿孙们，他们都活在世上。也有至今扛着列宁斯大林头像集会游行的人。

是的，不时会痛苦地感到：牺牲者（不是指刽子手）也并非无邪无辜，他们也曾诬赖别人。还是到此为止吧！别人的痛苦终究不是自己的痛苦。并非每个人都能挺住拷问。而在血的河流中去搜寻罪人也并不是体面的事。

应该怪罪的是罪恶制度，是它将人们分成刽子手和牺牲者。

当我执笔撰写这一章的时候我不停地思考那些至今“怀念”这可怕年代的人们，那些为恢复过去而斗争的人们，那些今天还在寻找“敌人”的人们。

他们是谁？精神病患者吗？罪行的参与者还是他们的近亲？

^① П·П·波斯特舍夫（1887—1939），俄国 1905—1907 年革命和十月革命的参加者，曾领导了在东西伯利亚创建苏维埃政权和在远东歼灭白卫军的斗争。1926 年起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书记，1927 年起先后任联共（布）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等职。——译注

抑或是因布尔什维主义谎言走火入魔而致残的人们？
我一片茫然，不得要领。但我并不感到轻松。

第九章 威武不能屈

持不同政见者……

一个至今仍令人百感交集的问题。

介绍它可并不轻松。

其困难在于，愤慨的和忏悔的、无情揭露的和仁慈大悲的已经发表了许多了。而且也还能见到令人作呕的辩护性的文字，那是出自民族沙文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之手。他们仍旧习以为常地朋比为奸，他们既无恻隐之心也不愿周密考虑，只想永远死死抓住那个已经报废了的社会躯体以及那病变了的社会意识不放。

困难还在于，在净化工作中发自我们良知的抗议暂时还只局限于个别人物悲剧性的命运，对他们来说善良不仅是其道德自白，也更是生命的真谛所在。

我深信，社会将不可避免地作出自我评价，不可避免地作出忏悔。

1956年的解冻曾是解放的一次真实尝试。社会获得了新的品质，那时，当局似乎已无法再继续对人民施加血腥的镇压了。

但是并非如此。在赫鲁晓夫年代，新切尔卡斯克以及其他城市的流血事件已明显昭示，制度的实质仍然未变。不容异见的意识形态和迫害的实践正方兴未艾。

这股冷风迟早要来到。那是因为反对不同政见的斗争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实质，是它的支柱。不进行这一斗争，它也就无法生存。

在我们的概念中，好像是斯大林的迫害政策完全取代了布尔什维主义的别的内容。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布尔什维主义正是从反对任何异己思想起家的，那还是在其创始人在世的年代。布尔什维主义反对整个宗教及其任何流派；而一旦哪种学派、假设和观点不符合列宁或斯大林的胃口或他们的主张时，就一定要对其口诛笔伐；甚至对任何一种源于马克思、恩格斯以至列宁原理的思想，只要与当时“领袖”不一致，也要兴问罪之师。



我重复一遍，20大根本没有消除党和国家高层领导追求无限权力和保证思维单一化的欲望。

赫鲁晓夫被已经开始的民主进程吓坏了。他的亲信之中更有许多人简直到了张惶失措的地步。他们被击昏之后终于苏醒过来，就立即开始有计划地进行恢复原状的工作。

我记得，一个时期内“布尔什维主义圣火”的维护者们曾把批评矛头直指阿朱别伊——赫鲁晓夫的女婿。那是因为阿朱别伊当时要求除去知识分子的镣铐，采取了最为开放的立场。他曾帮助特瓦尔多夫斯基“打开通道”，使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一书得以面世。阿朱别伊任总编的《消息报》向新的政论风格作了冲刺。

赫鲁晓夫本人未能从过去的羁绊中解脱出来。还在其治下就开始对知识分子实行了新的压制。那些名声不佳的同作家会见和参观展览等等都显示，国家领导层对实行彻底的民主改革还没有做好准备，他们也不想这样做。

继续向人们头脑里强制灌输许多攻击批判型的观点。从这一意义上说，斯大林时代几乎原封未动。赫鲁晓夫本人有一次高声喊道：“我们不会把斯大林交给任何人！”

随着 1977 年勃列日涅夫宪法的通过，形势进一步恶化。这部宪法第一次以立法形式确认党的“领导作用”，这意味着在实践中党的机关的专横跋扈将进一步加强。

还有三个因素促使形势尖锐化。

其一，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保留的时间越长，领导层越是蓄意坚持这一模式在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方面所固有的形态，那么社会生活中积累的尖锐问题和矛盾就越多。

在言论和行动、理想和现实之间出现明显脱节的情况下，要求科学、社会、创作领域的思维不为所动是根本不可能的。出现了一批天才的“乡巴佬”作家，他们开始以艺术的手段表现真实的而不是虚构的农民生活。

不管怎样，问题和矛盾的客观存在，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新问题。而对不同政见运动，确切些说是对真理思维运动的加紧迫害，其最终结果是加剧了社会内部的“不出国的移民现象”，即人们不再相信有可能通过官方途径和机构解决什么问题。

其二，东欧国家 60 年代初在欧洲共产主义思想框架内开展的运动发生了作用。这些运动内容驳杂，但其意义是一个：在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內部，一个追求多样化的运动正在兴起。这一多样化运动迟早会濡染我国的思想界。总不能无止境地剥夺将已经成熟的问题提上日程的权利。事实上在世界社会生活中，包括左派运动在内，这些问题早已开始广泛讨论了。

这里，当局对教条和幻想的盲目忠诚导致了社会思维的两极分化。主张思想自由和反对这样做的势力都得到了加强。

也还有其三，在社会上加速建立起来的僵硬的不具备正常的反馈机制的极权结构，开始孕育出特殊的“收成”。在党和国家

系统、在国家机关、在中央和地方、在经济、科学、文化等领域——即举国上下一种挑选干部的做法占据了主导地位，其结果是选拔上来的干部通常都是些专业水平不高、不很正派、缺乏创新意识、甚至是不会工作的人。

一个互相包庇、结帮成派、营私舞弊的制度导致许多这样的情况，即不单单是思想一律以及这种或那种意识形态老调本身，同时还有职务、官位以及与其相连的特权和发号施令都受到了保护。

精神压迫制度是过去的镇压做法的直接继续。进行政治审判、利用精神病院、驱逐出境、剥夺工作、在大众媒体上，首先是通过《真理报》进行攻讦——这一切都又重新出现了。

安全部门继续控制知识分子的生活，将其区分为“可疑分子”和“暂时可信分子”、“可以离境”和“不可离境”、“可上报刊”和“不上报刊”、“准许获奖”和“不准获奖”等等。

安德罗波夫为反对不同政见现象而斗争的事业作出了份量不轻的贡献。而且，他干得十分自觉，是按照信念行事的。

二

人们本来以为，改革（перестройка）带来了精神自由，它能够结束布尔什维主义不容异己的传统，将使这一传统的圣哲们声名狼籍，特别是在知识界。改革也将为渴望已久的自由创造提供机会，并以此将知识分子团结起来。

例如我本人就曾真诚地相信，自由将会极大地缩小那些爱散布闲言碎语，进行告密和各式各样的揭发检举，充满个人野心和妒忌心理的人的蝇营狗苟的地盘。但是，一切还是原样。只不过现在模样各异的批评家们，思想检查政策的歌手们不再将告密材料寄送到专门机关，而是主要寄往报刊。但是，他们的卑劣秉性并不由此有所减弱。

许多东西都颠倒了位置，而且相当稀奇古怪。过去的反苏人士成了苏维埃政权的歌颂者，过去的反共分子成了新受洗礼的布尔什维克，而那些曾以极其恶毒的语言破口大骂苏联帝国并由此促其解体的人现在突然有魔法似的变成了大国主义的拥护者。也还有这样一类“不同政见者”，他们对俄罗斯改革运动心怀不满，仅仅是因为，改革使他们丧失了靠揭露布尔什维克主义制度来挣钱谋生的机会。

由于这些原因，要对不同政见运动作评论也变得复杂起来。因为对一部分人来说，这是一项良知驱动的事业，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只不过是馋涎欲滴地追求自“我”的私利而已。

我指明这一点，为的是不让个别沽名钓誉之徒给真正寻求真理的人们，给整个不同政见运动投下阴影。

他们被称作持不同政见者。无论过去和现在，在大众的意念中，他们总是与其个人的人品和遭遇相提并论的。对他们的评论往往带有浓厚的主观成分，即要看评论者对个人的态度。例如是评论萨哈罗夫还是索尔仁尼琴；是罗斯特罗波维奇还是涅伊兹韦斯内；以及是布罗茨基或舍米亚金；沃伊诺维奇或科尔扎温；西尼亚夫斯基或科瓦廖夫；恰利泽或库兹涅佐夫等等。

其实，任何一种社会现象是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其具体载体的。不同政见现象更是如此。因此，对人物的评价只能有条件地运用于对现象的评价；同样，把对现象的评价运用到人物身上去时，至少应该持十分谨慎的态度。

提出一个问题就够了：索尔仁尼琴的人格力量和卓越才华是广为人知的，那么认为只有他才是持不同政见运动无所不包的标志，这样的认识是否可行，是否妥切呢？或者认为只有萨哈罗夫——同样是一个伟大、光辉和富有天才的人物——才能代表运动？

如果有谁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请问，为何同一

现象却有两个如此不同的象征性人物呢？

我的观点是，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所以能走到一起，并非出自他们的本意，也不是按照事物的常规逻辑。假如是在自由的民主国家，他们两人恐怕属于不同的政治团体。一个共同的力量使两人相遇了。这就是反抗官方全然不容异见方针的力量。

我相信，如果对不同政见现象作出详尽剖析，就会发现它是多层面和多方位的。现在把移民浪潮分为“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浪潮。即将来临的是“第四次”浪潮。这种区分使人一目了然，它既按年月，也按其产生的原因。

不同政见现象有必要用特别仔细、诚实和科学的态度并带着正直的公民感去加以分析。不同政见现象有其正负面也有极端，有其前瞻力也有误区，有其真理也有荒谬。它整体上是我們所需要的，确实是我们的财富，是一种看得见的精神源泉。

然而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这完全不是说可以无条件地同意其每一种思想，可以对其每一句话或每一本著作不假思索地奉为圭臬。

不同政见运动作为一种现象有它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具体的人物以及他们的命运、思想、探索和遭遇。这是一批健在的和已经作古的人物。他们是牺牲者，是战士。他们曾直面权势，同样也直面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公开说出了并坚持了自己的立场。

这是评价的一条线。经验教训的意义十分重大：寡可敌众，孤掌亦鸣，如果他是位人物的话。

但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几十年来，迫害政策得到了社会上极为广泛的支持。时至今日尚存欲置自己政敌于死地的道德畸形现象。

苏联人对持不同政见者知道些什么？他们知之甚少而且模糊不清。他们只知道个别人的名字和他们的命运，但远非是全部，

而且主要是根据一些诋毁性的并非出于善意的传说和轶闻。

他们并不知道最主要的部分，即不同政见者的观点、著作和理论，其采取的公民、政治和艺术的立场。除了五六个人名外，常常是一无所知。

大部分人并不明白，什么是持不同政见者以及持不同政见运动。这一狡猾地组合起来的外来词给人营造的印象是，那些被称为持不同政见者的人们总是与某种敌对势力有联系：要么与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有联系，要么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有联系，总之是与某种国际上品行不佳的世界主义机构有联系。

但是只要将此词译成俄语就大体明白无误了。那就是“有不同思想的人”和“有不同思想的现象”。这有什么天大的罪过？为什么思想不一样就等于犯法和反社会，至少是等于做了某种可耻的事？谁根据什么权力可以规定一种规矩，即所有人必须而且只能同样地思考？

持不同政见运动是驳杂的。它的一极是一群有创新意识的人，是思想家和艺术家。它的另一极是地方上维护权利的战士，是一些“怪人”，通常是一些不合群的“冲突型”的人物。这样的人每个集体、每个村镇都会有，在城市里就不用说了。从领导角度看，这是一些相当不好对付的人，甚至是一批捣乱分子。根据官方人士对待这号人物的态度，他有可能赢得周围的同情，但也会有令人生厌的可能。

公众心目中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形象，就是由这些对生活的不同理解形成的。在这一形象中，涉及面最广、最不显眼而潜在的社会意义极大的持不同思想者的典型被淡化了：那是一些具有巨大能力、渊博知识以及高尚道德和公民积极性的人们，他们确实向同胞们说出了真相，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遭到了迫害。

正是他们理由充足的论断和正确可行的建议被宣布为反苏主

义。如果我们今天同意这一分析是明白无误的话，那么也应该同意另外一点，即那些痛苦地对所有一切考虑周详之后，冒着对本人及家庭带来灾难的风险，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的人，也许他们做得有点古怪，但毫无疑问，他们是祖国的真正的爱护者。

以为迫害政策仅仅是指向自由思考的作家、艺术家、学者以及整个创作知识界是不公正的。这一政策的矛头所向是所有爱好独立思考、富有主动精神和工作特色、善于探索真理的人。

这一政策的悲惨的牺牲者的名单中就有经济干部。

经济革新家们的悲剧在于，他们根本未能有所作为，未能破除任何东西。他们一开始认真干起来，就立竿见影地以其行动显示出被人为埋没的才华。而给他们刑事处分却不费吹灰之力。总而言之，追求创造性工作和独立思考总归要受到惩处。

经济领域不同政见运动的篇章比较特殊，有待于详尽的剖析。

有相当数量的各个领域的活动家和思想家等待人们去开掘。我们在开掘这些名字的时候，也痛苦地发现，原来许多直至今日仍困惑人们的事，早在10年、20年、30年前，有的甚至在50、60年前就已经有人剖析过、理解过和思考过。

那么为什么把他们终究称之为持不同政见者，而不用别的称谓？为什么总的来说，特别是提出“刑事”起诉之前，很少被称为反苏分子？为什么如此处心积虑地要把他们宣布为神经失常的精神病患者？

那是因为，不然的话，无稽之谈和恶意图谋就会立即泡汤。我的感觉是，不同政见者最初的想法和意图非常简单，无非是想比较深刻地研究一下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原理，分析一下现实生活中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和矛盾，作出某些可付诸实践的建议。

对自由思考和主动精神的迫害引发了另外一种十分可怕的现象。冷漠无情、不问政治和消极情绪不断增长。双重道德标准开

始泛滥。社会维系开始瓦解。而所有这一切又使道德、社会、工艺和经济方面的许多病变现象越来越深重。人们再也不愿承担责任去份外地甚至是最低限度地为某事向某人作出证明，即使作这种证明不冒生命和仕途的风险。

我想，停滞若再延续一个时期，我们也不致马上就遇上社会爆炸，虽然这种爆炸是历史地不可避免的。但是大小偷盗行为将不断增加、社会的冷漠气氛将继续扩大，从而社会的一切病症也将愈来愈严重，以至找不到不会引起破坏的出路，也许根本就不再有出路。

勃列日涅夫时期和安德罗波夫时期的反对不同政见者的斗争——这是酝酿进行镇压的根苗和杆菌，这是威胁要复苏镇压政策而发出的持久不息的信号，这是创造条件，使恢复镇压越来越成为可能。

对不同政见者的迫害培育了看风驶舵、玩世不恭的习气和普遍弄虚作假的氛围。

在这样的氛围下，在科学、经济和管理方面采取了许多后果严重的决策又何足为奇。是这些决策造成了今日的切尔诺贝利悲剧、阿拉尔自然保护区的毁灭、输油管道的爆炸、生产出数以千计谁也不要的坦克、俄罗斯农村的消失以及其他无数灾难。

布尔什维主义制度的沉重罪恶不仅在于数百万清白无辜者丧失了生命，他们家庭遭到了悲惨命运，制造了毛骨悚然的环境。这个制度的罪恶还在于人们的心灵无尽无休地被仇视、凶狠和怀疑所扭曲。

当然，民主化和公开性已经把社会意识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但是在我们心态中仍然充塞着多少不容异见的习性，在各种大小集会上又有多少人咒骂持不同见解的人。帽子、诽谤、辱骂越来越不紧缺，通往法西斯之路也来得更短了。

当今的社会状况是多年培育起来的不要道德、不要精神的规

范准则的结果。

我们正惴惴不安地期待着，新的历史时期将给我们带来什么。目前有一点是清楚的：为了能诚实地面向未来并积极地对它施加影响，我们应该弄清楚我们过去的遭遇，弄清楚迫害伟大的人民是怎样得逞的。

我们应该对此有所认识，否则我们反复折腾和不容异见的习性将永无尽头。

第十章 哺育冷战的人们

我们在全世界燃起熊熊烈火，
血一样的熊熊烈火……
叫那资产阶级无处藏身。

——勃洛克^①：《十二个》

我想一开始就声明：我并不奢望在这一章中详细论述 1917 年 10 月后对外政策的历史和理论。

我只涉及决定与“另一世界”关系的那些概念和主张。

很清楚，苏联外交学说赖以构筑的支柱——阶级立场、支援解放运动和超出能力范围的军国主义化——已经招致了毁灭性的后果。

但全部都是单方面的现象吗？完全不是。任何当事的一方都无法宣称自己是圣洁无辜的。

双方都是始于 1917 年的冷战的哺育者。

—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曾写过不少论述国际问题的篇章。人们可以在其中的某些篇章读到言之成理的预言、对政治和政治家们一针见血的评述以及关于不许干涉别国内政的一些论断。

然而学说的开山祖师们所思考的最主要内容乃是对世界无产

^① 勃洛克（1880—1921），俄国诗人。早期创作承袭象征主义。后来在 1905—1907 年革命影响下其作品加强了面向社会生活的倾向。《十二个》（1918）是一部歌颂革命的长诗。——译注

阶级革命的信念。为了这一革命的胜利，不管是国际法的陈旧准则还是国家间相互关系中的道德准则，都可以而且必须打破。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注定灭亡并退出舞台；列宁也称“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马克思的这一根本错误，列宁的这一同样也是根本性质的误区，使他们对以往政治所作评论中的合理内容不断贬值。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与俄国的革命家们保持联系，然而俄罗斯实际上并未落在他们最关心的视野之内。

专制的俄国当时被人们看作是欧洲的宪兵。不仅如此，甚至在开山祖师们的书信中，对斯拉夫民族是否完全合乎条件、他们是否有能力为文明的积累增添什么实质性的内容，流露过某种怀疑。

因而，说什么布尔什维克的国际政策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教导为依据的等等，如同他们竭力证明的那样，是不足为凭的。这是一种臆造。当然，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在论证其国际措施时，总是不断引用辩证法的一般处方……

在布尔什维克活动的初期，即在 1903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出现分裂之后的一段时期中，列宁及其战友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对付俄国内部事务、与孟什维克进行争吵、与社会民主党人开展国际论战等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日子里尤为如此。

然而应该指出，早在日俄战争时期布尔什维克就采取了失败主义的立场。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们再次号召俄国战败而且破口大骂社会民主党人对自己国家和政府的支持。

总之，越坏越好，国家局面越糟，爆发革命的形势就越临近。这就是他们的盘算。

凯撒德国一有可能就资助列宁及其同志们，帮助他们中止侨居生活而回到了 1917 年二月革命后的俄国，这并非偶然。柏林

在那些年代把布尔什维克当作自己东线战斗中的帮手。按照德军总参谋部的打算，布尔什维克应该是在后方，接着在前线从事捣乱，虽然那些地方本已陷入混乱。

布尔什维克的反战宣传帮助他们取得了政权。他们在对外舞台上的最初招数十分成功。我指的是《和平宣言》。政府建议交战各国“立即签署不割地（即不攫取别国领土、不强行兼并别的民族）不赔款的和约。”

但是这里已是完全实际的方针与革命救世主义的混合体，它号召（我照本抄录）“人类三个最先进民族和此次战争中三个最大参战国即英法德觉悟工人们”同俄国无产者一起“把和平事业以及使被剥削劳动民众摆脱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的事业顺利进行到底。”

布尔什维克声明与秘密外交决裂，着手公布临时政府的外交文件。稍后，1918年1月，在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其中宣告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它是建立在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基础上的各苏维埃民族共和国的联邦。

意向是神圣的，但在实际政策中却被抛到九霄云外。

在布尔什维克政府一切早期对外宣言中，实用主义和布道式的热情，乌托帮和暗中的盘算形影相随、唇齿相依是显而易见的。但只是现在才搞清楚，在发表豪言壮语的同时，策划并实施了镇压所谓“边陲”的军事行动。那个时候国家已民穷财尽，但仍从其可怜巴巴的预算中拨出了款项来“推动”其他国家革命，对一些不合心意的邻国则进行了挑衅。

就在这时成立了第三共产国际，它后来逐步演变成不仅是外交方面，而且还是情报刺探方面的重要工具。1943年，斯大林为了加强反希特勒联盟范围内的合作，不经特别手续就解散了共产国际。

布尔什维克的外交史包纳了许多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不断变形，经历了实质性的变迁。

认为布尔什维主义奉行的是完整笔直的国际方针，这在一定程度上犯了简单化的毛病。布尔什维主义的国际方针有许多张面孔。它有时以意识形态的癖好为特征；有时表现出纯粹的现实性，其实是国家需求；有时则以帝国野心为其标志。

在国家的历史中，反对协约国武装干涉的斗争并非虚构，而除此之外，也曾经对崩溃了的俄罗斯帝国的广袤边远地区独立运动的萌芽实行了镇压。

严厉谴责了凡尔赛和约的掠夺性质，后来又严厉谴责了希特勒的纳粹主义。但又与这同一个纳粹德国进行了秘密而又相当广泛的合作，直至在苏联境内培训德国飞行员和坦克手。

在西班牙参与了反对佛朗哥主义的斗争，与西方民主有过不成功的浪漫史。但又厚颜无耻地与希特勒达成交易，与其共同瓜分了别国领土和别国土地。

对一些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国家提供了真正的援助。但又发生了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等事件。

无数次发誓要忠于和平理想，忠于和平共处原则。但同时又经久不断地进行大大超过实际国防需求的军备竞赛。

一幅多么绚丽的画卷！创作这幅画卷的不仅是莫斯科，而且还有西方国家，他们总是不放过一切机会，设法使苏联生活贫苦，使苏联惶惶不可终日。

大概可以对外交活动作出某些相对的划分，即将其分为几个不同时期，每个时期中，这样或那样的内容上升为第一位。

这里就出现了基本的矛盾，而且确实是对抗性质的。一方面是世界革命的救世主思想，另一方面是由国家及其社会制度的生存利益所决定的毫无伸缩余地的实用主义。

不是别人，正是列宁，将年轻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

共和国称作是“全世界社会主义大火的中心”（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7卷第372页）。他从政变后的最初日子起就不倦地重复指出，“没有最强大的同样足以席卷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战胜全世界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巨人。

不用说，这一提法是与已被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折磨不堪的居民的切身利益相抵触的。而且，旨在在匈牙利、德国、波兰和其他地方点燃革命大火的实际行动已经流产了。

至少策略是需要不断校正的，当然，战略也应如此。但是思想上的姿意妄为压倒了真正的客观实际。对世界革命的热切期盼虽已烟消云散，但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却仍不断顽固地进行灌输和鼓动。

悲剧在于，在这一无法兑现的梦呓般的思想指导下，一架庞大的军事机器终于逐渐建立起来了。国家的主要资源都被用来建设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经济上的自我孤立已成为信念的某种象征。国家以及它的经济、意识形态等都军国主义化了。想干什么？要将国家变成一座牢不可破的堡垒，然后再变成发动进攻的基地。

利用、挑起对方阵营中的矛盾的做法也源于这一救世主思想。这一做法本身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外交本来就是一场大型游戏，大家都在物色伙伴和盟友，为的是击败对手。自古以来的传统就是如此。很遗憾，它一直延伸至今。

列宁说得十分坦率：“当我们孤立而资本主义世界还很强大的时候，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是必须利用分歧（战胜所有的帝国主义强国，这当然最好，但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能做到这一点。”（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40卷第107页）。

接着，这一观点延伸出了以下的思路：凡尔赛和约将迫使德国置于一种自然想跟俄国合作的地位。

这一思路是颇有点道理的。后来在很大程度上都得到了验

证。1922年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于拉巴洛与德国、波罗的海诸国以及波兰都签订了条约。

在群众性宣传和“领袖们”的声明中千方百计地标榜爱好和平以及力量的增长。“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苏联加入了国联。看来要与一切有影响的国家建立并维持外交关系。

但是，共产国际在行动，在准确无误地履行其作为苏维埃国家的一个外交工具的职能。

玩弄矛盾的游戏规模巨大，在这一游戏中，外交几乎谈不上有什么伦理道德的限制。事实上不仅苏联外交如此。一副道貌岸然摒弃秘密外交转向公开外交的姿态很快变了样。外交史所极其熟悉的狡猾和虚伪，已被苏联的外交完全掌握了。

与资产阶级国家和平主义人士调情的同时（虽然大家知道，布尔什维克说轻点从来也不赏识和平主义），支持别国反政府的和反对派的势力的工作也进行得有声有色。

国家的钱财年复一年地耗费在各国共产党和其他革命政党身上，他们被看作是影响其本国局势的有力因素。而事实上这只是自欺行为。以抄录报纸文章、收集传闻为基本内容的情报工作也常常是毫无意义的。

当我任职驻加拿大大使时就碰上了这样的工作。我曾经企图反对这一工作方法，当然我干得相当谨慎。但什么结果也没有。有的只是我再一次得到了关于领导发火的信息。

我记得，1979年有13名外交官及其妻子被加拿大遣送出境。当我的建议发往莫斯科之后，我接到了安德罗波夫—克留奇科夫的电报，申斥我对苏联情报在北美大陆的任务一窍不通。

后来有人告诉我说，安德罗波夫甚至在政治局会上建议解除我的大使职务，原因是我在困难时刻不支持情报工作，缺乏“互助友爱”的精神。

其实应该指出，“收买自己人”从事情报等等决不是布尔什

维主义的独家专利。这也是西方民主的一种陋习。并不是苏联外交发明了包括情报工作在内的一切。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历史。

由于乌里扬诺夫—列宁及其周围人数不多的亲信对待不同政见及不同做法采取不能容忍的态度，社会民主派出现了分裂。结果（经历不止一次的重新组合之后）产生了对社会主义思想作不同解释的各种派别。其中主要派别是：社会民主主义（社会党国际）、国家社会主义（希特勒）和国际主义—布尔什维主义（斯大林）。

后面两派带着不可救药的思想盲目性发动了一场全面横扫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甚至面临法西斯的直接威胁的情况下，列宁的追随者们也丝毫没有减弱将社会民主主义作为死敌加以清算的决心。

我想，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一开始曾是真诚地沉湎于自己关于世界革命的幻想的。他们曾把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看作是自己的同盟者和全世界无产者的同盟者。1920年，乌里扬诺夫—列宁在回答外国记者有关亚洲计划的提问时曾说过，“和对欧洲的一样：同各国人民和平共居，同正在觉醒起来要求过新生活——建设没有剥削、没有地主、没有资本家、没有商人的生活的各国工人和农民和平共居。”（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158页）。

当国内战争取得初步胜利之后，布尔什维克上层曾经考虑进军印度，将其从英国领主手中解放出来，这样一来就会引起“多米诺效应”。但波兰战争受挫以及国内的经济崩溃迫使抛弃这一幻想。虽然对中国、印度和其他东方诸国的兴趣并不减弱：莫斯科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曾经培养过革命干部，提供过资金和武器。

30年代，苏联在政治上、道义上支援了当时已成为法西斯

意大利侵略牺牲品的阿比西尼亚。为支援共和国的西班牙也做了许多事情。为被迫抵抗日本扩张政策的蒋介石中国提供了大笔援助，包括军事技术和相应的专家。

但是对外政策中的这一进步内容（我指的是援助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几年以来也增添了明显的利己主义迹象。在评价别国的具体形势时，把第二位的東西绝对化，而主要内容却被忽视，而且常常被褻渎。一切都被归纳到两大制度的对立中去了。

莫斯科对待 20 世纪的伟大儿子圣雄甘地的态度以及它对“非暴力抵抗运动”——给印度带来独立的运动——的蔑视是无法从历史抹掉的。

上面已经着重指出，救世主义与实用主义已经交织到一起去了。首先是必须活下去。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列宁在鼓吹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经济合作、鼓吹为他们提供租让时，曾经说服其不太开窍的同志：“租让就是战争以另一种形式……的继续”（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40 卷第 962 页）。这里谈不上什么逻辑，而实用主义是显而易见的。

就在这时提出了“和平喘息”的口号，说的是喘息。采取了一条所谓与资产阶级国家“和平共居”的方针。

事态的发展使列宁及其同僚们确信：世界革命已经从历史的地平线上消失了。因而应该将整个注意力转向国内事务。

二

事实上早在战前苏联外交政策已经开始丧失其救世主的性质而不断添加明显的实用主义的帝国特征。

这一演变的转折点就是可耻的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的秘密会谈纪要——布尔什维克式玩弄矛盾游戏的顶峰。

我作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成立的 1939 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政治和法律评价委员会的主席，曾在 1989 年研读了好几百页有

关这一历史时期的材料。这些材料充满狡猾和无耻的事例，在政治上毫无远见可言。

国家的尊严和荣誉在后来的战争中被人民挽回过来了。这场战争在我国被当之无愧地称之为卫国战争。但是付出的代价之大是无法估量的。这方面同样有待我们去作痛苦的审视和悲剧性的开掘。

再重复一次，我不是在写外交史，甚至也不是在写这方面的论文。我只想唤醒人们注意外交的基本特征，暴露其在官方宣传中大量涂抹的胭脂和白粉下面的真实颜色。

早在斯大林时期，后来特别是在赫鲁晓夫时期，曾喧嚣一时地大讲和平共处，而且是“长期和平共处”。这是“和平喘息”政策的继续。

请注意：“和平”但只是“喘息”，“共处”也只是“长期”而并非永远。

生活在退缩，但教条却仍然统治一切。一批幻想破灭了，又出现新的更为荒谬的幻想。尽管许多事情已使人们失望，但对胜利的信念，即使不是世界革命的胜利，而只是在和平竞赛中取胜资本主义的信念，看来还是经久不衰的。

社会主义阵营，随后改称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出现、中国的革命、殖民帝国的垮台等等鼓舞了列宁和斯大林的继承者们。

“瞧！”勃列日涅夫在小圈子里惊叹道，“在原始森林中也想要按列宁教导的那样生活！”

和平共处被说成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而两种对立的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被认为是世界政治的核心。

当然，更能说明问题的并不是词句，而是发生在并非很久以前的那些事实和行为。1953年在坦克的帮助下平息了东柏林；1956年镇压了匈牙利人民起义；1968年扼杀了布拉格之春；

1980年疯狂压制波兰。最后是可耻的阿富汗事件。

我在此向大家点出了一些著名的事件。还有许多瞧不见、看不到但同样是很不体面的事。

当然，社会主义大家庭是一个古怪的帝国。“附庸国”的顺从无从谈起。不仅毛泽东的中国是如此——这个国家当然不愿在对外政策方面做赫鲁晓夫的尾巴；所有“附庸国”无一例外地都在玩弄自己的游戏。苏联本身并未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得到什么特权和经济利益。而且苏联人的物质生活仍然比大家庭中的许多国家来得艰苦拮据。

其主要原因当然不是与“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合作。根本毛病出在国家内部；而关键的外部因素则是所费不费的冷战。精良武器堆积如山，然后还要用新品种的武器对其更新换代。

这里指出一点是适时的：政权已经逐渐军国主义化了。促进这一进程的是战争，以及旨在捍卫政治制度而强化了堡垒被围的心理氛围。军国主义化已经达到骇人听闻的规模。军工集团开始独立于社会——它由国中之国的强力部门把持。

换言之，军事机构和武器制造商们逐渐摆脱了政治上层建筑的控制。政治上层建筑成了他们活动的方便的掩体和帷幕。

他们常常扮演露骨的挑衅角色，反对任何缓和，竭力加强军事对抗。

举几个例子。

当苏美达成第一个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后，苏联实际上立即或几乎立即在其领土布署了SS-20型导弹——按苏联标准属“先锋”级导弹。美国人也马上布署了自己的导弹，但这一次已经离苏联边境不远了。

所有这些严重破坏了我国的安全。

苏中关系恶化明显是人为挑起的，它随即被苏联“鹰派”人士作为理由重新装备与中国接壤的边界，其费用十分浩大。最高

将领集团确认，全国应该准备一场“全方位”的战争。

早些时候，我国军方与以色列交战6天失败后抱屈不已，迫使苏联领导与这一国家断绝外交关系。从此世界这块地方布满爆炸险象，成了国际紧张的根源之一。除了种种因素之外，这也是反犹太主义兴起的一个原因。

美国方面，“花岗石脑袋”的军人和凶悍政客也不乏其人。回忆一下越南就够了。

阶级分析方法一开始曾是布尔什维克外交的首要原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更多成了词藻，实际上推行的是一条明白无误的大国主义方针，按照我们中国邻居的说法是一条霸权主义的方针。曾炫耀一时的侠义精神开始褪色，裸露出某种相反的东西。

1950年的一段插曲是有代表性的。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将近5年，即中国革命胜利几个月之后，毛泽东拜会了斯大林。

拜会是怎样进行的呢？

中国的最高领袖在莫斯科近郊的斯大林的别墅中等候了差不多两个月。每天请吃请喝。但斯大林的接见却迟迟未能安排。伟大领袖没有时间。

毛的中国战友们说，他们的领袖是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前来莫斯科的，因为担心被捕。

会见终于举行了。但只是在两位“伟人”之间的距离测定之后。

几位目击者说，斯大林当着中国领袖的面陈述了他对未来的看法。他建议如下划分势力范围：欧洲、西方划归苏联，亚洲和东方划归中国。苏中关系本身开始注入中国依附苏联的性质。

后来这引发了一场巨大的灾难。在歌曲、标语和发言中被颂扬备至的苏中友谊由于蹩脚的苏联政治家的过错终于崩溃，而这一崩溃延续了许多年之久。

三

在斯大林以后的年代，对外政策中交织了复杂的内容。有现实的国家利益，有大国主义的习性，也有以往侠义精神的余音——向一切宣称反对西方的人伸出援助之手。

我想，历史学家们将不断挖掘出新的材料，来阐明冷战是如何开始的，是谁为了使冷战不断升级不惜花费金钱并煽起仇视心理，是谁直至今日仍不愿放弃冷战的学说。

冷战依循的逻辑是相当粗劣的：苏联的坏事就是美国的好事，反之亦然。华盛顿和莫斯科都严格遵循了这一逻辑。有众多实例为证：朝鲜、越南、加勒比海危机、近东、阿富汗等。事实上不论苏联还是美国，挑起冷战的例子又何止这些。

60年代，特别是在70年代，苏联对许多破费昂贵而又毫无意义的冒险活动十分投入。而几乎每一次，美国也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参加进来了。

我认为，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几乎是盲目行事的。例如，只要哪位非洲独裁者声明“以社会主义为方向”，再向爱好奉承、胸佩勋章的苏联领袖说上几句赞美的话，那么援助实际上已保证到手。

这样，在苏联之友的名单中就曾出现过“非洲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食人皇帝博卡萨、乌干达的独裁者伊迪·阿明、埃塞俄比亚残酷无情的杀人凶手门格斯图等。

这成了我国一笔巨大的支出。而尤为悲惨的是牺牲了許多人。对此直到今天还是噤若寒蝉。

外国拖欠苏联的债务大约有1000亿美元。这笔债务的绝大部分已一去不复返。因为它们是用来支援“民族解放”运动的，当时打的如意算盘是以此扩充势力范围。

毫无疑问，新的俄罗斯需要正常的商务往来和平等互利的合

作关系。但正如人们说的那样，愿上帝保佑我们，千万别让布尔什维克那套叫做国际主义的玩意儿再来折磨人了。

归根到底，所有这一切源于帝国主义注定要灭亡这一教条，同时也是由于不会或不愿正视并评估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变化，理解世界上各部分相互制约的态势，现实地评估自己和别人。

思想上的盲目是可怕的，它能造成无数灾难。

以入侵阿富汗为例。

这本是从小事引发的。部分阿富汗军官发动了政变，他们采纳了苏联的处方：宣布遵循社会主义目标，对苏联怀有深厚友谊，信奉反美主义等等，并宣称国家领导人阿明是美国间谍。这样，得到莫斯科的拥抱有了保障。

一开始说的是经济援助、武器援助并派遣专家。但是阿富汗的改革家们很快就碰上封建社会传统的顽强抵制。一场内战开始了。

据我所知，有关阿明是“美国特务”的信息是由克留奇科夫提供的，此人后来先在克格勃系统，接着在苏共中央政治局系统分管阿富汗事务，他与将领集团中的“鹰派”人物对阿富汗战争负有直接责任。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莫斯科老早就生活在一个凭空臆造的世界之中，置现实环境的现实意义于不顾，却满足于意识形态领域的陈词滥调，为各种不同政治力量定性。这是教条主义的必然结果，是罔顾客观因素、孤芳自赏实力和武器的结果。

有关阿富汗的悲剧已经写了和讲了许多了。全世界都谴责了苏联的侵略行为。但是布尔什维克对外政策的罪恶行径，在所谓“有限的苏联部队”开进阿富汗土地之前老早就开始了。

一切要比阿富汗事件早得多。我想说明的正是这一点。

在官方预算中从未有过军费的真实数字。军事纲领是由统治上层为数极少的几个人审议通过的。在国家生产总值中，军事生

产究竟曾占多少比重至今无法确定。有人说占 70%，很可能还要多些。

这是超出能力范围的负担。这一过错和罪愆还将长期压得俄罗斯透不过气来。

主导统治精英的信念是：武器越多，越锐利精良，国家的安全也就越巩固。

我从心底里深信不疑：苏联早在战前时期就已经抛弃了为世界革命的胜利而进行坚决斗争的思想。然而苏联国民经济却年复一年地衰败下来。没有任何敌人能像军国主义化那样吞没一切，给经济造成如此严重的破坏。这是在人民面前犯下的罪行。

自从 1985 年春开始改革以来，虽然不是立即铺开，但却是悄悄地探索未知之路，即开始摆脱教条，放弃国际事务中目光短浅的做法，重新审议损害社会切身利益的死板方针。这里戈尔巴乔夫表现出是一名十分坚定、真诚、顽强的政治家，他一针见血地看透了对手们玩弄的“把戏”。

外交领域陈腐政策纷纷败下阵来。这是一个激动人心而且富有戏剧性的历史进程，它还在我们眼前拓展之中。

如果描写这段历史，我也许会轻松自如些。我可以写些我亲自参与了的“高层”会晤——在日内瓦、雷克雅未克、莫斯科、纽约、华盛顿、马耳他；在北京、东京、波恩和赫尔辛基；等等。

但那已是另外的历史课题了。

但是，对于西方就苏联和俄罗斯所采取的某些奇怪的立场，我很难忍住不表示我个人的困惑不解。我有义务出来作证：我们的意向和行为，在我看来，并未得到西方政治领袖们足够深刻和全面的评价。

西方顽固地不愿与我国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合作，反映了并反映出或是目光短浅，或是不理解俄罗斯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

切。好像是苏维埃教条移位到西方国家，移位到美国去了。严格说来，只有 1994 年 9 月俄罗斯和美国总统的会见取得了实际成果。

可悲的还有：美国威望在俄罗斯知识界的心目中也败坏了，那是因为美国事实上并不关心我国进行的民主改革；另一方面，俄罗斯的政治反对派在其反对改革的活动中正在最起劲地利用这一形势。

如果将俄罗斯推向东方的企图将继续下去，并由此营造起新的“帷幕”而将俄罗斯和欧洲隔离开来，那么，形成一种新形式的“冷战”和对抗就将不可避免。但是这一次，其源头就不该在俄罗斯寻找。

第三编

是希望还是灾难？

1985年的改革派，走过了极权制度极其复杂和危险的迷宫，经历了它的游戏规则以及为数众多的陷阱。此外，他们在特工部门不断高度监视下冒着对自己和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的风险，自愿承担起改造国家的重任。

但是，正如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他们最终遭到既来自右的也来自左的尖锐批评。

这不是自吹自擂，也不是抱怨诉苦，看来这是命运。在俄罗斯，改良之路从来就没有受到尊敬。让我们多来一些造反和革命，多树一些敌人，以便造成更多的流血事件。

然而，改革是件令人生厌的事，它要求有耐心，需要思考。如果能在人们的口哨和挖苦嘲弄声中彻底摧毁一切，然后边哭泣边卖力地并为所干的事情感到不寒而栗的情况下重新建设，那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了。

不，我们的伟大人民应该有更好的命运。我相信，他们再也不打算为领袖的愚昧无知和虚荣心，尤其不打算为任何人的利己主义而付出血的代价，忍受苦难了。

可是，我们的记性终究是太坏了。我们已经开始忘记自己不久前的生活，甚至在怀念这种生活。

是不是皮鞭要比自由更可爱些？

在经济上，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是在往又尖又硬的石头上撞。国家垄断制则表明自己完全无知，且毫无效益。

统治者越是大声叫嚷人间天堂已快来临，希望的幻影也就离开得越远。

今天，鼓吹复仇的人们企图把改革说成是由一小撮人策划的，是受某种神秘势力（不是魔鬼撒旦，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

唆使而搞起来的不正常的事情。这是枉费心机的。

在这一编里，我不准备用大事记的方式来谈所发生的事件，我更感兴趣的是分析事件，分析事件的前因后果，探讨观念、期望和现实的进化发展。同时，我想让人们看看布尔什维克统治阶级是如何抵制自由的来临的，也就是说揭露一下这种抵制的实质、特点和采用的方式。

第十一章 改革的来龙去脉

原来意义上的改革实际上已经结束。它也不能不再结束，因为 1987—1988 年事实上已经提出了要更换社会制度的问题。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社会中的对抗情绪迅速增长，衰颓不堪、已无形磨损但仍进行统治的机构已经看到将丢掉政权的威胁。1991 年 8 月事件加速了这种解构进程，而民主制的胜利防止了内战的发生。1993 年 10 月所有这一切又以特殊形式重演。但是老的机构在很多方面仍然存在着——这种旧的一套东西既存在于实践中，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中，存在于官僚们、布尔什维克和法西斯分子身上，也反映在他们的傲慢自负、耍政治手腕以及所持的态度和方法上。

我想回答我经常想的一个问题，即所有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哪些是必然，哪些是谬见？区分我们常抱的幻想和逼迫我们的现实的界限在哪里？

总之……

俄罗斯当前的革新阶段，从逻辑上和政治上来讲是改革的继续。

这里还没有算上由于两派民主人士的互相攀比、互相逞强以及互相指责所产生的主观主义解释。这是俄罗斯社会政治生活的顽症。

当然，改革运动已具有了另一种性质。关于改造的规模和限度、手段和方法的观念都已发生了变化，而赖以实现期望的现实也已完全不同。

起初觉得，只要修正和清理一些东西，国家也就会加速自己的发展。这是一个错误认识，它产生于当时的社会意识水平、着手改革的政治家本人的性格和看法。

我们客观上是不可能超越自身的，而把今天的标准套用在我们身上，这只是投机性的玩弄政治手腕。

况且这也不是全部真实情况。当时形成的机构是以暴力为基础的，所以它们非常强有力和渗透一切，想要用正面攻击攻克这些机构是不可思议的。攻克的办法只能采用迂回战术、灵活智取和从正面意义上利用言行不一这种久经考验的方法。

不过，如拿国际事务来说，未必有人会对导致对外政策中结束冷战的历史转折的意义提出不同意见。

归根结底，应把革新看成是爆炸式演变的一个统一而强有力的社会历史过程。

这个过程包括了生活的所有领域。

但是，这个过程目前还处在自己的初始阶段，而不是已走了一半。当然，如果遇上新的叛乱，或官僚们的怠工和无能，或决策得不到贯彻以及由于宫廷倾轧，这个过程还可能遭到夭折。

观念的演变 改革运动从一开始起就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发生了矛盾。

马克思主义宣布自己是关于建设体现社会公正的社会的学说。很少有人对此感到困惑：怎么会有关于专门研究自然界根本不存在的东西的学说。可是，古拉格群岛从肉体上消灭了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而半个世纪以来使人们同周围世界隔绝并配合以极度意识形态化的教育制度，最终完成了已开始的“伟业”。真正相信可能建成“人间天堂”的几代人成长起来了。

让我们回想一下改革前夕的岁月。好像所有一切都是完全按规定的程序运转的。我们已习惯于这种程序，企图让自己相信，事情就是应该这样。我们在普遍是假戏真做的戏院里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但是，张惶失措的气氛逐渐笼罩了社会，而随着“领袖们”的诺言一次次地落空，社会上的愤懑情绪也与日俱增。

改革以前的生活的这个方面是容易理解的，至少在今天更容易理解，但是对这个方面还没有进行过认真的调查研究。

改革以前的生活的另一个方面，至今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

我指的是对社会主义思想一定能实现的坚信不疑，相信一切灾难都是由布尔什维主义歪曲社会主义思想造成的。曾有过一种幻想，认为只要揭示出关于社会现状的最充分最可靠的信息，十分科学地分析这个信息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一切也就会走上需要的方向，就会形成明确而理智的政策。

我在某种程度上也有过这种幻想，不过只是在某种程度上而已。

此外，我认为，全部问题在于具体的人，在于他们素质差，他们的行动不受监督，在于没有公开和民主选用各级干部。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在 1985 年年底上书戈尔巴乔夫的原因。信中我力图论证把苏共分成两个党的必要性，甚至这是无上的命令。这样，两个党就可以构成民主竞争的局面，在这条路上，它们会自我更新，通过民主选举互换执政地位。社会也就能从中获得强大的活力。

我摘录一下这封题为“政治发展的无上命令”的长达数页的信的基本论述。我重复一句，这不是 1995 年的札记，而是 1985 年那封信的摘录。

“1985 年 4 月只是希望的开端，但是 4 月的情绪本身已经反映出为发生的事情的担忧。生活把社会拖进了不可避免的变革时代。任何人要想阻碍，即使是无意的阻碍，都是有害的。此外，政治之弦绷得如此之紧，一旦断裂会把人打得非常之痛。”

一切日后改造的目标是人，“是人的所有相互关系和各种表现，即生产、社会、政治、文化、生活方式、爱好、心理、健康等等。”

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

“今天问题不仅仅在于经济，尽管它是向前发展的物质基础。关键在于政治体制，确切地说在于政治体制怎么运作，怎么发展，怎么面向人，在于政治体制同人的关系，在于政治体制能在多大程度上起到服务作用。因此，必须：

“1、消灭言行脱节现象，使个人、集团和整个社会的利益越来越密切地融为一体。

“2、根据每个阶段的具体历史条件，坚持不渝地充分实现民主主义。

“3、使人发展成为在思想和行动上能自觉地团结其他人的、独立的、富有创造性的力量。使每个人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

“4、切切实实地吸收所有人来改善地方和全国的生活。这是关系到解决头两项任务的主要关键。这里有着消除社会不满的基

础，因为，第一，人们自己将会发现有了积极的进展，而这种进展的速度大大地加快；其次，他们在取得权利的同时，也承担了责任，他们自己将会看到，今天什么是现实可行的，什么是不现实不可行的；第三，应对所发生的一切，其中也包括一切未做完的和错过机会的承担责任的，不是‘上头的’某个人，而将是群众自己。”

关于改革的基本原则：

“1、民主——这首先是选择的自由。在我国已经不存在选择的问题，而只有高度集中。我们好像是在压制矛盾的辩证性，想只在矛盾的一个方面发展。

“在各个领域，在各个层次都没有选择（这是由于亚细亚式的过去，整个国家的历史、受敌人的包围等等造成的）。现在，总的说来，我们对已经正在发生的和从历史角度来看是必然要实行的过渡的实质仍然不理解，这就是从没有选择或历史条件不允许进行选择的时代向没有每个人都参加的民主选择就不可能顺利发展的时代的过渡。

“2、对生活的所有方面的革新要综合进行——从经济到民主的多种‘形式上的’外表特征。

“3、在关键领域（首先是党内）的改革要同时或甚至提前进行。

“4、改革必须坚决进行，只应受现实可能性的限制，因为考虑到一系列国家职能要有一个逐步（尽管是在将来）消失的过程。什么地方有可能也有需要，可以（在空间和时间上）进行地区性的试验。

“5、改革本身应该不只是从上面进行，而且应该由群众从下面进行。

“6、吸收学术界的力量来研究并实施民主化的进程以及对民主化的中间成果进行监督。”

关于选举：

“选举不应该是推举，应该是选拔，而且是选拔优秀人才。可以对提名的候选人名额加以限制（但不应少于两个候选人）。

“代表应该依从选民的意愿，应该通过自己的嘴真正反映选民的意見，而不是用选民的名义来发表自己的意見。

“代表应该定期向选民报告自己的工作情况，应该可以更换。应切实实行召回代表的办法，但应公诸于众并说明理由。

“这样做的结果是：代表对群众的真正责任心、从属群众并受他们监督的程度空前提高。而主要的是能真正吸收群众（通过他们对代表的直接的和有组织的集体影响）参加对本地区、本州、本共和国以至全国事务的管理。这将首先特别有效地影响到使地方苏维埃变成真正的权力机关。”

关于公开性：

“全面的公开性，就是及时提供包罗万象的信息，这是社会生活进一步民主化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只有消息灵通的人才能有创见地和富有成效地参与社会事务。要想号召不掌握广泛信息并处于不利于发挥这种创造积极性的社会气氛中的人们表现出公民积极性来，是不可思议的……”

关于司法权：

“司法权真正独立于其他各种权力……”

“法官是独立的，在司法制度的原则中和召回程序中，要对这种独立性作出切实保证。

“法官不可撤任和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被召回。我国规定的法官任期为5年。选举的期限越短，原则性也就越少。所以发生法官不断调动，这不是偶然现象。哪怕把法官的任期延长到10年，法官的地位就会稳定。司法活动应该专业化。

“现在想要干预司法审判的人多的是。应该把这种干预解决具体案件的事看作是应按法律惩处的犯罪活动。

“刑法定应该强硬坚决，保持稳定。对危害社会的分子，特别是对盗窃犯一定要严加惩处，而对杀人犯则应毫不留情。”

关于人权：

“与此同时，应切实保证行使个人的权利。应该制定人权及人权保障法，人身、财产和住宅不受侵犯法以及保守通信、通话和私人生活秘密法。

“采取有组织的形式确保游行、言论、信仰、出版、集会自由的权利，以及自由迁移的权利。

“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崇高的公民责任感，然而这只有在享有崇高的公民权利的情况下才可能。

“司法机关应对个人在任何问题上的权利，直到控拆国家机关的活动的权利给予广泛的保护。公民应该有权对公职人员和组织提出诉讼。有需要设立行政法庭，以裁决行政事务方面的冲突。

“至于说到法律和按法律制定的规范法令，那么法律应具有必须无条件执行的性质……原则上其任务应是监督法律执行的检查机关，现在实际上是毫无作为的。甚至部长们，更不用说部长会议，都是在发布同大多数法律相违背的命令和指示。

“人本应相信主管人员和组织会奉公守法地及时审理他的需要和申诉，可是现在从来没有人因非法拒绝审理而受到惩罚，而按法律去解决问题的人相反受到惩处。

“因此便形成这样一套做法：先遭拒绝办理，然后提出申诉，最后可能是得到解决。这种拖拉作风使人们的时间和精力白白的耗光。但愿能对先遭拒办而后取得解决的案件数量进行一番社会调查！

“责任应该分明，公职人员应该对自己的失职承担责任。简单地讲，个人应该尊重国家，但是国家应同样尊重个人。否则，在个人和国家之间经常会有隔阂，甚至会有裂痕。必须在宪法中

规定出国家对公民的责任。”

关于经济问题：

“经济政策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对经济政策的能量和意义估计不足，将会延长停滞的时间……”

“群众的切实参加经济的计划、管理和销售活动，建立积极的能自我发展的基础，这才能达到个人、集体和社会的利益真正的、有机的和始终不渝的一致。

“需要保持经济联系，并实行直接的、硬性的、用物质偿付的责任制！不仅集体而且个人都有权发扬经营上的首创精神（如服务领域的实验和社会经济试验）。康采恩和托拉斯都应实行完全经济核算制。

“可以设想把整个服务和商业系统设置在合作制基础上。国家只规定价格和用租赁办法提供房屋和设备。租赁者应该从2—3商店、洗衣店等等之中选择。

“需要有一部经济法典，但是一定要有独立的契约当事人，也需要有一部现代的劳动法典，因为我们的劳动法典已太陈旧了。

“必须制止财政部为了追逐今天的‘小利’而使社会丢失明天的‘大钱’。必须消除财政上的胡作非为，实行明文规定的企业付费标准和利润提成标准。

“改革对外贸易垄断制，要坚决走先同东欧各国（作为第一阶段），然后再同西方一体化的道路。

“现今，工会在很多方面只是起形式作用。应大幅度地提高它们的作用，需要赋予它们比收会费和分配疗养证（当然，这种说法只是为了概略地说明情况而已）更为重要的功能。”

几条建议：

“无论我们怎样去完善某些领域、某些方面、某些机制，仅从完善中不会带来什么好处。而最主要的是要有自觉的行动，不

同寻常地‘自行消除’缺点的行动，否则就不会有健全理智将占上风、官僚专政将被排除或削弱的希望。

“为了这些目标，有必要采取下述原则性的领导体制：

“1、由苏联总统行使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他既是苏联共产党（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主席，又是加入共产党联盟的各党联合政治局的主席，也是各共和国总统委员会的主席。

“2、总统通过全民直接投票，从由加入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各党提出的候选人中选举产生，任期10年。

“3、共产主义者联盟由社会党和人民民主党两个党组成。每5年进行一次从上到下的普选。

“共产主义者联盟有共同的（原则性的）章程，而各党则有较详细的章程。

“4、总统下设两名副总统：

“一名负责党务，兼任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

“另一名负责国家事务，兼任人民监察委员会主席。

“总统下设相应的工作机构（分党系统的和国家系统的），其中包括负责国家安全顾问小组。

“5、政府由在全民选举中获胜的党的总书记领导。

“6、最高苏维埃的工作和职能问题具有特殊性，需要另作考虑。这方面可能有很多方案，不过这已经是随后需要研究的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

“所有这一切汇总起来就能解决很多难题，这些难题不管怎样都必须解决，但能提早解决则更好。

“这将是历史性的革命改革。这样时代要求的压力将会减小。像个人的积极性、人员的更迭、同情性作斗争等等问题的解决，将不会特别费劲。社会的政治文明将提高，也就会有实实在在的稳定局面。”

我重复说一下，这是在 1985 年 12 月写的。改革运动还只是刚刚启动。苏共的权力仍然是不可动摇，好像是永世不败似的。

我在这封信的开头的说明中曾写道，所建议的措施将会使社会主义和党得到加强，尽管我明白，根本性的变化将会有其本身的发展逻辑，而这种逻辑是无法预言的。但是，在这些建议中也不乏由时代决定的幼稚天真的想法，以及那些岁月里常有的言不由衷的说法。

戈尔巴乔夫对这封信的反应是虽感兴趣但不强烈，但他认为这些想法为时过早了些。

信里所讲的很多东西逐渐被采纳，这里问题不在于信，而在于改造的自身逻辑。

当然，尽管公开性、民主化的方针，改革政治体制的方针已开始贯彻执行，但是生活里不是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的。最终算是实行了总统制，但太晚了，如果能通过全民投票来实行总统制，那情况就会好多了。

正如我已经写的，在改革初期采用了“加速战略”，可是这种战略没有经受住时间的检验。

那时候社会主义思想在党的领导层中还没有受到怀疑。但许多实际做法已引起人们的忧虑。正是在这种气氛下产生了改革，它在开始阶段采取了“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形式。

看来，在当时那种具体条件下简直是不可能不产生这类行动。这是社会意识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阶段，因此当时讲的是完善社会主义，而不是替代社会主义。

“加速战略”的破产明显地表明，问题堆积如山的根源在于体制本身，而不在于这种体制的一些工作机制。

改革观念演变中的另一个环节是公开性。

公开性的进入日常生活是非常艰难的。它成了党政机关激烈攻击的对象，因为党政机关既不要客观信息，也不要社会监

督。

可是，通过大众媒体的优秀人物叶戈尔·雅科夫列夫、维塔利·科罗季奇、弗拉季斯拉夫·斯塔尔科夫、维塔利·伊格纳坚科、伊万·拉普捷夫、格里戈里·巴克拉诺夫、亚历山大·蓬皮扬斯基、谢尔盖·扎雷金、米哈伊尔·波尔托拉宁、弗拉季斯拉夫·弗罗宁、谢尔盖·巴鲁兹金、米哈伊尔·科米萨尔等人的共同努力，公开性才得以冲破谎言和各种骗术的重重障碍。

首先这些人的活动拔下了布尔什维主义的早已长锈的门栓，为真理打开了闸门。

公开性唤醒了社会，使它变得政治化。

起初，不仅想把公开性用在出版自由上，而且把它看作是打开监督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活动的钥匙，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我个人赋予它特殊的意义。实现这项任务，就能炸毁作为现行制度最重要支柱的官僚机关的保密系统。

公开性把民主制思想远远向前推进了。在人们的意识中，开始清楚地认识到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需要进行彻底改革。

那么究竟要进行那些改革呢？

经济学家们已经早就说过，过度集中统一的计划和管理体制已经过时，虽然还不敢明说，但已涉及到商品货币关系问题；政治学家们虽已精心制作了佳肴，但仍只是摆在自己餐桌上；而在意识形态专家们那里，一切归结为保护原来的做法。

政治改革不得不直接在改革过程中进行，而且公众意识还得去认真消化政治改革的基本原则，如言论自由、多党制、三权分立等等。

从准备第19次党代表会议到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这段时间，是改革观念演变中的特殊时期。政治改革开始付诸实践。

与此同时，抵制也加强了，这种抵制马上显露了自己的布尔什维主义本性，即不能容忍异己思想。

党领导层中的大多数持正统观点的人，总的来说承认有必要进行局部变革，看到这些变革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加强单一的权力、单一的所有制和单一的意识形态。

但是，生活已经大步地向前疾驰。对权力的害怕心理已很快消失，权力万能越来越成为幻影。社会沸腾起来了，简直迷上了新的希望。历史上唯一一次社会从一种质态转到另一种质态、从专政转到自由的不流血的渐进性变革阶段来了。

在这方面，1987年苏共中央的一月全会是具有一定转折意义的一次全会，因为会上提出了党自身民主化、自由选举、加强基层党组织对政策的影响等问题。

党的机关及其全部高级领导干部感到了将有丢掉自己权力的威胁，他们知道在自由选举中他们将会遭到失败。潜在的抵制变成了公开反对主张民主的方针。

但是，这时候改革观念的演变已经开始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脱离其倡导者的独立性，有了自己的发展逻辑。

高级领导干部内部的关系也尖锐起来，这在历次苏共中央全会上表现得特别突出。批评越来越有针对性，而且指名道姓。政治局里出现了像谢瓦尔德纳泽和雅科夫列夫这样的“挨打的孩子”。但是他们打的主要是戈尔巴乔夫。

党内危机日益加剧。它在1987年十月全会（即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作了发言的那次全会）上得到了尖锐的反映。这次全会只是走过场地讨论了戈尔巴乔夫关于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报告的草稿。

叶利钦的发言使很多人，其中也包括我感到突然，虽然将不可避免地发生类似情况的感觉越来越增强，但改革派对这次“爆炸”是没有准备的。

我是最直接地参加了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报告的起草工作的。在报告里有着对斯大林主义的尖锐批评，这在当时的具体条

件下是非常重要的。报告还比较肯定地谈到了必须在民主发展的道路上迈出新的步伐。当然还有另外一些新的东西。

我觉得把在当时是新的一些官方提法提交公众舆论去评判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认为任何背离这种做法的事在策略上都是没有根据的。我们指望通过保守主义的全会，利用十月革命70周年大庆的环境将“新思想”推向前进。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自己的发言中批评叶利钦的发言中有“保守主义”的原因，我指的是，他这样不合时宜地提出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会阻碍向前推进报告所含有的思想。

可是我的发言适得其反。对叶利钦的猛烈批评引开了全会与会者对报告实质的注意，反而离奇地促进了对报告的赞同，因为全会宁愿要戈尔巴乔夫模糊不清的渐进做法，也不喜欢叶利钦的激进主张。

我还利用自己的发言批评了利加乔夫在领导苏共中央书记处方面作风不民主。

戈尔巴乔夫告诉我，他同叶利钦已商量好在十月革命纪念会后会面以讨论叶利钦早在1987年8月就向戈尔巴乔夫提出的辞职问题，这也把我弄糊涂了。而在这种条件下，叶利钦的发言，在我看来，就破坏了他们已达成的这个协议。

4年之后，1991年的秋天在某地我向叶利钦问到这个协议的事，他说根本没有这回事。

整个这件事不是个别的偶然事件，它反映了由潜在的意见分歧走向公开的意见分歧。正像我已经说过的，正是在这个时候在权力的最高层开始以较为明确的形式表明各自的立场。

我个人认为，新的急剧转变的阶段还没有到来。“渐进性”改革的潜力还没有耗尽，社会还没有做好彻底摧毁已形成的布尔什维主义制度的准备。

但是，不管怎么说，叶利钦的发言听起来像是在对占统治地

位的头面人物发出公开警告，说他们迟早都必须在政治上作出同谁在一起、向何处走的抉择。尤其应该说，叶利钦关于某些改革滞后的意见是正确的。

当然，10月所发生的这件事不是从天而降的。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已形成一种“意见”，即莫斯科市委书记叶利钦在纵容民主派，因此，应对其“严加管教”。这个观点也迎合了大多数地方党领导的情绪。莫斯科在政治局中也就成了经常受指责的对象。

可是叶利钦不是位肯忍让的人，因此也就像通常讲的，砍刀碰上了石头，硬碰硬了。

1987年8月，当戈尔巴乔夫去休假的时候，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讨论了叶利钦关于在莫斯科进行群众集会的办法的意见书。他提了出了所有群众集会都可按伦敦海德公园采取的方式在伊兹梅洛沃公园^①举行。

这个建议引起大家的极度不满。叶利钦本人也感到奇怪和惘然。他想做些说明，他说他是根据政治局的委托写这个意见书的。但这也无济于事，大家还诡称政治局没有委托他做这件事。

指责纷至沓来，超出了群众集会问题的范围。他们指责叶利钦没有能结束“所谓民主派”破坏稳定的活动。

老实说，我当时也慌了神儿，天真地认为这个问题是自发产生的。我在发言时表示对这次讨论的性质不理解，瓦季姆·梅德韦杰夫也呼吁大家就问题的实质进行讨论。那时候我不知道，正是这次会议促使叶利钦提出辞职申请书。

这样的“谴责”明显的反映出当时矛盾的实质。类似这种情况也在我身上发生了。我指的是，由于《莫斯科新闻》上发布了

① 全名“伊兹梅洛沃文化休息公园”，在莫斯科东郊。——译注

作家维克托·涅克拉索夫^①去世的消息，在政治局一次内部会议上对我进行了一通批评。

这也发生在8月份，当时是叶戈尔·利加乔夫主持工作。他对我说话时用了“雅科夫列夫同志”，而不是通常叫的“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这种称呼表明对我很有意见。

我企图进行解释，说涅克拉索夫是个大天才，他曾写过一本关于卫国战争非常好的书，介绍了他的苦难命运和在乌克兰遭受迫害的情况，还说了我读过他在国外发表的文章，没有发现这些文章有应受指责的内容。

有争论过程中，利加乔夫问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涅克拉索夫的活动具有什么样的性质？

“反苏性质。”切布里科夫不乐意地回答说。

“你瞧，”利加乔夫向我说。“难道你不相信克格勃？”

“我相信，”我说，“但是我也相信我自己，因为我了解涅克拉索夫本人，也了解他的悲剧是怎么开始的。”

大家一致地谴责我对报刊杂志领导不力！把报刊杂志“惯坏了”等等。

让我们仍来谈1987年十月全会的事。

从实质上来说，叶利钦是否正确？毫无疑问，他是正确的。

① 维·普·涅克拉索夫（1911—1987），原苏俄作家，共产党员，卫国战争期间参加过斯大林格勒战役，受伤复员后当新闻记者。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在斯大林格勒战壕里》（1946）获1947年国家奖金。该小说细微地描写了官兵心理和真实地反映了战时日常生活。另有中篇小说《在故乡的城市》（1945）和《基拉·格奥尔基耶夫娜》（1961）。他的特写《初次相识》（1958）、《在大洋两岸》（1962）、《法国一月行》（1965），在报刊上遭到批判。1963年被开除出党，1947年被苏联作协开除，同年获准出境，侨居法国。在国外写过思乡性质的回忆录和散文《游手好闲者札记》（1976）、《大墙两边》（1980）等。1987年在法国去世。——译注

的确，正如这位政治局候补委员所讲的，改革开始碰到了困难，已停滞不前。

在策略上叶利钦对不对？我认为他不对。作这种性质的发言，应该进行较为周密的准备。看来，当叶利钦在回答人们的批评时也感觉到了这一点。有些批评他拒绝接受，可是对有些批评他又表示同意。

戈尔巴乔夫的精神特别涣散，阴沉着脸，凝神沉思着什么，很少讲话。休息时，人们都强烈地对他施加压力，要他把叶利钦开除出党。他同样强烈地反对这个提议。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这一次这个问题该由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会不会在全会上作上次那样的发言？我的回答是：从今天的看法来说，不会，我不会发言；而从那时的立场来说，是会的，因为我认为支持戈尔巴乔夫对我来说，是个原则问题。

党内反对改革的一派，受到了十月全会的结果以及随之而来的叶利钦被解除职务的鼓舞，对改革发起新的攻击。这是指机关权势分子随着1988年3月11日《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发表安德烈耶娃^①的文章而企图东山再起。

当我从蒙古回国时，我亲眼看到了机关权势分子是多么活跃，而报刊杂志却一片沉寂。中央委员会曾给地方下达指示，必须支持那篇文章。为了同一目的，中央委员会还专门召开了大众媒体领导人会议和中央书记处会议。

这时候，戈尔巴乔夫也正在国外访问。

他值得赞扬的是，他一回国就采取明确的立场。他召集政治

^① 尼娜·安德烈耶娃是列宁格勒工艺学校教师，她于1988年3月投书《苏维埃俄罗斯报》。在信中她对对斯大林时期的批判持不同看法。——译注

局委员们开了两天会。雷日科夫、梅德韦杰夫，当然还有戈尔巴乔夫，对该文作出了完全是政治上的特别尖锐的评价。

我也讲了一段不同寻常的开场白。

现在我把我1988年3月23日在政治局会议上据以发言的提纲公布于众。

1、最近几星期，对改革的攻击越来越露骨，越来越频繁。攻击采取了各种形式，既涉及具体领域，也涉及意识形态。最近最鲜明的例子是《苏维埃俄罗斯报》登载的那篇文章。

这种攻击的事实本身以及攻击越来越凶相毕露，并不使人感到奇怪，因为改革触及了人们的深层次利益和观念。因此斗争也就异常激烈。

从政治斗争的逻辑角度来看，理应如此，这里没有任何不正常之处。

不仅如此，对改革的攻击也证明了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

但是不应低估这些攻击对具体工作，对政治思想和道德所产生的影响，须要坦率地说，我们正处于极端需要抵制保守派东山再起、制定与之斗争的战略阶段。就这个问题在政治局达成一致意见后，还须始终不渝地将这种一致意见贯彻到底。不能造成我们对改革没有统一认识的印象。

2、目前形势中的矛盾现象之一是，改革在使社会的道德和政治气氛健康方面，取得了最明显、最具社会意义和成效的成果。

但也正是在这方面，改革遇到了最强大的猛烈攻击。

我也就想讲一讲这些攻击，暂时把经济、管理及其他领域里专门抵制改革的活动放一放。

3、看来，需要经常提醒自己：改革——这是弃旧迎新之路，也就是从已不能满足我们需要的东西走向今天所必需的、舍此明天我们将无法生存的东西之路。

这就是说对待我国的历史——近代史和现代史——应采取诚实的、完全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存在着各种不痛不痒的轻描淡写的情况下，必须分清什么是黑什么是白，也就是做到黑白分明。

当然，这种黑白分明不是按照某人刁钻古怪的要求作出的，而是通过对已走过的道路的分析进行的。总的说来，我们也是这样做的。明显的例子就是政治局成立的为政治镇压受害人平反委员会的工作。

当然，对个别评价可以有不同意见，也需要争论。让我们在事实与论据的踏实可靠的基础上来进行这种争论。

在这种场合我想强调一个原则。如果说我们的一切始终都处于最佳状态，我们也就没有什么需要变动，也就不需要改革。

但是，如果不改革不行的话，那么也就不能不触动某些人的固定观念和某些人的利益。

选择很简单：要么我将去做为国家和人民长远利益所需要的事，不过也同时可能使某些人内心的平静受到破坏；要么我们满足于自己的循规蹈矩和壮丽事业，但为此将要牺牲人民的利益。

4、文章作者紧随普罗汉诺夫^①之后提出了我国社会存在着“两股思潮”，它们从不同的方面“力图消除在战斗中建成的社会主义”。一股是指“新自由派”及他们背后的支持者“世界主义者”，他们以西方为目标，按文章作者（安德烈耶娃）的看法，他们是主要危险；另一股是“新斯拉夫派”，他们力图回到“革命前俄罗斯”的社会形态，即回到“农民社会主义”去。

在该文章中可以看到企图在保卫“社会主义理想”的幌子下贴上尽可能多的、人们非常熟悉的吓唬人的标签，而实质上是通

^① 亚·安·普罗汉诺夫（1938— ），俄罗斯作家，1975年曾发表半纪实性长篇小说《飘零的玫瑰》，记述了作家在西伯利亚、远东和中亚地区旅行的印象，提出了当时存在的社会问题。——译注

过不正当的途径用有些故弄玄虚的形式，塞进了众所周知的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阶级斗争将尖锐化的令人伤心的“理论”。“世界主义”和“世界主义者”这些名词，过去曾经是衡量最有害的镇压行动的一种“标记”，现在好像又不知不觉地顺便地恢复了存在的权利。

5、改革有没有给精神和政治领域带来损失？如有的话，是哪些方面的损失？这些损失对我们有多大害处、多大危险？

我来试着作些分析。

我们从架子上取下近30部影片并开禁放映。结果怎么样？除了听到知识分子感激的反应外，什么也没有发生。

出版了大约同样数量的文学著作，有旧的也有比较新的。效果也同电影一样。

的确，经常出现刺激性的出版物。可是人们已在学习独立分析，独立判断。这是座学校，是条学习和认识之路。

因此任何重大的损失和危险我都没有看到。而好处却无疑是很大的。

有人会反驳说：那斯大林主义的题材又将如何？艺术界和政论界主要围绕这个题材在展开争吵。

可是，这是否算损失？

总之，让我们给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有人人为地、有预谋地让我们围绕着斯大林的作用题材转？现在涉及的不是斯大林，对这个人的评价已经在20大上就作出了。当然，只要研究我国的历史，就不可能避而不谈斯大林。

可是，现在涉及的是另一个问题，即如何清醒地、全面地分析导致我们在80年代初遇到的那些问题的全部原因。

这样看来，那些反对批评那些年代的失误和罪行的人，是不是想要保护自己不受批评，不受改革的影响。

我们在着手进行这项责任极其重大的事业的时候，实在是

责任首先看到每个言辞后面、任何立场和观点后面的现实利益，同时要分析这些利益并给它们作出应有的政治评价。

6、目前改革政处于过渡时期。它被理解为一种主张，一种具体的构想。改革已开始进行，但它还远没有在人们的意识中，尤其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扎根。

一定要对改革的攻击进行回答。

这些攻击来自何方？

保守派的攻击，它是以那些首先把改革看作是对他们地位的威胁的人的利益和信念为出发点的。

在确实出于误解而进行攻击的地方，应消除这种误解，并说清楚，改革不是否定，而是创造。

在完全由于一己私利而进行攻击的地方必须进行斗争。

左倾空谈的攻击，它来自革命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同时也是产生于对生活的寄生和好吃懒做的态度。当好吃懒做的本能不能立即轻易地得到满足而必须干活时，流氓无产者的愤懑也能导致这种攻击。

教条主义的攻击，这是来自意识、习惯和观点的惯性，来自传统立场。在日常生活中，在学术界经常出现这种攻击，在群众中也有这种攻击。

对以上这些攻击的最好回答就是我们的健康发展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就是在事业上有所进展。

7、意识形态领域里对改革的攻击（现在阻碍改革的因素）表现在哪些方面？

表现在对新闻出版界的态度上，中央委员会总想领导每一份报纸，指导每一篇文章。

表现对知识分子，即对科学家和文化人士的态度上。现在不应该再制造新的持不同政见者，尤其是不应该只是从意气用事、同情或厌恶出发凭空制造出新的持不同政见者。也不允许一些创

作工作者的集团利用党的立场和评价为其小集团利益服务，这种现象在过去曾不止一次地发生过，而且都给我国文化事业带来损失。

表现在常常把原则性同“禁区”完全混为一谈上。今天，为了允许或至少不禁止别人发表意见，为了善于分析生活中的现象和事件的实质，而不是抓住僵化的教条不放，需要更多的原则性。

表现在缺乏宽容精神，习惯于只考虑自己的观点，认为它是唯一正确的。对改革的思想 and 构想，尤其是对改革的实践的绝大部分反对意见，就来自这里，来自心理方面。制造冲突是不需要费多少头脑，费多大劲的。

8、对反对改革的攻击应作什么反应呢？

谈几点明显的想法：

(1) 应该同意，对意识形态、文化和群众意识的转变搞仓促行事、从口味出发和失之偏颇是不行的。需要树立长期目标，准备并善于着眼未来工作，而不是只顾眼前。

需要的是农民种庄稼时表现的耐心和勤劳，而不是偷猎者的轻易得手。

(2) 需要有高度的公开性。在古代，对报坏消息的人往往加以杀害。今天对那些提醒社会注意负面现象的人，则说他们是在“抹黑”。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无论是坏消息还是缺点都不会消失，而在这样对待“报信者”的情况下，坏消息和社会负面现象将只会以更强有力的反常形式来影响人们。

(3) 对新现象、新建议和新思想，必须认真加以分析研究，不应随便置之不理。同样，对那些今天仍有效的东西也不应丢开不用。改革是针对现象的实质，而不仅仅针对它们的形式。

(4) 寻找真理的唯一可靠方法，是进行讨论和争论，对不同观点进行公开比较，以便造成有所选择的环境。只有自觉地对待

所从事的事情，才会有所前进。而只有当人亲自参与，也就是说由自己抉择时，才可能产生这种态度。

(5) 要请人们提出好的意见，而不要禁止他们说话，不要乱戴帽子等等。好与不好应由实际结果来衡量。

综上所述，《苏维埃俄罗斯报》刊登的那篇文章乃是复仇势力欲东山再起的纲领。它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只是一些老生常谈的论据。

可是，问题不在于这篇文章本身，而在于对这篇文章人为的重视，而且这是党的机关，其中包括苏共中央机关所为。

这次会议后不久，在《真理报》（1988年4月5日）上发表了题为《改革的原则：思维和行动的革命性》的文章。

对改革的第一次大规模攻击至此宣告失败。后来又发起了几次攻击，其中有的也获得了成功。

业已形成的局势的独特之处，在于政治飞快地向前发展，可能过于飞快了。党实际上分裂成改革派和正统派，这越来越明显。所有这一切使人们大为惊愕，感到无所适从，但是在群众意识中还没有发生急剧的转变。社会还只是刚刚开始承认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多样性是自然而然的事，承认这种多样性具有生命力。

在这种气氛中，开始出现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我称它为“社会主义无神论”，它摆脱了教条主义新宗教，回到了最初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思想。

“社会主义无神论”的思想政治内容还只是刚刚开始形成。这种“无神论”要求专业化和高效率的管理水平，既不臆断地崇尚权威主义、也不臆断地崇尚民主的管理形式本身。它懂得转向市场的必然性，但是也愿意听取其他方案。它试图使社会意识走上对现实进行实事求是评价的轨道。

换句话说，为从组织上形成社会民主运动奠定了基础。

这种尝试有过好几次，但都没有成功。比起其他尝试较为明显的一次尝试，是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组织了作为苏共的竞选对手的民主改革运动。

我提出这个主张，仍然是从认为有必要建立两党制或三党制出发的。这样对苏共领导来说，就会提供正常竞争的可能性。

可是政治现实最终抛弃了党的“领袖们”及其在克格勃、军队、军工集团的最高代表，因为他们走的是另一条路。

想东山再起的复仇势力竭力钻社会还远没有充分认识到自由的巨大价值，也不准备为自由而承受任何负担的空子，以达到苟延残喘的目的。当然，人们已尝到自由的甜头，但也远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自由。今天对自由和民主的需求水平未必比前些时候高，因为社会陷入了经济泥潭。

公开性和民主做了好事，它们产生了自由思想。但是，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打破像铁板一块的新的封建主义？当官的先是躲避风头，默不作答，而后来却威风凛凛地大声喝斥，似乎对民主的信仰已化为乌有，又要重新出现“莽汉充圣贤”的局面。

什么自由……什么民主……而人直到现在仍在他最近的百年来受煎熬的地方徘徊。可是，社会形态、亲王和皇帝、领袖和总统、政府和部长们都不断更迭，而天才与恶棍、智者与凡夫也都是来往过客。

但是以官僚为化身的政权却保留了下来，对人来说这种政权就是主要权力。

我们的官僚还是那种视权力为生命，对他们来说权力就是他们的生活、心理的实质和享福过好日子的根本。而且这种权力不是以法律为最高准则的权力，而是滥用暴力和胡作非为的权力，并认为所有这一切对权力来说是理所当然的。

这是从哪里传下来的？是从古代传下来的吗？

是的，也是从古代传下来的。

但是，当今官僚政权最深远的根源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暴力思想。当我们还是奴隶的时候，我们曾把这种暴力思想理解为一种有权决定我们行为和生活的东西。

这里，不由得想起智者萨尔蒂科夫-谢德林^①来，他在自己《关于勤奋长官的故事》中说，有两条能确保领导成功的重要规则。

“长官造成的损失越大，他给祖国带来的好处也就越大……估计祖国在从原先的领导转到新的领导时情况总是不佳的，那就让她先通过受点损失而变得稳定一些，不再动不动就造反，尔后就会恢复元气并很快繁荣起来。”

“而另一条规则是，掌握尽可能多的恶棍，因为一般老百姓都忙于自己的事情，而恶棍们都是些无所事事的人，能干各种坏事。”“长官把恶棍们召集在一起并问他们：什么是真正的祸害！恶棍们回答说：‘只要我们的纲领没有全部完成，依我们看，也就不会有真正的祸害。而我们的纲领应该是这样的：只许我们恶棍们说话，而其他人都闭嘴；我们这些恶棍想出来的主意或建议必须立即采纳，而对其他人的愿望则置之不理……让我们这些恶棍受到无微不至的爱护和照料，而给其他所有人都戴上镣铐。把我们这些恶棍所做的坏事看成是好事，而其他入即使做了好事，也应把它说成是坏事。还应做到，没有人敢说我们这些恶棍一句坏话，而我们这些恶棍想要骂谁就骂准！如果所有这一切都一丝不苟地做到了，那时候也就造成了真正的祸害。’”

^①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1826-1889），原姓萨尔蒂科夫，笔名谢德林。俄国讽刺作家，民主主义启蒙者，政论家。他塑造的讽刺形象在人民的社会意识上有牢固影响。他的创作传统对俄罗斯文学发展有很大影响。——译注

二

现实的演变 斯大林主义到自己的极盛时期，也就是到1941—1945年战争前夕，已建成了独特的权力金字塔。处在金字塔顶端的是领袖及其最亲近的左右手，同社会接触的是由党机关、经济机关和暴力机关组成的三头执政机构。

党的领导机关是政治的核心，经济领导机关负责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社会经济方针。暴力机关的职能那就不言而喻了。

还在斯大林在世的时候，在这三头执政体制内部的关系上，一些客观上不受领袖控制的过程就开始发展了。经济领导机关、军工集团和暴力机关，尤其是惩罚机关的阵地已在暗中得到加强。党的领导机关神经紧张不安起来，因此也开始作蠢事。

在斯大林去世后，正是这个内部关系已充分发育成熟的三头执政体制防止了新独裁者的上台。在权力的基座上出现了四位势均力敌的人物——马林科夫、赫鲁晓夫、莫洛托夫、贝利亚。

领导表面是集体领导。有段时间是政府主席当首席提琴手，居领导地位；马林科夫是当时的政府主席。但是强有力的党的领导机关显然不喜欢这种格局。依照意识形态理论，统治地位又逐渐地转到党的领导机关手里。赫鲁晓夫取得了胜利。

党的领导机关继承了斯大林时期的绝对权力，表面上似乎是全部权力，但实际上内部已有不是经常能觉察出来的各种限制条件。下面这些因素就是限制条件：

(1) 时间在始终不渝地冲毁着党垄断一切的局面。

导致这种结果的过程，不仅在苏共本身（领导机关越来越脱离人民，尤其是脱离知识分子，教条主义和空谈成风，社会思潮麻痹，不愿意看到也不愿意承认现实现象），而且在整个社会上都得到了发展。

详细研究这些过程，是一项独立的任务。这里我只想强调，

在 70 年代苏共的无上权力已走下坡路，尽管仍旧保持着外表上的“体统”和仪式。

可是仪式仅仅是信仰的外表，而已经十分明显的言行脱节已成为潜在的危险事实，而且已渗透到生活方式本身。

(2) 党的领导机关对国内事态的控制越来越蜕变成本位主义利益和地方利益对党本身的控制。部门和地区的帮派风气已明显加强。

这早就开始了。在 60—70 年代，工业区的区党委以及州内有联盟所属企业特别是军工企业的州党委都处于这种状况。这样的党委形式上是掌权，实际上越来越听命于企业经理和部队长官。从 70 年代初起。部委本位主义利益也笼罩了苏共中央。

各部委的权力已如此之大，以致在改革时期它们常常对中央政治局和苏联总统隐瞒已有的危险信息，继续保存了“一国中多国”的做法。

(3)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党内高级干部结构中纯粹党的机关权势分子越来越让位于专家们——不仅是那些只是在本部门工作的专家，而且是那些定期在部门和党的领导机关任职的专家。升官发财成了主要动机，而官官相护则是确保升官发财的条件。

结果是，从 60 年代中期起，经济上的刑事讹诈成了党的领导机关控制高级干部，特别是经济部门高级干部的主要手段。

这种讹诈的基础是什么呢？从 20 年代起，经济干部就不得不随机应变和说假话。他们在法律的边缘上或在法律之外玩手法，绕开由计划体制、高度集中和唯意志论决策以及大量的互相矛盾的繁琐细小的官僚主义指示和细则所规定的程序使自己“摆脱困境”。

那时违法乱纪现象简直无孔不入，到处都是，它们是绝对避免不了的，这种违法乱纪的本身，使违法乱纪成了陈规陋习。

这就是说，只要党委“瞄准”谁，护法机关实际上在任何时

候对任何经济工作者都可以立案法办：或给予党纪处分，或撤职查办，或关大牢。

与此同时，党的领导机关越来越多地浸透了部门利益，越来越多地为本部门效劳。在各民族共和国，党的领导机关则安插越来越多的本民族干部，越来越多地浸透着民族利益和越来越多地为本民族效劳。

党和党的领导机关就这样一步一步地逐渐变成了军界、政界和经济界官员名录上的干部手中的工具，而不是相反，不是像斯大林在世时和搞镇压时那样。但是，党的权力至上的幻想仍继续存在，而且在意识形态上还在继续滋长。

(4) 社会上出现了一个人数众多的高智力社会集团，它可能是潜在的反对按官员名录实行干部委任制的反对派的精神支柱，这个反对派里一部分人持民主观念，而另一部分人则追求权势。

20大以后，党的领导机关面临如何在不再采用镇压手段的条件下管理官员名录上的干部的重大问题。干部的自由放纵，领导的胡作非为，在中央和地方都有所滋长。贪污受贿、营私舞弊、出于贪财或玩忽职守的滥用职权、对很多人来说有利可图的经营不善等等情况大为增长。

当营私舞弊和滥用职权又成为普遍的现象时，就极其可能既容易又简单地把这一套实际关系用于为宗派和黑社会团体的利益服务。

经济领导机关也力求能控制三头执政体制中的另两位参与者。

暴力机关实现了自身的演变。斯大林之死和苏共20大划出了一条明显的界线。过去克格勃和军队占据了舒适的窝，在其中曾享了几十年的福。

形式上它们受苏共中央领导，但实际上它们对谁也不承担责任。在保密的掩盖下，至今仍隐瞒了社会还须对其进行深入追究

的罪行。

内务部、检察院和法院等护法机关的地位就比较复杂。只要失去一个主子，中央和众多的地方头子之间就会出现不协调的情况，而且在地方一级自然常常是地方利益占上风。

三头执政体制的演变发展也不均衡：有的地方发展快一些，有的地方发展慢一点；有的地方与地方的民族、宗教、帮派的陈规陋习沆瀣一气，有的地方则打破这些陈规陋习使之听命于己；有的地方在刑事惩罚上公然蜕变成无法无天，而有的地方虽然仍在形式上遵守法律和相信国家意识形态教条绝对正确，但实际上到处（地区、州、边疆区、共和国各级）都已形成三部门小圈子关系。

中央的规模巨大，而且个人之间的关系特别复杂，这就使得莫斯科不容易发生这种情况。这方面需要有个长时间的专门准备过程。这项任务客观上落到了70年代，也就是落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那时候各级三部门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而在地区——州——共和国这条线上的关系也同样有了相当的发展。这些关系开始大量摧毁整个垂直系统，并打进中央，把中央的一些部门拉入了地区帮派组织。

结果是党的领导机关的阵地显得最为薄弱。它对三头执政体制的另两位参加者有用的功能已主要是为经济工作者、军人和安全机关的行动作幌子。在形式上，党的领导机关继续掌握着官员名录上干部委任权。

因为党的领导机关可以给人使坏和穿小鞋，所以人们不得不“尊重”它。可是它已经不能对三头执政体制的钱库提供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了。不仅如此，经济部门中诚实的和懂行的工作人员不可能不看出，党的很多决议、倡议和组织的运动是多么的站不住脚。

在宪法里明文规定苏共起领导作用的同时，党的领袖的个人

权力却在下降。随着实际上的权力再分配，三头执政体制中的其他参加者已越来越对“强有力的个人”不感兴趣。

单一的政权、单一的意识形态和单一的所有制已经在不断抽搐，逐渐走向死亡。

谁是促使曾以自由公正的思想鼓舞千百万人的空想衰败和死亡的罪魁祸首？

一切都在走下坡路。

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列宁是 20 世纪的一位最伟大的政治人物。毫无疑问，他天资聪颖，博览群书，知识渊博。他全神贯注于夺取政权。他具有非凡的工作能力，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他曾不止一次地因夺权斗争策略的需要毫不犹豫地改变自己的观点。他虽容易冲动，但能慎重行事。他对不同政见持不容忍态度，而且残酷无情。他只能带来好处的妥协。他把夺取政权的目的置于道德之上。他对发动内战，实行“红色恐怖”，在雅罗斯拉夫尔、坦波夫地区、喀琅施塔得以及爆发民众起义的俄罗斯南方和许多其他地方的血腥镇压负有个人责任。

约瑟夫·朱加维什利—斯大林是职业掘墓人。他个性暴戾，是最好诈的恶棍。他是布尔什维主义制度最明显的代表人物，是要诡计、说假话、搞恐吓的能手，是封建主义的国家镇压制度的创始人。这种制度造成的神智不清如此深刻，如此损坏一切和吞食一切，以致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对这个杀害千百万人的凶手顶礼膜拜。他对国家实力和精神潜力的衰竭、对千百万人的死亡负有直接责任。

尼基塔·赫鲁晓夫是位非同寻常的、带有悲剧性的双重意识的矛盾人物。他在苏共 20 大上所做的关于揭露斯大林镇压的报告，这是在政治上走出的出色的一步，它在很多方面决定了斯大林去世后的过渡时期事态发展方向。他想要同斯大林主义分手，但不是同这种制度分手。他虽同这种制度的创始者决裂，可是他

崇拜由这位创始者所创造的世界。这种矛盾从来就无法解决，但他不懂得这个道理。

他平易近人，爱嚷嚷，文化程度不高，还爱即席讲话，而这些讲话常常以出丑告终。他谴责斯大林的罪行，而他本人又走上了布尔什维主义本性上所固有的迫害加暴力镇压之路。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是衰落时期历史上的一名闹剧丑角。他俨然成了取得战争胜利的“小地”^①元帅，而包括朱可夫在内所有其他人却都先躲在斯大林格勒堑壕里，后来躲在库尔斯克突出部堑壕里“苟且偷生”。在他治下，军工集团第一次得以在管理国家的操纵台上安插自己的代表。他学问不大，而且好记仇，他除了几乎能准确地嗅出谁是自己的支持者谁是自己的敌手的本能外，没有任何其他才能。

开始时曾想“纠正”些什么，可是很快就对事情冷淡下来。喜欢勋章、光荣头衔和各种隆重的礼仪活动。生前最后的5—6年，重病不起，实际上已不能工作，但一直被精心隐瞒。但是，看来制度本来就不需要一个有生气的管家。这已经不是他的过错，而主要是垂死的单一政权的征兆。

尤里·安德罗波夫是位狡猾阴险而经验丰富的人。他没有在任何学校学习过。他是通过国内流放和驱逐出境、关进监狱和精神病院组织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镇压和经常施加压力的能手。他把社会的发展看作是整顿上层建筑，是消除上层建筑的污垢，因为这种污垢已超过了范围，他是看到了这一点的。

这种立场使领导层的大多数人感到满意，因为这给了他们以继续生存下去的机会。同时，这种立场也激发起容易轻信上当的

^① 小地，勃列日涅夫在卫国战争中参加的一次小战役的地名。勃列日涅夫在一本名《小地》的自传小册子，宣扬他在小地战役中的英勇战斗功绩，对卫国战争的胜利作出的贡献。——译注

饱受官僚们压欺与凌辱的劳动者的希望。因此，安德罗波夫也成了大受欢迎的人，这在与勃列日涅夫相比之下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人们早就“期盼”哪怕有一些小的进展。这就是说，安德罗波夫的健全上层建筑的做法是既呈现出活力，又很狡猾。保住制度，这是这种做法的目的。

他是彻头彻尾的正统派，尽管有时也把自己装扮成进步人士，特别是在同知识分子谈话时。他把苏共党员明确地分为共产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当然他本人把自己列入布尔什维克一边。他对共产主义者有偏见，认为他们是潜在的修正主义者。

康斯坦丁·契尔年科是我们这个制度即将覆灭及毫无生命力和完全不合格的最耀眼的信号。他在事业上毫无作为，他最喜爱的是读劳动群众的来信。我不敢说他是位“眼睛里充满着布尔什维克热情”的有坚定信念的活动家。他多半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作是保住权力的手段，当然这也是由习惯促成的。

他上台执政这个事实本身就荒谬绝伦，这使国内很多人觉醒起来。但是另一方面，国家机关、经济机关和镇压机关却都在这一时期看到了有可能在进行有利于自己的权力再分配中跨出决定性的一步。

较有远见的党的活动家们懂得，新“领袖”的荒唐可笑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制度全面结构性崩溃的反映。荒诞剧院继续上演自己的戏，但导演的无能越来越明显。

这就是为什么也不能排除这种想法，即1985年的改革之所以受到党的领导机关的欢迎，是因为他们寄希望于这种改革会将权力归还给党，并将使三头执政中企图摆脱控制的另两部分“安分守己”。

但是，这一次党的领导机关失算了。改革也对它过去的那种权力职能猛击一掌。平庸的干部选拔政策也帮了大忙，因为实行这种政策的结果，安插在上层的人相当一部分都是目光短线、见

风使舵，然而“思想可靠”的人物。

不是民主派消灭了党，民主派是可以成为一支竞争的政治力量的。消灭党的是向民主改革宣战并开火的党的机关。

改革的过程是破坏了而不是消除了三头执政体制。三头执政体制已经失去了昔日主宰一切的显赫。由经济部门（绝不仅仅是影子经济部门）和封建帮派发起的反机关权势的运动，客观上也是对整个三头执政体制的一个打击。在这种体制中不仅在其各级，而且在各级之间以及整个体制内部都存在着重大的矛盾。

改革派，首先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的错误是让党内的反改革派掌握了干部政策。

在改革的影响下，三头执政体制的组成和结构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首先是经济机关的意义和实际作用提高了。实权集中到了从集体农庄、企业到更高的各级经济机关手中，因为实权就是资源。在改革期间，无论是国家的可以看得到的官方资源，还是“影子经济”的资源都提高了很多倍。

的确，改革给经营部门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只在国有制的框架内。原先的经济机构、人事部门和法律部门都给“自己的”单位提供最有利的机会和最好的条件。与此相反，它在客观上和主观上千方百计地抵制任何局外人——租赁者、家庭农场主、私有者的出现，直到现在仍在抵制。

与此同时，在经济机关内部也发生了相当严重的利益分化，从而也产生了政治期望的分化。行政命令式经济，在地区经济核算制主张的刺激下为极端民族主义和分立主义在经济上准备了土壤。

通过三头执政体制的演变，可以清楚地观察到民族共和国统治机构的作为。为了不至引起不必要的猜疑，有时它们强调服从党的纪律，表明它们忠于族际主义原则和统一的联盟。但是，它

们在等待自己时刻的到来。

当1991年8月军队和党的叛乱失败后出现了有可能公开亮出自己真正的政治和思想观点的时候，它们立刻就这样做了。虽然它们匆忙地“换了装”，但仍显得卑鄙无耻。民族主义情绪排挤了民族感情，不负责任的猖狂叫嚣占了上风。

三头执政体制没有想到会有这种结局。

结果，至少碰到了三种趋势。

第一种趋势：军工集团及其在最大程度上为其服务的各部门，总的说来仍旧只是考虑自己如何在原先的联盟和原先的经济关系的框架内生存下去。

任何革新对它们来说，都会带来最大的损失和严重的心理摧毁。最早的大规模裁减武装力量和军备，最初进行的相当范围内的军队调防以及军工企业生产军转民的尝试就证明了这一点。

总统委员会三次讨论转产问题的情况，我仍记忆犹新。每一次讨论的结果都是说为此目的所需的经费足以最终破坏我国的经济。

军工集团的代表以及他们在国家机关的庇护人，曾经极其激烈地捍卫自己的利益，以致主张裁军和减轻军国主义化的负担的人遭到了强大的政治围攻，给他们扣上各种帽子，横加指责，而且越来越尖锐凶狠。开始了歼灭性攻击。

改革派既无专业知识，又不了解情况，因为所有转产措施都是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结果是军转民的转产任务由政府机关来承办，而军工集团的可靠巢穴正是建筑在政府机关之中的。

确实可以有把握地说，曾有过不少消极抵制。但是，即使是完全没有消极抵制的话，无论如何这些物质生产部门的困难都将是最为严重的。那些因改革而不得不需要像样地从事艰巨工作的机构或确定要取消的机构，曾巧妙地利用了这些困难。

第二种趋势是由各共和国经济综合体形成的。各共和国羽毛

已丰满的经济机构和政治机构总力图巩固地树立自己的地位和确保自己的利益，对此它们是拥有不少客观条件的。

最后是**第三种趋势**，它反映了经营综合体中希望有正常市场的那些集团的利益。无疑，它们拥护改革，始终支持地区性的变革，因为它们看到这种变革有可能削弱老的帝国中央。

但是，无论是多么有背常理，恰恰是第三种趋势有失败的最大风险，如果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本身不积极参与政治的话。

第二种趋势具有取得明显的巨大好处的机会。但是只要过一段时间，各共和国就会明白，中央对它们来讲是必要的。说实在的，它们始终是明白这一点的，对它们来说问题只是为自己争得一些新的机会。

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构成体，甚至像欧洲联盟这样的自由邦联都不能没有自己的中央。因此第一种趋势也逐渐“衰弱”，但仍生存下来，而且最终也不会感到特别大的委曲。具有现代眼光的经济工作者是懂得这个道理的。

接着，在90年代，由于原先的意识形态的平衡状态遭到破坏，力量的分布和利益的角逐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意识形态的垄断已一扫而光，它的教条式的定理也都被推倒殆尽。逐渐加深了对这样一个真理的认识，即我们的灾难、危机、弊病和偏见，都是由于强迫接受的世界观造成的，而这种世界观截断了进行科学分析和郑重决策之路。

同时，仍旧需要精神上的引路人，因为社会在心理上仍然没有什么多大的变化。一个具有寄生心理和大量不能摆脱思想束缚而且内心深处没有独立见解的人的社会，没有引路人是无法生存下去的。现在谁能提出适应这种需要的意识形态引路指南，谁就能在正在进行的对抗中取得政治上的优势。

随着事态的发展，在苏共内部明显地分成了三派：改革派、保守的现代化派和民族主义的布尔什维克派。

民族主义布尔什维克派在第 19 次代表会议和 28 大期间就已经表明破产了，可是仍继续拼命挣扎，尤其是在权势机关里。原来民族布尔什维主义早已被人有组织地大肆鼓吹，而且各共和国机构里表现得最为强烈，不过还未达到到处都采取荒唐形式的地步。在重建了三头执政体制的地区和共和国中，新民族社会主义完全能够给那里的三头执政体制既提供新的意识形态上的论据，又提供新的合法性和掩盖利己主义言行的新幌子。

民族主义布尔什维克派曾对俄罗斯的命运起过罪恶作用。这里应该提示一下，民族主义布尔什维克们曾掀起过多么声势浩大的运动来反对那些不赞成成立俄罗斯共产党，认为它是破坏联盟关系稳定的因素的人们。现在，他们却在一旁寻找促成联盟在混乱中瓦解的罪魁祸首。这正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口是心非和歇斯底里般地狂吠的习惯做法。

保守的现代化派，它的成员是拥护渐进型小改小革的人物。这种改革依靠的主要是原先的机构和机制，而不是新机构和新机制。

换句话说，这一派人并不反对天上的仙鹤。甚至也不反对抓到它，可是要让他们把手中的小山雀放掉，那是绝对不愿意的，也害怕放掉。^①在客观上，这种立场最符合中央经济和行政机关以及那些不走任何极端的地区的统治势力的需要。

温和的改良派，这就是进行最初改革的那批人，他们自己感到害怕或者因别的什么人或什么事而受惊恐，不敢有大动作。按传统的政治标准，他们应属于社会民主党这一派，尽管他们不认为自己属于这一派。

^① 俄罗斯有句谚语：“不要你答应把天上的仙鹤给我，只要你实在给我一只小山雀”（喻言要实在能到手的小东西，而不指望拿到没有把握的大东西）。而这里指保守的现代化派二者都要。——译注

这一派人留在苏共党内，这就注定了他们要经受困难的考验。他们处于形式与内容相矛盾的困难境地，然而始终冒着遭到与苏共同命运的风险，尽管他们在党内受到极其残酷无情的排斥。而这种残酷无情的排斥有时很难用健全的思维来解释，因为他们客观上是支持党继续生存下去的。

改革耽误了很多年。如果改革能早一些开始，民主热情的浪潮会更高涨，而主要的是这个浪潮在思想上会更单纯一些。那时对不同意见的压制和社会的停滞不前几乎扼杀了社会理想和信念，产生了冷漠、愤世嫉俗和道德沦丧。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民主浪潮犹如拍岸的激浪，它既带来干净的海水，也带来污秽的垃圾。

但是，也有主观上的因素。改革也同任何上层所采取的行动一样，从内部来讲，简直很难使本身在民主化方面走出决定性的一步。

其实，任何激进的改革一开始就应该考虑自己改革的预先设想和时间表将会被推翻。生活这个主人会提出自己的速度、自己的逻辑、自己的事件先后顺序，会暴露自己的任性和失误，会显示出是悲剧演员还是喜剧演员，是英雄还是掘墓人来。实际上发生的情况也正是这样。

苏联和俄罗斯改革的经验是独一无二的。这是性质最激进的改革的第一个实验，而这些改革是要过渡到新的社会制度的改革。但是，由于这个过渡时间会拉得很长，它充满了政治投机和道义投机、法律上的不确定性和不合理性，而各类骗子就会猖狂地利用这一切。

三

期望与现实 期望是一种心理现象，它同人的需要不是一回事。期望不是确定人的动机的直接理由，它起的是另外一种作

用，即期望履行某种内在“坐标系”的职能，这种坐标系有助于确定那些东西在意识和行为中处于优先地位。

在改革之初，由于对社会主义及其“成就”和潜力估计过高，用惯常的权威主义方式提出社会发展任务，因而期望定得过高。正是在这种心理环境中才有可能产生其基本原理都是空想的而从历史角度看又是不能避免的加速战略。

加速战略的目标不是进行可能使社会顺利发展的彻底的社会改造，而是设想去完善制度，消除它的特别不能让人容忍的表现。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意见是：只要打开某些“水龙头”和相应地关掉某些“水头龙”，换掉一些部件和修补一些部件，一切事情也就会正常运转了。

期望总是伴有过去的那种规范化的宿命论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只要某种东西看来是合理和有益的，那它必定是站得住的。

这种观点至少有两大毛病。

第一，它没有对自己反问一下：究竟为什么某种东西会是最合理的？对此有什么根据？是什么东西证明改革从一开始就是正确的？在最初的前提中哪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现自己不够可靠？

这样一些问题，这样一些疑问，是应该对自己提出来的。

第二，规范化的宿命论观点实际上是把对全社会将来的好处同对具体的人的目前好处等同起来。

但事情远不是这样的，生活中存在的常常是相反的依从关系：社会明天的好处要求人们今天做出牺牲。改革之初，社会上有相当一部分人希望变革，并表示愿意为变革采取某些行动。究竟是哪些行动呢？

当然，有人说，变革的实质在于必须唤醒人的首创精神，可是当时为唤醒人们的首创精神既没有在经济上，也没有在政治上打好基础。

各项改革姗姗来迟，而且往往裹足不前。

只有公开性开始了自己的清扫工作，还有对外政策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的性质。

我讲这些错失掉的机会，决不是责备别人，而首先是为了牢记自己的失误。

在任何一个需要历时多年的大规模社会变动过程中，出现低落和上升以及某种周期性都是不可避免的。改革有涨潮，也一定有某种形式的落潮。

民主派如果不是搞一时的权宜之计，他们必须为自己准备“第二梯队”。应该关心把改革的光谱变得尽可能更全面一些。这方面的目光短浅实是奇灾大祸。改革让自己陷入了这样的境地，改革的决策好像被比改革当局更左更激进的势力从手中夺走了。这样一来，“改革事业”越搞下去，本身也就越孤立，因为它没有社会上的和党内的支持力量。

这里我也感觉到了自己的过错。我缺乏刚强性格和贯彻始终的精神，而在某些方面还缺乏政治意志力。

生活本身要求在党内划清组织上的界线。我知道，很多人把这视为摆脱政治危机的出路。想走这一步也同我的积极参与有关。我痛苦地衡量过这个抉择的难题，但是每一次在戈尔巴乔夫面前不好意思说出口的感觉都占了上风。结果是，我似乎抓到了主动权，却又把它放弃了。

我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在获得思想自由和否定烦琐哲学的基础上去增加自己的理论知识。实际上，我的理论思想继续在早在60年代讲述的那些思想概念的范围内转圈子。当时曾有过现实的可能性去组织有创造性思想的学者参加较活跃的理论工作，遗憾的是，没有能这样做。

我从中看到了自己的理论修养不足，大部分时间忙于日常工作 and 起草各种官方文件。而且也远不是所有学者都对理论领域的

转变有所准备。有一次我请两位院士写一篇关于合情合理地对待商品货币关系问题的文章，他们倒是同意写了，遗憾的是文章没有写出来。如果不是害怕，那也是胆怯在使他们苦恼。

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里，没有进行改革的东西，其数量大得惊人。把在任何情况下（在有自由市场的条件下或没有自由市场的条件下，在进行广泛改革的框架内或绕过这些改革的条件下，在改造计划的范围内或同改造计划没有任何联系的情况下）都必须做的事情，常常拖延下来。但是也必须客观地去理解改革所遇到的代表旧体制利益的纵深梯次配置的那些机构的最大抵制。

如果回想一下我国最高领导层的人员构成情况，那就能发现那里没有一个“从下面上来的”改革派人物。追求名利和权力分配的事都只是在最高层权力机构内进行的。

例如军工企业军品转民品生产的工作多半是由一生奉献给武器生产和军备竞赛的人们在负责，农业改革是由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不屈不挠的拥护者和集体化的“吹鼓手们”在领导，而整个经济则是由军工集团的代表们在掌握。

我并不怀疑他们中间很多人个人都是正派的，但是他们客观上没有做好进行彻底改革的准备。

总的来说，改革打破了那种成为社会崩溃催化剂的一潭死水般的均势状态。但是不可置疑的是，大家对社会保守主义的程度和深度缺乏充分的估计。

改革没有能建立起一套对所有愿意立即走改革道路的人给予支持和保护的制度。家庭农场主、手工业者、企业主和租赁者至今仍处于不得不去克服由那些怀念旧时代的官吏们制造的难以置信的种种困难的境地。

实际上，在经营管理、所有制关系和商品货币关系等方面，需要进行一场彻底的革命。从客观上讲，通往这场革命的道路不

可能是轻松的：军国主义化的国家垄断体制会步步为营地抵制各种改造和改革。

是否能把宣布加速战略、采用行政手段进行反酗酒斗争、建立国家验收制度、成立国营生产联合公司、通过国营企业法以及金融制度改革等等看作是改革的失误呢？

客观上这些是失误，而且其中有些是重大失误。

但是，为什么会是这种结果呢？

这是因为高层管理机构仍旧是原来的，他们以老的眼光来看问题，并企图好像是要把“纵欲同祷告”，即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结合起来。在这种条件下，似乎应懂得那些用传统的方式方法作出的行动是白费劲。他们理解不了，当然，也就糊里糊涂地过来了，就像反酗酒运动中发生的情况那样。很多人，其中也包括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雷日科夫，都反对这种骑兵袭击式的反酗酒运动，可是利加乔夫的“戒酒”主张取得了胜利，不过它导致了更加厉害的酗酒。

提出粮食、住房和大众消费品三个问题，这是正确的。

粮食问题仍停留在议论上，因为没有认真着手抓整个农工生产基础设施（收割、运输、储存、加工）现代化的工作。所有制和经营管理的形式也没有改变。要是做到了上面说的一切，今天也就不会有苦恼了。

住房问题没有强大的建材工业，解决住房问题只是一句空话。很清楚的是，不能光靠国家来建立建材工业。可是人们仍按老路走，结果政府轻易断送了它自己批准的住房计划。另一点也是清楚的，这就是住房不私有化也就根本解决不了住房问题。

大众消费品问题。情况也和粮食问题一样。没有进行企业现代化的工作，尽管对此有着完全现实的可能性。

正是为实现这些目标，西德人向我们提供了一笔 35 亿马克的巨额贷款。

当我还是政治局委员时，有一次我接待了德意志银行领导人克里斯季安斯。他给我讲了有关这笔贷款可悲的经历。他和联邦德国外交部长根舍曾向苏方提出了利用这笔贷款的办法。德方建议由德国的 200—250 家先进轻工和食品工业企业帮助 200—250 家苏联企业在一年之内实现现代化。可是这个建议被拒绝了，借口是这种办法是干涉苏联的内政。

接着克里斯季安斯询问，现在这笔贷款用到哪里去了？因为我不知道，我就马上给戈尔巴乔夫打电话，并亲自跑到他办公室，向他汇报了回国德国银行家的谈话情况。

戈尔巴乔夫给雷日科夫打电话，他不在办公室，又给雷日科夫第一副手沃罗宁打电话，他也不在办公室，最后，电话打到了部长会议副主席斯塔良那里，斯塔良回答说同这个问题没有关系，不过他能猜到这笔钱在哪里。

“在哪里？”戈尔巴乔夫问。

“已分给了各共和国和包括军工集团在内的各部委。”

我想这里就不需要做什么解释了。

遗憾的是，戈尔巴乔夫不喜欢抓十分具体的事情，而正是这些具体事情决定着改革的命运。

事实上经济政策在每向前跨进一步之前，都走进了一座可以意料到的种种错误和延误的“阶梯”。党机关外行的干预在这方面起了致命的作用。

此外，苏共机关还把毫无意义的意识形态问题争论强加给社会，谴责改革派使国家离开给人类带来幸福的社会主义道路，并把国家推到日益凋萎的资本主义。

党政官僚主义者们常常把一些具体做法弄得极其烦琐复杂。是进行货币改革还是进行价格改革？是先稳定后市场还是先市场后稳定？非国有化和私有化是一回事，还是不是一回事？在这些问题上就是这样。

此外，来自文艺界的给党当下手的布尔什维克们，不但过去而且现在仍在令人厌恶地争论，在谁的血管里流着较为爱国的血液，而在谁的血管里流着不太爱国的血液。这也使社会动荡不定，日益分裂。这种思想的吹鼓手们现在也出现于俄罗斯法西斯分子的队伍里了。

1989年到1991年期间，保守派和改革派在中央争斗的结果是谁也没有取得胜利。失去了在转向市场时本来可以利用的极重要的有利条件，即联盟范围内的大市场。在我看来，这个机会在1989年年中以前在某些方面是存在的。只要中央能及时地在经济领域中以及按自愿原则革新联盟的基础上推行有远见的和治本的政策，是可以利用这个机会的。可惜，这两件事中央都没有做。

令人遗憾的是，戈尔巴乔夫在这场斗争中没有明确的立场。我知道，他对当时的形势也有过痛苦的思考，但是他没有能克服旧体制和原先那些人的压力，因为这是现实的压力。他辗转不安，常常说一些明显是互相矛盾的意见，今天晚上支持某种主张，而第二天早晨又将其否定了。开始了某种停滞不前和空忙一气的时期。

我记得当时戈尔巴乔夫如何为“500天计划”感到欢欣鼓舞，但同时我也记得他受到多少疯狂的攻击。有人威胁要辞职不干，有人公然恐吓说经济要崩溃，还有的是散布大量假消息造谣惑众。有人不厌其烦地硬要他相信，如同意建立经济联盟主张，必定会导致政治联盟的瓦解。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的立场在这方面最为阴险。他骗取了总统的信任，所以他能够蒙蔽总统，居心叵测地玩弄假情报，而后来出卖了自己的恩人。

戈尔巴乔夫向反革命势力作了妥协，而这在客观上导致了他在1990年秋就丧失了权力。

也错过了通过成立总统委员会而造成的一些机会。首先，总统委员会仍旧只是稍稍有些变化的以前的那个班子，而且由于新人（保守派多于改革派）的加入已变得力量薄弱。其次，总统委员会没有发挥作为咨询机关和在解决特别复杂敏感问题时充当某种“调停者”的潜力。

在总统委员会开会时，当问题讨论得特别激烈时，戈尔巴乔夫常常会宣布说：“这里决定问题的是总统而不是委员会！”好像改革派想要夺总统的权似的，可是正是改革派在为改革的命运发出警告。

苏共中央政治局感到总统委员会是对自己的威胁，因此也就把它“枪毙”了。

总统走上了妥协之路，他是这方面的高手，可是这一次的妥协却是自杀性的妥协。

复仇势力还看到了夺回失去阵地的一个机会。党政机构和惩罚机关的胆子大了起来，而人数众多的官僚们认为这是暂时和局，这使得他们可以逍遥法外地去张罗自己的事。

正是在这个时候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双重政权局面：总方针是搞改革，许多权势机关进行的实际工作却是搞复辟。

我重复一句，所有这一切导致了1990秋的经济报复，由于旧机构的作梗，曾为摆脱困境提供机会的“500天计划”被扼杀了。陈旧的东西获得了胜利，这也就促使军工集团、强力机构和苏共领导于1991年8月发动叛乱。

第二件延误的事是稳定卢布。市场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能行动起来，这就是卢布基本上稳定坚挺。否则的话走向市场就没有任何意义。应该早在1985年，甚至不管同改革政策的关系如何，就开始使卢布稳定，而不让政府去随意摆布卢布。但是没有能及时认识到，企图根据“消耗量”、“自筹资金”、“经济核算”等等范畴去思考经济现状及其前景的做法，只不过是理论上和心理

上使用停滞经济的一些范畴罢了。

如果在对外政策上提出“使核对抗人道化”，“以文明方式打原子战争”之类的口号的话，情况也会完全一样。

要么是正常经济，在这种经济中根本不可能存在上面列举的那些概念；要么就是病态经济。

今天，我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难道从纯“技术”观点来看，在向市场过渡问题上一开始就没有简单化的认识吗？

我知道，在实践中这种想法为得到承认曾克服了多少困难，而对那些建议坚定地走向正常经济的人又有过多少愤怒的攻击。

但在回忆过去时代我不能摆脱这样一种感觉，就是当时曾把向市场过渡看作是一瞬间的事，例如说“从19××年1月1日起”走向市场。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在实现这种过渡的过程中必须有，而且客观上也不可避免地会有不同的阶段：不论是从市场关系渗入经济的深度来看，还是从市场将要扩及的范围和将以何种先后顺序去“占领”这些方面来看。

按我的观点，应该从商业和农业开始实行市场关系，让农民和商人去充分发挥首创精神。

是什么给予改革最大的打击和最大的阻碍？

主要是没有从根本上转向消费品市场，这就是预先决定了将来要发生灾难，包括财政灾难。政府未能预测到大幅度减少商品储备造成的后果，也没有能够当这个后果已达到极危险规模时作出迅速而有效的反应。

这些年，国内贸易额的增长靠的只是涨价。没有对工业进行结构性改革，因此第二部类工业产品的比重仍旧停留在曾使经济改革陷入困境的那个水平上。直到1990年（包括1990年在内），国防工业总产值继续大幅度增长。政府节约资源的政策以彻底破产而告终。在保持第一部类工业产品优先的情况下也不可能有别的结果。

在减少或哪怕是限制对计划亏损企业和生产单位拨给补贴方面，实际上什么工作也没有做。对农工综合体尤其是如此。

直到今天，仍没有对进口采购和利用外债与贷款的做法进行公开分析，没有对进口的项目孰先孰后的做法进行变革。进口政策完全被部门和集团的利益牵着鼻子走。反改革势力使出浑身解数，旨在不让国内的商品匮乏现象有所缓和。

这种做法的目的纯粹是政治性的：不让改革派有哪怕是一件对人民实实在在的好事可记在自己的帐上。相反，采取一切可能手段，最大限度地唆使人们反对改革计划，宣布改革和改革派是使人们受苦受难的罪魁祸首。

令人遗憾的是，在1991年8月以后头几个月的政治生活中，新上台执政的年轻政治家们搞错了历史的靶子，不仅对阴谋分子，而且也对1985年浪潮中出现的那一批改革派进行了激烈批评。新的革命的幽灵非常有诱惑力。

当新政府感到反改革势力确实在抓权时才开始觉醒，但为时已晚。反改革势力不仅掌握了怠工战略，而且掌握了旨在分裂民主派队伍的策略。他们还学会了在政治上做变色龙的本领。

在结束这简短的评述时，应该讲一讲迄今为止阻碍改革和使改革变形的主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这就是财产。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政治斗争都围绕着财产进行的。只要不属于任何人的（即国有的）财产的命运不解决，是不会有经济稳定和政治稳定的。

只有出现所有者之后，才可能建立起正常的经济关系。目前还继续存在着假关系，这种关系在经济上是虚拟的，而实际上是职务上的关系。它的基础不是占有财产，甚至也不是支配财产，而是随职务带来的那些形式上的和实际上的权利与可能性。

长时间以来，社会主要是按照惯性和根据给懒汉以最大方便的原则运转的。发展战略的目的应该是建立广泛的社会激励体

系，应该把所有的“自身价值”无一例外地都看作是保证人过体面生活的手段。

人们会问：从前是否可以做到这一切？

或许有的可以做到，但远非都能做到。

只有从历史的角度，才能对任何现象和行动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社会在很多问题上还没有做好进行根本变革的准备。这是一个由强大的党统治的社会，而这个党又浸透了教条，得了意识形态不治之症。

当1986—1988年期间提出关于家庭农场、市场经济、私有制的具体建议的时候，可以想象权势机关是怎样愤怒地反对这些建议的。

教条主义局限性和当权者的刚愎自用的程度如此之高，以致对任何新生事物都造成了窒息的环境。要作出灵活的决定，需要勇气，同时还需要谨慎。

现在大家都是勇敢的人了，而在1985年有多少勇敢的人呢？

第十二章 是失败吗？ 不，是胜利

改革派主张以人道主义、通情达理、经济效率和道德健全等原则对社会进行深刻改良。实质上，改革派接受了早就存在于俄罗斯社会运动中的两个趋势中的一个趋势，即与以对国家统治者方便的方式强制性控制生活的趋势相对立的搞改良、树文明、讲博爱的趋势，并将这个趋势推向前进。

在今天的俄罗斯，不同势力对造成政治和经济危机现象的原因的判断各不相同。各类拥护旧体制的人经常说，是民主派把国家弄到崩溃的地步，只要摆脱民主派，我们就能过上人的生活。

那么，改革之前，是谁不让过人的生活？是人民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分子？是间谍？是危害分子？是犹太人？是机会主义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究竟是谁？



透过当前的政治纷争来回顾一下人们（特别是俄罗斯共产党的前主人们、布尔什维克党报和反动的文艺刊物）是如何凶狠地专门迫害民主力量的（而且现在仍在进行这种迫害），将是不无益处的。

最早使我对改革能否正常结束产生重大怀疑的，是苏共1990年夏天的代表大会上大多数人的立场，我感到反动派的力

量从组织上、思想上和心理上都动员起来了。出现了反革命的预言家及其可能的“领袖”。

苏共领导宣布说，党已跳出战壕。说得不错，这表现为向民主和民主派的疯狂进攻，会同特工部门有组织地迫害所有起来反对我国军人官僚专政的人们。

为了弄明白这一切他们是怎样做的，我举一个例子就足够了。1991年3月，民主力量举行了反对联盟政府的政策，同时也是支援叶利钦的群众集会。实际上这是俄罗斯总统大选前的一次集会。

但是，请你们看一看莫斯科民警局行动处处长在秘密报告里关于游行示威者的行动是怎么写的。

“游行示威的人成群结队地走上车辆通行的路面，故意把小孩和老人推倒在行进中的汽车轮子底下不让汽车（其中包括急救车）通过，以此来阻挠恢复交通。”

你们看，这些民主派是些什么人！他们竟然把小孩和老人推倒在车轮底下去！

这种手法我领教得太多了。

到时候我将公布一批能展示布尔什维克们这种卑劣伎俩的文章、传单和发言摘录。但是现在我只想提一下与我写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改革的书稿有关的一段往事。当我在苏共 28 大上刚提到这部书稿时，就纷纷有人起来揭露这部书的内容了。原教旨主义者则是气得火冒三丈，尽管他们对书的内容还一无所知，甚至连我自己对这本书的情况也还不完全清楚。

与此同时，有人编造了一份好像是我向代表大会的青年代表作的发言。

我从侧面得知，部分青年代表因见到苏共领导的政策没有任何前途，曾探讨成立革新派政党的可能性。我也曾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像通常发生的那样，当苦苦期望的事一旦来临时，往往

会感到很突然。

这一次也是这样。我开始踌躇起来，拿不定主意，可是正像俗语所说的，火车却已开走了。为此我曾不止一次地责备自己。

说实话，当代表大会上开始对我搞这阴险的把戏时，我起初还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因而有点不知所措。而最使我惊诧万分的是那封在代表大会上广为散发的、说我向青年代表们讲话的匿名信。

整个一个夜晚我深深地陷入思索中，我提笔开始写在代表大会揭露这场造谣把戏的发言稿。我得出肯定的结论，所有这一切都是事先策划好了的，可是我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我还考虑了退出代表大会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的方案。但是，不知怎么的这个晚上没有一个人来找我谈谈，帮我正确分析形势。我感到孤立无援，好像与世隔绝，心情沮丧空虚。

很遗憾，我只是后来才知道，策划这个阴谋的竟是苏共中央组织部的领导干部和国防部的将军们。他们的意图是“向改革派挑战”，从情感上激化气氛，把党领导层中热衷改革的人清除出去，搞掉戈尔巴乔夫和夺取政权。

我不知道民主派当时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来阻止这一切发生，我对此不敢肯定。

不过，1990年7月9日在代表大会上发言时，我还是说出了我关于这次挑衅所要说的全部意见。我在结束发言时说：“当然，所有这一切在我心上留下了伤疤，但是我要对这场配合巧妙的运动的策划者及其幕后指挥者说：你们能缩短我的生命，但要我沉默不语则永远办不到！”

在这喧嚣一时的恶意吹毛求疵的环境下，支持、关心和理解对我来说是尤为珍贵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有必要公布这封由我国一批著名文化人士署名的《公开信》的理由。这封信是在1990年3月，即苏共27大召开前几个月送交报刊的。

呈送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同志
尊敬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我们认为有责任让您了解我们这封送给《真理报》的致我国社会公众的公开信，我们认为这封信在今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希望得到您的理解和大力支持。

尊敬您的下列作者

1990年3月20日

送《真理报》编辑部

公 开 信

我国发生的事件表明，我们感受到的最尖锐的短缺之一，是人才的短缺，是卓越人物的短缺，是思路广阔而稳健的社会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的短缺。在思考什么是这种短缺的根源时，不得不痛苦地承认，我国社会生活的最悲惨最古老的传统之一，就是对本国权威人士的吞噬。

因此有必要提一下特瓦尔多夫斯基^①这个名字。岁月表明，不仅停滞年代的领袖们，而且他们手下那些现在还健在并十分擅长推翻一切打倒一切的文艺界的头头们，在这位伟大的俄罗斯诗人及其心爱的产儿《新世界》杂志的悲惨命运中起了致命的作用。

^① 特瓦尔多夫斯基（1910—1971），苏联俄罗斯诗人、社会活动家。苏联党员（1940起）。诗作有：《春草园》（1936）、《瓦西里·焦尔金》（1941—1945）、《路旁的人家》（1946）、《山外青山天外天》（1953—1960）。曾任苏联文学杂志《新世界》主编（1950—1954、1958—1970），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16—1966）。——译注

在这个行列里还有祖国的伟大公民萨哈罗夫^①院士的名字。同样是那些人，那些势力用同样的方法迫害他。只是萨哈罗夫院士猝然去世才中止了在《军事历史杂志》上发表肮脏的文章。

但是推翻一切的大军没有就此罢休。现在轮到新的名字——雅科夫列夫了。有一帮人把搞臭和在各种讲坛上痛骂这位大国务活动家为自己的目的。为此他们动用不少以反对改革著称的报刊。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全体会议、小有名气的“纪念”协会的集体以及明显具有法西斯色彩的传单统统协调一致地服从于一个目的：推翻真正的权威，为平庸无能之辈扫清道路，可是由于这些人，我们国家几十年来受尽了苦难，陷入了目前所处的困境。

雅科夫列夫的威望是全国和全党眼看着形成和确立起来的，用不着再进行特别的鉴定。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几十年来平凡的领导人总是人云亦云或照本宣科，而我们认为雅科夫列夫却是个才华横溢的人物，是位具有独创思想、坚持原则立场的人，他从来都没有背叛过原则立场。

不能不提到他作为历史学家、政治局的斯大林主义受害者平反委员会领导人的工作。在我国对外政策所取得的得到公认的成绩中也有他的一份功劳。最后，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从建设联邦国家开始，雅科夫列夫的威望不仅是在俄罗斯本身，就是在各共和国（包括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内，甚至在全世界都得到同样高度的评价和认可。

在这种条件下，我们能容忍肆无忌惮地迫害这样的国务活动家吗？我国人民、社会舆论和政府当局能对这种迫害不予置评和采取对策吗？

我们的目的是，告诫社会舆论，在这国家最关紧要的时期，

^① 萨哈罗夫（1921—1989），苏联著名核物理学家，有苏联原子弹之父之称。苏联科学院院士（1953年起）。——译注

破坏已经形成并得到认可的那些权威人士是极其危险的，它会导致无法预测的后果和混乱。

Б·奥库贾瓦、О·叶夫列莫夫、П·利哈乔夫、А·阿达莫维奇、Г·巴克拉诺夫、Б·劳申巴赫、Ю·马尔钦基亚丘斯、В·贝科夫、В·贝克曼、В·戈利丹斯基、Г·德鲁采、В·孔德拉季耶夫、Ф·伊斯坎德尔、В·库德里亚夫采夫、П·杜金采夫

1990年3月20日

我由衷地认为对我的评价过高了。但是，问题不在这里，这封信根本就没有刊登出来。对我的各种诽谤诋毁仍继续像潮水般涌现在布尔什维克和法西斯性质的报刊杂志上，顺便说一句，这没有引起我政治局同仁的任何反应。

戈尔巴乔夫一次也没有提到这个问题，虽然我盼望他谈这个问题，因为在我看来，在道义上我有这个权利。

与此同时，反对改革的斗争越来越厉害、激烈。到1990年秋，这场斗争已达到特别嚣张的程度，结果复仇主义者得以扼杀了“500天计划”。反动派感到如愿以偿，重新振作起来。甚至他们的头头们走路的架势也变了，昂首挺胸，两眼发光，神气十足。

苏共中央政治局加强了对解决干部问题的影响，中央组织部表现得特别咄咄逼人。中央委员会和军工集团的产儿——“联盟”议会党团也大肆活动。苏共的很多地方党委也亮出了露骨的反对改革的立场。

将领们和军工集团的首脑们转入了进攻。克格勃机关立即恢复了自己本来已经消逝的职能——监视、窃听电话、捏造诽谤民主运动领袖们的各种材料。克格勃通过自己在新闻界的代理人在官办的党报和文艺刊物上发表必要的“研究成果”。

有一次一位我认识的在报界工作的克格勃上校打电话告诉我说，正在对我策划“交通事故”，我立刻将此事告诉了克留奇科夫，可是他开始对上帝发誓，说不可能有这类事情。我还向他讲了有人窃听我的电话和有人对我不太礼貌的情况，他神经紧张起来，但仍又发誓说不可能有这类事。我也把这一切向戈尔巴乔夫作了汇报，他好像不相信似的。

后来，我在报纸上读到了对我在电话里的一些谈话的窃听记录。请看，这就是官僚们的全部道德。

拥护国家沿民主道路发展的人被宣布为“搞破坏的势力”。在中亚、外高加索和波罗的海地区开始了别有用心挑衅活动。

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刊登了“这股势力”的“代理人”名单，也就是说已在预先准备今后受审判的人选，而且是按1937年的那个脚本进行导演的。

又散发出过去的死尸的气味来了。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曾给地方下达指示，要他们组织集会、集体上书或作出决议和发表文章，要求惩治党内改革派和整个民主力量。

议会党团“联盟”提出解除戈尔巴乔夫总统职务的要求，在1991年4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的撤掉他总书记职务的要求，毫无疑问，都证明了极端保守势力越来越刚愎自用了。

苏联总统遇到了组织良好的情报的压力，施加这种压力的目的是造成怀疑一切的气氛。这种情报的核心就是造谣。不得不表示遗憾的是，这种假情报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起到了高度破坏作用。而策划和协调这种情报的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是一个小人，爱说假话，口是心非，当初他欺骗了很多人，其中也包括我，但最终跌进了他本来为总统和其他人准备的陷阱里。

总的看来，戈尔巴乔夫在某个阶段上曾认识到，他“班子”

里很多人的行动违背了他们当初表示忠于国家、忠于他本人的誓言，与改革的战略背道而驰。这些政府内的和党内的政治野心家非常清楚，一旦签署联盟条约，他们就会失去职位和权力，就会被赶下政治舞台。

苏共领导人的社会思维的局限性和他们历史性的傲慢在意识形态和理论原则上的政治盲目性，把党带上了自杀之路。可是，苏共机关在死亡之际仍给改革带来不少灾难，使变革受挫，举步维艰，使民主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变了形。

关于反动派的策略，我已经写过也讲过。要看清他们的策略本来是不难的，因为他们做一切事情都是为了炫耀，为了自夸，好像他们已经取得了胜利似的。但是，这种过于自信也使他们大出其丑。

形势越来越紧张，人们越来越神经过敏，在政界让你喘不过气来。领导们抛开自己的工作，把最大的注意力集中在与国内现状无关的事上。未来的叛乱者和布尔什维克报刊却越来越大声叫嚷帝国主义阴谋和中央情报局的罪恶勾当等等。

看来必须采取某些措施，以抵制布尔什维克垄断一切的局面。是建立新的党还是建立几个党的联盟？总是要做些什么吧！

当1991年4月戈尔巴乔夫正式访问日本时，我曾给他写了一封信，讲了我对当时形势的全部想法。下面就是这封短信的内容。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非常遗憾，由于在日本应酬繁忙，没有能找到同您面谈的时间。可能在面对面交谈时能坦诚相见，比较容易向您传递我那些越来越强烈地缠绕着我的想法和苦恼。实际上要说的是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我早在1985年年底就给您写信讲过此事，也就是关于建立两党制的问题。在物欲横流和政治文明低下的今天，这

个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来得迫切。业已清楚，在现今条件下两党比一党好，也比一百个党要好。

据我所知，而且从分析中也可得出这种预测，这就是有人正在准备来自右的政变。某种类似新法西斯制度的东西即将到来。1985年的思想将遭到践踏。您，还有您的战友将被革除出教门。这种悲剧的后果甚至是无法想象的。

出路（在政治方面）只有一个：使所有健康的民主力量联合起来，成立一个主张社会革新的党或运动。

纲领是：以1985年的思想为基础进行改革，建设一个民主法治社会即公民和睦的社会，捍卫在自愿基础上成立的统一联盟。

策略是：

——维护总统制；

——同所有政府机构（中央的和共和国的）保持等距离，不分亲疏；

——团结除极端激进政党外的所有民主政党，并逐渐瓦解极端激进政党；

——依照宪法同苏共进行竞争。

所有这些将会使国内的形势得到改善，使斗争具有新面貌，提高政治文明。

我相信通过这个途径将会造成一个有利于改造的新的政治形势。

我深信健全的理智会成为政策的核心。

尊敬您的

亚·雅科夫列夫

1991年4月18日于东京”

我觉得，戈尔巴乔夫认为这些警告太感情用事，甚至可能是

太惊慌失措。有一次他对我说：“亚历山大，你夸大了他们的智慧和勇气。”这是在说我提到的阴谋。

事不宜迟。组织在这危急时刻能与苏共竞争的政党的问题已经到了该着手解决的时候了。我确信，如果事态发展正常，这样的改革派的组织是能在大选中把苏共机关的头头们赶下台，组成以民主派为主的政府的。

当时起草了一份政治声明，在声明上签名的都是著名的政治家。他们是：波波夫、谢瓦尔德纳泽、沙塔林、沃尔斯基、西拉耶夫、佩得拉科夫等人。我也在这份声明上签了名。我当时曾有过把这个组织叫做民主改革运动的想法。

直到今天我都认为，这个运动是有前途的。可是，1991年的阴谋搞垮了联盟，同时也扼杀了这个全联盟的运动。此外，这个运动的俄罗斯积极分子在下诺夫哥罗德市开了会，没有征求运动的中央领导的任何意见，就成立了自己的俄罗斯民主改革运动。我没有被邀请去下诺夫哥罗德。

同时应该说，这时候实际上我已经靠边站，像过去那样，不再向我通报内部情况。那时我还不知道（尽管已感觉到）克留奇科夫在对我搞陷害，开始窃听我的电话，并将电话谈话内容报送戈尔巴乔夫秘书处。我非常明显地感觉到与世隔绝，这大大地刺伤了我的自尊心。简单地说，当时感到受了委屈，既为戈尔巴乔夫轻信别人对我的诽谤而遗憾，也为自己难过。对政治和政治家们的最后一点浪漫主义的幻想已消失殆尽。

在那些刻骨铭心的日子里，也就是在痛苦的思考、令人苦恼的预感和被迫半赋闲的日子里，头脑中闪现出一幕幕各式各样的回忆和一些迟到的问题。这些回忆和问题都是令人不太愉快的，但是有助于更加现实地去评价过去的事实，去评价那些以前总认为是偶然的事实。

例如，尽管我掌管意识形态和国际事务，可是我是一次也没

有“被委托”在纪念列宁诞辰或十月革命的隆重大会上做报告的唯一政治局委员。我也一次都没有主持过书记处工作，更不用说主持政治局工作了，而我的政治局的同仁们几乎都担任过这个角色。

我现在倒是为过去没有发生这样的事而感到高兴，可是那时对这一切的感受却完全不同。在这方面是不会事出无因的。

其他事情也一件一件在我脑海闪现出来。

曾正式委托我就卡廷流血悲剧事件同雅鲁泽尔斯基保持接触。我曾不止一次地询问党中央总务部，关于这个问题政治局档案室有什么文件，可答复是千篇一律——什么文件也没有。

有一次，谢尔盖·斯坦克维奇要求同我见面并告诉我说，世界史研究所的列别杰娃教授偶然碰到有关押送波兰人的部队的档案资料，其中就有枪杀 1.2 万多波兰人的文件。我立即会见了这个研究所的所长丘巴良教授，他给我拿来了这些文件。

这时候我已多少变得比较谨慎了，而且也懂得了中央机关的习气，所以我将这些文件的复印件（只印了 5 份）分送给不同的机关，然后再给总务部瓦列里·博尔金去电话，告诉他有关这些文件的事。

他的反应出人意料之外。他非常焦急不安，要求立即把这些文件送给他本人。可是我已通过办公厅将这些文件送去，而办公厅已在这些文件上盖上了所有必要的戳子。秘密也就再也保不住了。

可是，博尔金的坚决要求和惊恐不安再一次使我坚信在政治局档案室有这些文件和材料。

1991 年 12 月在移交档案时，戈尔巴乔夫向叶利钦转交了一封公文，打开档案袋一看，里面有谢列平和谢罗夫的批条和关于枪杀波兰军人和平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平民（共 2.2 万多人）的材料。这说明这些文件曾向戈尔巴乔夫报告过。

此时此刻，我不好意思去看戈尔巴乔夫。他板着脸坐在那儿，好像关于这个问题从来就什么也没有谈过。

直到今天我也不明白，为这些文件保守秘密对戈尔巴乔夫有什么意义。如果公开它们，那么无论是政治上还是道义上戈尔巴乔夫都将是这个大赢家。

有关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秘密议定书的文件也发生了类似情况。

当人民代表大会任命我为调查这个问题的委员会主席之后，我们翻阅档案，但是没有能找到文件的原稿，尽管知道有这些原稿。

我感到，这些文件是在中央总务部的某个部门，但我无法证明这一点，虽然从博尔金的眼神和微笑中可以察觉到，他是知道这些文件的。人民代表大会终于在第二轮表决时批准了调查委员会根据这些文件的复印件写的报告。正义取得了胜利，同时也证实希特勒和斯大林早在战前就在瓜分别国的领土了。

过了一段时间，当我已经在以戈尔巴乔夫为主席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理论研究基金会（顺便说一句，在此之前我是这个基金会的主席，是我自愿让给他的）工作时，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给我打电话说：“你知道吗？秘密议定书的原件已在政治局档案室里找到了。”

这使我感到非常厌恶。怎么会是这样呢？我曾就这个问题多次直接问过戈尔巴乔夫，可是得到的回答都是千篇一律——没有这样的文件。

原来戈尔巴乔夫知道这些文件。这里又产生同样一个问题：隐瞒这些文件对戈尔巴乔夫来说有什么意义？

直到今天我也无法明白这种不合逻辑的怪现象。

就我个人来说，我感到受了莫大的侮辱，虽然在政治上抱怨是愚蠢的。在上面说的两种场合下，我都被置于极端难堪的境

地。这些文件本来就有，可是有人把它们隐瞒起来，不让一名政治局委员知道。

最终这一切却都水落石出，无论是卡廷事件还是秘密议定书都真相大白，传遍世界。

我再重复一遍，直到今天我无法弄明白这个问题。当人们问我为什么离开戈尔巴乔夫为主席的基金会时，我回答说，这是出于道德上的考虑。这是我第二次与戈尔巴乔夫分手。

早在1991年7月末，我就提出了辞呈。在这以前，我曾同戈尔巴乔夫进行多次长谈。说句真心话，同这位与之交往很深的人分手，对我来说是相当不易的。这几次谈话和过去一样，都是同志式的。我试图再一次向戈尔巴乔夫证明大难要不可避免地来临。他不同意我这个看法，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签订联盟条约上。他劝我留下和他一起干，可是至今我仍有这种印象，无论是谢瓦尔德纳泽还是我都已成了他的累赘。他听信克留奇科夫和党机关的假情报，结果不能实事求是地判断形势。至于阴谋分子，他们则早在1991年春天就开始串通，不希望在他们发动叛乱时见到谢瓦尔德纳泽和我在戈尔巴乔夫身旁。

可是，恰恰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正好同他在一起，尽管戈尔巴乔夫对此不理解也不重视。真遗憾！

在我辞职以后，党的领导机关就开始忙了起来，立即给我“立了案”。最终把我开除出苏联共产党了事。

为了看清楚他们是怎样策划这件事的，我这里援引伴随这件事所发的全部文件。

文件 1

苏共中央机关党委书记

我们是莫斯科几个区监察委员会的主席，在读到了在你们那里过组织生活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系列发言和访谈录后，现向

您建议在党员大会上审查雅科夫列夫的共产党员立场及其执行苏共党章的情况。

所以提出这个问题，除了针对他发表的文章以外，地方党员也提出了大量质问。

亚·雅科夫列夫作为原政治局委员，他曾负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并直接参加了苏共 28 大文件和苏共党章的起草工作，可是他常常粗暴地攻击（不是批评）党和代表大会制定的方针。

他在口头上高唱社会民主化和意见多元化，可实际上打着改革的幌子，从假激进的立场展开反党斗争，攻击苏共的思想和组织原则，反对列宁和列宁主义，公然分裂苏联共产党，从而违反了党章。

雅科夫列夫在今年 7 月 2 日《消息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就是最好的证明。这篇文章的标题是《需要新步骤》，他在文章中写道：“我一向主张多党制，而更准确地讲是主张理性的民主的两党制……这就是我为什么同意并支持以民主为导向的运动或政党的主张……”一批包括雅科夫列夫在内的著名政治活动家的呼吁书也证实了他们的分裂意图。呼吁书说：“……至于运动的组织形式，例如组建政党，那么这应由成立大会来决定。”（1991 年 7 月 2 日《消息报》）。

我们知道苏共产党章程第 16 条甚至允许在党内成立派别。可是该文章说的是在民主运动的基础上成立新的政党，而民主运动按其声明来看，它收罗的都是公开的反共分子、苏共内部搞派别活动的人、争取建立企业家社会的激烈斗士以及其他很多靠党的威望成长而现在叛变党的人。

一个把自己同这种乌合之众的运动捆在一起的人，尤其是苏共党员，对他的道德原则也是很难理解的。

在叶利钦、索布恰克、波波夫和阿法纳西耶夫等人退出苏共后，又有人再次企图以个人的权威力量在“民主”的幌子下使一

部分共产党员脱离苏共，使共产主义思想威信扫地。共产党员的这种立场早在1990年4月就遭到至今实际上仍有现实意义的“苏共中央致全国党员的公开信”的谴责。

我们认为共产党员雅科夫列夫身上的共产主义已所剩无几了，只有他以前挂有列宁肖像的办公室墙上两三颗钉子那么多了。发表在1991年4月份的第2期《政治报》上的他对《发展论坛报》（巴黎）的访谈录，是作为共产党员的雅科夫列夫政治上蜕变的顶点。

我们也不能不说到，根据许多共产党员和基层党组织书记的看法，苏共中央机关党员及其党委对雅科夫列夫大量不符合党的要求的言论所持的立场给人造成的印象是，中央委员会机关的党组织不讲原则，没有运用苏共章程所赋予的广泛权力。

1991年3月4日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通过的决议也谴责了这种立场。决议讲：“……苏共中央对那些以自己的行动破坏党的威信，把党推向分裂和组织瓦解的党员，不是总能作出原则性的政治评价的。”（《苏共中央文件汇编》政治书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

首都很多共产党员实在感到困惑不解的是，为什么允许像雅科夫列夫这样的不是促成党的革新而是促成党的崩溃的苏共党员留在党内。例如，在苏共莫斯科市五一区区委扩大的全体会议今年7月2日通过的决定中写道：“第4、鉴于原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从事与苏共党员称号不相容的活动，如亲自参与搞垮社会主义国家和成立以联合反对苏共的政治势力为基础的政党，要求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将他们开除出党。”

我们认为，苏共中央机关党委和党组织成员有充分的理由根据原则来审查对苏共党员雅科夫列夫提出的问题。

我们不希望让他有可能悄悄地退出苏共，而应对他作出严正的评价。

苏共中央机关党组织有权向雅科夫列夫提供建立他梦寐以求的新政党的可能性，但只能在把他开除出共产党的队伍之后。

莫斯科鲍曼区监委主席 Г·帕库洛夫
五一区监委主席 А·雷利希科夫
索科尔尼基区监委主席 Ю·拉夫
列诺夫（苏共中央委员）

文件 2

苏共中央监委主席团常委会关于苏共党员亚·尼·雅科夫列夫违背党章的公开言行的决定 (1991年8月15日)

最近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亚·尼·雅科夫列夫发表了一系列旨在分裂苏共和使苏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的声明。因此，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共监察委员会不断收到共产党员、党组织和监察机关的信函，要求给共产党员雅科夫列夫的公开声明和行动作一个党的评价。

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常委会决定：

鉴于亚·尼·雅科夫列夫的违背苏共章程和分裂党的行动，认为他不宜继续留在苏共队伍里。

将对这个问题的建议发至基层党组织。

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代理主席
E·马霍夫

文件 3

雅科夫列夫（党证号为 00000051）

给苏共中央机关党委的声明

昨天8月15日，我从电台的广播中听到关于苏联共产党作

出关于开除我出党的建议的消息。谁都没有就这个问题同我谈过话。我的尊严受到侮辱，党员的最起码的权利遭到践踏。

当然，这对我来说并非意外，因为最近四、五年来，大众媒体一直对我在苏共中央全会和俄共中央全会上的政治活动进行毫无根据的攻击，而这种攻击在 28 大以后变成了由苏共中央机关统一组织指挥的对我的迫害。

但问题还不仅仅在这方面。

我想提醒社会，在党的领导核心里已形成了颇有势力的斯大林式的集团，它反对 1985 年的政治方针，阻碍我国的社会进步。

实际上这是党的领导违背自己的宣言，正在摆脱党内的民主派，为进行社会复仇、进行党内政变和国家政变作准备。

在这种条件下，我认为再在苏共内部为民主改造事业服务已经是不可能和不道德的了，因此我声明退出苏联共产党。

我的良心要求我这样做。

亚·雅科夫列夫

1991 年 8 月 16 日

顺便说一下，也就是在这一天我写完了论述复仇主义危险的“致共产党员的公开信”。翌日，我同阿纳托利·索布恰克讨论了这封公开信。可是这封信没有能登出来，因为坦克开进了莫斯科。

我将这封公开信全文发表如下：

论复仇主义的危险

(致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这封信不是由于自尊心受到伤害和个人感到委曲而写的。绝对不是！而是由于发生了党的机关及其头头们早就策划的事情。

我在写这封信时，内心感到非常痛苦。可是根据国内形势考虑中央监察委员会将我开除出党的决定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意

义，则更为重要。

对我个人来说，最近一年所发生的事情的意义是清楚的：党的反动领导（在开除我出党时，各中央书记都出席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会议）采取了把民主派清除出党的方针，而逐步在各级贯彻实施；他们希望召开由“机关权势分子”主宰的29大，可是没有考虑到，如果这样，那么这次代表大会将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了。

由此可见，现在的领导应该对摧毁党和使党从政治舞台消失承担全部责任，我个人认为他们在政治上是目光短浅的。

但是，这个进程有自己的逻辑。它来自苏共领导的实际方针。党和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机关权势分子中的复仇势力蓄意阻挠进步性的改革，坚决否定新思维的必要性，迫害那些把社会改革看作我国多灾多难人民有美好未来的希望的人们。

可是上层统治人物不愿丢掉权力，他们进退维谷，辗转不安，甚至连自己作出的决定也不去执行，人为地加剧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形势，疯狂地寻找“牛鬼蛇神”，制造好像是造成当前形势的罪魁祸首的“恶魔”。这使人们坐立不安，惶惶不可终日。

不过，今天“被开除出党的人”不是怪物。现在我们已知道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员，他们曾在不同时候蒙受耻辱，被开除出党和受到迫害，而现今已真相大白，正确的正是他们，而不是迫害他们的那些人。恰恰是他们在当时企图拯救国家和党，使它们摆脱今天落在我们头上的部分灾难和痛苦、问题和困难、荒唐事和失误。

可是与此相反，守旧的人，确切地说是由于掌权而麻木不仁的人，却走上了违背生活的道路。这样做的后果是众所周知的，而遭殃的却是全体人民。

今天，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各级党的领导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有意识地执行一条使党同整个善于探索和思考的民主派隔离的

路线，而与此同时这些人在同沙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大国主义、极端反动黑帮和斯大林主义的活动家和组织调情时，却看不到任何对苏共来说不可容许的东西。

那有什么办法呢，每个人都是由自己选择旅伴的。

但是，认清这种选择的后果是很有价值的。业已形成的最高权势机关不仅抗拒要求革新、自由和民主的任何运动，而且由于武断、非理性思维以及不能遵循正常道德和人权的通行标准，它本身已成了对社会的威胁，成了进步的障碍。不仅如此，这个机关企图唆使人民群众反对改革，反对提倡改革的人。它不但不关心国家的实事，反而让蛊惑人心的宣传盛行，它不但不鼓励创新活动，反而死死抓住已被生活唾弃并且只是给人民带来苦难的老一套东西不放。

在苏共中央本身，尤其是在俄罗斯共产党和很多地方党组织里，正在加速和公开形成新斯大林主义的复仇政治派别。

一系列最近召开的中央全会，党积极分子会议，以及很多党的领导干部在中央和地方，特别是在俄联邦共产党里所发表的文章和讲话都表明，党的领导和党的机关正在急急忙忙动员党员反对民主改革及其传播者，反对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

党政权势机关不但不引导社会公众去关注国家实事，反而把他们推入分裂社会、分裂国家和分裂党自身的毫无意义的意识形态的纠纷中。

所有一切都有把国家推进毫无理由的流血事件新漩涡的危险。

真心实意的选择时刻到来了。摇摆不定的双重意识是最折磨人的，因为在这种场合下，良心已不是人的道德主宰。

我看不到要在任何人面前辩白的理由，不仅如此，我还为我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为贯彻改造社会的政治方针担负一份责任而感到自豪。我仍然认为这种转折乃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符合人民利

益的最伟大事件。

70年来建成了一个对现实的活人漠不关心并且敌视的体制。这不仅表现为数以千万计的群众遭迫害，而且表现为人根本无足轻重，甚至过着最必需的东西也要低三下四地乞求才能获得的日常生活。

我曾相信，苏联共产党会克服过去的沉重包袱，能从国家的专横组织变成一般性的政治组织，并成为能把吞食一切的假仁假义、升官发财、不负责任和妄自尊大拒之门外的民主力量。

遗憾的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后斯大林主义不是仅仅靠恐怖支持下来的，而近几十年则远不是仅仅靠恐怖。

除了精神病院、劳改营和贪污受贿之外，支持后斯大林主义的还有大量神话，这些神话都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总是迎合情性而不去批判地思考；总是满足于自我陶醉而不去清醒地对自己作出评价；总是没完没了地重复老一套的说法而不去对新事物和不知道的事情进行深思；总是满足于精神上的过于自信而不去经常作道德上的探索和追求自我完善；总是迎合盲目服从的懒惰习惯而不去自己独立行动。

这些已成为顽疾的甜蜜神话曾给我们带来多少祸害，由于这些神话整个国家和每个人曾受过多少苦难，以致直到今天我们在艰难痛苦地力求做到实事求是、光明正大和诚恳坦白的时候仍然感到非常痛苦。

我们不是在说历史的坏话，不是在给历史和过去几代人抹黑，不，我们是在力图弄清楚我们自己的真实情况。我们正在不断成长和不断学习，我们对自己的经验和见解已逐渐深信不疑。

最终，党没有实现民主重建，也没有与专制的过去决裂，更没有变成有作为的政治组织。

落得这种凄惨下场的原因在于，几十年以来，逐渐在很多方

面还是有意识地培育了一批首先以暴力（肉体的、意识形态的和精神的暴力）为政治的正当工具的机构、个人和领导人，他们对自己关于现在和未来的看法以及自己的知识和才能狂妄自大过于自信，而且还俗不可耐地相信他们有能力不只是造福于人民，同时能把自己的说法、自己的处世之道、自己衡量幸福的标准强加给人民，甚至认为这是他们的历史使命。

实际上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没有能力改变自己在社会和国家中担任的角色，也无法摆脱酷爱无限度地不受监督因而也就腐败的权力的极其有害的习惯。党僚机关变成了“党中之党”，而且是具有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手段和特权的十分强大而有势力的党。

6年的改革表明，苏共的组织结构和苏共领导的行动使苏共急剧滑向同社会、特别是同社会中的最爱国最积极最有作为的那部分人对抗的地步。

造成了极其危险的局面。越往前走，党的高层就越明显露出它渴望并能够很容易地、迅速地找到同社会上一切最反动势力的共同语言。

党领导层中的保守势力开始同军队、军工集团、国家安全部门的头头们勾勾搭搭，认为他们是保住自己阵地和自己利益的工具。这种共生现象在历史上已是司空见惯，不是新鲜玩艺儿。但是它好像是第一次意味着实际上建立了准备摆脱人民政权机构监督的崭新的影子政权。

开始了对公开性的压制，加强了对民主制度的压力，把它看作是使国家脱离“正确道路”的恶魔。至于总统，那企图很明显，就是要让他充当影子政权的人质的角色。

机关权势分子的联合进攻，导致了国家领导层中的改革力量惊慌失措，甚至精神完全崩溃。专制制度培植于我们身上的恐惧综合症在明显地起作用。唉，要想排除由这种恐惧以及健忘症、

意识形态偏执症和经常蓄意煽起的仇恨心形成的奴隶心理有多难呀！

我很清楚这封公开信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知道，政治上的庸夫俗子将会大叫大喊起来，因为他们经常在寻找机会，以便在即将熄灭的权力篝火旁再一次用跳大神来庆贺胜利。

由权势机关组织的各种“揭发文章”和“义愤填膺”的群众来信将会出现，同时各种帽子会满天飞。

那些多么想展示一下自己的思想“白璧无瑕”的人将会十分卖劲儿。

那些没有“违背”自己观点的人也就是巴尔扎克早就将其称之为“永不犯错误的木偶”的那些人也将大吹特吹，为自己标榜贴金。

市侩们是什么也做得出来的。

我已作好接受这种考验的准备，尽管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我再重复一遍，这对我来说是个痛苦的时刻。在战争年代，我曾见到共产党员的确是冲锋在前，以身作则，视死如归。我也加入了那个党，至今对此毫不懊悔。

曾一度出现过希望——我们这些前线战士珍视这种希望——这就是我们无限信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认为他们将会合情合理地评价人民的伟大功绩，将会走上改革的道路，以确保所有的人过上应有的生活。

遗憾的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只是在1956年闪出一点亮光，但是很快就熄灭了。开始了痛苦而漫长的灾难时期，它把国家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全面恐怖的时代，使民众冷漠无情，失去信仰，口是心非，不负责和假话连篇。

今天，关于国家的命运和生存的问题已经紧迫地提了出来。改革给我国人民自己管理国家事务、走上文明生活的道路和在精神、经济和政治自由的条件下，不卑不亢地生活提供了历史机

遇。

可是，也可能发生悲剧，因为改革触动了上层统治人物的利益，前进的艰难历程已开始变形。如果社会走和平革命的道路，那么党政权势机关中相当一部分人就会选择复仇的道路，选择对抗、分裂和复辟的道路。

20大以来的政治经验表明，党已经不可能摆脱严重的内部危机，无论是精神危机、政治危机还是组织危机。但是，人民和国家已经没有时间也没有可能再来等待这场危机的结束，等待这场危机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必须今天就开始行动，而本来应该在昨天或前天就开始行动的。

需要有一个由建设性反对派组成的运动，这个运动不是集中力量去搞什么意识形态争吵，不是要什么政客手腕来自我肯定，也不是为什么人的野心而斗个没完没了，而是捍卫健全的理性和合理的实用主义，争取通过能在今天和未来使人民和全国生活得到一些改善的决议和法律。

与此同时，最好不要被僵化的结构和传统、教条主义以及对自己特殊而安全地位的习惯死死地束缚住。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

1991年8月16日

唉，我要是早一两年走这一步就好了。

顺便插一句，我能相信开除我出党的这一套做法苏共中央总书记会一无所知吗？如果他一无所知，那么可以合乎逻辑地推测，这时候戈尔巴乔夫本人的命运也早就决定了。如果这个举措是他首肯的，那么关于他为什么对多次警告他即将发生政变一事持漠不关心的态度也就较容易理解了。要知道，提出这些警告的不是街上的算命先生，而是在所有这些艰难惊险的岁月里同他并肩战斗的人们。

布尔什维克的党报，首先是《苏维埃俄罗斯报》和《真理报》成了社会上复仇者的喉舌。

从1990年秋直到坦克开进莫斯科的1991年8月这段时间里，布尔什维克复仇势力表现得极其猖狂，咄咄逼人，在反对新方针的斗争中，军队的刊物表现得特别残酷无情，因为它们想用谎言和对民主派的仇恨来毒化它们的士兵与军官，而它们的活动则是由陆海军总政治部操纵的。

没有必要在这里援引和列举文章作者的大名，因为在图书馆里可以找到他们。所有这一切将来都会公布于众，而曾歌颂仇恨的人也都将会被逐一点名。分裂社会的歇斯底里地狂吠的思想家和文艺界的新布尔什维克忠实仆从们也逃脱不了这个命运。我希望将作家协会以及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党委会各次代表大会和全体会议的速记稿公布出来。

大家一定记得，所有不同意“党的路线”的人都被称做“败类”、“两面派”和“坏蛋”。

高级干部中最反动的核心攫取了对最大的共产党组织——俄罗斯共产党的控制。在苏联共产党内形成了把党阀、官僚、军界上层人物和军工集团头头纠集在一起的反改革联盟。这个联盟实际上把总统同党内和社会上的民主派隔离了开来。

对于总统，“极端派”力图一下子解决两个互相排斥的问题。一方面是利用对中央政策的不满积攒政治资本，为此目的曾批评总统好像应和民主派一起对危机负有责任。另一方面，“极端派”力求在对民主反对派的攻击上取得总统的支持。他们说，戈尔巴乔夫“没有看出”“资本主义化”的危险，但是他后来“开始改正过来”，现在的任务是帮助他彻底“改过自新”。

这样的“帮助”是经常性的，而国家安全委员会则特别卖力。例如1991年2月初在给戈尔巴乔夫的信中，这个组织的领导人克留奇科夫在讲述了来自民主派的所有“吓人的事情”后，

曾给苏联总统提出如下建议：“……鉴于危机加深和局势可能急剧变化，不能排除在适当时刻在实施苏联最高苏维埃授权总统采取的非常措施的范围内建立临时机构的可能性。”

1991年8月，这种“时刻”对克格勃领导来说似乎是“适当时刻”了。但它也是自杀的时刻。

在1991年8月的日子里，党和国家坚如磐石的联盟、斯大林的共和国联盟、行政命令经济机构以及很多意识形态幻觉都消失殆尽。

在这些日子里，我出席民主派的群众大会，发表演说，写传单和接受采访。我也不只一次地和叶利钦交谈，回答英国首相梅杰、美国国务卿贝克、联邦德国外长根舍和社会党国际已故主席勃兰特打来的忐忑不安的电话。

确实，紧张已达到了极限。莫斯科到处是坦克，民主派的报纸被封，宣布处于紧急状态。阴谋分子宣布由自己来领导国家，成立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国家面临内战的现实危险。

双方都开始大讲特讲自己在革命。

又革起命来了！碰到这种革命主义的病菌真是没有办法，而且完全是灾难。

历史经验不可争辩地证明，革命——这是通过社会混乱泥潭的一条最艰险、带来最大损失的道路，而且根本不一定能达到诱人的目的。

革命——这是缺乏责任和知识的直接后果，是过分狂妄自大和刚愎自用的结果。无论怎样借口这是高尚的精神冲动，都不能改变这种评价。

革命——这是事态发展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时的哭泣、歇斯底里叫喊和自暴自弃。革命——这是绝望的举动，是狂妄地企图一下子砍掉需要社会花上几十年紧张的努力才能建成的东西。

革命也包含着对一切政治力量和运动以及所有宣布自己是领袖甚至是全社会领袖的人是否成熟的真正考验。

向往革命，这是救世意识的产物。幸福和文明的生活要通过劳动获得，而且只有通过劳动才能获得。

常常有人讲，好像改革已经失败。

好吧，那就让我们也来谈谈这个问题。

首先要说的是，改革的实质是革新，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还远没有结束。它只是刚刚开始。如果作另外的解释，那在我看来，这就是大耍政治手腕了。

再说，与西方社会民主党经常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生活方式进行的改良和修正不同，改良主义在苏共党内是受到残酷迫害的，而在现实生活要求进行改良的地方，改良也是在合法的口号下进行，而且总的说来只是羞羞答答地企图给由于我国对马克思空想的诠释而产生的国家垄断怪物披上某种合适的外衣而已。

这类改良可以取得局部成果，但是它们不可能改变整个制度的本质和特性，不能改变为实现专横的社会和经济决策而建立的机构。这些机构完全是为把自己和国家视为一体的苏共的军事政治野心服务的，同时也是为特权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对这些机构清除一些污垢是可以的，但要彻底改变则是永远办不到的。

那些今天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把改善本质上的缺陷作为目的的革新派的内部矛盾早就决定了的。在最近几年的叛乱和暗中破坏活动背后不只是有干部问题上的错误，而且还有体制上的反抗，它反对对它进行改良和使体制人道化。

在妨碍改良的其他客观的和人为的原因中，也有社会上有一部分人思想消沉、疲惫不堪和缺乏事业进取心的因素。这一部分人在心理上受到布尔什维主义及其造就平平庸庸、不敢冒尖的人的政策摧残。

今天可以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即改革遇到如此激烈的反对是

出乎意料的。

情况完全不是这样。

党内在今天仍继续反对改革的那一层人，在过去也从来没有赞成过改革，只要读一读亲斯大林分子的报刊，就足以发现文章作者们继续欺骗人们的不道德行为。

这些报刊（如《真理报》和《苏维埃俄罗斯报》）昨天还是贴政治标签、迫害持不同政见人士、对不受当局欢迎的人进行精神折磨的冠军，而今天却装出自己受了莫大冤屈，并且已经在扮演正直的主张多元论的角色，它们昨天曾在意识形态上为1981年和1993年的叛乱作过吹鼓手，而今天它们甚至毫无悔过之意，只是要求民主派的保护，同时还把自己装扮成为争取人权的斗士。

当露骨的斯大林分子开始明目张胆地为苏共权势机关夺回它以前的权力的时候，这并没有引起苏共最高领导的抵制和谴责，而且是得到了他们的暗中支持。如列宁格勒的“倡议派”开了四次代表大会，他们对此好像视而不见，可是党内民主派（民主纲领派）自己组织起来的头一次尝试就遭到权势机关和掌权的头头们的公然敌视。

在改革过程中，改革曾有过起伏。来自基层的最初热情和来自上层的积极性开始逐渐地衰减。革新派的主动精神也眼看着低落下去，这就使得复辟势力于1990年秋取得了胜利。可是复辟势力根本不去考虑能否成功，就发动了1991年8月的冒险行动。这次叛乱倒激励了革新派，不过，他们错过了两次进行较彻底的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机会——一次是在叛乱失败之后，另一次是在1993年4月全民公决之后。

以列宁主义的俄罗斯形式表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平均主义仍在毒害社会。这种平均主义害怕采取激进的经济决策，对人的行为动机和劳动动机看法极其狭隘，在思想上遵循专制主义的陈规

老调。所有这一切在如何解决后来变成车臣战争的车臣危机的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把人的各种各样利益归结为经济利益，相应地把全部社会冲突和民族冲突也都归结为经济冲突，忽视众多具有自身逻辑的多种多样的社会生活领域的独立性，这就是远未克服的马克思主义遗产。

第十三章 七个“非”

无赖烧草棚，为的是烤小猪吃，当然烤的不是自己的小猪。流氓无产者是人的第一罪孽——妒忌的体现者。该隐就是由于妒忌才杀死亚伯的。^①流氓无产者有自己一套价值观。道德、道义、人格、良心、正派，对他们来说都是极其有害的东西。

懒惰是万恶之源。赫列斯塔科夫^②乃是穿官服的无赖最出色的形象。无赖赞成平均主义，赞成盗窃。

斯大林乃是受权力诱惑而败坏的典型，勃列日涅夫是由于欺世盗名而堕落的榜样。流氓无产者行为、无赖行为、对别人挣钱过富裕生活的妒忌以及“萨利埃里的变态心理”^③——这是我们前进道路上使我们重新回到封建主义的绊脚石。

① 该隐和亚伯都是《圣经》中亚当和夏娃的儿子。——译注

② 赫列斯塔科夫是果戈理《钦差大臣》小说中的主人公的名字，意指吹牛撒谎、招摇撞骗的人。——译注

③ 萨利埃里（1750—1825），意大利作曲家，1766年移居维也纳，作有歌剧多部。曾是贝多芬、舒伯特和李斯特的老师。据传说，萨利埃里因妒忌而毒死著名作曲家莫扎特。——译注

莫扎特^①精神——这是人身上最光彩夺目最珍贵的品质。世间万物——从野人亲手点燃的篝火到计算机，从车轮到宇宙站——都是莫扎特式的人、天才和知识分子创造的。

改革运动的先锋队正在穿过雷区前进，因此错误、损失和失望在所难免。

说实在的，通过雷区是件神圣的事。可是想一想丘特切夫写的关于被处决的戴上镣铐的十二月党人的诗句非常合适：

噢，冒失想法的牺牲者，
你们期望的可能是：
用你们的微不足道的鲜血
去融化永世冰封的极地！

在亘古不化的巨大冰块上，
鲜血冒着热气，勉强地闪闪发光。
钢铁般的严冬已消逝——
没有留下丝毫痕迹。

我们艰难地，非常艰难地学习在民主化条件下生活，掌握自由的最起码知识。几乎任何人一开口就会迸出无礼貌的辩论语言和不尊重辩论对手甚至自己伙伴的口气。在争论中更多的是蛮横

① 莫扎特（1756—1791），著名奥地利作曲家，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代表人物。五岁开始作曲。八岁时创作了第一批奏鸣曲和交响曲，十一岁写出了一部歌剧。一生长期处于逆境，在贫困中创作大量传世的乐曲。他受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思想影响，晚年曾参加共济会组织。——译注

无理和不愿接受不同观点，而不是去寻求真理。

最新的例子是，1995年3月10日我应邀向国家杜马汇报电视问题。可是对电视本身很少有人感兴趣，结果又对我进行了老一套的意识形态谴责，又对一律列入“黑手党”的银行家、工业家和企业家展示了仇恨。会上充满了鄙视实业界的气氛，而且这种气氛非常沉重，敌意很明显，甚至还发生了侮辱性的喊叫声。

当共产党员和日里诺夫斯基之流整个这场小丑表演（这是从同一个布尔什维克窝里飞出来的乌鸦群可悲的团结一致）结束的时候，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此不再过问。我内心感到苦恼并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如果这一伙政治无赖又上台的话（我早在1991年8月就对这种危险提出了警告），那我们不是白白耗费了许多时间、健康和精神。过去在做恶梦时也不曾梦见到，布尔什维克们会又一次用其肮脏的皮鞋践踏民主。

真是凑巧，就在同一天，杜马亲手使自己蒙受耻辱，它解除了谢尔盖·阿达莫维奇·科瓦廖夫夫人权专员的职务。过去布尔什维克们虽没有把他杀害，但曾将他长期苦禁在狱中。而现在，他们又乘这令人窒息的局势再一次对科瓦廖夫以及整个社会进行打击。如果民主力量自顾自地各奔东西的话，那么可能是我们大家活该如此了。

已经到了该开窍的时候了，不然的话灾难将必不可免。

第一，必须对过去的事进行认真的反思，从理性上去掌握新经验，而主要是要从这些年来积累的全部知识的角度去认识自己。

第二，必须把实际改革的重心转到巩固已经取得的成就，在社会、国家和经济的制度、机制和结构方面建立可靠的民主支柱。

第三，我们已进入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多的时期，而且要预测这种因素的结局非常困难。不确定因素不仅国内生活中有，而且

世界经济中以至整个世界也都有。

第四，对任何改革，当然是指那些造福人和社会的正当改革，而不是指追求其他目的的改革，现在都必须进行大量的预先调查、预测、研究，用模型检查一系列要点等工作。研究不够充分会给改革及其拥护者以沉重打击，会延误改革或使改革停顿下来。

从今以后，在政治和国家体制、经济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的结构中，应奠定改革机制，作为一种确保社会生命力的经常起作用的和涵盖一切领域的制度。

改革派现在就应考虑如何设法使下一个革新阶段（不是自发的复辟阶段）尽快到来。这方面是有很多可能性的。

对 1990—1991 经历的和在 1994—1998 年又重新出现的由法西斯主义作后盾的复仇主义活跃阶段，必须不仅仅把它看作是我们的失败或我们不得不与之妥协的不可避免的坏事，而且应把它看作是关于民主派危险临头的一个严重信号。

第五，改革前的社会，如果从它已建立的整个经济和社会动机体系的角度来看，非常像封建社会。

由于所有的人对一切东西持完全疏远的态度，这就预先决定了无论是基层还是上层谁都不需要这种体系。正因为这个原因，“那个社会主义”垮得如此之快和如此之容易，就像当年的奴隶制度未经战争和革命就垮了那样。

现在社会好像在解体，这个过程还将继续一段时间。

可能有几个发展方案。其中一个方案最使我感到不安。现在，社会的特点是具有高度的冲突性。可是，冲突性导致作防卫的需要性——包括军事的、经济的和社会的防卫，而这种需要又培育了一定的等级关系，会导致极权主义和这种或那种形式的专政。

原先封建主义就是这样产生的。

现在无论是在地方还是在中央，我们仍在继续经历的正是社会主义化了的封建主义阶段。

其次，如果我们的发展在近期内不落到某种非理性的轨道的话，那么只有现在是 17—20 岁的这一代人将获得相对的自由。由此可见，至少需要过 25 年到 30 年才能达到“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也可以反过来说，即“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足够强大和进步的时刻，而且还必须在这个时期内不出现某些能对社会向哪一方向演变产生重大影响的强有力的因素。至于生活水平，那将会较早地开始得到提高。

第六，我们逐渐进入了健全理智和负有责任的自由在民主建设中将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改造阶段。靠群众大会建设民主的时期已经过去，蛊惑人心的宣传影响也快要消失，党派间的无谓争吵已令人厌烦。换句话说，需要更换一下社会任务的先后顺序了，重点应放在保健、教育、家庭、居住环境和劳动道德上。其余的全是派生任务。

为了彻底改变社会存在的条件，必须全力以赴在能够确保摆脱过去和赋予社会以崭新面貌的各个方面下功夫。

我把这些方面概括为“七个非”：非寄生化、非军国主义化、非国有化、非集体化、非垄断化、非工业化（生态学角度的非工业化）、非无政府状态化。

非寄生化，这是最困难的。我国是世界史上唯一的一个禁止能挣多少钱就挣多少的国家。流氓无产者把《圣经》也认为通过辛勤劳动挣钱是永远正当的事称之为“利欲熏心”、“资产阶级化”、“蜕化变质”、“损人利己”等等。

布尔什维主义通过平均主义使大多数人成了乞丐。平均主义是生活上坐享其成、工作上爱干不干和过半寄生性生活的不光彩的根源。它甚至迫使劳动者堕落成为游手好闲之徒。

游手好闲的习惯，也就是把出工不出力作为对待劳动态度的

实质。由此也就产生了全面流氓无产者化，无论是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上，还是人们的相互关系上，或对政治、经济生活和物质生活的态度上都是如此。只要学会撒谎、偷窃、销帐、虚报以及克扣分量、造假帐等等就行了。

这里必须加上无数亏损的企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它们的职工无法养活自己，因而依靠别的企业来养活，而我们大家，不管是有意或无意，都是寄生在自然资源上。

只有通过实行私有财产制，才可能实现社会的非寄生化。这里，私有财产是指除了国有财产以外的所有形式的财产。

法制和法律程序，这是私有财产制的绝对要求，也是它的创造。私有财产是文明社会的物质基础和灵魂，是个性自由和个性在智能和物质上得到充实的本原。没有财产的人，就像一颗耐心地等待社会给它抹上润滑油的生锈的螺丝钉。

私有财产制、市场、民主——这是正常文明社会的遗传密码。

没有财产的人是不可能自由的。只要人的财产（不论多少）被剥夺，极权制度就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不可抗拒的事物逻辑就会逐渐摧毁自由、法制、人身不可侵犯、思想自由等社会的价值支柱，这将会导致文明社会的毁灭。

究竟如何实现社会非寄生化呢？

只有通过三个渠道：私有财产制、法律至上和劳动致富。

非国有化。迄今为止，我国的国家财富绝大部分是属于国家，属于国营企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这类单位。

只有同时实行非集体化，才能实现非国有化。这里需要继续

完成斯托雷平^①的改革。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喜欢农民，认为农民愚昧无知、粗鲁贪婪，而且没完没了地产生资产阶级等等。

农村遭到摧毁。如果过去是农业人口过剩的话，那么现在是城市人口过剩。农业没有人干的情况可以靠城市来解决。不过为此需要请出“利益”陛下。如果个体农民、家庭农场主、庄园主的实际收入高出城市居民1—2倍或者更多的话，那时候问题就好办了。

要改善国家的状况，只能从土地开始。如果土地改革不能进行到底，那民主也就完蛋了。

非垄断化，这就是依法直接禁止任何形式的垄断，解散已形成的垄断组织。承认竞争是使经济生活健康化的主要因素。应该用法律和社会舆论的一切手段来保护竞争，对违反反垄断法的行为应进行严厉的经济制裁。

垄断不仅本身腐败，而且它使经济和社会走向崩溃。只要搞垄断，技术和其他方面就注定要落后，在它周围滋生贪污受贿和官僚主义，在客观上加强并增加社会生活中的专横倾向。

有必要创造一切条件保证外国公司能够在我国市场中直接开业，并得到我国的法律和公认的国际法的可靠保护。

非工业化（生态学角度的非工业化）。工业化的畸形产物——贪大狂、“生产资料生产优先”、根据已达到的指标制订计划——导致了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比例发生结构性的变化（第一部类占75%，第二部类占25%）。就业率也大致如此：物质生产部门占70%，基础设施部门占30%。

^① 斯托雷平（1862—1911），1906年起任俄国内务大臣和大臣会议主席，任职期间曾领导实施旨在改变专制制度的土地政策的土地改革，但没有成功。——译注

对价值重新评估通常是件复杂工作，但又是件不得不做的工作。

对大自然所持的消费态度是几百年来甚至几千年来就养成的了。大自然是母亲的形象已让位于大自然是机器、是可挤奶的奶牛的形象。

牛顿以后，技术进步的速度急剧地加快了。人们过于自信地认为，这是征服“荒凉大自然”的结果，因为荒凉大自然本身没有任何价值。也就是说，需要把荒凉大自然加工改制成物品、商品和金钱。

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是统一的，这在今天已非常清楚。人是通过大自然认识自己，又通过自己去认识大自然。只能是这样，别无他途。

我们制造了多少沙漠？由于多年来禁止公开谈论不学无术的土壤改良家的活动，我国已干涸的沼泽开始变成了无生命的沙漠，而在沙漠里又出现了沼泽。

但是，最可怕的沙漠是我们心灵中的沙漠，而我们的心灵已被利己主义搞得疲惫不堪，已受尽双重道德的折磨。仁慈、利他主义、正直诚恳、心地善良、爱人类、爱自然——这些永恒的美德在我们心灵深处和脑海里究竟还有多少？

对生机勃勃的大自然的自我再生体系的破坏所产生的连锁反应，离灾难性的灭亡只有咫尺之遥。难以逆转的变化已不遥远，就在近处，马上就要开始。先是由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对土壤造成的影响，我们将挨饿，再是会受化学和其他工业排放的有害物质以及受污染烟雾的毒害而开始死亡。

而以后又将怎么样呢？

以后将是生态灭绝。

这就是说，一定要转向生态发展，即转到文明社会物质和精神进步的崭新阶段。只有生态发展才能成为任何社会（俄罗斯社

会、美国社会、日本社会、亚马逊河流域的原始多神教社会) 和任何经济(从德国经济到海地经济)发展的共同模式。

合乎理智的抉择没有作出, 而愚蠢的、像世界末日时那种慌乱的方案却有的是。

生态发展包括经济、社会、政治、哲学、历史、道德、宗教等一整套问题, 因为这是为了永久的利益合理对待大自然的过程。

生态发展的命运不仅取决于政策, 而且首先取决于我们自己。同时, 也取决于人们、国家和国家体系在如何生活和如何生存的问题上能否找到正确的答案。在和平条件下, 只有通过生态发展才能生存下来。

非军国主义化。传递信息的速度就是时间。由于连锁反应, 人们把时间大大向前推进了, “已燃烧上百万年的”静悄悄的铀块, 能够在瞬间就燃烧精光, 把我们推向世界末日。通向世界末日之门已经打开, 而且是由人通过自己的头脑亲手打开的。已经到了寻找回头路的时刻了, 现在还可为时不晚。

但是, 走相反道路不是像那些早已把投机和假爱国主义(确切地说是蔑视人民利益)当成可以捞到极大好处的手段和进行精神恐吓的工具的人宣传的那样, 要放弃国防, 不要军队。非军国主义化——这是使国防和军队转到合理的轨道上, 是讲效率、专业化和对社会负责的无条件要求。

非无政府状态化。社会出现了怪现象, 这就是残暴之极的极权主义同无先例的无政府状态和睦相处。

不过, 细想一下, 这里并没有矛盾。上层可以为所欲为, 也就为下面各级的为所欲为提供了广阔天地。当然, 规模不一样, 对像和方向不尽相同, 但是不管怎么说, 都是为所欲为。

除非通过革命者的为所欲为, 否则要想抵制官方的为所欲为也是不可能的。在专制制度下或者军事官僚制度下, 没有法律存

在的余地，也不尊重法律，谁也不真正严格遵守法律。

过去我们一直把对自由、善良、正义、纯洁的关系和公正的社会制度的执着追求，理解为在思想、醒悟、激情、意志等等基础上的向前跃进，唯独不是理解为在法律基础上的向前跃进。

看来，这里必须注意一个纯粹是俄罗斯的现象。实际上，过去整个解放斗争都是在“求解放”的口号下，而不是在“自由”的口号下进行的。

“求解放”——这就是为我自己取得自由，然后是为他人，而且其后的一切都取决于使人得解放的我。

“自由”——这是首先为他人的自由，因此也就是给所有人以自由。

“求解放”的传统在罗斯不仅鼓舞了农民暴动，而且也鼓舞了19世纪末的革命者。它仍继续存在于进行改革运动的当代人的心理中，这是在相当程度上堵住了走向真正自由的道路。

第四编

变革，变革……

在本编中我写的各章具有专题性质，在某种程度上都自成体系。这多半是一些独立成章的随笔，它们是想不仅仅从民族范围，而从不同的方面来思考正在发生的一切的一种尝试。

这里包括：俄罗斯的命运、它的忧虑、它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理智在冷战中取得胜利后的条件下意识形态的地位、民族主义和分立主义、俄罗斯民主的前途、由于布尔什维克主义依然存在而产生的复仇的威胁和人民遭受新的不幸的可能性。

所有在俄罗斯曾发生的事件中最令人吃惊的伪善面目，是布尔什维克们目前的伪善面目。它们睁着眼睛说瞎话，宣称自己是民主的“主要捍卫者”，同时在群众集会上举着“所有时期和各族人民的最伟大的民主主义者”——斯大林的肖像。

做恶梦也难以梦见这种情况。

在1991年，过去制度的主要支柱——苏联共产党顷刻之间倒塌了。镇压——侦缉部门的活动受到控制。从军队上层中清除了那些渴望保持自己的地位、特权和影响的最顽固的“蠢脑袋”。联盟议会的时钟在“12时差5分”敲响了，它就在党和国家的官僚们为它营造的窄小的摇篮中寿终正寝了。

具有民主色彩的活动家们取得了胜利，他们号召自己的拥护者去争取这个胜利，但是遗憾的是在胜利面前他们却不知所措……

同时，许多新领导人都充满了胜利的欣慰感，一味认为好象胜定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这里必须简要回顾一下过去。

民主反对派曾竭力主张采取激进措施，严厉批评戈尔巴乔夫的小心谨慎和前后不一贯，似乎是认为“干吗要去扶植幼芽，倒

不如一下子栽种大树，那时自由的花园便会立即枝繁叶茂”。

对建设任务民主派觉得已经谈腻了，认为只要时间一到——我们就能学会腾飞。

但是1991年8月以后他们本应该显示出自己的才能来。要从课堂走进实践的广阔天地。

对民主派的这种状况，八月冒险行动所产生的后果也起了重大作用。国内的离心倾向得到了如此强有力的推动，使得本来就被削弱的联盟结构经受不住。昔日的泥塑巨人破碎了。完全固有的、自然的经济联系被破坏了。经济迅速下滑。

新建国家某些首脑的民族主义打算和野心使他们看不到事态的这种转折所带来的明显的不利后果。混杂在习以为常的布尔什维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分立主义成了苏联的许多地方都吸食的吗啡剂。开始了瓜分，包括对不可分割的东西的瓜分。

盖达尔班子提出的经济生活健康化的战略是非常大胆的。向市场和市场经济过渡的目标方针是正确的。想在经济上加入世界共同体的努力值得赞扬。

还有，这个班子本身年轻、受过良好教育，所以颇得社会上拥护改革的那部分人的好感。

但是政府从所有可能的方案中选择了最简捷的，但也是最脆弱的方案——休克方案。

我自己最初就感到这个方案至少是很冒险的，代价会很大，是注定要失败的，这一点我在1992年2月就说了。物价放开需要有个竞争环境，然而当时并没有这种环境。在市场上，土地、住房、生产资料都不上市。没有制订应有的保护企业家、特别是生产者的法律。

仅靠一些货币主义措施是产生不了自然动机的，特别是在国有经济占统治地位、官僚享有无限权力和现行的国库税收政策的条件下就更是如此。

但是我既不想充当预言家，也不想充当裁判员。在怀疑“休克疗法”主张的同时，我依然认为，当时政府根本没有别的选择。此外，我要补充一句，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西方并没有急于拖引这艘沉重的俄罗斯经济驳船。

回顾1991年秋至1993年春这一段所走过的道路，使我感到沮丧的是为恢复私有财产制的充分权利，即为经济上享有自由的公民的出现创造条件，我们做得太少了。

公民在经济上不能享有自由，就谈不上有自由公民社会，这一点不仅被世界经验所证明。坚持这一看法的也有国内的杰出学者斯坦尼斯拉夫·沙塔林、叶戈尔·盖达尔、尼古拉·什梅廖夫、尼古拉·彼得拉科夫、叶夫根尼·亚辛、格奥尔吉·阿尔巴托夫、斯维亚托斯拉夫·费奥多罗夫、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阿尔乔姆·塔拉索夫和许多其他人。但是他们所有的人最终没有一个被人接受。

这是怎么回事儿——是当局对他们的观点不理解还是不愿意采纳？

在我看来，政府还有一个过失，那就是对具有奇特和沉痛历史的俄罗斯的特点估计不足。

但是把所有不幸都推到政府身上是不公正的。得以三次把议会变成改革阻力的布尔什维主义，给社会和改革事业带来巨大的危害。

第十四章 世纪的挑战

几百年来人在不可避免的死亡面前感到惧怕，总想用战争、自私和妒忌来补偿。在仔细营造的幻想中去疯狂地寻找拯救办法。

这些幻想给人以安慰，但也是对人的欺骗。人知道这一点，但是还是甘愿受骗。

人在寻找，但总找不到居处——可以避开生存污垢的居处。人变得残酷了，他对自己和人们失去了信心，产生了仇恨，变得越发偏执。但是不会由此得到安宁和满足。

但这绝不是说，一切都控制在某个魔鬼的手中，而善良注定要失败。

我不信走不出困境，不仅如此，我满怀希望，20世纪将结束人类异化的阶段。

天才的亚历山大·布洛克是多么地有远见！早在本世纪初他就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20世纪……一片黑暗，
比无家可归的生活更可怕
(启明星的影阴，
又黑又大)。
残酷的扫帚星—
高空可怕的幽灵，
墨西拿^①残忍的末日
(无法克制的自然力)，
它的陨落升腾起火海一片。
机器不倦地怒号，
日夜锻造着死亡。

① 意大利西西里岛港口城市。1808年地震时几乎全城毁灭。——译注

一切往日的思想和信仰，
是欺骗的可怕意识，
飞机的第一次起飞，
飞向无人知晓的荒漠……
放弃生活，酷爱生活，
对祖国的爱与恨……
平民的后裔、尘世的后裔
鼓胀了静脉向我们预示：
边界要拆除，
闻所未闻的变化，
从没见过的叛乱……
人是什么东西？
一下子被扔进烈火中、硝烟中。
你放眼远望——
是火光冲天的远方？
机器不停的响声在诉说什么？
为什么螺旋桨要怒吼、切割
寒冷的雾—寂寞的雾？

（《报复》）

下一世纪即将来临。人类又将面临一次选择，这是一次什么样的选择呢？

担忧是显而易见的。一些担忧完全可以意识到，另一些担忧能直觉地感到。但是在任何情况下盛怒的、爆发的和血腥的正在逝去的世纪的经历（包括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始终伴随着人类。

两次世界大战、几十次其它战争、鲜血和眼泪成河、无休止的暴力和仇恨、帝国的没落、许多极权制度的垮台、被仇恨扭曲的意识，所有这一切仍然留在几代人的记忆中，所有这一切并没

有过去，依然存在。

这是 20 世纪。

智慧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掌握了核能，把缺乏理智的地球儿女们带到了这样一个状态，即丧失了人类已与生俱来的永生不朽的性质。

这也是 20 世纪。

随着电子学、信息学、基因工程学的发展，人们拥有了难以想象的创造可能性，但是这些奇迹落到了军国主义手中。

这也是 20 世纪。

有计划的开发和利用宇宙成了惯常的事。

这也是 20 世纪。

这时物质世界有可能危胁到自然世界、作为栖息地的世界。世界性灾难正在叩我们的门窗。

这也是 20 世纪。

两种体系（指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的毫无意义的对抗、罪恶的冷战，它险些儿酿成人类历史上最后一场世界性大战。

这也是 20 世纪。

人们都在思索往事的教训，评价胜利和失败，意识到世上所有人都有共同的关注和共同的事业，看来这就是也已波及我国的种种反思和思索的意义之所在。

同过去决裂往往是困难的，是异乎寻常地困难的。

我相信一个流行的论点，说什么人类会勇敢地告别自己的过去。这样的论点来自有损人和人类的过分自信。

过分自信的人自命为宇宙的主宰者，他正在毁灭宇宙，同时也正在扼杀自身。

这讲的是自然界。

而知识呢？

这里远非总能找到能产生智慧的宽容心的尺度和能够救世的自尊自重精神，而人的尊严要用这种精神来培育。



当今世界正在告别共产主义、那种理论观点和实践行为的体系，这是没有什么可以惋惜的。告别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狂妄的实践已玷污了美丽的社会假设的声誉。

但是嘲笑“勇者的狂妄”，嘲笑谬误，嘲笑那些像最早的基督教徒那样相信正义、善良会得到胜利和相信全人类的金科玉律（相信这种金科玉律会使人成为真正的人）可以实现的人，不将是一种新的狂妄行为吗？

是的，活着的人眼看着不可能有胜利者的“冷战”的沉重一页翻了过去，核怪兽也爬走了。

在这条路上理智的胜利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当人打开门窗让历史的新鲜空气为他带来另一种生活时，他有什么感觉？

是一种精神和道德的恍然醒悟的感觉吗？

是较前更好地洞察世界和自身的能力吗？

是重新获得智慧并给予同情、怜悯、原谅的意愿吗？

是心灵的清醒和自慰吗？

还是相反，是一种心灵空虚的阴暗的破灭感觉，是一种与复仇交织在一起和散发血腥味的遗憾、痛恨？

想起来很痛苦，几十年来统治你的是神话，而不是健全的思维。

有人会提出异议——神话有各种各样。是的，古希腊罗马神话至今侵扰着你的想象。神秘的、可怕的古希腊诸神至今活跃在人类的精神艺术创作之中。

那么共产主义神话呢？

难道共产主义神话没有迷惑被损害、被侮辱、对美好生活充满浪漫幻想的人们的意识吗？

难道饥饿的孩子没有梦见甜食，无家可归的人没有梦见美丽的太阳城，被无休止的工作弄得疲惫不堪的人没见梦见蔚蓝的可以歇息的远方，忍受过不公正凌辱的人没有梦见平等博爱的王国吗？

20世纪推动我们去作的社会选择的意义和逻辑还在等待人们去解谜，等待社会的“判决”。但是无论如何今天就必须看到那些已经失败的选择方案和失去的机会，并不抱意识形态偏见地去进行评价。

我们大家长时间地在政治、军事、意识形态和其他各种对抗的沉闷气氛中生活过，以致于许多人简直不能想象世界的其他组织原则和组织形式。几乎在四分之三的世纪里这种对抗不仅决定着两个体系的相互关系，而且在许多方面决定着两个体系的内部结构、内部生活和首先是两个体系的自我特性。

对抗性的自我特性为我们留下了一大堆各式各样的对立观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极权主义—民主、控制—自由、计划—市场、国家—个人，而在道德领域则是善与恶，自然双方的理解各不相同。

1917年10月形成了两条道路，从那时开始两者分道扬镳、越走越远。对抗人为地缩小了可供选择的领域，如果说在实践中并不总是如此，那么在意识形态上就总是如此。

今天当第一次冷战已经结束的时候，我们更能看清冷战的道德上的损失、政治上的荒谬和经济上的犯罪。

按照惯性和为了满足心理舒服的要求，双方还在强调自己与对方的区别，当然这种区分依然存在。但是同时不得不承认，一种制度—任何一种制度形成系统的特征，也一定会在另一种制度中出现。

但是仅靠这点还不足以确定自我特性。我们的社会被一个最沉重的问题困扰着：“我们是什么人？”我们的社会试图从自己的过去、世界的经验和闪烁的未来中寻找答案。

也有一些西方书刊，它们对西方社会相应提出了同一个问题：在对世界的认识上这种性质的对立不再存在的条件下，西方社会将向何处去和将成为何种社会。

也许，这是个人、民族和整个人类社会化过程的自然发展阶段。通过同别人的对比和对立来认识自己，继而思考“自我”，再后则努力去寻找共同的、能使双方联合的东西。

二

20 世纪并非始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当时人们大概还没有意识到即将面临什么样的选择。

我想把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交替时期称之为欧洲在世界发展中占绝对统治的时期。

两千年的欧洲精神传统和成就决定了欧洲的自身生活，也决定了在许多方面使欧洲在世纪之交成为世界政治、科学和文化核心的东西。工业发展的欧洲模式带来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

欧洲领先国家提出了对内对外政策、文明和技术进步的标准，不仅仅提出了标准，而且通过殖民帝国体制、基督教传教士活动和文化、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的扩张，迫使世界接受这些标准。

欧洲感到自己是发展的中心和最高点，把世界其他地区看作需要从不同野蛮的程度提高到文明程度，也就是提高到与欧洲一样水平的地区。既用直接手段，又用间接手段，或明的、或暗的手段；既用最残酷的手段，也用真正人道的手段；既行善，也作恶。

诚然，中心自身的发展在这之前已经经历了决定历史发展的

一些岔道，可是人们不是一下就理解了这些历史岔道的。

第一个这样的岔道，是改革运动和启蒙教育，就其本质而言，它开辟了通往现代化欧洲之路。

这是纯理性思维和纯理性道德的胜利之路。

这是知识的积累、科学和教育的形成之路。

这是摧毁君主专制和教权主义的道德、思想理论和政治基础之路，这是现代民主制度萌芽之路。

这是使许多从事劳役的居民成为具有专业技能和管理知识的人才（大量这样的人才需要接受良好的教育，掌握信息和技能）之路。

这种过程的外在表现是欧洲大踏步地走向世界，包括侵占殖民地。

第二个岔道，我认为是 18 世纪像美国这样的国家的形成。

就其实质而言，这是把那时欧洲思想、文化、生产、政治、宗教、处世态度中所包含的所有最新事物移植到一个新地方的土壤上去进行史无前例的实验，而且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即那里等级制、保守主义和惯性等阻碍发展的可能性是有限的。

这是纯粹形态的欧洲经验的移植，无须为此预先摧毁腐朽落后的东西、克服巨大的反抗力。

但是 20 世纪来临时世界远非像今天那样拥挤、狭小。新世界远在海洋之外，它的潜力有待开发，而欧洲继续怀着父道主义的傲慢、不安的恐惧和充满希望的预感的复杂感情观望着冲在前头的美利坚合众国。

与此同时，那时的欧洲已经形成了下一岔道——第三岔道的理论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前提。

欧洲社会身上压着过去的残余、过时的结构和形形色色反动东西的重担，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实现快速现代化导致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定形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萌芽。

问题仅仅在于这些前提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会变成政治现实。

由于各种情况的凑合，此事在俄罗斯发生了。这些情况就是使俄罗斯陷于崩溃的劳命伤财的战争、专制制度及其管理能力的退化、新生的资产阶级结束封建主义的努力、革命口号的吸引力。

新制度诞生了。这种新制度称作社会主义，虽然国家昨天主要还是封建主义。

新制度宣布全面否定产生它的社会。它不仅与民主、自由市场经济的决裂，而且还割断了与欧洲、基督教（较比其它宗教更甚）的联系。因为美国也是基督教欧洲资产阶级文明的一部分，所以也割断了与美国的联系。这种全盘否定是在俄国文明的内核中形成的，是从它的内在矛盾中，从急于实现现代化的尝试的艰难中产生的。

在欧洲文明所经历的每一个历史岔道上旧的总要顽强地抵抗新的。甚至美国也不得不先进行独立战争、后进行国内战争。欧洲国家的流血史更不用说了。

但是那种冲突从来也不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对抗那样有害和危险。试问我们离核毁灭还有多远呢？

为什么我们要以非理性的规模、非理性的手段、非理性的目的去搞军备呢？

是由于野蛮还是由于社会无能力控制社会个别集团的利益和影响？

所幸的是，非理性最终还是不能驱逐健全理性。

就这样，在1917年10月以后，欧洲文明中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

一种模式叫美国模式。它的特征是，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它的内部的、特别是外部的发展条件使它可不走极端。还有地理

所赋予它的不受外部入侵的高度安全性。

另一种模式叫欧洲大陆模式，它的特征正好相反，它的内外发展的条件使它将走极端。衡量这种极端性的尺度在西欧是一种，而在苏联则是另一种——是极端程度更高的一种。

美国的发展当然远非没有自身的问题和矛盾，但是如果拿人和社会所能实际享用的自由幅度作为衡量自然性的标准的话，那么整个说来美国所走的是一条更为自然的发展道路。

我认为，罗斯福的“新政”是质的转折的分界线。在转折过程中和转折后，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社会改良主义性质的决策和方法在美国占据了主导地位。

西欧和中欧经受了法西斯主义的疯狂凌辱，法西斯主义的发作是对旧结构不能应付成堆问题和现代化需要的回应。

法西斯主义失败以后，社会改良主义的发展路线在欧洲占据了主导地位。极端性逐渐消失了。

在苏联，在我看来，正是这种内外条件的极端性，而常常是人为的极端性，预先决定了：

首先，斯大林—布尔什维克体制模式的形成和巩固；

其次，当苏联不少人、包括当权派意识到必须逐步拆除这种体制、而最理想的是摧毁这种体制时，还在维护这种体制。

再次，这种条件的极端性和利用极端性的做法，使改革前的改良尝试，包括“赫鲁晓夫的解冻”和“柯西金的改革”注定要失败。

我们还记得实现缓和的矛盾和不合常理之处。

始于1985年的苏联的改革运动，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发展的矢量，各历史岔道开始从政治上会合了，但仍保留了业已形成的不同发展方案的特色。结果便形成文明的多样化，这种多样化乃是世界共同体的生命力的必备条件。

当今，在新的政治和道德氛围中，在新的国际条件下，相互

作用的进程发展非常迅猛，因此我斗胆断言，在走过了长期痛苦的道路后，在经历了激烈震荡后，欧洲文明将有一次回归，回到历史的相互谅解和和解中。

历史的离心倾向正在被向心倾向所替代，人类文明保留和增加了内在的多样化，具有新的完整性、新的统一性。今天拥有了自己的全部经验：正面和负面的建设性的和毁灭性的、痛苦的和悲哀的、极端民族主义的和族际主义的、欧洲社会主义的、美国自由主义的和俄国共产主义的、民主的多样化和极权主义的多面性。

文明的解体和自我毁灭的倾向，正在被保护和发展文明的倾向所代替，维护和加强这种更替的条件，乃是一个人类生存的问题。

欧洲基督教文明理应是这种命运。

20 世纪的独一无二不仅在于 20 世纪强有力地集中了人类的天才创造和物质进步—从蒸汽到宇宙、从电学到信息体系、从木犁到基因工程学。所有这一切，我认为，不可能僭越正在逝去的百年的决定性的象征作用。

20 世纪的本质在于，它向人倾泻了如此大量的社会信息，以致人目前还来不及处理或只能部分地加以处理。

看来，只是在 20 世纪末，社会的变异性才以它的全部深刻性和复杂性呈现在我们面前。

说“选择”，无非是承认，从原则上讲发展是可以走不同道路的。重要的是，选择应是人、人民和国家的自觉行动。

三

用什么样的范畴可以审视这种选择呢？

惯常的意识形态范畴使我们自然地回到 20 世纪初。“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争论必然会把话题扯到那里去。

如果说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条死胡同，那么要从死胡同里走出来只有一个办法——退回去，退到由于革命暴力而离开的那条大道上去。

我们不去讲，类似的假设会激起什么样的最非理性的情绪。眼前就有各国的人民的经验，他们之间的敌对和战争曾绵延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但是如果如此机械地运用惯用的范畴，那就掩盖了一个更为严重的缺陷，就会明显地或模糊地、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从这样一个假设出发，即认为历史发展是间断性的，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被中断，可以按照自己的选择让它走另一种轨道。

当然，当今在世界范围内就民主对极权主义、人权优先对国家利益优先、健康思维对意识形态上的教条主义等来说，前者能经常地取胜。

在当代政治思维中，民主、非暴力、人权、自由、企业精神、进取心、对弱者的社会保障、公正性，这是公理的本质，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对此很少有人置疑。

但是，即使采用最理想的方案，所有这一切不能形成社会选择。社会选择——不是社会向右还是向左摆、摆向民主还是离开民主、向外还是向内摆的政治摆针问题。说实在的，这只是现象的外表，尽管也是反映本质的一面。

社会选择的前提是对社会发展的质的选择。

但什么是社会的新质呢？

政治制度？经济效率？科学成就？财富？

不。

社会的新质是通过人的道德和自主性提高人的地位。

根据这种范畴，我认为，总的说来 20 世纪推动了我们前进。不仅如此，正是现在，在 20 世纪之末，正在实现最重要的突破，正在通过共同的努力使世界政治的模式发生了变化。当然各国都

是根据不同方式进行这一切的，而结果也各不相同。可是欧洲文明跨出了引人注目的一步，使得在自己的前进中避免了非理性主义的最危险根源和非理性主义的推动力。

我指的是抑止了东西方之间的冲突，而且这种抑止不是以一方的“胜利”的形式，而是通过对已取得的经验的结果的共同思考。

我指的是不断克服偏见和相互猜疑，指的是抛弃千百年来由于敌对而在心理上积累起来的污垢。

欧洲文明的关键问题之一首先是道德问题，这就是在发展道路的选择上的进化和革命的关系问题。

拥护革命的人到处和经常为自己赞成暴力的选择辩护，说是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摆脱旧制度的压迫、不公正、不人道的桎梏，没有其他办法摧毁反动派的牢固的强大堡垒。

拥护进化的人正好相反，厌恶的正是暴力。他们不否定进步的必要性，批判不公正行为，然而他们有根据地指出，由于暴力的逻辑而变形的革命经常会吞噬自己的孩子并把人引进社会的死胡同。

浪漫主义酝酿革命，狂热分子制造革命，而革命成果却被坏蛋们享用，这是可能的，也是确实的。

历史没有审判员。所有的革命都有自己的罪人、自己的英雄和先知先觉者。同时也有各种各样的革命——流血的、不流血的、“天鹅绒式的”革命。革命的后果也是不一样的、经常矛盾的。一些革命意味着向前突破，另一些革命则蜕变成反革命。

暴力的、流血的政变是令人厌恶的。

但是有利于进化的选择，正如经验所谈，并不总是人道的和轻松的。

进化按其本性是要求进行经常性的变革、自然筛选和为生存的斗争。所有这一切可能会向人、向整个社会提出难以接受的巨

大而严厉的要求。

为什么改革运动进展如此困难，经常引起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不稳定，原因之一是，正在衰亡的制度建起了反对任何变革的非常坚固的墙壁。

目前墙上仅被打开了一些缺口，仅此而已。

然而，结论是显而易见的：进化性的变革应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是否具有实现这种变革的能力，乃是衡量任何一种制度的道德性及其在政治、法律和政治体制上生命力的基本标准。

如果今后的变革还仍然需要冲破意识形态上的原教旨主义、官僚主义的惯性和社会冷漠态度的顽石砌成的障碍的话，我们将面临一个危险的时代。

生存斗争是需要克服下一个障碍。人们经常把生存斗争这个词与“弱肉强食”等同起来，因而对之保持警惕。造成无穷无尽的短缺、排长队和官僚主义——这不是争取生存的斗争，这只能使人道德沦丧。

在文明社会中争取生存的文明斗争，只能有一个意义：每个合格的人都具有实现自我，靠自己和自己的家庭提供生活保障，从而对整个社会财富增添自己正当的一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人如果不愿为生存而斗争，总想让国家充当慈善机构和分配办事处的想法，必须导致所有社会阶层和集团的大规模流氓化。

正是在这方面民主面临最困难的考验。民主在不同集团和浅薄的平民主义的压力面前显得十分脆弱。如轻易作出各种没有保障的决策，左右摇摆，对过去的教训置若罔闻。

但是还有一个过渡时期的最尖锐的问题，它与建立新社会体制时期不可避免地需要作出不受欢迎的决策有关。

我们自己作为成年人能否学会服用这种苦药和忍受不可避免的痛苦？还是像孩子那样，在有人和有什么情况迫使我们吞下药丸之前总耍耍脾气？在说“学会没有”时，我指的不仅是人，在

更大程度上指的是政治机构体制，政治机构运作的机制和程序及对政治机构产生影响的刺激因素。

四

综上所述，我想这样说：最初我们从欧洲基督教文明的同一幢房子中走出来时，我们偶然地或自觉地分散到了不同的、有时是相互尖锐敌视的村庄中，但是，时间又使大家聚到了一起。

但是前面等待我们的是两个相互关联的困难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探索为欧洲基督教文明确定它当代的自我特性的新原则和这种文明的生命对未来的意义。这种文明的根源是清楚的和众所周知的，在企图把这些根源砍断、锯掉并把它们从记忆中清除出去的地方，尤其可看到这种文明的根源的意义和价值。

但是未来呢？

显然，新原则不可能存在于“消费社会”的范围中，不仅是因为这种模式的明显的精神耗费，而且是因为已经看到了这种模式的资源和生态极限。

这是一个特殊的课题，但是清楚的是，新文明的使命是同这种文明可能为合理安排地球上的生活所作出的贡献不可分割的。如果不能在我们重新安排生活中作出这种贡献，新的文明未必能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还有第二个问题，它与不直接纳入欧洲基督教文明的世界有关。

不言而喻，当今谁也不会去争论每个民族和每种文化都独具风格以及保持这种独特风格的权利。但是这里要讲的并不是这一点。

可以把问题这样简要概括地表述：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否像矢量那样，既有升降，又有偏差和进退，但毕竟是“从 A 点到 B

点”。

抑或我们遇到的是不同文化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模式的平行发展？而它们都是互相影响，在某些方面还有相似之处以及互相借鉴，但本质上是各不相同的。

如果是第一种情况，那么整个世界迟早应该重复先进国家的道路，大概也是采用它们的形式，取得与它们同样的成果。马克思列宁主义曾是这样思考的，现在西方民主的许多拥护者也是这样思考的。总的来说这是往日“欧洲中心论”在现代条件下的继续。

如果是第二种情况，那么世界发展的情景会变得复杂得多。尤其是需要在许多方面重新思考“发展”范畴本身。

对认为历史就是吞没一切的发展矢量的观点，应引起人们的警惕。现在已经清楚，生活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局限于“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主义—共产主义”的直线发展公式中的。

即使拿上述公式中的前四个似乎已经实现了的社会形态来说，生活也没有局限于这四个社会形态。

对用不可避免的救世使命论来说明历史发展矢量的观点也要警惕，这种观点认为走在前面的人必定有一种率领他人的自然愿望，否则就不能说明自己的正确性和所选择的方向的可靠性。

但是我们所以要对历史发展的矢量观点保持警惕，主要是因为这种观点有很大的可能会把社会生活引向专横的形式上去。既然有既定的从“A点”到“B点”的运动，那么就必然会有领袖和被领导的人、冠军和失败者。当然，也会有千方百计去觊觎先行者、先知先觉者和领袖的角色。

即使在把发展看成是不同文化的历史共存的情况下，领导人和被领导人的问题依然存在。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会反映在民主交往和相互关系方面。这里每个人都会表现出自己的优秀品质和才能，每个人都会

有平等的起步可能性，每个人在不失其尊严和自尊的同时可能在某些方面成为领导者，而在另一些方面成为被领导者或平等的参与者。

我们如何建立已经开始形成的世界新秩序，在许多方面取决于我们自己。

我们是否会有意无意地把这种秩序纳入专制主义方向？在专制主义初期保留欧洲文化的主导地位，但随后又必然要加以否定和抛弃，这可能会长期地对人、社会和民族的权利和自由产生消极影响。

或许我们能够使这种秩序转向并非装璜门面的民主，这就要求在心理上对所有社会模式实行开放，要求客观地、而不是带着文化上的先入之见去评价每种模式的质地和可取之处。

我深信，虽然欧洲文化对世界文明作出过巨大的、宝贵的、不容置辩的贡献，它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也有目共睹，它对未来的意义也重大，但是世界财富要靠大家的努力才会增多。所以迫切需要所有人的努力，因为人类面临着许多共同的根本性危机，其中有：

(1) **都市化危机。**人们似乎对都市化问题不再保持漠然心态，对很少加以控制和从各种观点看都预测不佳的都市增长过程已不再有以往那种兴趣和高兴心情。从共同利益和个人利益方面看，对待都市化危机的态度明显有了变化。都市化的经济基础可能会有根本改变，正如对都市化的观点的变化一样。

(2) **环境危机。**不容置疑，人们很快会相信，技术进步的要求正在危害使生活本身成为可能的基本的自然条件。技术主义意识形态的侵略性越来越成为威胁，而破坏自然生活的条件是不能容忍的。

(3) **生活保障资源危机。**这种危机给疯狂掠夺地球资源的实践，给不能容忍的、无法以各种合理借口来谅解的实践，给当代

生活随处可见的浪费现象的蛮横态度的实践上了生动的一课。

(4) 国家机构和政治机构危机。政权机构威望下降是不容置疑的，这一领域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状况有所加剧。政界上层人物的神经过敏及其才智的下降的现象越来越明显。

(5) 人际关系中正在膨胀的极端主义。普遍的技术进步、无休止的战争、因使用暴力而产生的不公正现象及把人类划分为相对少数的富人和多数的穷人的做法而产生的社会动乱和民族运动，这一切导致了主要用暴力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导致了真正自由的侵蚀，导致了相互宽容的破坏。

在统一的完整的全球体系中，人类面临日趋尖锐的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用新的方式使社会制度保持稳固安定的能力。

人们习惯于把险恶的生存条件看作是無法作选择，只好听天由命。这就是贫困、落后、疾病、饥饿、还有经济危机、社会动荡、自然灾害、人为灾害、都市化、战争、民族冲突、资源和资金匮乏、技术落后。

这都对。

但是 20 世纪、特别是 20 世纪下半叶的一个特点还在于人们有这样的理解，即认为人无法作选择，只好听天由命，这也可能是由人的内心世界决定的。如果一个人看不到可以接受的摆脱危机的可能性的话，他就认为只好听天由命，别无选择。

生活本身向我们提出了行将过去的世纪里的关键问题。问题非常严峻：社会是否能够在爆炸性问题积聚到危险地步以前及时觉醒？

我想这不是哪一种改革运动所能解决的任务，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五

历史性大争论、重大的精神矛盾的解决最终靠的不是武力，

也不是靠消灭论敌及其思想，而完全要靠提高人的境界、使他能洞察较复杂的真理。

这个过程是很困难的，常常是很痛苦的。这个过程耗费很多时间，以待客观条件、人的思想、采取行动的道德和政治准备的成熟。

但迄今为止人类还是在世纪交替之际和激情的变化中取得了胜利，因为人类通过对 21 世纪前夕的这个世界的认识提高了自己。

什么在等待着我们呢？

是将不会有自相残杀的威胁和战争的耻辱的和平和非暴力时代吗？

但愿如此。

是个人权利和尊严、个性自由、承认人的生活成为最高价值和使人变得高尚的生存条件能得到保障的时代吗？

希望如此。

是健全理智、生态和社会责任心代替抑制不住的利己主义的时代吗？

这已经是个人类生存问题了。

第十五章 意识形态时代 是否已过去？

狂热分子总在寻找敌人，否则他的生活便失去意义。异端思想是狂热分子的粮食，他靠吞食不同思想的人为生，否则他窒息而死。狂热分子鄙视任何事实、价格，他的教条中装不进这些东西。他践踏生活，企图摆布生活。他看到的世界只是黑白两色。他十分自我满足。尘世欢乐对他格格不入，他只有仇恨。狂热病摧残着道德。

修正或否定以往的意识形态，这是执政者的家常作业。不同利益，就会产生不同的政权和国家观点、不同的公正和自由观点、不同的个人和领袖作用观点。但是，就其本质而言，说的都是一回事，只是无视人的生活价值的程度不同而已。

我主要讲的是布尔什维克的共产主义模式，准确地说是它的斯大林主义实践。

如上所述，认识了布尔什维主义的根源和它恰恰能在俄国产生其影响的原因，了解了历史遗留下来的奴性是如何被巧妙加以利用的，就可有助于理解当代生活的许多现象。

莫名其妙的是，多数人接受任何形式的极权主义时多半非常顺从，而自由的萌芽却困难重重。许多人在思念理想，实际上在思念某种不可实现的东西、某种神话，而没有自由倒是无所谓，好象缺了它也能照样活下去。

意识形态不止一次地遭到埋葬。

早在 60 年代，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社会思想、趋同思想、技术至上社会思想的拥护者们就进行过埋葬意识形态的工作。

依照他们的观点，现代技术涵盖了整个地球和全部生活领域，使不同的制度、政治体制相互接近，其历史后果是将形成一个以科技纯理性主义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非常相同的国际社会。

那些人认为，到那时各种意识形态都将失去地位，它们将先被挤到一边，然后被忘却。

科学和技术的确已大大向前发展了，但是没有造成 60 年代所想的那种形式的趋同，意识形态也没有被排挤。

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的崩溃、在前苏联的境内、15 个新国家的建立，许多国家——包括俄罗斯及俄罗斯境外的国家，都宣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遭到了历史性的失败。

这些观点主要产生于这样一种表面印象，认为世界正在摆脱偏执和暴力意识形态的束缚、和这种意识形态所固有的烦琐哲学以及非理性主义的束缚。

我担心，从广泛的历史层面上来说，这种乐观主义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我认为他们还没有非常清楚理解，作为一种现象的意识形态的本质，以及它在社会生活中、在思维和意识的历史演变中所处的地位。



我知道，一个半世纪以来西方社会政治思想把“意识形态”诠释为一种幻想的、其基础是骗人的学说，信奉这种学说会使人脱离真理，狂热追求的话会使人犯重大的实践错误、甚至犯罪。

顺便说一下，早期马克思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概念的，后来正是他赋予自己的社会发展学说纯粹的意识形

态性质。

由于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两个世界体系的对立，在许多西方理论家的著作中，“意识形态”一词与“共产主义”一词作为同义词而被使用。在那些提到“意识形态的末日”的著作中，首先指的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末日。

在这种情况下，也许不用拐弯抹角就可直接提出一个问题：共产主义思想的时代是否已经过去？

是的，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实践，经受着严重危机。

但是时常发生思想与实践相混淆的情况，布尔什维主义不怀好意地把两者混为一谈。

共产主义思想从来也没有消失。共产主义思想不是马克思凭空想象出来的。还在初期的基督教思想中在许多方面在一些同样的或同类的概念中已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基础。

是呀，在人的天性中总有一种不懈追求社会公正、利他主义、人道主义的愿意，不能否认它们对思维和政治产生影响的事实本身。

例如，应该承认，马克思意识形态中赋予重要意义的某些思想和主张，在西方，首先通过社会民主党的实践，事实上已经实现。

社会保障的思想、计划经营、集体所有制形式、国家调控经济和社会生活某些领域等内容，都是一些可以列举的例子，但远非全部例子。人们不承认这种同源关系，反而经常矢口予以否认。采取这种做法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同源关系客观上是存在的，因此不能把共产主义看作谬误大全。

但这是一部分思想。

斯大林法西斯主义即布尔什维主义赖以发展的另一部分思想，则使第一部分思想变了形，不仅如此，它不寄生在第一部分

思想上。革命，包括世界革命思想以及暴力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否定公民社会等思想冒了出来。于是为了达到目的就可以不择手段。农民作为资产阶级化根源应加以消灭。知识分子变成某个受凌辱的“阶层”。由上级按官员等级名录委任的官僚实行的一个阶级的专政成了官方的权力学说。

那些破坏性思想的生命力是令人吃惊的。

在布尔什维克执政 70 年以后，在大清洗和古拉格群岛以后，在单一思维培育箱中成长了几代人以后，最终在国家孤立于外部世界和同自己过去的历史相脱节以后——在所有这一切以后，当呼吸到自由空气时，许多好像已一去不复返了的思想潮流、精神潮流、政治潮流和社会潮流便活跃起来，却附和了反自由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意识形态。

从君主主义到无政府主义的各种政治思想又复活了。

1910 年版的“俄罗斯思想”（及其反论据）作为那个时代的复活思想又被人喊得价响。

人们连篇累牍地谈论作为“非文明”国家和民族对立面的文明国家和民族的共同体，这同 20 世纪初译成俄语的国际法教科书中所写的只字不差。

“通灵科学”、各种教派和邪说，以及它们之间的尖锐争论和冲突又都恢复，有时表现为早已被人遗忘的中世纪狂热。

布尔什维克们也继续在为政权而斗争。

诚然，这其中有许多可笑的、有时是病态的东西。此外，复活的潮流甚至并非全部地波及俄罗斯的政治领域，更不用说波及俄罗斯的精神生活和社会探索了。但是既然复活了，我就不敢说，拥护类似的许多潮流的人数为数不多。

好像共产主义遭到了如此打击以后，已经振作不起来了，再也不会回到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来了，这种坚信不疑的论断从何而来？

没有充足的理由确认这种论断。

难道任何宗教、包括基督教未在自己的历史上曾经历过严重危机？危机有的是：有理论思想危机，有政治危机，有社会危机，有与教会丑闻冲突和舞弊行为有关的危机。

还可以列举其他性质的例子。在军事上，摧毁了希特勒德国，法西斯主义遭到了国际社会的谴责，国际法庭审判了纳粹帝国头目，处决了罪犯。自此以后欧洲、世界、德国本身大变样了，但是纳粹运动在许多国家、包括在俄罗斯、在德国依然存在。

我个人并不相信布尔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生命力”，我尤其批判反人类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

但是我深信，一个半世纪对世界事件产生过强大影响的思想是不可能很快消失和消亡的。不要陷入新的幻想，新幻想如同旧幻想一样也充满诡谲。

同时我认为，对任何暴力主张都应严格进行法律上的追究。

二

但是还是让我们回过头来谈谈意识形态的广义解释，不要把意识形态看作共产主义的同义词，而应把它看作一种虚假意识来理解。

真的，我不知道，是否需要证明，现代人是何等易受各种幻想的影响，而且不仅是在受到救世论思想病毒和上面自会神秘地造福于人的思想病毒感染的国家里。

我要强调的是，那些人正是当代人，他们似乎真是见多识广的人、而且多数是理性的和不易轻信的人。

但是难道就没有思想知识时髦这样的现象吗？

难道我们不会落到依赖专家意见的地步，虽然专家们如同他们的科学一样也会犯错误？

难道我们还不明白一个老道理，我们知道得越多，我们无知的范围也会越广？

我不想列举远不是罕见的一些情况，即有人在有意地、厚颜无耻地欺骗人们，怂恿他们去相信神话、空想、臆测。

我仅想谈谈无数的善意的谬误，还有人和人民的心理及其自身的秘密和难以解释的转变。

人们的心理有时需要奇迹出现。当理智说“不能”，但条件又不允许时，而感情不能容忍缓慢的自发变化时，这种心理催促人、推动人去强暴自然，曲解事件，加快行动。

心理能使这种情况成为可能，因为预言人间天堂的“夜莺”能够吸引不少主要是非常高兴倾听“天堂啼啭”的仿效者和追随者。

换句话说，意识形态没有过时，虽然意识形态本身、其影响机制和方式、影响的规模和力量会有变化。

然而既然这样，就应该撇开具体的意识形态，去解释一下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现象究竟是怎么回事。

意识形态不简单是某种思想、假设、原则、公式等等的大全，它必然会把这种大全归纳成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可以区分出几种固定的组成部分。

首先是世界是如何建立的以及它服从于哪些法则等概念的总和，然后是对人在这个世界中所处地位的看法，最后是指明人应该如何为人处世，如何同整个世界和别人建立关系。

自然，任何意识形态都有的这些必然内容可能会大不一样。

所谓世界，可以理解为整个宇宙或狭隘的人建立的小天地。所谓这个世界的运动法则，可以理解为把其解释成天命的最高意志，或者相反，可以理解为要求非常严格的刻板公式的科学法则，而科学法则是强制性的，实际上就没有让人进行选择 and 创造的余地。

行为准则可以只是一些总的普遍道德原则，也可以规定得很细很细。

作为现象的意识形态的理论，是一个独立的大问题。我只想强调，每一种宗教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只是在其精神、伦理和实践方面、在其历史、社会经验、人的科学和实践知识所达到的水平上去履行上面提到的所有职能。

共产主义是一种新宗教，是一种具体的意识形态，在其基本内容中假设和信仰起主导作用。假设过去，假设未来，相信这些概念和所有从中引伸出来的东西的千真万确。

是否可以批判这种信仰呢？

在认识过程中和在增加新知识的范围内，通过批判去感知经验，这是可以的，也是需要的。

但是必须明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人都愿意相信某种东西，并且觉得必须信以为真。不仅在社会实践上，而且在任何精密科学中，其基本原始定理无非是在某种程度上把假设信以为真。不管经验和知识的范围有多广，从原则上讲将永远是这样。

但是，正因为人的活动的不同形式和领域越来越变得专业化，所以应该准备不仅接触社会政治的意识形态，而且接触狭义的、部门的、专业的意识形态。这是合乎规律的。

同时也始终存在建立在观点上的某种一致性和对某种活动的目的的共同理解基础上的管理的客观需要。要确保所有这一切，就要用意识形态把大多数人纳入到一个对他们来说是共同的精神、信息和动因领域中去。

三

在意识形态上是什么东西使我们激怒？不管说的是哪种意识形态，是什么东西使我们感到不快？是什么东西使我们的道德和

理智受辱？

不，不是迷惘本身。不管承认自己和别人存有幻想多么令人不快，可以理解的是，每个人都会在某种程度上迷途。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乌托邦观念、选错的目标或判断错的机会的受害者。

在当代世界上可以容忍不同观点的程度是很大的，何况人们在口头上宣讲的意识形态看起来常常完全可以被人接受，甚至非常诱人，这种宣传也是为了可能被人接受而做的。

即使甚至出现根本不同意构成某种意识形态本质内容的思想和原则的情况时，受过宽容传统教育的人也不想去惩治这种意识形态。最多是精神上不同意，不追随，如此而已。

这里我不想去说那些提出反人道目的，宣扬道德无序和为达到目的而不惜采取公开的不道德手段的意识形态。在这类情况下，人们对之作出拒绝的反应是自然的，例如，对种族主义、纳粹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对任何宣扬威胁人的安全、有损人的尊严的暴力的意识形态，情况就是如此。

我指的是较为复杂的情况：这就是：没有明显的加以拒绝的理由；这种意识形态包含的观念体系可能显得奇怪荒诞，但有权存在；其意图是端正的或是没有理由去怀疑这种意识形态在某些方面是应受指摘的。

当然，从实践上看，这里有十分复杂和非常敏感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经常自由选择意识形态？例如，当问题成堆、社会危机四伏时，这种选择可能有多大程度的自觉和合理？

如果拿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意识形态来说，它们的出现总有某种客观的、不受局势支配的和现代人还远非完全认识到的原因。

只是在以后才或多或少地弄清楚某种意识形态出现的具体背景是什么，它使人们的意识有哪些进步，带来了哪些正面或反面的后果。

我不同意把意识形态流派及其后果仅仅算作历史进程的主观

一面的观点。

理论家们可以想象很多东西。但是如果他的创造有千百万人追随，也就意味着，其中有符合千百万人的精神需求的某种东西，有创造了适应社会期望的某种东西，有激励某种活动的某种东西。

我还想强调一点：思想经常要受实现思想的手段的影响。或者是其信徒们的狂热病，或是道德和健全理智的否定，或者是反科学、反经验、反理智的疯狂的教条主义，这些东西首先使人对它敬而远之。

四

20世纪末，世界进入了这样一种发展阶段，它强烈需要一种负责的和长期的学说来创建自由的全球共同体。

在我看来，冷战结束后时代的真正召唤在于，欧洲基督教文明能否为世界提供一种有利于所有人和每个人共同发展的现代概念。

现有的有关社会、文明、世界发展问题的科学知识，较之世界客观面临的任务，显得明显不够。

现在需要学会更有信心地和比现在用更少的花费来管理复杂的社会体系和进程，其中包括走向未来的进程，学会设计几种可供选择的、可施行的发展模式，避免进入社会的死胡同。

我想重复一遍，客观地说这种知识暂时还不够，而生活又提出了需要解决的种种问题，现实的选择范围有时很小很小，只能是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可以用假设去补充知识的不足，但必须认清实践要求不断修正假设这一事实。

或者可以用这样或那样的社会歇斯底里叫嚷的方法去弥补不足，可是它会让我们重新回到单一意识形态的生活里去。

也许，在政治战略中讲假设，会让人感到是在号召人们去造成新的空想和谬误。但是强调一下以下一点很重要：空想形成之时并非是提出假设之时。但是空想形成之时恰是假设被接受，并被当作能够解释一切问题的知识之时。我认为，将实用的、已经认识的知识与非理性假设进行对比，可以是与此作斗争的最有效办法。

说到底，无论是在现今的政治中，还是在未来的政治中，离开假设是不成的：任何政治纲领必然应该包括假设的成分——如果不是以明显的形式，也必然会以不明显的形式。

我们在有意和实用性地做这件事时，也就开辟了合理看待意识形态的途径，开辟了习惯于根据假设提出的最初论点和建议与实际效果是否相一致来经常检验意识形态和途径。在这条道路上存在逐步摆脱非理性假设而多采用实事求是的假设的可能性。

在 20 世纪，正是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被西方看作主要的意识形态威胁。这并不是说不存在别的威胁，只是它们退到了次要地位，受到了轴心对立的影响，因为不论在西方还是东方，大家完全用世界对立的棱镜去看待一切了。

国家法西斯主义被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改革摧毁了，东西方对立也已过去，但是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还很活跃。

非理性主义不仅没有退出，而且还顽强地表现在许多其他方面，例如现代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对抗方面。

历史情况就是这样，现代形式的政治民主和自由经营主要是在单一民族和单一宗教的国家中形成的，即便原则上不是如此，但事实上却是如此。但是众所周知，就是在那些国家中，这个过程也是很长且很痛苦的。

在当今越发拥挤的世界上，国界是靠政治来努力捍卫的，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正是被越来越多地冲毁，而世界本身——大部分有影响的国家原来都是多民族和多种宗教的国家。

在这种条件下，回到神秘的非理性主义和崇拜传统主义中去，是一种主要不是存在于思想领域，而是存在于社会领域的现象：这种非理性主义客观上成为在生活方式上、社会和经济制度上、政治体制和结构方面、民族主义心理上保留传统主义的一种手段。

这里所说的“非理性主义”，一般地说是不太准确的，我用这个词仅仅是因为找不到更好的词。那种在实用的、理性主义的坐标体系中显得是非理性的，事实上有时完全是理性的，但是只是存在于那些社会和精神坐标中，存在于属于某种思维类型之中。

但是非理性主义的根源不仅存在于社会领域，而且存在于不同的文化中，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和社会的心理中。

我不想忙于否定，在世界一些发达地区上的经济增长和社会乐观主义时代的结束与这些地区在某个过渡时期里出现非理性的社会反应、思想和政治潮流的高涨之间存在着联系。

我认为，作出不容争辩的历史结论的时候还未到来。但是如果这个思想被证实的话，那么的确应该对于非理性情绪的爆炸有所准备。

可以设想，西方经常欢迎、俄罗斯现在也附和的那种世界发展进程本身（即民主、经济自由、社会开放性、政治对话和妥协）将会在国际社会生活中使作为占优势的民主的意识形态的对立因素的意识形态和非理性观念得到加强，不管这种设想是如何地不合常规。

从这种意义上讲，不同寻常的时代在等待着我们。

怎么办？

用战争战胜意识形态是不可能的，用政治取胜必然长久不了。

但是是否非要为自己树立一个取得胜利并为胜利而奋斗的目

标呢？

我个人认为的答案是，我们应该提出新世界和通向新世界的
新秩序的切合实际的假设。世界为所有人开放，参与世界事务较
之拒绝参与所得好处要多。

为此所需要的知识、政治战略、旨在生活中体现这种假设的
措施和规定，综合起来就可能构成新的理性的意识形态。关于这
种意识形态的合理性我已经说过。

但是，大概可以换一种方式提出问题：当相互关联的尖锐意
识形态化时代、第一次冷战时代结束以后，东西方关系，现在的
俄美关系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呢？

我觉得，如果俄罗斯不发生复辟、而美国不陷入“获得胜
利”的幻想中，那么它们的相互关系中不会发生什么耸人听闻的
事。将会有广泛问题、广泛领域和广泛利益的正常合作。将会有
竞争——政治的、经济的竞争，甚至可能是军事技术的竞争，但
不是以战争相威胁的军事技术竞争。还会常常有争吵和冲突、磨
擦和复杂关系的时期，所有这一切在一个大家庭中是司空见惯的
事。

现实的挑战的另一面，即如何解释欧洲基督教文明两大部分
的意识形态对立的结束和历史发展新阶段的可能性？作为胜利
一方是否需要提卫它所提出的秩序？

这种方法将会重新导致世界政治的冲突、意识形态化、非理
性主义。

或者我们将会明白，久拖不决的对抗不仅起因于恶意，还起
因于对整个文明的历史无知和野蛮，但这种对抗同时又是克服这
种无知、积累经验和知识的途径之一。

当我说到提出新世界的切合实际的假设时，绝没有想以此告
诉大家，所有积累的经验应该抛弃。

决不！

被生活已经证明正确的一切，必须作为新的思考的基础。例如，社会伙伴关系、社会和睦和均等机会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证明了其生命力，作为正常社会唯一可以接受的改良机制证实了其历史正确性。

同时，国际社会正在发生的经济、社会、文化道德的进步，必然需要新的理论思想、新的实践方法、团结而不是涣散人们的新的发展理念。

第十六章 沙文主义及其后果

我个人毫不怀疑，苏联注定要进行根本性革新。只是问题在于，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最可能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瓦解还是向邦联的民主进化。

但是事情就像已经发生的那样发生了。民族主义者对权力的贪求席卷了全国。

显然，目前的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同历史不能争辩。这个阶段是由许多客观情况决定的。

我认为，它同时证明沙文主义和分立主义的政治口号已走到了历史性的尽头。

民族的东西经常变成了民族主义的东西。

社会和睦代之以战争和冲突、打击别人和复仇的愿意。

个人权利代之以对人权的粗暴践踏。

分立主义能使任何社会陷入贫穷、冲突和强调自己的特殊性的死路。

所有这一切不是民族自由之路，而是严重分裂和对立之路。

民族问题是最敏感的问题，从本质上说是改革的致命问题。改革的倡导者们抛掉了过去的许多意识形态神话和政治神

话，但是在像民族问题这样的要害问题上却模糊不清，陷入了神秘主义。

结果是，布尔什维克党和国家精英所煽动的民族主义狂热感情占了上风，阻断了联盟向自由和自愿的邦联的渐进进化过程，毁灭了国家。

但是，看来一起生活了 50—400 年的各个国家和民族是不能被一下子扯碎成一块块的。人际的、家庭的、文化的、心理情感的和其他的种种联系的中断的痛苦感情和病态感情将会长期伴随人们，至少要伴随到人们自己开始觉悟起来和批判分立主义和任何形式的沙文主义民族主义的破坏性口号的时候。

让我们根据全世界发展和前苏联地区的事件的来龙去脉具体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可以从这样的问题谈起，当人们还在民族纠纷中流血时，当疯狂的沙文主义灾难还在不受惩罚地肆虐时，人类无权称自己是文明的。

遗憾的是，20 世纪的政治和政治家们失去了人类的信任，因为行将过去的百年，这是充满血腥的战争和革命的时代，是社会制度之间毫无意义的核对抗时代，是生活和思维军国主义化时代。

到本世纪末，世界上的执政者们有了足够的智慧和勇气来结束冷战。但是民族分离、贫富悬殊、宗教差异、实际生活和良知的不协调、国家与个人的利益的矛盾还在继续。此外，部族政权机构挑起的民族冲突越发野蛮。

当今的智者常说：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人民终于具有了民族精神和自我意识，抛弃了专横制度的桎梏，而有些国家的人民还抛弃了苏维埃帝国的统治。

如果说到事实，事实是明显的。在任何一个东欧国家和苏联，今天已没有纯粹的共产党执政。已经没有苏联对东欧国家在

军事上、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控制。没有了华沙条约组织。没有了经互会。

一切就是这样。

但是对事实如何解释，那完全是另一回事。

我认为，情况如此不同，它不允许把原因和后果都划一起来，不允许不管历史和社会的具体情况而运用各种范畴来作解释。

苏联曾是个制度复杂和命运复杂的国家。当代俄罗斯也一样。

如果像人们常做的那样，把苏联与传统的帝国相比较的话，那么不能不指出这个“帝国”的许多怪事，包括宗主国不仅没有靠殖民地富起来，而且自己还拿出不少东西去帮助殖民地发展。

至于说到东欧的形势，则更加说不清楚。这个地区居住的各国人民，早在几百年以前就已经形成完整的民族，他们具有自身多个世纪成立国家的经验。

这里也有一些国家，他们第一批民族大学早在美洲发现前的几个世纪前就开设。这些国家具有丰富的精神遗产、多个世纪的文学、固定的宗教和政治传统。

即使这些国家时常受到外国的影响甚至统治，加入不同的君主联盟和帝国，但是它们保留了民族独特性、自身鲜明的宗教、政治和文化的面目。

例如波兰，当它加入俄罗斯帝国以后，不仅没有溶化其中，还保留了自己的语言、信仰、生活方式，而且对 19 世纪初俄罗斯本身的反专制政权运动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未必可以无条件地同意，苏联或东欧过去的制度是在民族主义的压力下垮台的。它们的倒坍是受时代的冲击，而民族主义，则是由于缺乏其他正经的思想政治流派而占据了腾出来的位子，仅此而已。

我这样说，丝毫无意贬低民族运动及其拥护者和领导人。但是，对真理的利益要求不要夸大其词。

我想我并不违背真理，如果我作如下假设的话：如果在苏联没有开始深刻的且影响深远的改革运动的话，如果苏联的改革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的话，这一地区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民族主义势力不仅就不可能取得政权，而且至少在本世纪末以前不会产生多么重要的和稳定的政治影响。

显然，在分析目前东欧和苏联的形势时，无条件地运用反映民族的社会历史和精神自我意识以及民族自决的形式和方法的那些民族主义概念是不合适的。这些进程在这里早就过去了。简单地把它们划分压迫国家和受害国家也是不合适的，因为很难想象会有生活比自己的压迫者好半倍到一倍的受害者。简单地直线地把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加以对比也是不合适的，这里我们不妨想一想极端民族主义的罗马尼亚类型。

更何况，我认为，也不能把民族主义和分立主义等同起来，虽然这两种现象彼此有着紧密的联系。

不，在世界的这个原先的“第六”部分里我们不仅遇到了社会和历史的普遍规律的各种表现，而且遇到了非常特殊的规则、特征、社会突变的种种例外现象。

毫无疑问，“民族主义”属于社会思想、哲学思想和历史思想范畴，确定这些范畴，如果一般来说是可以的话，那也是非常困难的。

这不仅在于把本身似乎是清楚的概念与其实际意义如何结合起来是困难的。困难首先还在于民族主义现象在不断发展，其内部变得越复杂起来。

当代民族主义完全不同于 17 世纪欧洲的民族主义，而后者

又有别于中国的、日本的或任何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

当普通人说到自己的或别的民族、民族性、民族特点时，每次虽然有意无意地但必定会提到诸如语言、传统、习俗、生活观等个人和人民的这些特征，提到区别这个人或这些人民的思维风格、行为举止、表达自己情感和感受、待人处世的方法的那些特征。

这个论点是正确的：民族主义、民族和民族的东西的历史，这是文化历史共同性逐步形成和扩大的历史，也是人力、区域和社会成员不断扩大的历史。

但是精神领域的东西的扩展也很重要，这包括价值和取向的范围、思想和思维的发展、经验知识、直觉知识、信仰知识、假说知识的增长、社会智慧的道德发展。

所有这一切也就是文明的自我发展，即以社会的规范和关系来逐步排斥生物的规范和关系，以规范性的、法律的、经济的和其他文明的调节器代替社会生活的强力调节器，既使社会管理结构、组织管理结构复杂起来，又使社会协调生活的各级机构的数量和社会反馈量增加起来。

我不想沉缅于历史而离题太远，我只想强调，当代存在于西欧的民族国家乃是最近五个世纪精神的、物质的和社会的进步产物。

在最近 200 年里与这个“民族主义”有关的不仅是文明的成果，而且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在内的大规模战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现象；许多民族利己主义、国际关系的现代体系、实行力量和民族利益平衡的政策。

现今国际社会是按照另外的法则在生活或至少试图这样去生活，它逐渐地告别封建意识。

国际社会还积极支持自决权，这不仅是说说而已，而是反映在联合国成员国构成上的现实。

但是，我认为，实现自身的民族国家权利越来越明显地开始于具有产生难以预言的痛苦后果的危险的旧时代残余特征。

虽然大概所有的当代多民族国家都为分立主义欲望而耽心，破坏稳定的分立主义火花却是在前“社会主义世界”里爆发了。

为什么是这样？

二

在意识形态和政策——无论是对内政策还是对外政策中，布尔什维主义充当着国际主义的积极鼓吹者。实际上许多东西完全是另一码事。

许多国家以某种程度的毫不隐讳的形式宣布并推行具有自己特色、特别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政策。我认为，谁也不会否定，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匈牙利和南斯拉夫、波兰和东德都奉行过这样的政策。朝鲜、越南、古巴虽不那样强调实际差别，但也奉行自己的特殊路线。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也完全不是苏联的机械的模塑品。罗马尼亚我就不说了。

我认为，如果允许说 15—18 世纪欧洲的王朝民族国家、18—20 世纪资产阶级民主类型的民族国家的话，那么也有理由承认诸如 20 世纪下半叶的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国家这些现象。“社会主义的”，所指的仅仅是名称。

不仅在东欧或亚洲，而且在苏联本土也是如此。

苏联成员中的前联盟共和国和许多自治共和国，由于受到外部主权严格的限制，在社会政治面貌上有着相当的区别，就本质而言也只是假社会主义的民族国家，而不是别的什么国家。

为什么这是可能的呢？

首先因为实际的管理结构对于恢复、巩固和发展以封建依从地位、部族传统为基础的关系来说几乎是非常理想的。

反民主、缺乏正常的社会反馈、到达专横程度的民主集中制

原则，所有这一切最终导致形成了首先由本民族人士构成的、脱离社会的、自己有足够保证的一批精英。

例如，苏联成员中的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乌兹别克、土库曼就属于这样一些共和国，那里居民中“有爵位的”人的比重很高；那里在地方党及其领导人、整个精英中这个民族的比重很高；那里异族通婚的比重极低。

苏联中央的政策是超前发展民族共和国和民族自治区。这不仅是一宣言。共和国的确得到了不少发展需要的资金，可是地方精英们却并不对自己的民族、全体居民承担什么实际责任。

如果与莫斯科的关系在外表上都是得体的，甚至是很顺从的话（所有的人几乎都是这样做的大行家），那么在共和国内部实际上是不受任何约束，可以为所欲为的。

莫斯科为地方统治者投保，使其免去社会政治风险、自然的和人为的风险。当出现危机的时候，莫斯科便更换其领导，但是在对待整个官员名册中的官僚的关系上总的说来却在事实上充当着他们的存在和统治的不可动摇的实际保障。同时又可以非常方便地把地方上的问题和失误的责任推到莫斯科头上，而且他们在这方面还可提出许多理由。

在精英层面上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空泛词藻和实践的共生现象是根深蒂固的、很自然的。

改革破坏了这种共生现象，同时也使它在某些方面陷于不稳定。

产生了对个人地位的威胁。斯大林死后实际统治一切的党的权势机关、经济机关和强力机关的三头执政体制客观上受到了动摇，莫斯科不再是整个地方精英软弱无能的保护伞了。

最后，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复仇势力作出了很大努力来动员各加盟共和国起来抵制改革。共产党的民族精英所面临保存自己的斗争，打着民族主义的口号，这样做是很方便的。

我深信，苏联领土上的流血冲突是中央的复仇势力和地方部族共同挑起的。我认为，今后必须对于阿拉木图、苏姆盖特、卡拉巴赫、奥什、费尔干纳、第比利斯、维尔纽斯、里加、巴库、格罗兹尼等地事件的真正根源进行调查。

遗憾的是，民族知识分子和民族运动客观上成了这些势力所掌握的两有效手段。

当然，大部分民族知识分子和民族运动是真诚地希望各族人民自由和独立，渴望民主的。

但是，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一部分被收买的知识分子，他们受过旧体制的恩典，有足够理由感到，在民主条件下他们会受排挤，因此搬出投机地贴上“爱国主义”标签的民族社会主义、沙文主义、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等口号。

至于说到爱国的知识分子，它为苏联所有的民主力量所怀有的情感所激动，天真地认为，在民族主权条件下，他们将会有更大的创造空间。

这两部分知识分子都遭罪——一些人活该，另一些人则不应该。

对于党和国家精英们来说，民族运动开始时是他们作为向莫斯科施压手段的完全可以控制的社会不稳定状态。

但是民族运动逐步失控，其目标由民族目标变成了民族主义、分立主义的目标。精英层面的地方共产主义很快演变成为地方民族主义。

当然“下层”民族主义发展的原因不少。集中计划和管理弊端、官僚主义办事规则、形形色色的无神论和其他运动、喜欢无一例外地划一，所有这一切和许多其他东西，在各共和国里人们首先通过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的棱镜来看的。

但是应该强调，在地方上可经常看到在一些没有人想故意去冒犯民族尊严的问题上也出现冒犯民族尊严的事。这些民族感情

通常在地方部族的经常角逐过程中，也是由莫斯科的不少怀有沙文主义情绪的官僚们的所作所为有意地挑动起来的。

政治精英们控制的民族运动逐渐丧失了民主的内容，变成民族沙文主义运动，成了阻碍民族自由发展的因素。

事态的这种转折挑起了非常有特色的分立主义。

我想称它为寄生的分立主义。

外表上保持了对主权国家的企求的体面。各种主权国家的象征都被赋予并将赋予特殊意义。同时煽起了民族主义歇斯底里。

不仅地方布尔什维克当局的所作所为，而且就其实质而言首先是反俄罗斯性质的俄罗斯本身的各种沙文主义派别的破坏性活动，经常为反俄罗斯情绪提供论据。

令我震惊的是，在主权混乱的年代里，“主权分子”几乎完全忽视了人们的实际生活、实际利益、实际意图。

现在正是弄清楚有关指责戈尔巴乔夫搞垮联盟的问题的时候了。这是明显的荒唐指责。

让我们从恰恰是苏共的正统派坚持要组建苏共的特别队伍——俄罗斯共产党一事说起，这是苏联解体的第一个信号。

接着 1991 年党内的军事叛乱彻底分裂了联盟。

至于说到戈尔巴乔夫，他曾赞成要革新联盟，只是他坚持联邦的主张坚持得太久了，尽管形势已发展到有利于实行邦联制度了。

总统非常担心联盟被民族主义解体的威胁，因此 1991 年 8 月以后，我想说，他把自己所有的时间、注意力和体力甚至神经都花费在寻找拯救联盟的途径上，劝说共和国领导人保留联邦，提醒无序解体的严重后果。

我个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把太多的时间花费在无济于事的劝说上，但是我并不坚持这种说法。也许从事政治和经济的具体问题会更有效。

在1991年8月后成立的政治协商会议（我参加了）上起草了不少非常有意义的草案，其中有：“关于股份资本”、“关于承租亏损企业和出售服务企业”、“关于土地改革和家庭农场”、“关于地方自治”、“关于经营自由”、“关于贸易自由”、“关于贪污”、“关于犯罪”、“关于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危险性”、“关于人权”、“关于财产非国有化和非集中化”、“关于划分苏联部长会议和共和国部长会议在可调控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形成方面的职能”、“关于在市场价格条件下居民社会保障的根本措施”、“关于地区发展基金的构成和使用办法”、“关于1991—1995年期间全国收入在联盟预算和共和国预算之间的分配标准”、“关于银行活动”、“关于商品市场上反垄断措施和发展竞争”、“关于国家支持小企业的发展”、“关于改变市场价格条件下营业税的计算和缴纳办法”、“关于在苏联建立就业局”、“关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苏联教育、科学和文化的经济和法律保障”、“关于投资活动”、“关于有价证券和证券交易所”、“关于海关法”、“关于保护消费者权益”、“关于社会保障”等法律草案。

但是所有这一切，遗憾的是，都消逝在沙土中了。围绕“主权”的一阵忙乱阻挠了这些真正市场建议的决策。有谁知道，如果通过了类似的法令，改革是否就能克服离心倾向和民族主义狂热，就能按部就班地进行。

如果说到因苏联解体对我的批评，那么这种批评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无论谁、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找不到一句我的支持病态的主权表演的话。相反，我公开反对成立俄罗斯共产党和由共产党钦定的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不合时宜地、匆忙地宣布俄罗斯的主权。

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也始终主张国家的统一。

不，布尔什维克和沙文主义者先生们，首先你们应该对“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者”的政治上层人物肢解国家负责。顺便提

一下，那时所有加盟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大多数是由苏共成员，也就是由完全按官员名册委任的人组成的。

遗憾的是，民主阵营的观点是非常没有远见的。我们可以想一想 1991 年 3 月 10 日在莫斯科民主示威游行上的那些口号：“联盟条约是俄罗斯的陷阱”、“不要戈尔巴乔夫的全民公决”、“在联盟中生活——鬼哭狼嚎”、“革新的联盟是新的奴役形式”、“同胞们！宁要富裕的有封邑的公爵，也不要贫穷的联盟”、“不要有总书记的联盟”、“宁可跟欧洲资本家联盟，不要与封建的中亚联盟”、“不要联盟条约”、“不要戈尔巴乔夫式的联盟”，等等。

既缺乏责任心，又缺乏洞察力和智慧。造反的喊声尘嚣甚上。

我知道，许多我的朋友是这一那一事件的参与者，他们对那一时期在关系国家命运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感到非常痛悔。

破坏的蒙蔽手段挡住了人们的视线。

戏剧性的、喜剧性的和悲剧性的东西交织在了一起。

可以清楚地看到两种神话的心理占了上风。

首先，我们成了主权国家，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保留以往的所有经济联系和关系、补贴等等。

其次，“西方将帮助我们”。

唉，两种神话仍然是神话。是莫斯科在照料俄罗斯，而西方依然袖手旁观，直至今日。

如果在其他某个地方存在过争取民族解放的武装斗争形势，我还是理解的。当进行这种斗争的时候，这里当然就谈不上考虑对外经济联系、家庭和民族分离的问题，主要的是活下去并取得胜，而其他事到时候再说。但是在苏联所发生的远不是这样事情。

所进行的是伟大的非暴力改革运动。我们第一次浪潮的改革家们不顾复仇集团不断施压，原则上否定暴力行动。

我认为，分立主义在苏联有一种几十年的平均主义、配给制和对国家的全面依赖性培养起来的典型的苏维埃本性。

如果国家运行的是正常的市场经济，就不会出现谁养活谁、谁靠别人的劳动养活这样蛊惑人心的话题。如果国家是一个民主国家，民族文化、语言、教育、信息等问题就不会如此尖锐。分立主义狂热病就会受到实际生活的控制。

今天这分立主义的出现是由于以下几点：

——由于体制，这种体制在严厉的强制下得以在内部加以维持，而当这种强制消失时就瓦解；

——由于经济，这种经济不是以共同市场为基础，而是以防止全面计划难以预言的意外事情的形式而出现的成千上万个自给自足的生产单位为基础；

——由于寄生者，这种人抱怨旧结构使他们不富有；

——由于不负责任的精英和部族机构，他们不习惯思考普通人的不幸和痛苦；

——由于经济领导人，这种人习惯于发号施令和独断专横，但当他们突然感到自己将不得不在市场条件下工作，对此就无法胜任；

——由于一些人玩弄细小的和罪恶的政治权术，他们使自己的人民遭受新的不幸。

这样讲，我丝毫不想否定人民要求民族自决的权利。在 20 世纪末的世界上这种权利是神圣的。

但是其他问题也是合理的：如何运用和为谁运用这种权利？谁有权代表人民说话？当人民努力为自己取得主权后人民在多大程度上能监督当政人的行为？

遗憾的是，民族自决权，例如在苏联的实现并没有各加盟共和国人民的任何参与。此外，经验清楚证明，苏联的分立主义和民族主义（特别是分立主义！）在许多情况下导致保留以前的关

系，成为只是抛弃了单一意识形态老调的昔日精英和权力机构暂且生存下去的手段。

三

民族主义和分立主义，经常与沙文主义相联，制造了迫使家庭离散的最尖锐问题。

让人必须在民族归属和对自己家庭的忠诚之间进行选择，这时我们看到的选择不道德的选择。

说不道德，这是因为那些妄图让人们把自己看作民主派的权贵们根本无权让人面临这样的困境。这样做就使他们的民主一文不值。

在前苏联，异族通婚的家庭达到 1200 万个，加上孩子超过 4000 万人。

这几千万人还应加上大量单一民族家庭的人，但是，这些人现在不由自主地成了他们本人、而通常包括他们的祖先一生生活的地方的“外国人”。俄罗斯境外还居住着 2500 万俄罗斯人，而在俄罗斯本土则有千百万乌克兰人、鞑靼人、亚美尼亚人、哈萨克人等。

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一些中亚共和国领土上的普什图人、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纠缠不清。南斯拉夫的情况令人瞩目。

可以回忆一下历史：仅在最近的 200 年里欧洲的民族国家经历了多少次的战争、流血和牺牲。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认为在前“社会主义大家庭”领土上的民族主义和分立主义今天的爆发是某种进步。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认为事态的这种发展有利于人，而民主国家里人的利益的优先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国际社会有义务采取更加坚决的立场对

待那些继续用人们的鲜血的代价换取自己的权力野心的当权派。

类似纽伦堡法庭那样的组织应该成为常设国际机构，这种机构应拥有联合国明确制定并通过的程序、惩治办法、法律保障和实际保障的手段。

每个潜在的“崇尚武力的人”应该知道他是没有前途的，因为谋害人们生命始终是犯罪行为。犯这种罪的是庸俗的刑事犯和政客，他们用假爱国主义或伪国家的蛊惑行动来掩盖自己的自私、道德上的盲目无知和对人民的蔑视。

当代世界不可能按民族禁区安置大家。分立主义进程走得更远，颠沛流离的人就越多，有利于越来越新的民族瓜分、冲突、重新划分边界的动因就更加强烈。

我简直无法相信，人类不能制止类似事件。

如此尖锐地说民族主义和特别是分立主义，我想证明一下我过去在《反对反历史主义》的文章（1972年11月《文学报》）中说过的观点，在该文中我试图提醒社会有关任何形式的沙文主义——无论超级大国的还是超级小国的沙文主义这一点并不重要——可能产生的悲剧后果。

我想再次重复，决定各族人民命运的权利属于民族自己，绝不是政客甚至政治家。

民族单独生存的权利是容易解释的，但是一起生活的权利同样无可争辩。

出路在哪里？

聪明的出路仅此一条：探索建设现代国家制度的合理途径，它通向有能力的、有效的但是无疑受社会监督并为社会利益服务的国家。

但是这一点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即如果在政治上、在人们的意识中人们将把“民族的”和“国家的”这两个概念区分开的话。

四

民族主义与国家的相互关系是非常含混的和矛盾的。但是，清楚的是，国家为了自身的目的曾经常利用民族主义，竭力玩弄民族情感，赋予其侵略的、沙文主义的性质。

民族主义，不仅是政治观点、哲学观点和其他观点的总和（原则上这些观点可以用教育、知识、劝导加以改变），而且还是许多方面暂时还没有认识的、无法驾驭的人的生物社会属性。

要求用武力“铲除”民族主义是不道德的。

如果世界上千百万人这样或那样地受这种现象的影响，那么就是说这种现象纳入了人的本性，可满足个人的和社会的某种需要和需求。

但是可以而且也需要采取一切措施去阻止自然的民族企求变成民族主义变态要求、对他人的仇视、对特殊权利的奢求等。

实际上如何去做呢？

处在殖民地位的人民已经没有了。今天说的是另一件事：关于维护每个具体人的权利。

同乡关系、文化自治、民族俱乐部、学校、教堂、出版社、报纸、剧院、电视，所有这一切无疑是固有的。如果人们不管其宗教信仰、政治和其他信念如何一律平等，那么不管他们是哪个民族也一律平等。

但是，在历史形成多民族的空间里建立民族国家，这是缺乏充分根据的、而且常常是一种制造不稳定局面的特权。

随着世界向更加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和一体性发展，在更多的活动领域中和活动方面向全球化前进，向区域—国家结构和管理过渡的需求就越来越明显，那时国家将不是民族形成和自我表现的方法和形式，而仅仅是为人和社会的利益服务的组织结构。

如果透过现在爆发的民族主义和分立主义来审视前景的话，

那么前苏联领土面临什么样的前途呢？

两种极端方案是显而易见的。

一种方案是民族主义和分立主义倾向的增长。这很有可能挑起国家之间和民族之间的战争，导致肢解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几乎所有前加盟共和国，组成无能的新国家，通过流血重新划分领土和边界（这种划分必将超出苏联边界，在某种程度上波及毗邻国家）。这无疑是所有可能方案中不好的一种方案。

但是我个人倒觉得这个方案是不大可能的。甚至在有战争的地方，精英们已经疲于战争，正在寻找和解的途径。战争双方在人民和世界眼里丧失了威信和同情。战争的英雄气概逐渐化为乌有。

但是如果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不好转的话，那么许多挑衅者、新法西斯分子、民族沙文主义分子和民族布尔什维克就可能大肆活动，这是很危险的。这些势力将继续紧紧抓住民族主义口号和神话不放，罪恶地挑起和复制各式各样的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这正是在车臣发生的事。

在前联盟空间的“离婚”并没有完结，但是结构性的一体化因素正在走向首位。出现了搞好合作、扩大合作领域、建立赋予协调职能而在某些问题上有管理职能的中心的趋势。

今天已在上层的这一代政治家们，是在尖锐对立的浪潮中走向政坛的。他们将会离去。相信下一代是更讲实用的一代。

摆脱了单一意识形态、单一政权和单一所有制的社会共同体将会来临。

最理想的互利方案是在纯粹自愿基础上的邦联。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乌克兰应该为建立邦联奠定基础。

大家都将会更好。

第十七章 斯大林主义之“死” 尚需时日

在俄罗斯布尔什维主义中，交织在一起的有权势主义的传统、有乌托邦愿望、有施了生活污秽肥的土壤、有投机的政治理论、有在一个国家里不同文化时代和经济制度的混合物、有先知们和领袖们的主观特征、有许多其他东西和所有情况的总和。

结果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缺乏宽容的心理，而布尔什维克们则把这种心理变成了国家的意识形态。

我们已经残酷地斗了几十年，不惜肝胆，不惜墨水，不惜被扣各种帽子，不惜受辱，不怕上帝，不怕鬼神，只是踩踏别人，给人抹黑。

那么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呢？什么时候有完？看，历史果然已在敲打傻瓜们的脑袋。

唉，当代人想要弄明白重大社会事件的真正意义，特别是它们的后果是不可能的。真实的东西好像悄悄溜掉，被繁忙的日常生活弄得模糊不清。政客手腕、私利的鄙俗行为、傲慢态度、对权力的不可遏止的贪婪经常暗中偷换了事件的内容。

1985年曾经非常明确地提出一个问题，国家要摆脱什么，国家要放弃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原则。

如果说最主要的，那么国家和社会试图是又一次走上进化式改革轨道和试图制止暴力，用马克思的话，是试图不做“历史接生婆”的工作。



很难确定，是否有一种尺度可以衡量在俄罗斯经常不断发生的暴力比其他国家要多多少，因为谁也不知道这种尺度。

但是从暴力史上许多世纪的结果来看，俄罗斯肯定是独一无二的。

例如，根据史学家的调查，在伊凡雷帝时代俄罗斯的人口从600万减少到400万，在彼得大帝时代，从1650万减少到1400万，在斯大林时期，还需要去弄清楚，但光是大清洗就不少于2000万，而整个苏维埃政权时由于战争、饥饿和枪毙而死亡的人数，一些资料说是超过6000万，另一些资料说是达到1亿。

独一无二之处还在于形成了稳固的和强大的国家、社会、心理、精神的结构，这些结构实际巩固了生活中的暴力统治。当然，这不是俄罗斯的过错，而是它的不幸。

在所有时期——从最早的编年史到我们的时代——人民都在进行摆脱暴力和压迫的殊死斗争。

20世纪初以前的俄罗斯农村公社，是在特殊的宗法民主之上建立起来的。

每年重新分配土地、完成国家和地方徭役、公社内部法庭和许多其他做法，都带有可观的民主成分。宗教公社、寺院、不同村庄也都根据那些原则生活在一起。在俄罗斯的历史上也有人民代表大会——市民会议；曾经有过自主的自我管理的城市。

这种自发的民主精神及晚些时候清楚表达出来的民主思想，也经常反映在俄罗斯社会上层的精神世界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所有改革运动和民主运动都产生在俄罗斯相对享有特权的集

团中。

在思考俄罗斯民主的未来时，我们还只是刚刚开始认真考虑和分析这些客观因素。不管俄罗斯遭受何种诅咒，事实上俄罗斯一直在追求自由，但是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总是磕磕绊绊。

显然，在俄罗斯社会的本性和历史中，有着非常重要的、非同一般的、但是目前我们还无法理解的、没有研究的“某种东西”。

我认为，指责改革派在开始大规模的改革时还不认识“某种东西”，这是不公正的。

这样的认识至今谁也没有提出来，如果有了这种认识的话，那就可以完全有理由据以得出结论说，在对俄罗斯现实的社会历史因果关系的理解上根本还没有任何新发现。

但是越来越显而易见的是，正是暴力阻碍了俄罗斯的发展。

在这种条件下，唯一有效的良药可能是言论自由，改革正是由言论自由开道的。因为这是社会能够区分以下事实的首要条件：

哪是现实，哪是空想；

哪是生活产生的问题，哪是玩弄词藻或厚颜无耻的蛊惑宣传；

哪是在行的工作，哪是巧妙的欺骗、故作姿态和妄自尊大；

哪是心、智都很紧张的工作，哪是玩忽职守和毫无责任心的工作；

哪是社会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哪是无空气和阳光的冰冷观念；

哪是真诚为民服务，哪是肮脏的夺权斗争。

换句话说，社会应该在活生生的生活镜子中而不是扭曲的社会映象中看到自己。

只有转向作为内外政策的道德基础的个人自由和全人类价

值，才能实现我国历史上没有先例的社会制度的重组。

重视全人类价值，这是既出于道德考虑，也出于完全实践的考虑而提出的要求。这是由于理解到正在抛弃斯大林主义及其结构重负的国家需要一种至少会被多数人接受的思想。

但是这些想法不是注定能完全实现的。

二

1990年我在《莫斯科新闻》报上发表了一些题为《我们民主的陷阱》的随笔。它们受到了朋友们的赞扬，而许多人却没有予以注意。如果那些日子的恐惧和潜藏的惧怕没有成为今天的事实的话，我也不会重新提起这些随笔的。

在发生所有叛乱前我写了些什么呢？

现照录原文如下（只作某些不重要的删节）：

“今天主要的危险是那些陷阱，我们如身陷其中，我们的民主注定会遭受失败、长期的和战略性的失败。

这种危险的根源在何处：

在社会及其历史和状况、成就和不足之中；

在目前大众注目的问题之中：这些问题在多大程度上能用民主的方法和手段加以解决；

在人民政权的本性之中：民主如同所有其他东西一样并非绝对的善事。民主可能导向灾难。为使灾难不会发生，应该很好弄明白这个可爱的孩子的本性所产生的种种缺点……

即使从最好的动机出发，执意追求加快向民主过渡，定会破坏民主的威信。

现在的任务是不要建庙宇，不管它看上去多么漂亮。但是要使我们眼看着正在起步的民主进程永远不致倒退的事。要做到使改革派和今天的反对改革的人都相信这一进程并学会珍惜它，根据正常生活的法则，反对改革的人对民主的需要并不比其他所

有人少。

当然，民主进程的发展有股猛劲、不太平稳、时起时落。对此应有所准备。但是，无论谁执政，除了民主进程外就是权势主义、反对异议人士的不断内战，两者必择其一。

对民主社会在多大程度上已作好准备？还没作好充分准备，这是清楚的。但是既然没有别的社会，那么这个社会从哪里来呢？

因此‘准备好了还是没准备好’这样的话是空洞的，而且是有些不道德的……我们对许多事情不太知道，不太理解，靠神话过日子。现在重新开始数数，正在形成自我选择的形势……说什么‘政治文化修养不够’，‘一般文化修养不够’，这样的评价已经令人厌烦了。

让我们换一种方式提出问题：我们是否具备正常的民主生活的素质？有。我们是否有文化修养呢？有。那么我们还应该具体掌握些什么、学会些什么呢？这是问题的另一种提法，这是一种使人高尚、令人信服、真正人道的提法。

这里是第一个陷阱——惧怕真实的生活。人们总是惧怕什么，害怕情绪统治和控制了人、社会、国家机构。理智正在丧失，本能发挥了作用。众所周知，本能是几千年历史养成的：打呀、压呀、关呀、杀呀、禁呀、抓住不放呀……

第二个陷阱——‘贵族小姐心态’。说什么生活中的一切都应该是理想的。如果还不是这样的话，无论如何应该达到理想。希望今天已经达到，万不得已时也要明天达到。这是导致精神变态的典型心态！但是由于许多原因生活永远不会是理想的。

我们害怕冲突，害怕公开性和民主化的进程会暂时引起冲突的升级。

我不想说，只要从一切生活领域中能很快地卸掉沉重负担，只要蒸汽能带着哨声散发出来，就不可能再有别的选择了……

我想强调的是另一点：民主并非是制止冲突的途径，民主是文明地、非破坏性地而且是创造性地解决冲突的途径。

第三个陷阱——妄自菲薄综合症。朝这一方面的歪斜是显而易见的。假爱国主义的反动势力正是利用了这种情况，企图积累资本，偷偷散布社会遁辞：说什么人民受了委屈。

我们说：人民根本不可能受委屈。

问题比较复杂：妄自菲薄是对几十年埋下的自我欣赏、自满自足及其对立现象的自然反应。应该摆脱妄自菲薄，但是一定要
进行诚实的清醒的分析。

第四个陷阱——言辞的迷惑性。我们是善于并喜欢言谈。在民间早就有人喜欢能说善辩的撒谎的人，甚至明知某人是撒谎者，还是听他讲。该是学会用实际作为和实践效果的标准衡量所有人所有事的时候了。把蛊惑分子比作巫师不是偶然的：他们都运用言辞、手势、仪式。我们的民主派很容易热衷于作不负责任的允诺、搞游行和罢工、发出政治叫嚣。

第五个陷阱——宣扬否定一切的民主，这种民主会产生灾难。

通过否定获得的自由，这是负面自由，它最终会从内部毁了民主本身。如果不是用明目张胆的、赤裸裸的暴力，那么也是由经济和社会的混乱来毁坏民主……把民主仅当作破坏的武器加以利用是毫无意义的、不允许的、危险的。

第六个陷阱——否定管理。如果认为群众集会、各种会议能够实际管理国家、社会，那是天真的想法。我们习惯于把管理阶层看作是独断专横的阶层，因为管理阶层过去就是这样的。由此社会上总是鄙视专业管理。不管是在‘上面’（这可以理解），还是在‘下面’，那些惯于搞唯意志论的人似乎觉得专业管理者最多不过是个头脑简单的理想主义者。

今天很清楚：职权范围明确的地方，应有职业家参与事务。

民主离开专业的高素质管理机构，则一钱不值。”

我今天仍赞成我五年前写的东西。生活继续为社会和人设置陷阱，有时是阴险的和难以解释的陷阱。

三

受美丽的幻想或无可指责的纲要影响而得到的精神舒适感觉，真是令人陶醉。但是当纲要失败、幻想破灭时，现实生活就成了不明不白的生活，而如果现实生活的过错在于玫瑰色的梦不能实现，现实就引起人们的忿恨。

如果说起国家的现状是不是也这样？我们是否会当可能给我们唱些阴险的、含糊的歌的感情的俘虏？在繁忙的政治游戏中是否会最终失去理智？

我们擅长于辱骂一切。我们一味颂扬列宁和斯大林及其帮手，只是在他们还活着的时候。

我们仿佛已经忘了，1985年以后人获得了自由，恐惧感已经消失，血腥镇压已成为过去，与民主不相容的制度不复存在，不再有上面命令的思想一律和苏共的专横独断。按新的办法进行从地方直至全国的选举。正在形成三权分立的制度。不再有以前的与世隔绝的情况。俄罗斯向所有人敞开了大门。

可以理解的是，根本性变革的巨大的显著成果可能要经过几十年时间才能获得。同样也可以理解的是，在任何社会转折过程中必然要经历过去年势力和未来势力处于势均力敌状态的时期。

在这种快速和多样的变化、相互矛盾的倾向的竞赛中，探索社会政治理想和生活实际之间的最佳关系是十分重要的。

但是在这种混乱中不要丢掉一样东西，这就是要创建一个自由的公民社会，有效的、服从于社会的国家则要为这个社会服务。不创建公民社会，我们的未来将是虚幻空洞的。

不允许退回专政，不允许披着任何外衣的新法西斯势力得

胜。但这只能靠我们。

今天在俄罗斯，许多人都在谈改革，但是宣言经常令人怀疑地缺乏明确界定，不知说的是些什么样的改革。

关于市场也谈论了许多。但是，具有法律机制和其他经济和政治责任机制的面向社会的市场，这是一回事。当市场成为权力无限的国家旨在对社会和个人进行经济迫害的工具时，则是另一回事。

如果把市场作为国家的工具或只服务于狭隘的小集团利益而不是整个社会利益的制度来建设的话，那么俄罗斯极有可能重复许多欧洲国家发生的事：法国的波拿巴主义、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西班牙的佛朗哥主义、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

眼前尽是让人生气的奇奇怪怪事件，无休止的各级政权机构的讼争，政治不文明，大街上叫喊着“整顿”、“交付审判”、“敌人”、“叛徒”等布尔什维主义口号的喧嚷的群众集会，高举“所有时代和各族人民的英明领袖和导师”的肖像。

无疑，任何“自上而下”的根本性改革运动在某个阶段都会面临两种选择：要么迎合“自下而上”的民主倾向，宁可为此丢掉“高位”乌纱帽，要么开始强行灌输自己的主张，再次退回到专政。

发生这种情况的基础依然存在。在地方政权机构保留着专制结构，它们只是装成民主派的样子，实际上在确立反民主的秩序和习惯、部族规矩和关系。

特别危险的是继续存在的政权机构的专横，它表现在其不可预言性上，表现在争权夺利斗争的法律、行政和政治后果上。在过时的法律准则的作用方面、在新、旧法律之间以及新法律与新法律之间的冲突上、在政权机构对采取决策的后果在经济上不负责任上，这种专横表现尤为明显。

在日常生活中特别能感觉到这种专横，只要有人生活和工作

的地方，就会有官僚们的专横。

人得不到保护，避免不了生产者和售货员的专横，避免不了飞来横祸，摆脱不了贪污受贿。

新建的税务警察机构在一些地方成了政治压制和迫害的工具。

遗憾的是，言论自由有时具有独断专行的性质，超出了通行的伦理范围和经常违反基本的人权。这种自由由于政权机构令人吃惊的无所事事而被法西斯、半法西斯出版物广为利用。

今天无政府现象爆发的原因何在？

原因在于社会处于过渡状态：旧的准则、法律、关系不再起作用，新的准则、法律、关系充满着矛盾。原因还在于根深蒂固的民族心理，而改革派对其力量估计不足。

这里只举一个例子：政治和意识形态观点非常不同的活动家们，今天暴露出都不能容忍别人的观点、别人的立场，都表现出同样的非理性主义，同样无视法律，同样喜欢滥用职权和营私舞弊。

这也是一个明显信号，表明斯大林主义的死亡显然还会推迟。

四

危机甚至远比政治学家、专家和鉴定家们相当悲观的判断要深刻得多。

怎么回事呢？我相信，问题在于毒化人们意识的布尔什维主义。

我过去和现在都赞成在民主国家里要有强大的民主反对派，但是坚决反对以民主的名义掩盖宣扬暴力的法西斯主义、民族沙文主义、民族布尔什维主义。

新布尔什维主义正从各个缝隙和各个角落冒出来——它来自

共产党人和反共分子、民主主义者和民族沙文主义分子、旧官僚和政治新贵、市场分子和反市场分子、分立主义分子和暴发户。这种社会心理顽固地存在于各级政权机构及日常行为中。

1993年和1996年的议会选举结果虽然使人感到苦恼，但并非出乎意料的。政权机构令人惊奇的对复仇主义置若罔闻。

不错，民主派糊涂地、傲慢地进行了一场竞选运动。但是他们失利的原因不在于此，而是在于进行改革时没有周密考虑健全的经济观点与国情的联系，因而给居民带来不良后果。人们疲惫不堪，给贫困、政治游戏、大小官僚的独断专横、犯罪猖獗搞得精疲力竭。

这是明摆着的事，无须刨根问底。但是旧制度拥护者和法西斯分子正是利用了这一点进行投机。

民主派的涣散状态，无疑削弱了整个和单个民主派。民主派有责任严厉分析一下自己的失误。

民主派的成功乃是通过了新宪法、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民主宪法。在新宪法中写进了私有权和多党制。

但是，徬徨不安的钟声在我头脑中依然响着，时而大声、时而低沉。一切都是因为盛行复仇的时代已经到来。

是的，斯大林现在还没有完全死亡，他处于不省人事中。但是斯大林偶像崇拜者时刻都在为复活“伟大领袖”的事业而忙碌。

国家分裂（在我国历史上已经多少次了）为两部分完全不平等的人已经40多年了。

一部分人人数较多，他们为暴君的死去而感到悲伤。特别在地方机关很少有人怀疑“舵手”的完美性，认为如果犯了错误，也仅仅是“人民公敌”、“间谍”和“破坏分子”的罪过。

社会已经习惯于接受最可怕的东西，接受这样的事实：在群众集会上、在会议上、在决议中、在报纸上拼命要求处死所有不

同意的人、怀疑的人、自作聪明的人和其他妨碍前进和追求共同幸福的人。看看新闻影片吧，读读那些年的《真理报》吧。

另一部分人——人数很少，他们暗自为吞噬千百万人的恶棍已经死去而高兴。

自1953年起国家处在旷日持久的过渡时期的痉挛中。病态社会的心电图胡乱扫来扫去——一会儿是对自由的期望，一会儿在复仇面前感到恐惧。

1993年10月3日夜，这种恐惧降临到我的头上，这大概是平生第一次。为俄罗斯而恐惧，为俄罗斯各族人民将再次被政治骗子欺骗而恐惧。

当时我在郊外。当电视里播出斯摩稜斯克广场上发狂的“劳动团分子”的镜头时，我明白某种可怕的东西开始行动了。群情激昂的挑衅性说明了许多事情。

我很快来到市里。城市空无一人，没有警察，没有行人。只有红绿灯管理着秩序。

我怎么也不明白正在发生什么事。我打电话到“莫斯科回声”台，同记者谈了话，警告莫斯科人卑鄙的法西斯主义横行于市。接下来的事件是攻击“奥斯坦基诺”电视台和市府，我完全慌了神。

在俄罗斯恶魔旋转木马早就转动了。

多个世纪的国家暴力传统使人处于奴役状态——不能自主的人大量流血的奴役状态。

斯大林主义反人民罪行的规模大得无比。斯大林杀死的共产党人比世界上所有法西斯独裁者所杀死的加起来还多，提醒这一点对当今斯大林分子布尔什维克是有益的。

扪心自问，是什么东西在政治和社会意识中航行时控制着完全是用尸骨雕成巨大怪物的现象。

足够多的东西。

首先是，斯大林不简单是历史上几百个暴君中又一个暴君，他建立了暴政体制、全面镇压个人和社会的体制。但是斯大林主义不仅是靠流血、而且是靠神话来维持的。

关于伟大成就的神话：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内行的工业国，而斯大林死后不久卫星便上了天。

如果不去考虑这一切是靠什么手段取得的，如果忽视道德的话，这些成就是确实的。是呀，做了许多事情，但是，靠的是几百万人因饥饿而死亡，靠的是消灭农民，靠的是奴隶集中营，靠的是河流、森林和土地的毁灭。

其次是，卫国战争的胜利。至今许多家庭里那次战争——二战的伤口还在流血。痛苦难以忍受。这种感情的强烈是自然的，对亡灵的纪念是神圣的。

不可理喻的是另外的东西。为何合乎人情的痛告和欢乐的感情妨碍对自己提出简单的问题：难道离了独裁者（他在战前消灭了上层职业军人）人民就不能取胜吗？为什么发动进攻的希特勒军队只损失 500 万人，而我们进行防御，战斗在自己领土上的反而损失 3000 万人？

全体人民的高度紧张、英雄气概和忘我精神的结果实质上被人掠夺去了，被人利用来神化篡夺胜利的权力体制了。说到这一点难道不心痛吗？

要考虑的只有一点：在战争中和战后牺牲了多少杰出天才、才华横溢的学者、慷慨的和有良知的人们？

但是我们是否经常想起他们？

而我们却记得靠世界级恶棍的阴谋、出卖和暴行爬出去的那些平庸之人。

对斯大林的评价是一个每个人的良心问题，是一种衡量责任心和心理完整性的尺度。

但是不能不看到：几千年来在俄国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暴力

模式还能重新产生疯狂的觊觎独裁王位的人。

断言我们似乎告别了斯大林主义，此话说早了，太早了。希特勒、墨索里尼、弗朗哥的独裁随着暴君的死亡一起垮台了。其中一人的尸体被焚烧了，另一人被处以绞刑，第三人病死。

斯大林主义的境况是另一回事。斯大林主义不是靠战争，也不是靠革命就能抑制得了的。

在俄罗斯通向自由的大门敞开着。民主的前景看好。昔日的社会天真已化为乌有。成就可观。

但是得到的自由还应该发展成为安排以理智和道德为基础的生活的自觉意识。

俄罗斯能够走上这条道路。

今天已经十分明显：应该象避火一样避免社会试验，这种社会试验不是产生于健全思想和智慧，而是产生于头脑发热以后的意识形态幻想、中邪般的骄矜、定位于革命风暴的那种社会和政治思维的惯性。

千年以来斯拉夫民族、基辅露西、莫斯科维亚^①、俄罗斯、苏联各族人民崇拜自己的统治者、王公、大人、公爵、沙皇、皇帝、领袖、总书记、总统。人们神化了他们，相信领袖们能够给人们带来幸福，驱除灾难，相信只有这些人拥有安置生活的秘诀。

虽然非常令人失望，但这种信念今天继续活在众人心里。

布尔什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旋风已经过去，但这并不意味着随着国家极权主义的死亡它们已经消亡。它们还存在并准备新的冒险。

我们这些 1995 年浪潮的改革派，在企图为了真正的宗教和真正的耶稣而摧毁布尔什维主义教堂时，还只是模糊地认识我们

① 16—17 世纪外国文献对俄罗斯国家的称谓。——译注

的宗教是伪善的、我们的耶稣是假的。

后来一切都走向历史指定的地方。不文明和无法纪、贫困和富裕、独创性和玩忽职守、俄罗斯的广阔天地和交通闭塞、政治坑洼、沼泽地和陡坡，都混杂到了一起。

但我还是深信，俄罗斯将是一个自由和繁荣的国家，不过要具备一个必要条件，即新、旧布尔什维主义不要去扼杀摇篮中的新生俄罗斯民主。

第十八章 新俄罗斯与西方

任何歧视和孤立俄罗斯的想法和做法，必然会使国际关系变形，导致新的对抗和冷战。

与苏联改革运动有关的事件，使国际社会措手不及。旧观点的惯性至今还妨碍着制定连续的、负责的、考虑到前景的对俄政策。这种政策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如果不说是短视政策，起码也是观望政策。

西方世界没有清楚认识到，没有苏联的改革运动人类注定或遭受核死亡，或逐步耗尽民主资源和价值。改革中断了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通向世界极权主义的运动。

因此他们也就不会深刻理解，苏联和俄罗斯的改革运动就其历史规模而言具有全世界意义，特别从 21 世纪的面貌和整个对抗后文明的形成的角度来看更是如此。

国际社会其他成员是从自身国家安全的角度看待一个国家的国内事件的（如果这些事件特别具有戏剧性和发生在对世界政治有意义的国家里），这种方法无疑是合理的。

但是试想一下，当言及西方对俄罗斯改革的政策时，不管我们愿意或不愿意，这个问题客观上超出了各方的国家安全范围，也超出了双边或多边关系的范围。

首先，这是因为，安全问题，严格说来可以以不同方式加以解决，其中也包括与民主毫无联系的方式。苏联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有许多外交问题达成了协议。达成的协议都履行了，这些协议今天继续有效，比如在限制和减少战略武器方面的协议。

其次，我完全可以设想，我可能不对或过于谨慎，但是当我

完全同意这样一种见解，即认为只有处在民主国家之间才能达到最大的安全的时候，我还是对把这安全和民主两个概念非常直接地相互联在一起的观点采取审慎的态度。我担心，当需要在国家安全和民主之间进行选择时——如果某个时候要作这种选择的话，多半会偏重于国家安全。

但毕竟到了重新审视限制和削减武器的进程的时候了，不仅是从减少冒险和减轻经济负担的角度考虑，而且要把这看作在世界范围内深化民主的必要条件之一。

民主曾经首先在长期走发展道路的国家中存在下来并感到自己颇具把握。如果在一些个别国家中情况是这样的话，那么显然同样的规则也应适用于整个国际体系。

但是当专制政府向自己提出发展任务时，它必然会面临二者必择其一的境地：忠于自身发展的目标、以民主换取专制呢，还是偏爱专制并为此付出民族倒退前景的代价。

苏联在某种程度上是走的这种道路。它忠于发展目标是毋庸置疑的。这些目标通过什么手段和方法达到则是另一回事。但是最终正是发展、发展的逻辑和需要向苏联、苏联境内的所有民族提出了向民主转折的必要性。当过去的制度不能完成这样的转折时，苏联便不复存在了。

因此，我认为，俄罗斯的民主最终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得以确立，即俄罗斯本身要尽快并彻底转向合理的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是别的什么，因为只有发展才能为俄罗斯民主提供它今天所没有的和来自外部的任何作用都不可能创造的一种东西：广泛的、具有充分根据的社会经济基础。

此外，现在俄罗斯需要真正溶入世界经济，而不是需要特权，不是需要特殊地位。这种溶入是建立在共同基础上的溶入，这种溶入是按照共同的原则，用法律上、政治上和实际上可运用的可能性，在与别人竞争的同时，谋求自己的生存。

俄罗斯很像长时间闲坐在家的伊里亚·穆罗梅茨^①，只是某种魔力妨碍他扔掉身上的枷锁和懒散。

俄罗斯可悲地缺乏这种心灵启示，对于许多欧洲国家来说基督教某个时候成了这种启示。改革运动可能会是这种启示，也许将来会是这种启示。

我很清楚，当其他国家感到人有些挤，当它们要腾出地方给新的外来人时，提出政治保证和类似的问题是很自然的。

但是俄罗斯并不是那种应该要求它保证的国家。它本身就不打算坚持何种保证，例如要求美国作什么保证。正是美国最近许多年来坚持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②，虽然通过该修正案的原因早就不存在了。虽然军事敌人已不存在，北约国家不仅不想解散自己的军事集团，而且还在扩大它。从经济合作方面看，也有许多不可理解之处。

此外，我觉得世界民主力量曾低估了专制主义抬头的危险性以及由于两种制度的对立和军备竞赛而逐步减少自由的危险性。

两种制度的军工综合体、情报机构客观上热衷于对抗，而对抗的加剧势必把世界推向专制主义。

这两种基本势力想发动战争吗？当然不。但是生存在全面紧张的条件下对他们来说是非常舒适和有利的。军备竞赛和庞大的维持对抗机构的经费成了世界规模的大笔生意。

① 伊里亚·穆罗梅茨勇士，俄罗斯 12—16 世纪壮士歌中的主人公之一。他的形象体现了人民理想中的英雄。——译注

② 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1972 年尼克松访苏，同苏联领导人举行高峰会谈后，于同年秋天向国会提出了《东西方贸易法案》。美国众议院在讨论这个法案时，众议员杰克逊和瓦尼克提出了修正案。他们针对苏联政府限制苏联犹太人出国移民，在修正案中规定对那些限制本国公民移居外国或向他们征税的非市场经济国家，不能给予最惠国待遇和信贷。这个修正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译注

与其他原因一起，所有这一切给予了俄罗斯的改革一种变型性质，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依靠民族主义瘟疫），使苏联的解体十分混乱。

我认为，客观上热衷于对抗的世界势力，包括在我国的这股势力，至今仍阻碍着世界非军国主义化的进程，阻碍着俄罗斯转上民主轨道，阻碍着新的民主的世界秩序的建立。

可以继续列举类似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不认为这有利于俄美关系。我想指出一点，我遗憾地看到俄罗斯知识分子中的民主派对美国的信任在降低。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某些西方有影响的领袖简直是出卖了俄罗斯的民主，虽说这种民主暂时有些盲目和笨拙，但毕竟是民主。

世界力量的新格局把资本主义（这种称谓是有条件的）推到了既对资本主义本身、又对人类充满潜在危险的境地。这就是出现单一垄断者的境地。更何况，许多人不管是否有根据，把某种希望寄托于这个垄断者。今天人们愿意在许多事情上原谅这个垄断者，准备让他放开手脚去干。

可以说，资本主义突然得到了一笔可观的心理和经济信任的高额贷款，这是资本主义史上从未有过的。

这样的贷款无论对于贷方还是受贷方都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历史已不止一次地证明，任何垄断主义都是没有建设性，而是有破坏性的。

我既不属于对资本主义的热心崇拜者，也不属于它的反对者。

一切事物都有始也有终。有一点很清楚：将来的世界将变得比今天更拥挤、更互相关联、更一体化，而垄断主义在这样的世界上很可能成为最严重的威胁。

人们常说，特别在 20 世纪丧失理智的时代常说，当上帝想惩罚某个人时，他会先使其失去理智。但丧失理智的一种最可怕

的情景就是坚信自己优越、永远正确、无所不能。

已经到处听得见大肆宣扬对共产主义的巨大胜利的自鸣得意的声音，说什么成功地捍卫了民主、保卫了自由经营的世界、在军事经济战斗中占了上风。

对此很难绝对地不同意什么。

使人警惕的别的东西。

首先，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么为什么西方主流保守势力竭力把这种胜利记在自己的账上？因为如果同意西方全面取得了胜利的说法，那么这里也有包括社会民主党、社会改良派在内的其他政治、意识形态流派的不少功劳。

况且，克里姆林宫的改革派们，我根据自身经验知道，他们较之任何别的东西更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方向，并且无可争辩地在俄罗斯改革运动中扮演了自己的角色。

如果是我们改革派自己不靠任何人的帮助驯服了狂暴的极权主义，那么能从何谈到什么样“胜利”呢。此外，还该提醒的是，西方国家机构早就接受了对立的军事阵营的存在了，而双方的军工集团在军备竞赛中早就找到了共同语言。

避免只有俄罗斯反动势力和西方沙文主义势力赖以生存的庸俗评价是有益于大家的，并且在民主远没有取得彻底胜利的条件下更是如此。

其次，现在又有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世界上大家会永远进行斗争，永远会自相争战的观念强加于人。今天战胜了一个反对派或敌手，明天又将战胜另一个。

有一种心理非常危险，即曾使世界陷入冷战、军备竞赛或许多其他纠葛之中的那种心理。怀有这种心理时，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会觉得有敌人，因为没有敌人，这种心理也就无法存在。

那种切断通向精神、思想和随后的政治专制主义道路的心理

制动器和制约器，我认为正在被关于在冷战中和对共产主义取得“胜利”的喋喋不休的喊叫所取代。21 世纪初将面临的主要危险之一正摆在这里，如果人类不善于告别对抗意识的话。

世界秩序问题很尖锐、很严重。但是像饥饿、落后、无知、反对自然和人的战争这些问题，从原则上讲，在已有的知识、经济和工艺条件的水平上今天是可以解决的。

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变化，要求国际社会在所有行动中具备大量知识、洞察力、意志和责任感。

外科医生在走向手术台前就要有勇气、特殊的专业知识，应该考虑到手术过程中的细节及以后的治疗，要预见到可能的复杂情况、困难、不测，估计到误诊的可能性。

这就是说，我们需要新的世界结构、新的国际关系，这种结构和关系会要求摆脱任何武力实践和强力心理，摆脱仇恨和偏执，这些东西曾被用来掩盖国家的或集团的私利，以及权力的利益。

文明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伴随着一个持续不断的争论，即在道德、法律、政治中何者优先：是单个的个人，还是集体的社会。

显然，在 20 世纪行将过去的时候，从原则上讲这个争论已经结束。

正常发展的利益要求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理智结合，这种结合有助于捍卫人的基本权利，鼓励人的创造活动，通过整个社会组织保持必要的文明程度。

正如我看到的那样，问题现在在于，西方民主是否意识到，它是某种包容和力求协调这两个原则的东西，还是使摆针摆向与此对立的一方，即把资本主义仅仅等同于个人主义原则，从而去强化另一种极端性。

但是从另一方面讲，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前“社会主义”地区国

家在克服集体主义的极端性的同时，在实现个人主义原则的斗争中不要匆忙行事。

社会如同自然界，在改造过程中要求备加爱护、大智大慧和慎重行事。谁要不加思索地、不顾一切地摧毁激越的权欲路上的一切，生活就会残酷地报复他。

在当今世界，自由、平等、博爱之路仅有一条：组成国际社会的所有民族和国家的合作、共同发展、共同创造。大家应该明白和认清人类文化、历史的完整性和多样性的意义，也就是说必须把赞成自由和人道主义理想的人团结起来。

前面是新的考验。当人类正在进入非对抗文明和全面改革的时代时，在这样的条件下是否能够提出发展的新目标，这是一种考验。

第十九章 一切有待体验

在解决任何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烦琐争论会使人误入不自由的王国。

结果是，选择可能仅限这两种方案，而现在如果同意社会主义试验业已结束的看法，那么它们之间已无从选择。每一方案内部也不清楚选择的含义可能在哪里。

于是很自然产生一个问题：说实在的，为什么不可能有另一种发展道路、另一种命运，特别在俄罗斯这样的国家？

这一点相当重要，即俄国和苏联都试验了这种和那种社会制度，但两种制度都被推翻了。

这就是说，将形成某种新的“第三种”制度，也许它会吸收已经融入各族人民的生活方式、心理并成为习惯和传统的所有东西。但是，具备某种现代的、对俄罗斯有用的东西，当然要有一个条件，即社会应沿着自然和健全思想的道路发展。

俄罗斯应该对文明的唯一挑战作出自己的回答。

寻找“第三条道路”对俄罗斯来说是个时髦话题。上个世纪

的受过教育的斯拉夫派分子做过这件事，他们尝试着渗入俄罗斯生活的秘密，对俄罗斯人的某种性格特点、心灵“秘密”进行清点。所有这一切做得恰如其分。

现在的民族沙文主义分子喜欢这样的探索，但已经纳入了不学无术的政治投机轨道。他们宣称自己是唯一的爱国者和祖国的保护者，挑起民族纠纷，千方百计离间俄罗斯人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勉强地臆造出某种神秘力量赐予的“特点”、“例外”、“俄罗斯性”。

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反犹太主义通常是一种政治上有利可图的事情。

遗憾的是，这种话题上的政治投机妨碍对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发展的特点进行心平气和和不偏不倚的研究。

俄罗斯也有这些特点，也不可能没有这些特点。



先从 20 世纪俄国开始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造反谈起。造反的原因有许多。

1861 年的改革唤醒的希望并没有带来预想的结果。国家在俄日战争中遭到了失败。1905 年的革命教训也没给社会带来好处。斯托雷平改革受到左右两边来的压力，停顿了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无能表现使人民的尊严丧失殆尽。政权危机和经济危险越来越威胁着人们。

这一切的后果之一是政府同人民不仅是同穷苦人和受屈人，也同包括被称之为许多“第三阶层”、“中产阶级”的阶层代表明显地疏远了。

社会危机如同台风一样席卷大地。在大学生中，不属于革命者的人被认为简直有失体面。

政府注定失败。革命已经来临，这场革命本该是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说“本该是”，因为西欧的政治经验让人这样想。

在西方那里新的、有生气的、充满力量和抱负的经济阶级，要求在政治权力分配中有自己的位置。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无论是共和制还是君主宪政，今天两者很少区别，它们的出现便是结论。

俄国的情况则不同。1917年2月革命主要是专制制度内部解体和脱离社会的结果，而不是新生力量自觉的和有目的的战略后果，因为当这个革命完成以后，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和难以宽恕的事情。在我国没有出现能为了人民的平静生活、正常的日常劳动而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有权威的对社会负责的力量。

刚诞生的俄国资产阶级的经济上的不强、政治上的软弱和处事幼稚的状况不可能让它保持权力。

这个政权在秋季泥泞的道路上、在十月的冷雨中跌打滚爬，不会滥用权力的人中没有人需要这个政权，无论是商界、厂家，还是疲惫不堪的和穷困潦倒的贵族、漠不关心的庸人都不需要它。

只有知识分子在大声欢呼变革，为自由大唱赞歌，不过如此而已。

很少有人想过，无政权的局面使那些不能让其得到权力的人的权欲大大膨胀起来。

一切发生得太匆忙。谁也没有向社会发出警告说在这种情况下以激进的民粹词句作掩护的左、右冒险分子占了上风。左派还是右派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那些冒险分子、历史上的一时得势者极端意识的传播者。重要的是被变化无常的社会之风驱赶的政治上的随风倒。

右派首先尝试了自己的机会。当科尔尼洛夫叛乱失败后，左派星光灿烂的时刻来临了。拥护社会主义试验的人——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开始执政。

他们以不同方式看到了道路、甚至道路的终点。他们在殊死的夺权斗争中还面临你争我夺、互相厮杀。

这是一幅简略图。图的背后是我国的生活、鲜血、贫困、社会痉挛、国民分裂、改革的多次尝试。

为什么二月革命和十月政变的民主热潮（尽管二者有原则区别）竟是那样短暂、那样毫无生气？

为什么恰恰是它们的民主潜力没有人（无论是二月革命思想的拥护者还是十月政变口号的拥护者）认真加以捍卫？

抑或民主在此后对社会生活越有影响的流氓思潮的压力下已经声名狼藉？

抑或民主根本就没有什么客观基础（无论是封建主义还是早期商人发财致富的资本主义都没有建立起这种基础）？

民主的思想至少在最近一个半世纪里与广泛的思想、政治、文化和其他问题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这些问题又都与“俄罗斯—欧洲”的相互关系、最近70年里又都与“东方—西方”的相互关系有关的问题。欧洲经常引起俄罗斯社会一部分用公民意识思考的人注意的东西，首先是欧洲如何解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个人与国家的相互关系等问题。

我完全不想以此来证明，好像欧洲的一切都很优越、一切都可作为标准。连绵不断的欧洲革命、起义、国内战争和世界战争，都证明了恰恰相反。

但是对于俄罗斯来说，至少在最近几个世纪里欧洲始终是它的某种目标。俄国的持不同政见人士有被迫躲藏到西方去的传统，这一情况在不小程度上促进了这种看法。

另一方面，最近几百年中俄国打的战争都与欧洲有关。在天主教和东正教之间、基督教和东正教之间形成了宗教分水岭而且经常处在激昂的、病态的状况。

向欧洲学习（有时是正确的，但做得不适当，而有时则非常

不成功)与反对欧洲主义交替发生。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说移植到俄罗斯土壤的情况在这方面是个反常现象,它最终导致与西方的全面尖锐对抗。

结果在群众意识中形成一种非常狭窄的选择: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

如果社会主义试验以失败告终,那么就认为应该退回到资本主义。如果是资本主义,那么就认为一切都应该像西方一样,因为西方就是资本主义。民主是西方的特征之一,因而也是资本主义的特征。诸如此类的看法都来了。

最令人心痛的是,决不是只有一些见识不多、乳臭未干的年轻政治家,而且还有一些善于思考的人们、不少真诚地主张革新和民主的人都在作类似的议论。

但是统一的、完整的世界只能是多样化的共同体,不然的话就是退化。

甚至我们按惯性今天还在说的“资本主义”,事实上显示着文化、具体的经济、政治、法律等决策的多样化。大西洋的两边决不是双胞胎。如果加上日本的话,那么差别则更大。

历史的道路难以细说,但是我还是要斗胆地说:俄罗斯将形成某种新的、“第三种”生活方式。

我想强调:第一,关于发展的第三条道路问题的提出,完全不是由于从心理上对我们所知的那种“社会主义”失败以后只剩一家的资本主义进行抵制。问题不在于主观偏爱。

今天世界显得这样窄小并看得一清二楚,而一代人的时间里在不同国家里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看得见的是:社会文化,作为一种现象,具有许多参数——政治的、经济的、区域的、人口的和其他的参数。而社会文化从原则上可以用最不同的奇妙的方式把这些参数结合起来。多种可能的一体化、“世界村”的形成,不会取消文化多样化的问题,而在某些方面会赋予这种

多样化以新的力量和新的可能性。这种多样性是不能装进任何神学分类的硬性框架里去的。

历史上从来也没有过完全否定当前时代的多种生活方式和经济制度的某种纯净的资本主义。

同样，世界上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成功地完全摧毁社会生活的原来基础、人类共同生活和合理经济的前提。如果做到了这一点，生活也就枯竭了。

从中引伸出**第二点**：在我的理解中，“第三条道路”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管我们如何界定它们）之间的某种第三种东西，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机械结合，甚至也不是它们的趋同。

这是许多可能的道路的综合，只有不把这多种道路塞进人为的公式中去，在理论或实践中把它们打入非常狭小的意识形态框框中去，才能使各种道路统一起来。

第三条道路不是什么超越历史和可能性的新尝试，恰恰相反。

问题涉及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重大价值的、经过历史检验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基础。

问题涉及在业已形成的条件下最适合的和最有效的社会发展道路和人道主义价值方向。

问题涉及的不是新建资本主义，而是解放被布尔什维主义压制的劳动动力、创造力和旺盛的精神生活。

问题涉及社会生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一切有生命力的东西，保留的传统、多种多样的文化、情感和激情。

俄罗斯的使命是寻找自己的复兴公民社会的结构和价值的道路。我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俄罗斯的发展道路的。

人到哪里都是人。昌盛、富足和社会保障之路，家庭、国家的繁荣之路到处是同样的路，这就是自由劳动和民主之路。

二

在思索“第三条道路”的特点时我抱有一个希望，希望俄罗斯把健全思想作为生活的哲学，把伦理作为行为的道德规范。

当我说到俄罗斯的繁荣、俄罗斯的新民主、永恒的和新的精神财富时，我想的正是这一点。

几个世纪甚至几千年以来，人们把道德和伦理有意识地、直观地或事实上看作是某种高级的非实践的、脱离生活、排斥生活的、莫名其妙的东西。

20世纪提出的甚至不是论据而是账单：如果道德和伦理范畴不纳入到日常生活中去、活生生的生活中去，不成为实际行之有效的规范的话，人类就不可能生存下去。

我不想陷入又一次的浪漫主义的迷误中去，但我还是认为，正是伦理因素、它的积累和发展是人性的文明程度和基础。

回顾过去，你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文明史上的每一次根本性转折，不仅与道德领域的变化有关，而且在许多方面是由这些变化预先决定的。

想当初，接受基督教大概主要出于伦理上的考虑，而不是什么别的考虑。正是这些考虑导致了基督教以后的发展。

以上两种情况对欧洲的政治体制及欧洲各族人民的社会组织曾产生巨大影响。

资本主义的产生同样与又一次的实践道德的演变有关，正如后来道德、伦理因素引起否定资本主义思想的出现一样。

宣告斯大林式试验的结束的苏联改革，也不是始于用计算机运算来决定各种经济决策、军事决策或其他什么决策的选择而是始于简单的道德信念——“这样下去不行，这样下去是不道德的！”

今天在俄罗斯人们大声嚷嚷民主导致道德沦丧、伦理准则丧

失、犯罪猖獗。好像在民主政治时代从别的星球来了一些不讲道德的人，而斯大林制度则是最先在人们关系中灌输纯洁性的。

够了，先生们！今天炸毁的一切都是以前奠定的、积累起来的、受到当局鼓励的东西。布尔什维主义的犯罪世界除了无道德和犯罪行为以外不可能产生别的什么。

民主以什么样的智慧和合理尺度解决道德问题，这是另一问题。我想，在俄罗斯的实践中对道德问题还没有足够理解。

资本主义带来了实用主义的伦理。在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中体现了崇高的理想主义，它依据的是清醒的、脚踏实地的现实考虑。只有存在由知识检验过的生活需求的地方，教权君主传统所灌输的教条、神话和虚礼才会被排挤出去或完全消失。

双重的悖论在于：共产主义学说的出现是对早期的、古典的和衰弱的资本主义的极端性的理所当然的反动。共产主义学说从伦理上否定这种极端性，并要求在当时可以实际达到的认识水平的可能条件的基础上与其作斗争。

而当马克思主义变成暴力夺取政权的意识形态时，当马克思主义开始灌输自己的教条、神话、仪式时，健全思想就会像此前对待侵犯生命的自我肯定力量的其他东西一样来对待马克思主义。

但是如果实用主义具有量化的合理性的形式，它也会导致令人悲哀的结果。

在追逐狭义的经济效益和利润过程中，就会产生许多不公正现象。不合理消耗资源，给自然界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出现过曲解合理性的例子，其中一个例子是军人和学者曾计算出消耗最低、最有效的军事行动方案。伦理对此无话可说，暴力逻辑依旧存在。

换句话说，习惯于穿合理性外衣的健全思想也能够把人错引

到无道德性上，而不管它是在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基础上做的，还是在个人、集团的起码利己主义或表现为阶级利益或国家安全利益的大众利己主义基础上做的。

甚至伦理思想大加赞扬的健全思想，在某种看不见的界线后面，也能变成自己的对立面。它和所有其他东西一样需要自己的平衡力量。必须在以全人类价值为基础的伦理领域寻找这样的制约器。

遗憾的是，在许多情况下非道德性暂时还占上风。任何地方还没有建立起道德神殿。

让我们列举几个最明显的例子。

1917年的政变，宣布了非常崇高的目标，毫不迟疑地抛弃了道德规范。

采取对抗政策作为生活方式，人类濒于一切都不存在的境地。道德和伦理标准又一次被搁置一边。

难道现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方面所发生的一切从本质上讲不就是同样的事吗？

当然，过去和现在都有过公然无耻的生态犯罪。但是主要的生态危机毕竟不是生态犯罪产生的，而仿佛是合理的经济考虑、财政考虑、工艺考虑产生的。完全忽视了普通道德：不能这样对待自然，这是不人道的、不仁慈的。

我故意举出这些例子，为的是强调一个简单思想：道德因素的严重匮乏并非总是某种罪恶阴谋、某人的过错的结果，而是人、人类、文明的历史状况的直接后果。

说到人的智慧和精神状态受历史条件的局限时，我指的首先是这一事实，即迄今的全部人类历史，是暴力的历史。

暴力在人类历史上总是全面的。

暴力不仅表现在战争和冲突中，而且表现在很不发达的经济的强制中，表现在自然力的无比强大中，表现在对自然的恐惧

中，表现在知识的缺乏和弱点中，表现为由于社会和其他原因不能组织适当的社会生活形式，表现在人在无数自身创造的罪恶面前的软弱性上。

今天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十字军远征，宗教裁判所，迫害异教徒、反圣像崇拜者和教派信徒，烧死巫婆和一切其他何种宗教正统信徒的暴力主张，都不会使人接近上帝，也不会使生活更有道德和更崇高，正如在宗教战争中消灭异教徒没有和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当非暴力成为生存和发展的无上命令和条件时，新的时代不可避免地会替代长期的、可悲的暴力时代。

但是非暴力只有依靠伦理才能维持。

一个得以足够准确校正的时代即将来临，伦理原则在与俄罗斯改革运动有关的事件中，曾经起过、现在也正在起着这样的作用。但是现在已经清楚，从重新实行的封建主义转向公民社会的已经开始的伟大转折，离开了伦理原则、道德声音是不可思议的。

对于我们这些改革派来说，对于那些开始改革的人来说，对于那些向专制主义挑战的人来说，对于那些蔑视自身权力的诱惑力而义无反顾地转向民主的人来说，对于那些坚决拒绝像疾病那样的国际对抗的人来说，道德问题是个首要问题。

历史的曲折是不可避免的，难以猜测的。但是有一点很清楚，发展在许多方面已经不可逆转。现在这种发展本身获得了自由，它在教导和告诉我们过去我们想都没有想到过的东西，启发我们的思维，以及怀疑，不断向我们提出许多问题。

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对开始了改革不懊悔吗？”“是不是可能有别的办法呢？”

我不想讲自己，我也不想责备自己。况且，我是幸运的。

虽然我想当时应该更严厉地、更坚决地在文化、科学、新闻

等领域进行民主改革，不应寄希望于那些公开反对自由和公开性方针的人的良心自动发现。这是当时的一个错误。

但是在批判性地分析自己的政治行为时，我感到，我得了1972年在《文学报》上登的那篇文章的“综合症”（它妨碍了我），准确地说，是那种曾经压制我并至今仍企图压制我的恶意批评。

我不想装成“坚不可摧的人”——卑劣的乱扣帽子、子虚乌有的诬蔑、政治讹诈、威胁达到了目的，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这种形势抑制了我的决心，这是因为我怕陷入被指责为“复仇者”、“泄私愤”等等的境地。

同时我也不想说，我保持了郁闷的沉默。除了发表公开演说外，就这个问题我给戈尔巴乔夫写了几封短信。我摘引其中两封。

第一封写于1987年5月。

“米·谢·戈尔巴乔夫：

当人们批评你时，沉默是可耻的，也就是犯了某种道义上疏忽大意的错误，是在耍滑头，难道不是吗？

是呀，说实在的，问题不在于我。当人们在读者中把你当作俄罗斯文学的诽谤者和破坏者来示众时，当然不太高兴。

反驳这种胡说八道我认为有损自己的尊严。

那么为什么我要给您写这封信呢？因为我深信并证明，在非常敏感问题上的突然爆发的蛊惑宣传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穿着极端反动的黑帮分子服装的纳粹主义。这种现象是危险的、不幸的、破坏性的。我不认为，有自己保镖的一个半文盲无业摄影师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对付雅科夫列夫”。有算计和有选择地打人那是很疼的，但我想说，也没有什么可畏惧的。这里有些事可以思考思考。

另外一件事则更重要。今天把时钟拨向蛊惑宣传轨道：为煽动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的关系、民族主义、共济会组织^①、反犹太人主义，这对谁有好处？任务很简单：激起当地的和任何其他的，多半是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鼓动人们去进行那怕是小规模的“民族大屠杀”……

这就是为什么说今天主要的社会政治问题是，巩固民族联盟、反击对这个联盟的任何蓄意侵犯、利用这个联盟以利于社会生活形式的革新。

在极端民族主义中什么事特别危险？这就是通过提出令许多人不安的敏感问题诉诸人们的感情。首先有文化遗产、国家文物、生态、反酗酒等问题。但这仅仅是一种“掩护”，而主要的是强使接受一种思想：俄罗斯存在的一切无序状态和问题都是“共济会阴谋”的罪过。

第二封信写于1988年1月。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我感到在道德上需要向您道歉，在电话中谈到H·伊利英娜发表在《星火》杂志上的文学批评文章时，我还没有读过这篇文章就议论起它来了。

现在我着迷地读完了这篇文章并觉得，这篇文章正确地反映了作家圈里的情绪。它批评的主要是人的野心，最近几年大膨胀起来的野心，而不是个性。

人们现在又感到心寒，特别是在中央书记处公开尖锐批评这

① 共济会，18世纪初产生于美国的宗教道德运动，传播到许多国家，包括俄国。其名称、组织和传统来自中世纪石匠和建筑工匠行会团体，部分地继承了中世纪骑士秘密修会的传统。其会员希图建立一个全世界的秘密组织，以达到其他全人类联合在宗教兄弟同盟之中的乌托邦目的。——译注

篇文章之后。

我请您读一读这篇文章，如果您还未读的话。

当然不能无保留地接受伊利英娜的文章。这篇文章太苛刻了，引起了不必要的骚动等等。

问题总的来龙去脉毕竟远比在讲台上所溅起的水花要深刻得多。

我顺便给您寄去1969年的文章，《星火》杂志上的文章曾提到这篇文章。那篇早些时候的文章最终毁灭了《新世界》杂志，这对我国整个社会生活有着最严重后果。

首先，这篇文章促进了诸如“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及其一切后果这样的现象（60多位作家和300多位艺术家离开了我国）。知识分子至今还记得那篇文章由11位作家署名。今天几乎所有这些人都是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包括现在的普罗斯库林^①在内。

其次，这篇文章埋葬了苏共20大唤起的希望。

我想对您完全负责地和出于良心义务再次说，所有这些人至今认为自己是真正的即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的“支柱”，其中3人——阿列克谢耶夫^②、维库洛夫^③、伊万诺夫^④继续在领导几家主要的杂志并在思想上又觉得自己是胜利者。所有这些杂志进行着

① П·Л·普罗斯库林（1928—），俄罗斯作家，著有描写卫国战争、现代生活和农民的长篇小说《苦草》、《结局》、《命运》等。——译注

② М·Н·阿列克谢耶夫（1918—），俄罗斯作家，著有《面包是一个名词》、《卡留哈》、《不屈的小柳树》等小说。1967年起任《儿童文学》主编。——译注

③ С·В·维库洛夫（1922—），俄罗斯诗人，著有《争得的幸福》、《土地的主人》、《湖那边》、《犁和垄沟》、《始终不渝》、《农村的来信》等诗集。曾任《我们同时代人》杂志主编。——译注

④ А·С·伊万诺夫（1928—），俄罗斯作家，著有《阿尔金的歌》、《牵牛花》、《永恒的召唤》等小说。曾任《青年近卫军》杂志主编。——译注

露骨的反对改革的工作，如同以前反对 20 大。

仍举着社会主义、价值观、爱国主义那些旗帜，而实质是拿人民忠于这些旗帜来投机，实质是，把作家分成“自己人”和“异己分子”，使人民在民族问题上发生冲突，忽视改革的主要方面，用“中伤”、“侮辱”等恐吓人。何地、何事、何时？什么具体的也没有。痛骂报刊成了一种时尚，但是举不出事实来，说问题不完全在报刊，而在于改革。

我相信，还有很多人想使党偏离改革方向。还是那些“自动枪手”举起了枪，但是他们的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与改革产生的那些价值观相去甚远，正如革新时代的真正良知与过去年代包括不久前年代的耻辱相去甚远。

亚·雅科夫列夫”

因此，我于 1987 年春天就提出了纳粹主义问题，但回应的是一片沉默。不过我还是认为，信总归只是信，自己应该行动果断一些、坚决一些，而不要自己翻来复去地瞎想，不要寄希望于有人为你“鸣不平”、“挺身而出”你。真如谚语所说，愚笨之害甚于盗窃。

那么，我们对开始了改革不懊悔吗？不，再说一遍，不！

我们改革派希望我们的人民扔掉自己身上的专制主义枷锁，我们做到了这一点。

我们改革派幻想着结束致命的核对抗，制止疯狂的“冷战”。这一点我们也做到了。敌视的时代已经过去。

我们致力于诸如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那样的悲剧不再重演，致力于欧洲摆脱柏林墙的耻辱，致力于东欧各国人民能够在自由的社会选择基础上发展。现在我们有权利说，为了不仅不妨碍，而是促进东欧国家的和平改造，为了实现德国的和平统一，我们做了可能做的一切。

我可以深信不疑地说：我们所做的一切，足以问心无愧地从政治舞台上退下来，既不感到委屈，也不应受到谴责。我们从来也不认为暴力是掌握政权的手段，这是人格问题、道德问题。

我个人相信历史的终极公正性，历史作出的评价是不会错的，历史是按自己的、虽然是难以猜测的乐谱演奏乐章的。

当然，改革之初，我们许多事情没有预见到，也不可能预见到。我们没有想象到，社会组织的解体过程会走得多远，生活的道德原则会丧失到什么程度。

建立在暴力和恐惧上的社会是不能改革的，我们面临的复杂历史任务是拆除有其意识形态、经济和政治根源的制度，这种理解来得迟了。

遗憾的是，用在“完善”政策上的时间和精力太多了，结果是改革自己“吃掉了”自己，不太有效地消耗了自己的潜力。

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中央政治局里是很有民主气氛的。这种气氛有助于改革，而有些情况“妨碍”了改革，使改革（由于无穷无尽的妥协）不彻底、不明确、太缓慢。

干部政策导致悲剧性结果。这种干部政策与新的精神和政治现实处于令人愤怒的对抗中。

正是在这个根据社会出身和意识形态选择干部的做法、即按官员名录委任干部的做法在整个苏维埃政权年代第一次应当衰亡的时候，旧机构的一些最保守的代表人物却往往是在这时候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这些人实际上是一些改革的政治反对者、道德空虚的人。

我认为，戈尔巴乔夫抱有一种幻想，即想通过委派一些拥护旧制度的人担任显职并用他们的手实现民主改革，指望图报，结果适得其反。

结果是改革的威信发生了动摇，开始了从国家领导职位上排斥掉一部分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民主力量的危险进程，支持改

革的社会基础被削弱了，对领导改革的能力丧失了信心。

今天许多人写文章说戈尔巴乔夫的不一贯和不坚决冲毁了改革的威信和对改革的信心。

是呀，不可能没有失误。有时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决策迟缓，经不住自己周围最有野心的“领袖们”的逼攻，害怕引起军人的不满，企图调和不可调和的事。民主和集中领导、市场和国营商业，党内的不同派别和许多其他东西。他相信苏共能成为改革的主导力量的时间过长了。

那么，其他人到哪里去了呢？

太不应该把错误推到某一个人个人身上。这很容易，但很庸俗。

历史一定会把我们的改革运动评价为一种伟大的和勇敢的步骤。但是领导改革的高层人士都是些如此不同面貌、不同头脑、形形色色的人，以致在改革的一些根本问题上不能取得一致意见。

我不能指责谁，我也不想指责谁。当时我没有看到什么恶意思想，我认为它是在后来出现的，那是1989—1990年当权力从包括党、政、军、监察机构等在内的整个机关脚下开始失去且很快失去的时候。

现在许多前领导人都在写回忆录。自然是写些恭维自己的东西。可是，何不认真说说呢？

不难回忆一下，多少时间花在了谈论媒体的“破坏作用”的毫无意义的议论和争论上，而不是去按照改革的战略目标一步接一步地前进。

各种会议、冗长的发言、全体会议、代表大会代表了细致的、具体的日常工作。一句话，忙乱。

多少激情用在解释哪个是第一位的，哪个是第二位的，是政治还是经济！

而时间在过去，而且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今天不应该去确定谁错多、谁错少。对所做的工作应该感到骄傲，而不要吐吐沫，抹眼泪。干了一件伟大的事业，哪怕有错误，宣布自己同这个事业毫无关系，而且还和狂吠的政客们沆瀣一气，那是不道德的。

不过主要的毕竟不在于此。

在许多方面，虽然不是在所有方面，已经进行过的改革注定有前后不连贯性。

要是在改革的最初年代搞前后连贯的急进主义就会危害涉及所有领域的进化性质的改革思想本身。而党机关、国家机关、镇压机构和经济机构联合起来反对改革会把国家抛回到斯大林主义时代。

不妨想一想，如果没有改革运动，如果没有以民主为目标的新政治，今天指责第一次浪潮的改革派不一贯和不坚决的许多人，恨不得一生都当虔诚的、听话的官僚或正统的学者才好。

回避不了这么一个简单的真理，是党和国家领导层中很狭隘圈子里的人开始了改革，是根据高层“机关权势分子”的倡议开始摆脱斯大林主义，随后摆脱所谓的现实社会主义。

自上而下的改革道路有其自身的优势，但是也有自己的坎坷。自上而下的改革确保了旧的协商一致原则、发展的某种继承性，得以保持稳定，避免社会的崩溃，这样就有可能吸引一部分管理者参与改革。

同时囿于在旧的党的合法性范围内去进行改革的政策束缚了人们的手脚。这种政策阻碍人们说出关于封建主义式的社会主义及其危害后果的全部真相，是强大的党的等级制度不能允许事情这样发展。

这里大概正是忏悔的时候。

布尔什维主义具有虚伪性、两面性、欺骗性，这是大家知道

的。但是在那几年中如果与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采用直线进攻的方式进行，而不作任何妥协和让步，那么这个斗争就注定要失败了。走这样一条路从表面上看来是真心诚意的、道德上是纯洁无瑕的，但在与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的具体条件下，这条路有同自我欣赏混杂在一起的利己的味道。

应该讲策略，对有些事缄默不言，有些问题要绕着走，但这样却能达到在“纯洁”的斗争中是不可达到的目的。

这里显然有道德冲突，但是，唉，事情历来如此。

对于我个人来说，主要的道德原则一开始就是，在向崭新生活过渡的时期避免国内的武力冲突。

在我国土地上迈步前进的改革运动和道德原则是不可分割的。只有一颗冷酷的心，要想改革社会、把社会从落后和贫穷的泥坑中拯救出来是不可能的。道德和伦理不容许单纯地去算光秃秃的帐。

对物质上的艰辛，人们回忆起来总会带有遗憾和忿激的心情。

对自由的精神财富，人们将永志不忘。

有人反问道：“如果周围都是些流血和秽事、无道德行为和犯罪行为等不可思议的事，还有什么道德可讲呢？”我知道，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见是合情合理的。

是的，是这样。

社会很难走上笔直的和坚硬的道路。但是自由逐渐进入人们的意识，这就是改革事业得以生存的保证，这就是任何严寒不能摧残在俄罗斯破土而出的善良、道德、人性的萌芽的保证。

人类长期一直在争论，至今还在争论人类历史运动的目的。

我认为，在20世纪末，在许多世纪的精神和社会经验的熔炉中铸造出了一个简单的认识：真正的目的在于创造使个性完全自我实现的条件，这样就会使生活变得体面、自由和幸福。

养活受饥挨饿的人，治疗有病的人，教育缺乏知识的人，为愿意劳动的人提供机会，促使不愿劳动者和懒汉参加劳动，保护弱者和生活艰难的人，使人对明天充满信心，但不让信心成为指望他人供养的依赖心，找到与人道主义理想相结合的社会动力的可靠手段，学会用行动、而不是用暴力反对社会不公正现象，使人民避免战争和暴力。我觉得，所有宗教、所有意识形态学说和所有政治派别的皈依者和拥护者都会同意这些目的。

今天争论的问题是这些目的孰先孰后，孰主孰从，然而主要的问题却是达到这些目的的途径和手段。所有改革运动实际宣称的是同一个目标，但是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途径和手段，采取的行动也不相同。

手段的问题，是最高层次上的道德问题。

我觉得，无愧于人的世界只能建立在道德上具有理性的自信心、对自己的行为、要求和期望具有自己的尊严感和分寸感的道德基础上。

我想特别说说这种道德的三点内容。

一、承认人的自我价值、优先于任何形式的社会组织的人的无条件的优先地位、人的权利和自由的不可分割性，从法律和道德上保障人的荣誉和尊严；

二、确立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原则，崇尚劳动和成就，鼓励一切促使知识增长和文化发展、与自然关系和谐和增加自然财富和生命潜能的事；

三、严格遵循“不要做败坏事情的事”的准则，因为我们的知识还不多，而错误的代价可能非常大。

今天设想的人的真正生活之路正是这样的路，这就是俄罗斯开始铺设的路。

道路将是困难和漫长的。在从简单的向复杂的道路过渡的时期不得不克服客观的坎坷、自身的愚蠢、张惶失措、奴隶被捧上

自由的基座时所表现的恐惧。

承认有关自身和走过的路的真实情况，决不意味着可以随便轻视千百万相信美丽神话的诚实人的自我牺牲精神。难道不是这样吗！

自己能说实话乃是勇敢和刚强的表现。要过无愧的生活只能靠说实话。

在本书结束时我要这样说：

我们的确需要一个伟大的俄罗斯。

但是伟大不是靠帝国的野心和军事实力，而要靠人民的美德和生活的质量。

俄罗斯只能在自由的条件下，在法律至上和人的权利高于国家利益时才能达到这种伟大。

一切都是相对的，只有人、人的生活、死亡和不朽是绝对的。

附录：

雅科夫列夫生平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联邦总统属下的为政治镇压受害人平反委员会主席、国际民主基金会会长。1923年12月2日生于雅罗斯拉夫尔州雅罗斯拉夫尔区的科罗廖沃村。俄罗斯人。

卫国战争期间在沃尔霍夫方面军的海军陆战队第6旅服役（1941年至1943年），曾任排长。重伤后，作为残疾军人回到家乡。

1943年加入苏联共产党。

1944年毕业于雅罗斯拉夫尔国立乌申斯基教育学院历史系。在学习的同时，担任该学院的军训体育教研室主任。后来曾在苏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一年。在苏共雅罗斯拉夫尔州委当过指导员。1948年起任雅罗斯拉夫尔州报《北方工人报》编委会委员。1950年至1953年为州委院校部部长。

1953年至1956年在苏共中央机关当指导员。1956年至1960年在苏共中央社会科学学院研究生部学习。其间1958年至1959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

后来又回到苏共中央当指导员、处长，1965年起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从1969年至1973年的4年为代理部长（在苏共领导看来，雅科夫列夫不够正统，所以没有批准他担任部长的职务）。

1960年通过了硕士论文答辩，1967年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两篇论文都是研究美国对外政策理论发展史的。1969年被授予教授学衔。当时苏共主管意识形态的头头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对雅科夫列夫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同时兼搞研究工作持否定态度。

1972年11月，在《文学报》上发表了题为《反对反历史主义》的文章，批评了纠集在文学杂志《青年近卫军》和《十月》周围的民族爱国主义分子的思想意识。这篇文章被看作是苏联境内意识形态斗争的表现。1973年在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讨论了这个问题之后，雅科夫列夫就被派往加拿大当大使去了，他在那里呆了10年。

1983年，苏共中央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访问加拿大时与雅科夫列夫重叙旧情，后来就坚持把他调回了莫斯科。

1983年至1985年，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在这段时间里，研究所曾向苏共中央报送了关于在苏联建立吸收外资参加的合资企业的适宜性的报告，向苏联国家计委报送了关于苏联在经济上面临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的报告。

1984年，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1985年夏，雅科夫列夫当上了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1986年，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和主管意识形态问题的中央书记（接替米哈伊尔·齐米亚宁）。在苏共中央1987年一月全会上当选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同年六月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在苏共中央1987年十月全会上支持大多数人谴责叶利钦在这次全会上的发言。雅科夫列夫在发言中批评了叶利钦的保守和利加乔夫的偏执。

1988年3月，当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正在国外访问的时候，《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尼娜·安德烈耶娃的文章《我不能放弃原则》。

根据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雅科夫列夫组织了《真理报》编辑部文章的起草工作（该文章于1988年4月5日发表）。

在第19次党代表会议上成立了公开性委员会。该委员会主席雅科夫列夫是这个问题的决议的报告人。

1988年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上对苏共中央书记作了新的分工。雅科夫列夫被任命为苏共中央国际政策问题委员会主席。

1989年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当选为苏共推选出的100名苏联人民代表之一。

1989年12月，在第二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雅科夫列夫以代表大会有关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做关于对1939年缔结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时的情况和法律后果研究结果的报告。根据他的报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在第二轮表决时通过了苏联第一次承认这个互不侵犯条约有秘密记录（原件到1992年秋才找到）的决议案。

从1990年3月至1991年1月，担任苏联总统委员会成员。在被任命为总统委员会成员的第二天，他就申明退出政治局和不再担任中央书记。

1984年起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90年起为院士。

总统委员会解散后，被任命为苏联总统特别顾问。1991年7月29日宣布辞去这一职务。

1991年4月18日，曾致函戈尔巴乔夫，警告可能发生国家政变。

1991年8月15日，认为雅科夫列夫有分裂苏共的言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建议将其开除出党。8月6日，雅科夫列夫宣布退出共产党。

在1991年8月19日政变爆发前48小时，他公开提出有可能发生政变的警告。在政变翌日，即1991年8月20日，他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支持苏联和俄罗斯合法当局，反对政变。

1991年9月末，被任命为苏联总统政治协商委员会成员。

1991年12月中，在民主改革运动成立大会上做报告并被选为该运动的联合主席之一。

12月末，出席了戈尔巴乔夫总统向叶利钦总统正式移交权

力的会晤。

苏联解体后，从1992年1月起担任社会经济和政治研究基金会“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副会长职务。

1992年末，俄罗斯总统下令任命雅科夫列夫为政治镇压受害人平反委员会主席。原先苏联总统属下的，也是由雅科夫列夫领导的这个委员会，它的活动只是调查1930年到1950年的政治镇压事件。而新的调查工作将调查整个苏维埃政权期间的镇压政策。

这个委员会在前后两段工作期间，共为300多万名受镇压的公民恢复了名誉。

同时在1993年到1995年期间，根据俄罗斯总统的命令，曾负责领导联邦电视广播部和“奥斯坦基诺”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的工作。

原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曾指控雅科夫列夫同美国情报机构有联系。根据雅科夫列夫的要求，总检察院对这项指控进行了调查，结果证明，克留奇科夫所写的指控纯属诽谤。

雅科夫列夫认为他本人的政治观点接近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主义革新派观点。

雅科夫列夫继续积极从事社会活动。现今他是俄联邦总统属下的为政治镇压受害人平反委员会主席、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主席、《文化报》公众委员会主席、俄罗斯公共电视董事会名誉主席和俄罗斯知识分子大会两主席之一。

他是国际民主基金会会长，并负责国际仁慈与健康基金会和（俄罗斯）莱奥纳多俱乐部的领导工作。

他发表的著作在25部以上，这些书被译成了美、日、法、德、西班牙、罗马尼亚、意大利、保加利亚、波兰、捷克、立陶宛等多种语言。在俄罗斯革新运动时期出版了《现实主义乃是改革之本》、《领悟生活乃艰苦之事》、《前言·倒塌·后语》、《于事无

补》、《感悟》、《一杯苦酒》等书。

他还在编辑出版多卷集巨著《俄罗斯·二十世纪·文献》（计划要出 80 多卷）。

他是英国达勒姆大学和埃克塞特大学以及日本草加大学的名誉博士，获得过布拉格大学的银质奖章。

他曾获得十月革命勋章、红旗勋章、卫国战争一级勋章、劳动红旗勋章、红星勋章、谢尔吉·拉多涅日斯基宗教勋章、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勋章以及众多奖章。

（根据〈俄〉H·B·希什林博士和Г·B·皮萨列夫斯基博士撰的生平译出，翻译时略作压缩）